

出版说明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幸的是他在一九五〇年因病早逝。

任弼时同志在党的建设、青年运动、军队工作、根据地和土地改革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著作。他的思想理论贡献是我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任弼时选集》,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收入选集的著作,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凡是手稿和已经发表过的文稿,都保持原貌,只做少量文字和史实的订正;对讲话记录稿,则做了文字整理。为便于读者理解这些著作,还做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首页的下边,注释按顺序号附在书末。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

目 录

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九二五年）	1-4
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九二五年 六月）	5—13
一 上海屠杀案之经过	5
二 上海屠杀案发生的原因	6
三 我们对于民众的希望	7
四 反帝运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9
五 长期反帝运动中学生的责任	11
关于共青团工作的三个通告（一九二五年 七月至十一月）	14—18
一 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团的组织（一九二五年 七月二十一日）	14
二 向工人群众解释罢工策略变更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16
三 重视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17
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一九二六年）	19-2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意义（一九二七年五月）	25—29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30—31
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一九二七年 十二月六日）	32—37
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九二八年一月）	38—41
党的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一九二八年 五月七日）	42—45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46—53
对黄色工会的策略（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54
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55—70
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	55
农村工作的整顿与发展	63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 十五日）	71—81
一 改造和健强支部组织与工作	71
二 健强地方党部的组织与领导	75
三 群众组织与政府工作	78
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	82—91

湘西北革命运动的新形势和敌人新的进攻	82
目前党的紧急战斗任务	84
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 二十七日）	92—96
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红二军团的成绩和存在的弱点	92
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	94
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一九三五年九月 二十九日）	97—114
一 在粉碎敌人“围剿”中红二、六军团的基本任务	97
二 敌人“围剿”计划的内容和我们的策略	98
三 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经过	102
四 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及其意义	108
五 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教训	110
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115—131
关于行动的方针	115
二、六军团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	128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132—135
山西抗战的回忆（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	136—149
一 晋北战线的形势与山西在抗战中的地位	136
二 八路军作战的方针和平型关的胜利	138
四 忻口抗战的经过	139
五 我们动员群众的基本方针	142
五 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与敌人对晋察冀	

边区的“围剿”	144
六 山西抗战的几个经验教训	147
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九三八年一月	
二十二日）	150—163
一 坚定我们奋斗的方针与信心	150
二 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巩固与扩大	
国防军队	152
三 建立强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	155
四 努力把全国民众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战.....	156
五 加强在敌人远近后方游击运动的领导与组织.....	158
六 努力争取迅速过渡到抗战局势胜利开展的	
新时期	159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	
任务（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	164—207
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164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	176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状况	188
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199
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一九四〇年	
七月十六日）	208—211
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	212 — 224
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二月）	225 — 230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九四一年）	231—237
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	
七月十四日）	238—245
反对宗派主义（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246—255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256—274
一 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	258
二 对边区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	262
三 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	267
四 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	272
向贺龙同志学习（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275—276
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277—300
一 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的 领导方法和作风	277
二 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	285
三 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	294
四 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当前的任务	297
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九四三年 六月）	301—30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四年四月）	306—348
一 一九四三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估计	306
二 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	308
三 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319
四 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340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四四年十月 二十六日）	349—367
一 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目的	350
二 对湘赣苏区历史上各个时期党的路线的估计	353
三 对湘赣苏区新旧省委成绩的分析	364
南下的方针与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368—38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382 — 384
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五年）..	385—393
一 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	385
二 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	388
三 建设事业的重要	390
四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392
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六年五月）	394—401
提议建立青年团的两次讲话（一九四六年	
八月—九月）	402—407
一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402
二 在中共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六年九月	
十三日）	405
在军委二局全局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一月	
十三日）	408 — 410
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	
的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	411—412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	413—437
一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	414
二 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	420
三 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	424
四 对工商业政策	428
五 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	430
六 打人杀人问题	434
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一九四八年	
五月至六月）	438—456

一 完全抛开党的支部是不妥当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	438
二 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党员（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443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457—461
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的意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462—463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464—473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474—492
一 目前形势与任务	474
二 加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	483
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493—494
注释	495—551

怎样布尔什维克化

（一九二五年）

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1]提出“少年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今年本团第三次大会^[2]亦提出“学习列宁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形式虽不同，然其实质则一。本团的决议就说，本团以后的发展应仿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学习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经验，按照列宁指示我们斗争方法的原则，以扩张增加我们进攻的实力。

但是我们要知道，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使团员大家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如果只以这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那就容易使我们团体变成学院式的组织，或是不落实际而与群众隔离的团体了。倘若这样，不独不能接近群众而为群众的利益奋斗，反足为群众自觉与奋斗的障碍。然则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如何？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改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这是他根据大会决议精神写的文章，刊载于团的内部刊物《中学校刊》一九一五年三、四月份合刊，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要使团体能群众化，当然要注意组织问题，因为我们要接近群众，须纯视组织上的结构是否合于与群众接近的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党与团同第二国际⁽³⁾以及一切自称所谓工党的不同之根本点，就是前者确是要引导群众去作政治的奋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主张革命而不妥协。它把接近与引导群众的工作，视为达到目的的根本条件，所以它在组织上务求其能与群众接近。支部组织乃为接近群众的基本组织方法，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团体组织上与其他假称革命政党在组织上不同的地方。换言之，其他自称革命政党，并没有引导群众，并没有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诚心。它们主张的隔离群众，不过是暗助资产阶级寿命之延长而已。改良组织，务求其能接近群众，乃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工作。

所谓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的意思，就是警告一般忽视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即如本团同志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左”倾或右倾，近来南京同志反郭拥胡⁽⁴⁾的投机倾向，长沙同志反对基督教学生参加运动会的“左倾幼稚病等，都是使我们隔离群众，都是在主义上缺乏正确认识之表现。布尔什维克者若有必须让步的地方，并不完全反对让步，但是让步总要求其对于我们工作的本身没有妨碍，而且利于以后的发展。列宁曾说，我们要会让步，但是

让步时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我们的工作因此陷于恐慌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后与德国单独签定布列斯特媾和条约^[5]，亦即让步而得胜利结果之一例。我们运用政策，须求与主义根本不相冲突，且要善于利用时机以定进攻与退让，如此方可以代表群众，为群众的领导者。所以，求主义上正确的认识，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乃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二步工作。

所谓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意义，表示同志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我们常见有许多同志说：某国的是那样，某地方是那样，所以我们不妨照例去做。从各地报告中亦见到各地工作，往往计划大而实行少。这都是不按实际情形做事的弊病。这样，不是使计划永为不能实行之空谈，就是乱用经验致使工作实际上不能进展，甚至因此而生出许多意外之危险。还有许多同志只顾主义的原则，如封建社会崩坏，资本主义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产生，阶级斗争发现，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等，而不注意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形。与同志谈话时，只说这是马克思或列宁说的，他们是有研究的，这断不至错误。一旦与非同志讨论或争辩时，便被他人责为不顾中国情形的空想家而无辞可答。这都是不顾实际环境，脑筋简单的结果。现在国内国家主义^[6]盛倡一时，他们的宣传比我们更努力，故他们现在是我们有力量的敌人，各地的同志应开始作反对的宣传。然要求反对之有力量，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否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各地以后对于各部工作进行的计划，以及采用经验时，亦务求其合乎环境而能实行，抱“宁缺勿泛”的切实主义。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

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为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三步工作。

同志们! “学习列宁主义”, “获得青年群众”, 都是本团所提出的口号, 这些口号的实质, 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化。现在我们敌人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增长, 对于本团“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 须加倍努力实行才好!

上海五卅惨杀^[7]及 中国青年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六月)

一 上海屠杀案之经过

上海学生，因日商纱厂工人顾正红为要求入厂工作被日人用手枪毙命，及多数日厂中国工人同胞因罢工失业，乃组织学生讲演队演讲募捐，揭露日人的残暴，援助失业工人。学生这种举动，实为热心爱国，不忍同胞被外国人残害欺侮之正当行为，亦为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之所准许。而租界当局竟丢掉平日所谓和平亲善之主张，否认法律之效用，视中国领土之上海为自己属地，对中国国民如农奴时代及殖民地内的奴隶，竟敢逮捕演讲及募捐之文治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

青年学生，较易感受外界刺激，代表社会先进思想，富有反抗能力，对于社会上种种无礼的虐待——何况是外国权力虐待中国学生，当然有所表示，此次上海学生，因为同学被捕以及工人同胞身死，发起在租界上露天讲演，唤醒民众。租界当局不究学生之本心，任意囚捕，并开枪对付几千手无

本文刊载于当时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八十一期，收入本书时第二部分有删节。

寸铁之学生、工人、市民群众，而至酿成这次上海英租界之大惨杀案及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破天荒之绝大风潮。并且，从五卅以后，又连日枪杀并捕捉无辜同胞，武装戒备，调遣兵舰到沪，陆战队上岸，封闭学校，越界行凶，任意搜查旅馆和住宅，俨如战胜国之对囚虏，以致中国民众愈益激昂，全国奋起，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此次蛮横的暴举，掀动了全世界的空气。

二 上海屠杀案发生的原因

自这次风潮发生，罢工、罢市、罢课日见扩充之际，社会上代表软弱人们思想的论调，以为这个事变是学生援助工人强要到租界上去演讲的结果，仿佛是怪学生肇此祸事。帝国主义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则诬为“过激派”所主使，苏俄帮助之所致。这种对于此案发生之推测，离事实实在太远，尤以外人报纸之论调更令人奇异。我们很难相信“过激派”有这样伟大的神通，能指挥全上海工商学界，领导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大罢工、罢市、罢课，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一段极光荣的历史。

然则这次风潮的主因安在呢？若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说：这次风潮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阶段，是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并非因学生援助工人而致于爆发这样的简单，也非少数“过激派”之所能鼓动成功，这不过是敌人想灭杀我们对他们的反抗力的狡计罢了！

现在且将事实分析,我们就可以明了这个解答的正确意义。这次学生援助工人,原由于日本纱厂之工人罢工,日人枪击工人顾正红身毙所致。查日本纱厂中国工人之所以罢工,乃系工人平日饱受日人虐待压迫所激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领土设立工厂,雇用中国贱价劳力,已为侵略国权之不法行为,何况更加以奴隶对待中国工人,使之衣食不敷,饱受殴打和苛刻呢!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工厂中国工人之罢工,乃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压下的一种反抗的表现。上海学生演讲募捐援助工人,表面上为发动之直接原因,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已普遍到全国各地各阶级了,谁不感觉到这种半殖民地的痛苦!近来工部局又有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之提议^[8],和在中国擅恣惨杀人民的种种狂妄和蛮横的举动,以及工部局选举权的不平等。这才是此次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大运动的主因呢!

从全国各地罢课和种种对于上海屠杀表同情的运动上,更明白地显示出是饱受帝国主义压迫所起反应的表现。

三 我们对于民众的希望

我们既已知道这次屠杀,是由帝国主义压迫(强订不平等条约,占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以后中国不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则这种屠杀的事变又将重现。上海为直接受帝国主义压迫最烈的中国领土,所以这次事变乃爆发于上海。如帝国主义仍继续其侵略和压迫的政策,或者还要施行更甚于现在压迫政策的时候,则这样屠杀的事实,不仅将重现于上海,极有发生于北京、武汉、天

津、长沙、广东等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地之可能，而重现的惨剧必定比这次还严重、凶恶。

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这种理由当然为一部分中国国民所明见而深知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绝非部分的反抗力量所能做到，亦非现有的中国政府能以外交手段可解决的。能使帝国主义受打击，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其侵略政策而至于退让者，就只有全民众一致的力量。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真象，并没有十分明了，尤以大多数农民，虽身受其害，然并不知道受害的原因，这是我们反帝运动中的大障碍。甚至二年以前的国民党以及现在的国家主义者^[6]，还不敢提出反帝的口号。因此，我们对于中国一班青年国民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平常我们向一班民众宣传，总难使他们明白反对帝国主义之必要，现在有了这次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事实，当然容易唤起一班同胞的同情。同时须注意民众力量的组织，监督政府防止其妥协和卖国行为，以求达到这次风潮中所提出之各项条件，并扩充反帝同盟的团体变成全国的大联络，集中反帝运动的力量作为长久斗争的根基。遇难的上海国民，应坚持反抗的精神，极力防范上层阶级之妥协及利用，以待全国民众及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援助而求正当之解决。

四 反帝运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在这次反帝运动中，应当明白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对象，及我们主观对抗之力量。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侵略政策，绝无分别，且将更残酷地继续，因为他们在欧战之后的互相关系，已与欧战前的形势不同。美国已经占到国际最高经济统治地位，英法等为求恢复其旧有统治，就只有对于殖民地政策更加厉行，美国为保存其现有势力也不会让英法日等国自由发展其殖民政策，使自己失掉现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政策，是他们存亡所系的重要条件。他们对于我们被压迫民族的侵略，决不能以什么“人道”、“尊重国体”等的美名所能制止的。他们互相竞争，侵略手段必将更残酷。因此，我们应当明白自己的敌人——帝国主义也决不是仅限于某一国而已。我们若以某一国为反对的对象，则无异于帮助其他帝国主义者巩固其在华势力，认贼为父，将使自己更陷于自绝之境。我们要求中国解放的反帝运动，应认清所反对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者。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求得政治经济的独立，脱除帝国主义的一切限制和压迫。换言之，就是推倒帝国主义过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内一切统治的地位和势力，以图民族独立和自由。但是我们要知道，求得这样的民族自由和经济政治独立，绝非以单纯被压迫民族本身的力量所能做到。尤以在各帝国主义国家誓死必争的市场，且为他们的工具——军阀所分据的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绝非中国民众主观力量能求得根本解放而达到国际平等地位的。这种单方面的进攻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侵略

政策。因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注意联络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多方面进攻方能动摇其统治威力。我们应认清，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以刮削弱小民族殖民地及本国工人阶级为生存之必要条件，他们主要的敌人乃是弱小民族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只有这两种力量的联络，一方面在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使其殖民政策的经济根源不安，他方面各本国无产阶级加以政治上的进攻，这方是屈服帝国主义统治地位的唯一要策，亦即为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得到民族革命成功的主要机会。因之，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应极力注意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联络，绝非国家主义者的清高理论所说的，只以中国民众力量就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种清高的国家主义理论，无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实质上则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会。我们要明白，统治阶级的国家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之环境和目标，完全是两样绝不相同的东西。统治阶级是要借国家主义的精神去实行殖民政策；被压迫民族乃是要从各统治国家势力之下去求得自由平等。我们不要忘记，联络被压迫势力，是我们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及推倒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条件。

五 长期反帝运动中学生的责任

这次上海屠杀所引起的全国反帝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上是含有极大意义的。我们对于这次运动的希望，就是使全国民众了解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同时使他们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应注意之点，简言之，就是注意民众中的宣传。学生在这次运动中主要的责任，也就在宣传上的工作；在做宣传工作之先，应认清现代中国学生界的使命。

欧洲学生界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俄国学生在十月革命前，都是革命的先进分子，同情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因为学生中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亦受当时政治与经济的压迫，他们为自身生存条件之改良，所以为革命而牺牲者非常之多。如俄国学生在十月革命前牺牲学业到民间去向农民宣传，风盛一时。现在，中国学生界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无不受尽各种压迫和限制，全国人民无不直接间接受尽帝国主义的压迫摧残，在这种环境下的中国学生，负有民族革命的绝大使命。现在的中国学生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务须将民族革命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的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的工作。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洞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综合言之，目前中国国民革命重要工作之一部即在于宣传与组织，这种工作也就是现在学生界应负的主要责任。

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

注意 取得民众的大多数。遇到必要的时候,流血牺牲亦为革命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宣传与组织的对象应当预先认定清楚。现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这两种中间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因为工人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比任何阶级残酷,同时因受资本主义化的产业发展之赐,使他们特别容易觉悟而进行组织,如最近半年来的上海、青岛、武汉之罢工及全国劳动大会^[9]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因此,现在的学生,应当打消宗法社会工学界限的观念,多注意与工人接洽,帮助工人的教育,开办平民义务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工会,灌输工人政治常识,解释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阶级能早日觉悟而团结。这是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凡在大城市及工业区域的学生尤应特别注意。农民在中国人民中约占百分之八十,大多数因经济落后和交通隔绝,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非常落后。然而我们应认定他们是革命中有力的军队,他们既占人口的最大多数,且在经济生产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绝不能放松。在他们中间工作的环境当然较在工人中为难,其工作的主要点也不外是宣传与组织两项。这种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界应负大半责任,因为学生多为四乡集中于城市的,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特别努力在农民中活动。这种活动的方法当以各地环境为转移,但其共同点,不外为联络本乡同学组织讲演队、新剧团,开办平民学校,组织贫农农会,进行反对地主、乡绅及减租等运动,提倡办合作社、习武团,联络一班先进农民及本乡小学教师组织国民党,作为永久活动的基础。这些都是每逢寒暑假期内可能做到的工作。

总之,我们要明白这次上海的屠杀和屠杀后所引起的罢工、罢课、罢市以致形成全国的运动,绝非偶然无因的事。这次遇害先烈的热血,在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上面有绝大的意义,亦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认为有价值的牺牲。帝国主义者所目视的“贱种”,现在也有了觉悟反抗的能力了,恐怕他们从此也将要改变其以前任意屠杀的手段了。前途事业之如何,还待一班中国青年的努力!

关于共青团工作的三个通告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月）

一 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团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对于发展本校团组织的工作以及其发展的必要，在过去通告以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议决案内，都已详细说明，想同学们亦都明白其必要了。然半年以来之发展成绩，终不及我们所希望应有的数量。这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良好发展的客观环境之故，同时各地同学们之未能对此十分注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前没有注意发展的结果，就使我们的力量不能应付这次全国的民众运动，这固然就是我们的缺点，然也就是促我们自觉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在这次运动中须特别努力于此项工作。盖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我们要知道，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

一九二五年五月，任弼时任共青团中央代理总书记，七月任总书记，由他署名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了一系列通告。本书选编了其中的三件，并加了总标题和小标题。

之时。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吸收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就是对于学生，亦应较前从宽。因为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并非政党可比。暑期回家同学，须使其在乡村活动，图发展我校的组织于农村中。

各地有新同学大批加入的时候，则须进行特别训练的工作，应由训练员若干人专门负责。对于新同学之初步训练，须注意下列数点：

一、说明本校组织的内容及在中国的责任。

二、解释此次运动爆发的原因，各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一致进攻的形式。

三、工人阶级在这次运动中的职责、目的和各社会阶级的趋势，以五卅惨案(7)以来最近的事实证明之。

四、解释我们在这次运动中的政策，及每个同学目前应有的责任、工作方法和校内纪律，并分配实际工作，使他们即刻到群众中间去活动。

此等训练人员，须由各地委及干事会按时召集开会，讨论教育新同学之方法。有 CP^[11]组织的地区，应请其常派代表出席，向新同学做政治报告，说明我们的政策。

(通告第六十二号)

二 向工人群众解释罢工策略

变更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此时各地罢工运动已不能有大的发展，即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亦受军阀压迫而停顿，政治上军事上亦一时不能有所变动；同时，上海罢工已逾两月，经费日见困难，工人群众尤其是上层工人遂日见摇动。我们鉴于工人阶级孤军急进之危险，上海罢工策略稍有变更，即是由工会提出地方的最低要求，大部分是工人的经济要求，得此要求即可上工，其他的政治要求，则力促政府交涉。这个变更的意义，是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并且多提出经济的要求，以坚工人团结奋斗之决心。同时我们要认识，此时只是退守，不是完全退却，因为即是地方的最低要求，也还须努力争斗，始可得相当的结果，决非完全退却所可得着。并且我们应该认识，工人即达到最低要求而上工，只是此次运动告一小段落，决不是全部民族争斗之完结。无论罢工停止与否，工人阶级都急须协同各界努力开辟此次运动之新的途径，即“废约”^[12]与“反奉”^[13]，以冀得到最后之胜利。

各地同学均即须有组织地在同学中，在工人群众中，解释此次罢工策略变更之意义，及开辟新的运动途径之必要，在上海尤属紧急！

（通告第七十一号）

三 重视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农民运动是党与团的一种极重要的工作。占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现在无产阶级势力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紧！

过去本团对于农民运动素少注意，同时客观方面也缺少做农民运动的可能和经验。但是现在因为全国各地之水旱灾，土匪军队的劫掠，重课或预征田赋，以及五卅运动的影响等，已引起农民有相当的政治觉悟。尤以这次国内战争⁽¹⁴⁾爆发，在驻军或作战区域以内的农民，必将更感受军阀压迫之苦痛。这正是我们宣传和组织农民的好机会。

本团在农民运动完全没有发展的地方，当然是还难进行单独的青年农民运动。为使将来有做青年农民运动的可能，目前须极力注意在农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传，以及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极广泛地在农民中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注意调查农民中各种秘密和公开的结社，如红枪会、农民自卫团等，设法派人参加进去，侦探其情形，报告于总校教务处^[15]。为使我们将来在农民中能永常地继续活动，故现在在乡村中发展本校的组织，尤为重要。

在农民较有组织的广东，我们除帮助大学⁽¹⁶⁾进行普泛的农会运动工作外，须开始注意为青年农民及手工业学徒做经济争斗和教育的工作；宜多召集乡村无党的贫苦青年大会，作普通经济争斗和政治的宣传，引导青年农民拥护革命政府，肃清反革命的势力，整顿并发展农民自卫军。尤须注意在农

村中发展本校的组织，以巩固我们自己的势力。

在农民中基督教的势力日渐发展。凡在有基督教势力的农村中，我们应准备于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非基运动周内组织反基督教的大游行，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使一般农民都能了解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关系，借此以鼓吹农民之联合。

以上所指各项工作，望各地详细讨论，按照当地之实际情形规划进行，并将其经过情形及成绩随时报告于总校。

（通告第一〇二号）

怎样使团的工作 青年化群众化

（一九二六年）

这一年以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自前年曹、吴失败后，孙中山北上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中山之死，五卅惨杀，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广州政府肃清反动势力而形成统一的革命政府，奉张势力之崩坏，都是助长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环境。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正是我们深入群众的极好机会。这种好的机会，几乎是其他各国CY所没有的。

在这一年，我们团体工作上自然有不少的进步。团员数量上较第三次全国大会时增加两倍以上，现除贵州、甘肃、黑龙江外，内地各省重要城市，都有了我们的组织。质量上亦有进展，有几处地方的组织向青年工人中发展，青工同志现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工作上颇能领导群众作各种斗争。总之，本团这一年极大的进步，就是由偏重研究性的小团体，渐形成实际领导群众行动的组织，宣传与组织方面都渐深入群众；但是也有极大的缺点，就是工作上没有表现关于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的成绩，未能使全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

本文刊载于《中学校刊》一九二六年第二期，原题为《怎样青年群众化》。

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做了不少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但是学生运动多偏于政治方面，工人运动则重于普通工会方面的活动。因为没有能注意到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以致使学生群众不能坚固地团结在学生团体之下，反而不满于自己的团体，不觉得学生团体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在工人方面，因为我们未能注意青工利益的斗争和宣传，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仰。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未能使青年群众感觉到本团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

过去我们未能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工作，当然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一、因为这一年以来，政治运动很多而党的组织尚小，不能不多协助党的工作之发展；二、还有许多地方尚无党的组织，所以团不能不代替党去指导地方政治活动及工人运动；三、过去学生运动完全由团指导，而学生运动含有极重要的政治作用；四、团员年龄过大，过了二十岁的青年多富于政治趣味；五、缺少青年活动的经验，一般同志还没有明白关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尤其是关于经济斗争工作）与本团发展的关系。以上种种原因，都足以促成我们不能注意本身工作的结果。

上列各种问题，如果不想方法解决，我们的工作当然很难青年群众化。关于第一、二、四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我们必须设法帮助党的组织扩大而强固有力，同时使团员的年龄降低，因此中央曾决定，党团须从严分化，将过了二十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 CP，年过二十三岁之团员完全脱离 CY，即使不到二十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须加入 CP。这个决议有四种极重要的意义，即：一、使党的组织更加扩大而强固；二、使没有 CP 组织而有 CY 组织的地方，发生党的组织，将政治工作交党负责指导；三、使团的组织青年化；四、使团内兼党

员的分子增加，从而容易施行内部教育工作。

这种分化的工作对于团的青年群众化，有极重要的关系。有许多同志甚至是负责的同志，对于分化未能深刻了解，并且不愿意将团的能干分子介绍加入 CP，惟恐团的组织因此而松懈涣散，或恐 CP 将 CY 负责同志调作党的工作而妨碍团的发展。这种心理，都是因为没有明白党发展的重要而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同时，我们希望 CP 方面以后更能帮助团的发展，对于团内负责同志的工作，不要随便调动。

关于第三项学生运动的指导工作，过去由团方面负责，这是过去党与团没有注意群众工作的结果。五卅运动以来，我们看出中国学生运动有极重大的政治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将随着民族革命运动而继续扩大，因此对于以后学生运动工作，已决定党与团双方负责指导。我们应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去提高广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关于为学生本身利益及求自由的斗争之领导。以后须在学生群众中扩大团的组织，尤须注意在中等学校及高小学生中从事发展。

高小学校过去我们未能注意，这也是未能注意深入青年学生群众的结果。为使本团青年群众化，扩大学生群众斗争的力量，养成青年学生做事能力，以后在各高等小学校须组织学生会，并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进行这种工作的第一步当然免不了有许多困难，但我们须开始着手进行。因为高小学生若能有组织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更可以使民族等

等运动的影响扩大而深入民众,于我们工作前途发展有极大裨益。

关于缺少青年活动经验,未认清青年本身利益斗争与团的发展的关系,是平时未有实际斗争、缺少训练的结果,须从实际斗争去纠正这种缺点。换言之,就是只要实际领导青年学生与工人为他们本身利益而斗争,我们自然会得到活动的经验,明白其中关系之重要。反之,我们将永远不会有这种经验,明白此种工作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们在青年工人中,有两种经常应进行的工作,而且只有在这些工作中,方才能够使我们的势力深入青工群众,表现我们做青年运动的成绩。第一种工作就是召集无党派青年工人的会议。以前我们做青工运动主要的方法,只是开办平民学校、组织俱乐部等。这些方法,固然能够影响一部分青工,但其范围总是很小的。还因为我们缺少开办平民学校及俱乐部的经费,这些方法也未能普遍应用。自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已由退守而转入进攻时期,各地产业工人均公开或秘密地渐次组织起来,并时常发动经济罢工运动。在这工人运动进攻时期,我们一方面应帮助普通工会之组织与发展,以巩固党在工人中的势力,同时也正是我们争取青年工人群众的机会。我们应尽量扩大在青工中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实际领导他们为本身利益而斗争。但是现在做青工运动的方法,决非从前仅依平民学校、俱乐部所能收效(这固然也可进行),必须有适合需要的更好方法,方能收得我们工作的实效。这种最适宜的方法,就是在各工人区域,用适当的名义(工会或某种团体)召集各种没有党派的青年工人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以扩大我们的宣传。这种会议的影响,比平民学校、俱

乐部和出版物的力量还要大。关于这种工作的重要意义与方法，中央曾几次通告，但是执行的很少（仅上海、长沙曾举行并有相当的成绩），这证明各地同志对于青工中的宣传工作很少注意。现在在本团提出青年群众化口号之下，各地应详细考虑执行。

第二种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童子团。对于这种工作，本团过去完全没有注意，所以没有很充分的经验。但是在现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时期中，且我们的势力正相当地打入工人群众，有了接近工人子弟及童工之可能。为了养成将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提高对新生无产阶级的教育，我们应开始这种工作。西欧各国 CY 非常注意劳动童子团的组织。俄国有组织的童子团人数在二百万以上，在各城市与乡村无不有他们的旗帜，对于社会生活有极重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应认为组织劳动童子团是本团重要工作之一部分，在各工业区域中去尽量设法建立这种组织。最初色彩不必太浓，纪律不要过严，且加入条件不必过高，力求其能普及。在各乡村中，亦可进行组织。

关于劳动童子团的组织，中央从前也曾通告各地进行。现在上海有组织之童子团人数在八百以上，且很能接受我们的宣传，表现得极有革命精神。其他如唐山、广东也有同样组织。各地亦应注意开始进行，务使劳动童子团的组织能扩大而普及于全国贫苦儿童群众中。

同志们！青年群众化本来是本团的老口号，但过去因为党的组织尚小，党团工作未能分化，所以我们很少做出青年运动成绩；同时我们因为没有去注意青年本身的工作，所以终久不能使党与团的工作分化。现在党的组织渐扩大而深入

群众，我们在党的指挥下，除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外，应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实际工作。能如此，本团方有实现青年群众化口号的时期。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五月十六日在武汉闭幕了。这次大会所讨论的重要问题，都是根据去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和少年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今年五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而决定的。

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正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断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屠杀工农领袖和共产主义者，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武汉，军阀向革命民众示威，绞死李守常等二十人的时期。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反动资产阶级联合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期。

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霖（25）、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并不独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集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所以这次大会第一个重要

本文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六三、一六四期合刊。

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这最严重时期，聚集

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的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完成已死同志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

当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在这两年来的斗争中，虽然受了不少的损失（被新旧军阀与帝国主义杀戮的同志总数在五百人以上，被囚禁者二百余人），然而它的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接近了广大工人的青年群众，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但是过去因为资产阶级混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以内，和没有明确的革命前途，因此一切工作都受许多客观的牵制，并且免不了有许多的错误。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这必定更能提高劳动民众为远大目的而积极奋斗的精神，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革命的努力。

“五四”以后，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知识阶级的青年学生，斗争的目标是思想上的革新和反对日本的压迫。当时

劳动青年群众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这一运动。一直到“五卅”的前夜，都是如此。因此青年运动并没有深入群众。“五卅”以后，青年工人随着工人阶级而跃入中国革命运动的舞台。因为轻工业为中国产业的中心，所以占轻工业工人主要成分的青年工人变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极重要的动力。此时中国青年的领导渐次转移到劳动青年的身上。自北伐胜利以后，中国南部农民运动有了惊人的发展，而思想天真的农村青年更变成农民运动的中坚。因此中国青年运动有了更广大的下层基础，并且这一运动的领导，完全由知识阶级的青年学生转交于中国的劳动青年群众了。所以这次大会指出，今后中国学生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已不能有以前同样的作用，但是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仍是具有参加工农运动，到工农群众中服务，以谋革命完成及学生自身解放之伟大使命。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明中国青年运动趋势，并且更加确定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应当消除团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中的责任与使命。

过去青年运动因为中国革命突飞的发展，多偏重于一般政治上的活动与斗争，很少注意到青年本身生活和利益的改善。这是中国青年运动虽然有了很好的下层基础而未能使其深入的根本原因。近年以来，因为战争和天灾的影响，大小工业与农村经济均成破产之象，生活程度较几年前高涨数倍以上。工人不独工资与工时状况毫无改善，而且常有失业的恐慌。农民不独缺少耕地，并且不能安居乐业，日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常有被迫而流为

兵匪。学生因家庭经济之破产，政府教育经费提作军用，校舍变为兵房，而致求学无门，有些流为失学游民。手工业因与帝国主义工厂生产竞争以图生存，对于手工业工人遭受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这些行业中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和学徒的生活更是不堪言状了，他们几乎牛马犹不如，常为军阀炮火的肉塞和帝国主义榨压血汗的源泉。若是他们得不到生活上的改善，便不能使他们为革命有更多的努力与牺牲并保障革命已得的胜利，甚至将趋于消极。因此这次大会特别指出领导青年为其本身利益而争斗的重要意义，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这是这次大会的第四个重要意义和精神。

总括起来，当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统一战线，联络一切反动势力而来与无产阶级以武力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严重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就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意义的重要。而这次大会确能根据它七年以来斗争经验，决定了中国青年运动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并且可以相信，大会的决议是非常正确而适合中国青年群众的客观要求与需要。在过去很短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旅程中，已大半为青年无产阶级死战的尸骸和血迹所铺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之新的决议案和作战计划，将成为全国青年群众争自由、杀敌人之新的标志。每一热血的青年战士，都应齐向此标志奋勇前进。

我们不独希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接受大会的决议而努力按照去执行，并且希望能得到广大青年群众对于大会决议的拥护，努力站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旗帜之下，使中国青年运动更加发展和深入。如此，中国青年乃真不愧为中国

革命的少年先锋队！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接受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以。

一、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第一问题是北伐问题，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武汉政府的封建势力为要扩张其势力是需要北伐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北伐，但要借此机会来抓住群众。结果不然，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北伐结果，唐等势更大，其影响汪幻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二、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告说 CPM 与 CY 意见冲突，主要的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任弼时出席了会议，这是他的发言。

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

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三、党怕群众。如对学生代表大会不召集是因为孙科反对。劳动大会如此,工纠之解散也是如此。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四、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纠正取消主义和 先锋主义倾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

最近 CY 中央局扩大会议，发现有些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多半由于党团关系不好而形成，极有迅速纠正之必要。

第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在党的负责同志中也同样有这类的主张。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团的工作遇到恐慌，没有找到正当工作方针的表现；是由于团的指导机关与一部分党的负责同志脱离青年工农生活，不明了青年工农的要求与习惯，感觉青年工作困难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并不能真正代表团员群众与青年工农的意识，而是表示团的领导机关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形成剪刀式的发展。

主张取消团的人，仿佛取消团的组织便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其实取消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完

这是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通告（党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团中央通告第六号），由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起草，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后，经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修改定稿。

全是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

第二种观念，就是把团看成做文化运动的组织，以为一切工农政治斗争既有党来领导，团可以专心做文化工作和儿童运动。这种观念是以前党对于青年运动的指导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遗毒之表现。从前“工农运动有党负责，CY注重学生运动和文化工作”的观念，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没有完全去掉。江苏崇明岛的党组织最近还说，“CY替党做技术工作的，一切对外活动都由党员负责”。这种观念同样是犯了取消主义的投机主义的错误，充分表现没有明了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群众的政治的组织的意义，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组织。这次CY中央局扩大会议指出，这观念必定把团变成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非政治的），是非常正确的批评，因为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

第三种观念，就是以团代党的先锋主义倾向，以为党的组织与政策完全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团应领导一切斗争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主张更改团的名义为青年共产党，入团年限提高到二十五岁甚至二十八岁。这种观念之产生的远因，是由于团在初期（一九二。到一九二五年）即有第二党倾向的影响。近因是：（一）有一部分下级党部没有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表现畏缩退后，致使团轻视党的力量与作用；（二）党内民主主义成分之缺乏，团没有广泛讨论党内问题的机会，党不重视团的意见与提议，没有注意提拔青年党员及兼党之团员担负党内工作；（三）团在反动压迫之下没有找到做下层青年群众工作的方法，而着重没有深入群众的政治斗争，因此形成错误倾向。虽然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这种先锋主义倾向的结果，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

先锋主义的倾向，根本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的方法不正当，就是在团的机关中工作的党员，不站在党员方面努力去与机会主义奋斗，而无意之中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团”反对“机会主义的党”。这种倾向是非常之不对的。在团之中工作的党员应当站在党的新政策之上，一方面去指导团的工作，另一方面努力于站在党的观点上作积极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这次CY扩大会议对于这几种错误观念都有极严重的批评，认为是青年运动中的危机；指出CY今后应当加强团的政治任务，积极领导青年工农参加一般的政治斗争；团应极广泛地讨论党内政治问题，并注意青年工农兵士中的下层群众工作；应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去建立团的基础，改造团的指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使团真正布尔什维克化，变成党在青年无产阶级中极有力量的政治组织。

党中央完全同意于CY扩大会议的精神，并且严厉指出党内主张取消CY，把CY看成文化运动团体，不帮助CY在工农青年群众中的发展与斗争，客观上使CY走到没有出路等等，是非常之错误，是机会主义的表现；须认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与第二国际青年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群众的组织，团的组织是保有独立性的，只有第二国际改良派的青年运动方才是只做文化工作的团体，是党的附庸机关。同时中央党与团严厉指出团的先锋主义倾向的危险，党团指导机关应在工作中去加以防止。但防止先锋主义，绝不是加团以不必要的限制，反而妨碍了团的发展与工作之进行。

最近各地党团关系非常恶劣，主要的现象就是党对于团的工作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以致团员看不起党，骂党是

机会主义组织而单独领导群众斗争；互派代表双方没有负责执行，多半只有团的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团的会议党则不派人参加（或派技术人员出席），甚至弄成了党与团的斗争。假若党与团不能双方负责纠正，必定可以引起极严重的不好的结果。因此党与团的中央特此指出这种现象的危险，并提出下列办法，各级党与团应认真执行：

（一）党与团各级会议应切实执行互派代表的办法，仅如此方能消灭党与团间主张上的冲突，使党能了解团的情形，使团能明了党的政策。

（二）党内重要问题与政策，应提到团内讨论，对于一切政策的决定，应注意团的意见与提议。

（三）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与帮助；在党的机关报及党员群众中，时常提出团的问题的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党应多给团以物质上的帮助。

（四）兼团员的党员应努力参加团的工作，负有领导团员群众的责任；团应经常介绍好的团员入党（但非满二十三者不必脱离团），增加党在团内的成分与影响。

（五）团应注意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并继续不断地输送一部分干部到党内工作，但党调团内负责同志时须得双方同意，以不妨碍团的工作之发展为原则，如双方有争执时，须提到上级党团机关解决，党不得任意调去。

（六）团应继续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政策上进行反对党内与团内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党的组织弱小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不改变，放弃工农运动的指导时，团可以并且应当站在党与团上级机关政策上，联络党员群众领导当地工农运动与斗争，但须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且注意

强健党的组织,消灭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

(七) 团部机关对于当地的党的机关的政策和行动,认为不正当,甚至机会主义的时候,不应当单独地站在团的地位而应当同时站在党员的地位,联合赞成他们的主张的党员,向上级党部机关陈诉意见,要求上级党部机关审查。

(八) 党应注意帮助团的发展并强固组织,在没有团部或是团的组织单弱时,党须指派得力同志担负团的工作,建立团的组织,尤其在乡村中,团的组织极少又薄弱,党应命令乡村党部成立团的组织。

(九) 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团员。

(十) 今后党对上级机关报告中须叙述团的现状,团对上级机关报告中亦应叙述党的状况及团对党的意见。

总之,党与团的关系,最近所以发生不好的现象,发生团反对党的倾向,其原因在于党和机会主义奋斗以来,党的健全的干部还没有造成,一般党员群众有不满意于干部的情形,因此少数地方的团的机关便变成表现这种不满的机关。所以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令一般党员群众(团部工作的党员当然在内),尤其是工农党员,都能对于党的组织及政策表示意见,使他们的意见能够战胜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团与党之关系问题。

团应当在党最近扩大会议的总政策之下,在团最近扩大会议决议的指导之下,发展真正的青年群众工作,肃清团内的机会主义,以及军事冒险、玩弄暴动的倾向。只有团真正成为群众的斗争的组织之时,方能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

之任务。

以上所指各项现象与整理党团关系的具体办法,在目前斗争紧张情状之下有极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团应认真切实执行,仅是这样才能加强党对于团的指导,使团能广大地发展。各级党与团部应当随时将执行情形报告上级机关。

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一月）

“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最近几个月来，各地群众斗争与暴动的发展证明上面的估量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是否一切斗争皆成暴动，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真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暴动中有机会做”吗？这些问题我们都应有个明确解答。

有些同志就有这种观念，但是从各地经验告诉我们，这类观念是非常危险的，完全没有了解“暴动是一种艺术”的意义，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弄暴动的错误。

首先我们应当明白暴动是一种阶级斗争达于最高度的斗争方式，暴动的目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必须有广大的阶级及群众做暴动的基础，而且这些群众具有夺取政权的意识和组织力量；同时统治阶级已经动摇，引起了社会上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厌恶；领导暴动的党能够指挥暴动的极广大群众，技术上有很精密的布置，这样方

才能够发布爆发的命令。

因此，恩格斯说“暴动是一种艺术”，绝对不是“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无动不暴”。若是我们不顾暴动的条件，不论成败如何，或是群众有了强固的组织和暴动情绪，而统治阶级并没有动摇，或是统治阶级已经动摇了，而群众尚没有具备暴动条件而贸然发动，这便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了。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

过去各地暴动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群众本身没有组织，缺少暴动意识，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这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教训。因此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若是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中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便是玩弄暴动。

我们说“由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暴动”，这是很正确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明了不是“一切斗争就直接走到暴动”，也不宜先定了暴动计划与日期然后去作群众工作，而是要有了群众工作的基础和其他的暴动条件方才能够计划如何暴动，并且要很精细地估量当时群众力量与情绪和统治阶级动摇的程度，方能确定暴动日期。因为暴动只有一个最好的时期，过早和过迟都是失败的原因，所以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讨论彼得城（现称列宁格勒）暴动日期时说：十一月六日太早，我们应当有一个全国的基础才来暴动，六日大会的代表不能到齐（七日是全国苏维埃大会期）；另一方面十一月八日又太

迟，那个时候大会已组织好了，很难有一个很大的有组织的群众采取最敏捷坚决的行动。我们应当在十一月七日发动，那天大会将开会，我们可以对大会说，你们有了政权怎么做？

虽然暴动不能预先很久就确定行动计划和日期，但是我们抓住某个时机（如某种战争爆发、统治阶级动摇或是某个经济上的特别时期），加紧发动群众和一切暴动的准备与布置是必要的，但是到了时机，是否一定爆发还要看当时准备条件的程度而定。

发动群众，既是暴动的主要条件，我们应当怎样做群众工作呢？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这种工作是暴动以前最艰苦的工作。因为它的目标是要使群众能够了解党的策略，有夺取政权的认识，并具有最高度的组织力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定不仅是一种宣传与鼓动就可以满足的，而须使群众从本身利益（阶级利益）的争斗中，去了解去认识，进而去组织自己，去培养暴动的意识。在城市里面如此，在乡村中亦如是。什么是群众的切身要求呢？这是要每个工厂和乡村支部或是每个与群众接触的革命者所能够规定的。在年关时节，工人要加工钱要求双薪，农人不愿还债，大概是最迫切没有的要求了。

因此，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每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在这些大的小的争斗中，教育他们对于政权的认识，引导他们组织真正有群众的工会和农会，使他们感觉自己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在斗争的群众中去吸收勇敢的分子

到党和团里面来。仅仅是这样的党和团，方才可以说真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青年工农的先锋队。不然它便是一个群众以外的小团体，小团体绝没有领导暴动的力量。

党的政策与 反机会主义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

在党的第五次大会之后，湖南马变事件发生，汪精卫〔32〕等国民党领袖便开始动摇，接受蒋介石的影响而不满意于共产党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土地问题与工人武装表示非常不安。此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需要坚决的阶级政策应付当时的环境。但是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无条件的退让，自动地决定工人纠察队缴械，公开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直等于投降资产阶级（见党中央通过之十一条政纲，当通过时，团中央因未得通知无代表参加）。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最重要的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土地革命问题。当时的情形，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意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

本文是任弼时为党的六大准备的报告《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曾于一九二八年由团中央以《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的书名出版。

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而党惟恐与那些“左派领袖”破裂，不敢直接领导农民自动地没收土地的斗争，至此还希望国民政府明令颁布土地法令，由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主张由国共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的解决和进行的实际办法。甚至连鲍罗廷同志的以下提议也被党中央政治局所采纳！鲍罗廷提出：国际训令主张没收土地是对的，不过实现土地革命必须有长期的过程，现在还没有到实现的时期。当前的任务是应当以极大量的牺牲与忍耐帮助国民政府东征，打下南京以后土地革命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当组织农运训练班，培养一批执行没收土地的指导人材，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以备将来执行这一任务（大意如此）。

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更反对鲍罗廷打下南京土地革命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训练人材的自杀理论，因为即算武汉政府打下南京，那时右派势力只有更加扩大而受东南资产阶级影响公开反对工农及共产党，断无比当时更好的结果；若东征遭失败，同样也将使土地革命难于进行。

二、国民党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仿佛既没有与之破裂便不应批评，既然合作便不能单独有自己的政策，否则只有退出国民党。

当时团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是：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既然多半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我们应当利用左派国民党党员群众以民主化的方法去影响国民党的领袖和政策，直到改组国民党的中央，而不应仅靠与上层领袖的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领袖一旦投降反动派则一切只有失败。我们是不应即退出国民党的。退出国民政府在当时（六月中）亦不赞成。

三、其他如武装工农问题，团中央赞成国际的意见，对于党的十一条是反对的。此外尚有其他不甚重要问题的意见，因材料于当时武汉机关被破坏时损失，无从记忆。

关于上列问题，团中央曾有两次正式决议提交党中央讨论。但第二次决议案后闻被独秀 g 同志毁灭，而未传到党中央会议，在六月某日的武昌中央会议中又被主席禁止宣读而未发生影响。当时团中央虽与党中央的政治意见冲突，因恐影响党的威信，故未敢传达到下层团部中去讨论。现在看来，或许是一种错误。

虽然党中央是无条件的让步，但仍不能使国民党相信而改变其向工农进攻的政策，并且步步进逼，反动派开始公开捣毁工会。此时党乃决定退出国民政府，七月十三日公开发布宣言，宣布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反动，但还不敢公开指出汪精卫等的反动勾当。十九日团中央发表比党更激烈的宣言，公开骂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等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当时党中央是不赞成指明的）。但朱培德（4 刃没有列入（当时

少共国际代表由仁是主张列入的），因恐促成朱的激烈反动，妨碍张发奎军队（叶挺军队包括在内）南下的计划（当时张还表示很左），后即看出是一种错误。

在党中央七月十三日宣言公布之后，公开的白色恐怖便开始，团中央十九日宣言之后，压迫更加紧张，不久便捕杀同志与工会领袖，从此革命的武汉变成了反动的中心了。

总之，由北伐到武汉反动时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时期，但因党始终是退让，没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不信赖群众力量，不坚决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以致不能取得小资产阶级群众。蒋介石反动，使中国革命受一次大的打击；武汉反动，更铸成革命部分的失败。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 整顿和秘密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一、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坏，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江苏、河南相继破坏，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

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坏的重大关键。

二、在这种严重压迫之下，各地党部往往失掉领导斗争的力量，甚至屈服白色恐怖之下而不能与广大群众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的同志反因是 CP 分子而不敢活动，不若非党分子的勇敢积极，以致放过许多群众斗争的领导作用，尤其表现于这次因济南事件之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运动之中。即是比较有斗争经验的上海党部，竟表现没有能力发动工人群众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一九二八年五月——八月）。这是他为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原件副题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几乎完全是一种国民党领导的上层机关活动，看不出本党领导的群众斗争。这确是我党工作没有深入群众的危机。

三、这些现象的来源，就是由于平常没有注意运用公开可能去团结广大群众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须知秘密工作之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党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坏。所以，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是白色恐怖下的党部最重要的任务。

四、因此，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党必须有更严密的组织，庶几不致于脱离群众，并且可以防范敌人的进攻。但是，本党过去的组织，并没有能按照环境的转变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数还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主要的现象就是：（一）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所以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二）没有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极容易被敌人探悉。这样情形的结果，不是脱离群众生活、毫不起一点领导斗争的作用，就是一动作便遭破坏，而致干部损失组织瓦解。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城市中的党部容易发生。

五、以上许多事实，应当引起本党严重地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无论何时何地的党都不能夸其不至于遭遇破坏。列宁曾说，领导全党的艺术，不独在怎样有组织地向敌人进攻，在斗争一时不利之际，并且

能够有组织地暂时退防。列宁这种教训告诉我们的，就是在目前直接革命形势与白色恐怖之下，一方面如何保障革命的先锋队，同时又能积极地领导当前的斗争。

六、中央根据这些教训，特别通告各级党部注意下列几项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

（一）在秘密环境之下（尤其是城市的党），每个党员必须成为群众中积极活动的分子。因此，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月缴纳党费。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违犯这些条件的分子应当驱逐出党，吸收新的党员也必须按此原则。只有每个党员都有一种工作，才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作用，只有这样的党，方才能够担负白色恐怖下的繁重的艰苦的使命，使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一切投机者或是敌人的侦探分子不容易混入，消极、叛变的危险也可以减少。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俄国一九〇五年后白色恐怖也是非常严厉，当时党员的数量并不甚多，但质量非常优良，确能领导当时的斗争。如彼得城（现称列宁格勒）之某工厂支部仅有同志五人，完全能够领导全厂一万七千工人群众，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在秘密环境之下，务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坏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坏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因此，以后凡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部。在这白色恐怖厉行的时期，每一支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如此则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

响全部组织。如支分部书记超过六人时,亦须分组开会,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以备一旦发生破坏能有人继续工作。

(三) 城市街道支部,务必使之更能适合于目前的工作环境,过去的形式显然是不能起重大的作用。以后街道支部之组织与作用,务须依照下列方式改变:

1. 每一街道支部或邻近街道合组的支部,必须按照党员职业区别而分成支分部,超过五人之支分部须另分小组,不满三人同职业的同志则编入某一支分部,平时只开支分部或小组会议,以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代替支部会议。

2. 每街道支部中的某职业支分部,必须负责发展该支部范围内本职业的工会支部。在上级工会与党的指挥之下领导该职业工人群众的斗争,由全市各街道支部中同职业的支分部负责强健并发展该职业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平时可召集这类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会全般工作之进行。

(四) 为健全指导并卫护指导机关起见,以后区市县省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和一二内部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应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不出席执委以下的各种会议而偏重于内部工作。庶几在书记被捕或平时向外活动委员发生问题不能继续工作时,他们能够代替前者的工作。再则县执委委员必须轮流到所属县区党部巡视工作(广东、湖南等省须有五六个巡视员,其他省份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巡视员),常会所在之地至多留三人已足。只有这样才可以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指导,同时又可避免全部被破获之危险。以后当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非十分必要时不应用书面形式,执委委员的姓名不必向普通同志公开,出席各种会议时只是代表机关,不必

宣布个人的姓名。

（五）各级执行委员尤其是区委委员须尽量地找在业的工农同志担任，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秘密工作的困难，同时又更可以了解群众的情状。城市区委的机关应当建立在工人居住的区域，支部及支分部的会议须设法在工农同志家中召集（过去有些地方的支部会议都要在交通机关内召集，这是非常之坏而危险的办法）。区委的执委会议也要尽可能地轮流在同志家中开会，这样必定可以减少许多机关被破坏的危险。除指定收藏文件之机关外，其他机关与负责同志居住处所不应储藏文件，无论任何机关不应保存同志名单与地址。

（六）各地普遍的现象就是在某次斗争失败或是执行机关被破坏之后，引起同志畏惧，消极甚至成为瓦解的状况，平时支部或支分部甚至区委会议没有上级代表参加便不能开会，这种现象非常不适用于秘密环境，其根本原因由于同志缺少教育训练和单独活动的的能力。补救这一种现象除加紧同志的教育训练外，须特别注意干部分子之养成，自区委以下的各级党部须养成在党的一般政策之下独立活动的习惯与能力，庶几在某种困难情形之下（如与指导机关一时断绝关系）仍然能够继续活动，不致成为完全崩溃的状况。

（七）过去许多割据区域的党部与负责同志常常忽视秘密工作，以为“既然被我们割据了便永远是CP的天下”，因此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常常把自己的“官职”章帜公开悬挂胸前，惟恐人家不知道他的地位，一至反动局面临头便全部被敌人破坏，负责同志及干部全不能立足，或遭捕杀而受极大的损失，以致全部瓦解。以后应特别注意纠正这种现象，在割据区域的党部固然应当公开一切党的活

动，但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

（八）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地扩大。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但同时必须遵守集中的原则，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

（九）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则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为使党可以影响并领导广大群众，则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因此每个支部必须找出许多公开组织群众的方法，如上海之弟兄团、姊妹团、堆金会、读书会、平民学校等等，在自己的领导与影响之下去结合周围的群众，并且要抓住每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将我们秘密的工作与其联系起来，以吸引广大的群众，扩大党的影响。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各支部应讨论详细的具体办法。

以上所指各项，各级党部应即切实执行，绝不能丝毫疏忽，致使党遭受破坏的损失。须知因疏忽而引起的破坏与同志告密反叛因而被破坏的结果是相同的。

七、除上述各项外，关于党的发展，中央特别指出下列现象与办法，深望各地注意。

在这半年以来本党的组织确有极大的发展，改造组织也有相当成绩，但是发展的阶级成分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同志，城市的发展非常迟缓，这种现象极有动摇无产阶级指导的危险性（如盲动主义、只杀人放火等都是农民意识的表现）。

农村发展虽然迅速，但下层支部组织非常松懈，在斗争失败之后，党的组织便随之崩溃或消灭。因此，强健党的无产阶级指导（尤其是农村）与巩固农村党部的组织应当特别注意。

除城市党部须继续努力提拔工人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外，农村党部须注意下列工作：

（一）党的发展须以雇农、佃农及农村手工业者为主要对象，上列成分应占农村党部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自耕农及农村知识分子的吸收必须特别谨慎，并须有候补期的限制。

（二）党及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必须以农村无产阶级为中心，省市县委应经常地准备工人同志派赴农村党部工作，以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

（三）农村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培养干部分子，每一支部或每一区域必须有一部分中坚同志，经过他们去强健支部工作。这些干部必须从雇农、佃农及手工业工人中去挑选，庶几在斗争受挫、指导机关遇害或不能工作时，农村党部还能在干部领导之下继续工作。培养的方法，就是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或开办短期训练班。

八、关于提拔工农分子与改造党的问题，虽然有些成绩，但是各地发现许多缺点，多半偏于敷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如河南省常委委员中虽有多数工农分子，但均派地方工作，实际上最高指导机关仍为知识分子包办。广东某处常委委员虽全系工农分子，但开会时一切问题完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秘书长。湖南省常委则有每隔几天又另换一新的工人同志之现象。如此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结果，就是由多数工农分子的指导机关变成少数甚至一个非工农分子的包办。这一现象绝非中央提拔工农分子的本意，各地必须纠正。

以后应注意：

（一）提拔的工农同志必须是干部而能担任指导机关一部分工作的，不应很形式地以为只要有了工农同志便是满足。

（二）指导机关以内的知识分子或有工作经验的工农同志必须帮助新进的工农同志工作，注意告诉他们各地及上级来件，推动他们发表意见，并须使之学习起草通告、决议案及复信等。

对黄色工会的策略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面去活动，以公开的地位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至于在宣传方面，我们当然要公开地批评黄色工会的欺骗，但是不能够简单地站在群众以外笼统地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至于对于空招牌的反动工会，它天天去压迫欺骗工人，我们当然要无条件地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它。过去各地对于黄色工会的态度，一方面自己未去做职工运动，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一方面又不管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或无群众的黄色工会，一概笼统地机械地提出打倒的口号，结果黄色工会并不因为我们的反对、打倒而受任何影响。事实上工人群众因为得不到出路，反而一天一天接受黄色工会的欺骗而受其影响。这从上海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此问题。

这是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给江西省委信的节录。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对于黄色工会的意见。

城市农村工作指南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

我们应该肯定地承认,如果没有健强的城市工人运动,使城市与乡村的争斗配合发展,是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土地革命的领导作用的,乡村斗争的发展,将受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领导,而必然产生许多错误的结果。

过去城市党部因为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反动局面一来,便与群众隔离起来,甚至有些县委执行机关都建立在乡村,几乎放弃城市工作,或者是没有能够迅速地改变工作方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打入群众中去,只凭借恐怖手段去威吓群众,当然不能产生什么强有力的工人运动,党也自然不能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

目前各级党部应当有极大的决心打破一切困难,以多量的精力去创造城市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广州、上海、武汉、

这是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的目前任务部分。文件要求进一步纠正城市农村具体工作中的盲动主义。当时,全党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及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还在认识过程中,文件也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长沙、郑州、天津、九江、南昌、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党部

应更加倍地努力，就是县委也应当打破过去忽视城市工人运动只做农村工作的错误倾向。中央严重警告过去因白色恐怖困难而放松城市工人运动的各级党部！须知城市与乡村革命运动若不能配合发展，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只有日益扩大，暴动政策便没有实现的可能。

城市中心工作当然是职工运动，但若单纯只做工人运动而放弃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贫民等）的工作和士兵运动，也是不正确的工作的路线（过去有些地方情形就是如此），这是我们必须深刻注意的。

目前城市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

现在全国各地除我们领导的工会外，尚有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会组织：

一、由工人自动起来为保障自己经济利益而组织成的工会。这类工会，带着劳资妥协的精神，站在工人地位求工人生活的改善并防止资本的进攻，不是绝对放弃阶级斗争的方式。在政治上不反对国民党，并且形式上还是发生关系，实际是脱离政治斗争，纯为经济利益的工会组织，如上海邮务、商务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报业、南洋及英美烟公司、电汽等七工会。这类工会比较是有群众基础的。

二、国民党御用的工会。这类工会组织的领袖多半是国民党指定的，他们相当地站在工人利益上来调停劳资的纠纷，并且有相当的群众，其政治上当然完全受国民党的指挥，如厦

门、福州等地之工会组织。

三、完全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忠实同志”所组织的御用工会。但是这类工会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上层机关而无下层组织，因为它们事实上是离开工人利益，利用政治势力压迫工人争斗，时常引起工人群众的反对，如上海工整会等组织。

四、在贵族工人领导下的法西斯式的工会组织。这类工会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有极深的关系，因为历来与我们冲突，而我们过去没有注意获得其群众的工作，故其对 CP 非常仇恨，如广东机器工会，不过仅仅在广东有此组织。

我们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意义，是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工会的群众。

在这一原则之下，对于如工整会一类完全没有群众而极反动的组织，我们只有在工人群众中揭破其黑幕，防止它的影响在工人中发展；对于第一、二、四类工会，应按其性质与内容的差别，而切实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有上层机关接洽与下层群众联络两种方式，但是下层群众联络与宣传是主要而且必须经常进行的工作，上层机关的接洽谈判仅在一定条件之下方可采用。惟须注意上层接洽必须同时进行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下层工作是可以单独经常进行的原则，庶可使右派工会群众日益左倾而监督或影响其领袖。

在这一原则之下，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方式是：

一、对于一、二、四类工会的群众，须经常用我们领导下的工会（或其他工人结社）名义，提出当地工人最迫切而实际的要求纲领，极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尤其使这些宣传

深入到右派工会组织和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中去，鼓动工人群众在 这些要求之下作一致行动。

二、在他们有组织的工厂中，必须设法产生党的支部组织，并且派一部分色彩不甚浓厚的同志加入他们的工会活动，主要作用是去推动其群众左倾，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我们在右派工会内须要求实现民主主义，多开会员大会，实现民主选举制，去求改造其指导机关，排斥极右而反动的分子。对于第一类工会，我们暂可采取占领指导机关的策略。但是广东机器工会内我们领导的左派运动，必须退出机器工会，加入赤色工会方面去，根本破坏其组织（因机器工会为广东工人所反对）。对第二类工会则暂可斟酌情形决定。

三、在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应该在工人阶级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如发宣言、传单，派代表慰劳群众，以至于举行同情的怠工或罢工等，表示我们的确是希望一致行动的，去影响其群众。但必须注意其领袖妥协畏缩或中途出卖等事实，利用这些向他们的群众做广泛宣传。

四、在争斗紧张时候或是斗争爆发之前，我们的工会可以用书面形式要求第一、二类工会作一致行动（但对广东机器工会不必如此），对第一类工会并可派代表与其上层机关或领袖谈判一致争斗的条件，对第二类工会必要时亦可采用。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便可与之作一致的斗争。如果被其拒绝，或在一致行动中他们的领袖表现畏惧退后时，仍必须向群众宣布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

第二，纠正过去争斗方式之错误

过去我们发动斗争的方式有两种错误倾向，第一就是用恐怖手段威迫群众，派人以武力制止工人进厂工作，去造成罢工形势。第二就是把罢工暴动看成是工人争斗的目标，而忽视小的能够争取群众的争斗之发动。这两种倾向都足以妨碍职工运动的发展，应即纠正。

现在全国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已入于最痛苦的时期。南方工人在国民党反叛后，一切以前所得的条件完全被资本推翻，而白色恐怖又掩护资本向工人猛烈进攻，加时、减资、开除工人是普遍现象。北方工人在初脱离奉系军阀任 2) 压迫之后，亦有改善生活的斗争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处常有自发的经济争斗现象。

工人中的某种成分对于斗争是表示非常愿意参加的，但是害怕 CP，不敢加入 CP 的工会和 CP 领导的斗争。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 CP 所受的政治压迫过于严厉，使他们害怕（因发一张 CP 的传单都可以被捕至于枪毙），同时过去争斗方式的错误，亦有很大的关系。今后我们发动工人斗争必须注意：

一、抛弃武力胁迫的方式，而着重“说服”群众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须努力宣传教育群众，使群众接受我们争斗的主张，尤须有党的独立宣传，向工人解释党的政策，使工人群众了解党，不致因白色恐怖而不敢与我们接近，仅如此在争斗时才能够获得广大群众起来参加。为此目的，党必须定出很切实际的工人要求纲领（每个工厂支部必须制定本厂工人特殊要求条件），向工人群众作普遍的宣传。平时召集工人飞行集会，推销工会与党的宣传品及刊物，应视为工厂支部

的经常工作。仅仅如此才能扩大党与工会的影响，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随时受我们调动。

二、我们须切实领导工人日常微细的斗争，因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之下，大的斗争在工人群众没有相当组织力量与争斗决心时，是很难收到胜利效果的。小的斗争便是准备大争斗的方法。党的每个工厂支部必须注意到每件能引起争斗的事件（如饮料不洁，空气恶浊，工头监工欺压工人，工资不按期照发等），鼓动工人起来反抗。斗争的方法如派代表交涉，停工几分钟要求答复，鼓噪群众起来威吓监工、包围厂家等等，都可采用，不应抱着非罢工不算斗争的观念。在这些争斗中必须注意宣传工作与工会组织工作，发展党的支部与扩大影响，聚集群众力量去发动大的斗争，仅如此大的争斗方容易收到胜利的效果。

三、赤色工会的组织工作，各地始终是进行得很迟缓，全国赤色工会下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尚不及四万的数目，这足以看出本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影响薄弱的程度。因此，赤色工会之建立及工人结社（兄弟姊妹团等）之发展，应当成为每个支部的任务，并须开始注意使我们组织的工会取得公开存在的地位（惟已公开的工会必须注意秘密机关的保存）。当此工人群众要求出路的时机，我们应多用过去老工会名义（如上海、湖北、湖南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散发宣言传单，号召工人群众起来争斗。

四、除开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十分紧要以外，工人武装组织亦应有计划地开始进行。在赤色工会之内，必须按中央军事决议案原则，组织赤卫队或自卫队等组织，甚至可用体育

队、习武社等名义，公开组织卫护工人的团体。

五、手工业工人运动过去很少注意，这是职工运动中的一个缺点。尤其在工业不发达的县市中，放弃这一工作更是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些县市中手工业工人运动是城市工作的主干。关于手工业工人运动，同样以发动斗争，建立工会为主要工作，各级县市委应即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规定具体工作计划。关于统一战线及手工业工人运动，中央将另有通告。

第三, 发展反帝运动

在民权革命时期中, 反帝运动是本党根本任务之一, 但是过去各地党部不甚重视这一工作, 甚至将反帝运动看成是国民党的工作, 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观念。在这次反日运动中, 我党表现的领导力量非常薄弱, 确是极大缺憾!

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江浙的资产阶级表现很积极地抵制日货, 并且筹备全国反日代表会议, 国民政府亦高唱废约修约等论调, 企图取得反帝运动的领导权, 而抑制工人的反帝行动。因此反帝工作此时特别重要。各地应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反帝的通告, 去发动群众反帝高潮, 揭破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帝的黑幕, 而取得这一运动的领导地位。

有些同志认为反帝高潮已经过去, 我们用不着费尽精力来发展这一运动, 中央认为这同样是极危险的错误倾向。其实在济案少发生以来, 反帝的民众运动因国民党的压迫和我党没有积极领导而尚未起来。现在日本驻屯山东、满洲及天津一带的军队肆行无忌, 日本政府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废约

案，显然是不能接受，将来济案的交涉也必定是使国民政府完全屈服。若是本党不能发动民众的反帝斗争，揭破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民众必将受国民党欺骗政策所蒙蔽，而反帝运动消沉下去，则我们直等于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责任。

过去中央通告已经提出反帝运动必须与反国民党和争民权自由及本身利益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发展扩大并且可以激起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使小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脱离国民党的影响。

在这一方针之下，各级党部尤其是城市党部应当切实估量过去反帝工作的成绩与缺点，继续努力发展这一工作。一切城市工作与群众争斗，都应引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中。反帝运动应特别努力的就是：

一、扩大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除多量散发传单、宣言、标语，组织灰色反帝刊物外，必须组织讲演队，动员全体同志参加口头宣传鼓动工作，工厂等部须设法组织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反帝情绪，惟须特别注意本党主张的独立宣传。

二、切实有组织地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揭破资产阶级包揽抵制日货运动的黑幕，检出大商店的日货须采取严格处置的办法，由抵制日货运动扩大到不供给日人粮食伙役，组织日厂工人的罢工与示威运动。

三、组织和扩大反日大同盟、外交监督会、救国十人团等类群众组织，做公开活动的工具，同时进行争取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斗争。

四、同时注意领导商人进行反对苛捐重税、反对库券的斗争，引导到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争斗。同样从学生本身利

益的争斗，鼓动学生群众参加反国民党与反帝的运动。

五、国民党组织的反帝团体，我们必须打进去，提出彻底的主张，去揭破国民党的反帝实际是阻止民众反帝斗争的黑幕。

农村工作的整顿与发展

过去农村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正如前述，一般的现象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没有走入正确的轨道，尤其是缺少农村经常的组织工作。

现在正值农民生活的青黄不接恐慌时期，并且接着就是秋收发展争斗的机会，这正是我党农村工作发展的极好时机。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分粮，一直到秋收时抗租、没收土地，在群众与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须实行割据与暴动。我党应即抓住这一秋收时机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

目前农村工作应当特别注意的：

一、防止离开群众、受农民意识支配的盲动主义倾向。农民群众的心理常认县城是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会集之所，以为只要杀戮了在县城的压迫者便是农民的天下。因此把县城看得很像是乡村的敌人而主张完全毁灭，忘掉城市中贫苦民众的革命作用，稍有力量即要求孤注一掷地攻取县城或镇市，不顾城市中工作的重要，不管自己是否可以战胜城市，也不管打下县城后的出路如何。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倾

向。结果是被敌人个别的击破，消失农民争斗的勇气。我们应纠正这种倾向。攻取县城必须在下列条件之下：

1. 在这县以内的农村斗争有普遍的发展，至少要有几个区域的斗争已有群众的基础或是已造成了几个乡村的割据，具备相当的武装力量。

2. 县城以内的城市工作有好的基础，不独工人群众具备相当组织基础与武装争斗的力量，并且在反动武装中有相当工作，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对统治阶级厌恶，统治阶级表现动摇崩溃不能维持其统治。

3. 这一县的邻近各县具备相当农民运动的群众基础，不致使争斗孤立而失败。县城的占领必定是成为某一区域（几县）暴动割据的中心，或是全县总暴动的完成。省会所在地之县城，必定是全省总暴动快要完成时方作最后的进攻，万不应任意做进攻的尝试。

二、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之配合发展。过去各地争斗的失败多半由于斗争孤立发展而无配合的结果，这样当然容易被敌人个别的击破，以后必须注意：

1. 城市内职工运动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的工作，须按一般城市工作原则组织工人及手工业工人的赤色工会，发动工人及小商人、学生等的反苛捐杂税、争民权自由的斗争，建立党在县城镇市中的基础。过去湖北、江苏一带的外县工作仅限于农民运动的错误应即纠正，力求城市与乡村配合发展。

2. 一区之中的各乡，一县之中的各区，一省之内的各县或区域的相互之间，必须力求配合适应地发展，这尤其是在湘

鄂赣粤四省之内应当特别注意，省市县委及特委应当切实审查过去工作布置的缺点并设法补救。

三、加紧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过去各地很少重视农民群众的经常组织工作，只是临时鼓动群众起来斗争，不论争斗胜利或失败之后，群众仍然是散乱无组织的状况，这仍然不能聚集群众力量，更不便于群众的教育工作，显然是已往工作的极大错误！今后在未割据区域，必须努力于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的组织。每次斗争的胜利与失败，不应仅以是否达到部分的经济要求来决定，必须着重于农民协会组织是否有广大群众，对于党的主张与土地革命及政权是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要求，党的组织与影响是否发展深入。这些将决定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因为这就可以准备继续的进攻。因此各级党部必须注意：

1. 建立并发展农民协会（或用其他名义）的组织，如果不能公开地存在，亦须秘密建立起来。我们估量自己在乡村中的领导力量，必须看我们组织群众的数量来决定。苏维埃必须是快要进到暴动的时候方才可以组织，须改变以前一有群众起来立时组织苏维埃的方式。在苏维埃割据区域农民协会自然应当取消，因为苏维埃即变成广大群众的政权组织。

2. 注意乡村无产阶级群众的特殊组织工作。在苏维埃割据区域，农民协会取消之后，便须建立雇农工会组织。在未割据区域，应即建立单独的手工业工人工会，团结乡村以内的手工业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做经济斗争（手工业工会在割据区域亦应存在）。当农民协会已有相当群众基础时可

以设立雇农部,注意雇农特殊利益,并可用农协名义召集不定期的雇农群众会议讨论他们特殊利益问题。但是农协尚未组织之前,不必组织单独的雇农协会。

3. 建立农民武装与游击战争问题。过去中央通告〔54〕指出,“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但各地多半把游击战争仍然看成单纯离开群众的杀人放火,沉溺于赤色恐怖的方式,这样离开群众的行动必定是造成乡村反动势力的进攻而致吓退群众斗争的勇气,必须纠正这种错误。

游击战争必须是在群众争斗中为抵抗反革命武力(民团、团防或军警)或向反革命武力进攻(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时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用少数武装拥护群众斗争向前发展。因此它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开,并且须注意由群众中产生武装的组织。

但是农村中的某种成分,往往认为发动斗争必须先杀掉反动的豪绅方有办法。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绝对禁止对于农村反动分子的赤色恐怖手段,但必须向群众解释不应以赤色恐怖的暗杀手段看成是发动斗争的重要方法,而须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对于农村的斗争同样是“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这就是说在争斗发动之前必须广泛地做宣传鼓动及组织群众的工作,使他们在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及口号之下起来斗争。

但是游击战争同时有发动群众争斗的意义,所以在下列环境之下,我们是可并且应当派遣游击队去帮助农民起来

争斗：

1. 在割据区域有公开红军及赤卫队组织的地区（必须向外发展扩大），我们应当派遣红军、赤卫队到邻近乡村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2. 在我们服务的工农学生军驻屯地方（如吉安有五百余枪），亦必须分出队伍到乡村中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3. 在农民已经起来斗争或是有很高的争斗情绪与要求，但因某种反动势力（民团、团防等）的镇压而不能扩大或发动时，我们可以派遣游击队去帮助斗争的发动与扩大。

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既须由群众中产出，所以党必须经常注意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过去我们一组织农民武装就必须集中武装，组织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甚至是像一般雇佣军队的形式一样（集中起来自然就需要发饷去维持他们家庭生活），得不到给养时就成土匪流寇式的队伍，这种方式显然是需要改变。以后农民武装建立须注意下列几点：

1. 不宜一组织武装就集中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队，必须使武装分散在农民手中，按照区域去编成自卫队（或用其他名义），每队人数不必过多（八人、十人），惟求其容易集中调遣。

2. 农村武装不限于使用快枪等利器，棒、刀、梭标、尖串甚至犁锄等都是农民的武器。我们应当用习武社等形式去组织农民公开的武装组织，给农民军事训练机会。

3. 在割据区域当然需有常备的红军组织，但必须适用志愿军的原则，尤须注意赤卫队普遍的建立。

4. 我们的武装对于比我们弱的反动军事势力固然可以用

敏捷的方法去夺取其武装，但对于比我们过于强大的军队宜避免决存灭胜负的战争，须用分散袭击方法去求战胜敌人军队，因此民众普遍的武装组织与训练应特别注意。

四、加紧士兵运动。北伐“成功”之后，在“裁减军队”宣传之下，国民党的军队更加动摇。士兵群众以极大的牺牲参加北伐，成功后他们得不到丝毫利益，不独旧欠薪饷没有领到的希望，更加上一种被裁减淘汰及失业的恐慌，此时正是我们发展士兵运动的机会。同时各派军阀新的公开冲突未爆发之前，他们必定在“肃清共匪”口号下加紧对于工农斗争的进攻。因此士兵运动关系我们争斗的工作十分重要，今后不独努力使城市与乡村的工农运动适应地发展，各地应即切实计划进行这一工作。对此，中央已另有通告，不再详述。惟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军队中的组织、士兵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须独立地组织。除负责同志与其有关系之机关或个人发生关系外，绝对禁止与党的机关发生关系，以避免有破坏时相互连带的危险。

五、在实现上列各种任务过程中，必须同时努力于党的组织之整顿与改造工作。现在组织上的情形就是支部涣散而脱离群众，省委与县市委隔阂，各级机关的关系非常不亲密。较远的省份中央政策甚至半年还不能达到支部，有些地方连八七会议的决议尚未收到，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政策，这些现象应当努力改正。

今后支部工作的整顿与改造应当引起各级党部特别严重的注意，尤其在严厉白色恐怖压迫下的本党，若不能有健全的支部组织，可以造成党与群众完全隔离的现象。

改造支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努力做到每个同志都要参加一种党的工作，实行驱逐一切不工作的畏惧动摇的分子，尤其是城市的党组织应当切实执行这一原则。只有如此改造，才能形成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对于那些同情于党而不愿工作的成分，可将他们组织于党的周围，使他们在党的影响之下而行动。

各级机关的关系应当设法亲密，下级党部务必经常详细向上级机关报告工作，上级机关同样应经常给以指导，指导内容须求具体，尤须注意工作方法的指示，并须时常派人巡视下级组织的工作，做实际考查与指导。

过去上级机关发出通告，下级机关多不能迅速转达下级党部。有些省委接到中央重要通告并不详细讨论，只是简单地照例转发，市县区亦同此，甚至因技术关系连转发都没有办到。这样的结果，不是支部收到长而且深的通告无从讨论（尤其是工厂及农村支部），就是简直看不到中央文件，自然不会明了上级机关政策，更难谈到执行了。

今后下级机关接到上级的通告及信件，应当详细讨论适用到所属党部范围以内具体执行的办法。直接指导支部的机关（区委或市县委）必须拟出讨论大纲提交支部讨论，不应只是简单地转发。仅这样方才能够提高同志的政治教育，并使党内群众了解党的政策。

教育训练工作，目前非常重要，指导机关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除用实际工作与通告文件去训练教育同志外，省市县委应尽可能地出版带训练性质的刊物，多根据当地工作经验编成训练的材料，以供给支部讨论并可作同志工作的

参考。

对外宣传鼓动工作目前特别重要,尤其在小资产阶级动摇不满国民党时,我党负有思想上领导的重大责任。同时关于土地革命、暴动政策、中国革命性质等类问题和工农生活及斗争状况的宣传,以及目前反帝的鼓动,都需要党以很大的力量有计划地扩大。关于这些工作除开推销党的刊物宣传品外,每个同志必须成为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家,尤须注意利用一切公开可能以发展党的宣传工作。

关于一般组织与宣传工作,最近中央均有详细通告,各级党部应当很认真地根据执行。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一 改造和健强支部组织与工作

（一）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过去支部不能起应有的作用，是党不能广泛地组织、动员、武装和领导群众来参加当前的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二）支部的改造，应求得适合斗争条件与需要，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建立支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巩固党的领导。过去支部工作的缺点：一是支部干事会不健强，五个人干事会的分工不能适应当前战斗环境的需要，如工会、苏维埃、军事等工作，不能有专人去注意；二是目前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不能吸引更多的同志参加支部的领导工作，干事会往往只有支书包办一切或由少数人做工作，支部领导机关有改变的必要。

（三）支部干事会组织以后要扩大与改变分工制度，原

这是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报告的部分，刊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报的《斗争》第五期。当时任弼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则上分工要细，每人要负责一件具体工作，并实行个人负责

制。

1. 人数较多的支部，干事会可由九人至十一人组织之，干事的分工可如下（必要时可增减）：

支部书记：管理全盘工作。

副书记：管理支分部与小组。

工会工作干事：指导工会工作，管理工会党团小组。

军事工作干事：特别注意赤少队（岗工作，兼赤少队的党代表。

群众宣传鼓动干事：指导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墙报委员会和宣传队，管理宣传品分发。

党员教育干事：注意新党员训练与一般党内教育工作，如党员识字班与读报班等。

妇女工作干事：领导妇女代表会工作。

贫农团工作干事：注意贫农团工作。

统计调查收党费干事：管理党员人数、成分登记统计及收党费。

苏维埃工作干事：负责苏维埃党团书记。

青年工作干事：参加青年团工作，如青年团支部书记为党员，即由他担任。

2. 人数较少的干事会，某几项工作可以合并由一人管，但分工除书记、组织、宣传鼓动、妇女干事外，以后必须设工运、军事、苏维埃工作的干事。

3. 在某几个干事之下，可组织各种工作委员会。如工会工作干事之下，可由各工会党团小组组长来组织工会工作委员会；宣传鼓动干事之下，可由在俱乐部、列宁小学、宣传队、

墙报委员会内做负责工作的同志组织委员会等。

4. 支书和各个干事，应分配出席小组会及支分部会。如小组数量少于干事的数量时，可由两个到三个干事出席一个小组会或支分部会，来领导与帮助他们的工作。

5. 全体干事会至少每十天应开一次会，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在十天中间，书记、副书记、工会工作干事、军事工作干事、苏维埃工作等主要的干事，应有一次接头，解决日常事务问题，必需时可要与解决问题有关系的干事来参加。

6. 新的分工制度的主要意义，是要将工作范围分得小，并加设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专门干事，吸引更多的党员来参加支部领导工作，并建立各个干事的个人负责制度，健强支部的领导力量。

7. 支部大会每月两次，小组会每月三次。每次支部大会前，干事会必须有很好的准备。

（四）支部人数过多，应成立支分部，以便利支部工作的进行。

1. 由人数多的小组（三十人或五十人以上的小组），或距离过远的邻近几个小组成立支分部，支分部应在支部干事会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2. 支分部应设三人至五人的干事会，五天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三人的干事会的分工，可为书记、组织及宣传鼓动干事；五人的干事会则为书记、副书记、登记和收党费干事、群众宣传鼓动干事和党员教育干事。

3. 支分部大会每月两次，所属的小组会每月两次。重要的全分支部大会，支分部党员应去参加。如支部大会讨论一

般的问题，则距离远的支分部干事同志应出席，回来在支分部大会上报告和讨论；近的支分部党员，则应出席每次全体支部大会。

（五）切实实行党员中的分配工作和检查工作的制度。每个党员除应担任一般的发展党员、宣传群众、散发宣传品以及临时工作外，应分配一种经常的工作，如特别注意苏维埃、工会、贫农团、赤少队、青年团、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及俱乐部、墙报、学校、读报班、妇女代表会等各部分具体工作。要消灭过去支部同志只是挂个党员不做工作，甚至不到会的严重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支部领导群众的力量，并且可以训练党员的工作能力。过去总责怪党员不积极，这是错误的。要使每个党员参加一种经常的工作并检查和督促其工作，必然可以提高党员工作积极性。

（六）支部要经常讨论并注意支部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过去支部不管周围群众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这是不能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在支部周围的，容易走到脱离群众的危险。支部要能自动地建立本身的经常工作，要有计划地规定各项工作的讨论日程，来加强对苏维埃与群众组织的领导。

（七）建立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在改造一般支部工作中，每个区应特别努力来建立一两个健强的中心支部，使其真正起中心领导的作用，帮助邻近支部的工作。要建立一个或两个模范支部，来推动全部支部工作的改进。

二 健强地方党部的组织与领导

(一) 建立集体领导。目前地方党部最严重的是集体领导未建立,省县区领导机关往往只有少数人工作,有的只有书记一人甚至连书记都出发了,这就不得不形成个人包办的手工业式的家长制度的领导。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的是不能有健强的领导力量,完全不能适合斗争环境的。以后省县区领导机关必须立刻形成集体的组织和领导,要保障各部各委工作的建立。一切重要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不仅各级委员会的常委要订出每月会议的主要议程,按期开会讨论,就是各级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须按期召集,消灭过去除常委委员参加工作,其他委员只是挂名的现象。

(二) 巡视制度的建立。真正建立巡视制度,这不独能使指导机关经常了解下层组织与群众状况,传达上级党部的一切决定,而且可以减少常委下乡的时间,是帮助各级委员会建立集体领导的必要条件。以后区委可以在支部中,特别是模范中心支部中,指定几个积极的有经验的同志来作区委的巡视员。他们不脱离生产,区委可分配他们去负责巡视某一乡某一项工作,如指定他巡视这一乡的苏维埃工作、赤少队或某一些小组的工作。区委每月召集一次或两次巡视员会议,倾听他们对工作的报告与意见,给以具体的指示和新的任务。区委委员除经常出席支部会与帮助支部解决各项问题外,要经过巡视员来更深刻地了解支部的实际情形。

县的巡视员可增加到五个人,大县可增加到七八人,省委可有十四五个人。巡视员除传达上级的决议外,要能帮助下面来具体执行决议,解决困难的问题;要注意发挥下层群

众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而不是去代替他们；要考查县委及支部的领导方式。省县委巡视员不仅巡视和检查下级党部的工作，还要深入到支部去，选择一个或两个支部，特别是中心支部、模范支部或最落后的支部，去细心考察与倾听他们的意见，并注意干部的引进。这里要反对只抄统计的走马看花式的巡视，同时要改变过去认为巡视员一定要比下级党部负领导工作的人能力强，才能胜任的观点。只要对某项工作有特别经验（如对解决土地问题有特别经验）、工作积极、政治开展、成分好的，就可以开始分配他做某项或某几项具体工作的巡视。在每次出发前，具体地告以当地的要注意要解决的几项中心问题，给以具体的任务与解决任务的具体办法。要有巡视会议，根据巡视员的报告给以具体的个别的指示，这样来训练培养巡视员的工作能力。

（三）建立各部工作。过去各部工作未建立，各级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实际变为巡视员，放弃了本身工作的建立。今后，组织部不仅要统计党员的数量成分，更要注意党组织工作上各方面的问题，如发展趋势，支部工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和苏维埃政权方面的组织上的工作。要经常注意党内及群众组织问题的研究，使之适合战争环境。这就要纠正过去党的组织部只管党本身组织上问题的狭隘的错误观念。各级组织部应有干事（区可有一个，县二个，省三个到四个），并应建立和健强组织委员会工作。组织委员会可由同级青年团的组织部长，工会、反帝拥苏同盟党团内（最好是担任组织部长）的党员及本部部长、干事，当地党部组织部的同志等五人到七人组织之。它经常讨论各方的组织问题，

收集各种组织的材料,提出具体的意见与办法供给常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必要时可调某县、区的组织部长来讨论并解决问题。

宣传部亦应健全自己的组织与工作,同样须设干事和宣传委员会,经常管理党员特别是新党团员的教育训练,解释党的决议与群众中宣传鼓动和文化工作等,要注意政府文化与工会的教育工作的指示,它要给各种欺骗宣传以及时的回答,并运用各种方式(如宣传队、蓝衫团游、俱乐部)解释与宣传党的每一个中心口号,使之通俗化。

要健强工会党团组织,使它能兼担工委的工作。工会党团要讨论一切工运的工作,除支部的工运干事外,以后不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或职工部,由党团负起这些工作。各级妇委也须充实健强起来,它应当是党与团合起组织的。

(四)党内民主化。过去党内民主化的运用是不广泛的,支部不能发动全体党员来详细讨论党的每一重要决议,支部干事会和各级领导机关未能按时改选,委派制度还普遍存在,而且发展到群众团体与苏维埃方面,如兴国县黄琴乡苏维埃不经过选民大会来撤销乡代表等。以后要推广党内民主化,一切问题要发动党员详细讨论,决定以后,便须传达到下层去坚决执行。这是提高一般党员积极性最重要的方法,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不能容许的。在组织上应改变委派制度,并按期来改选支部与各级党部,按时开代表会议。

(五)培养干部与巩固各级委员会的无产阶级领导成分。一是要用巡视的办法来创造与培养干部。二是经常地定期地召开活动分子会,团结他们在区委的周围,经常给以特别的

教育与训练，从工作中来培养他们。三是办短期的训练班，来大批培养与创造新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

要实际地吸引工人来参加各级领导工作，坚决反对提拔干部的形式主义。增强各级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成分，这是保障党的积极进攻路线的强顽执行的重要条件。要耐心地教育并分配他们一件两件工作，要教他们识字，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强固各级委员会对下级的领导。

三 群众组织与政府工作

（一）工会。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一般注意得很差。同时工会的组织过去只有地方的联合会，而没有真正的各个产业的工会组织，这妨碍了工人斗争战线的形成与减弱了斗争力量。因之要根据全总执行局所发出之各产业工会组织条例，迅速建立有系统的各产业工会，同时地方性的各业工会联合会仍要健强其组织与工作。

（二）贫农团。过去有些地方认为贫农团只在分配土地时有作用，这是错误的。贫农团是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柱石，它要最积极地为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而斗争，讨论苏维埃的一切建设工作的进行，推动一切战争动员工作的执行。过去许多地方贫农团不能开会，不起作用，贫农团组织所包括的分子不宽广。如瑞金县几个乡去年有六七百会员，而现在只有一二百会员。因之扩大贫农团组织，吸收贫农中更多的积极的成分来参加是极重要的工作。在组织方面，每个人数多的贫农团可以有三人到五人的委员会，但不需要组织与宣传

等的分工。各村可设立小组长,来负责会议的召集。在距离过远,不便召集全体会员大会时,可在党的支分部管辖区域下来单独召集开会。每个贫农、雇农、工人党员都应参加贫农团,并领导全乡的工人加入贫农团来加强对贫农团的领导。

(三) 政府工作。城乡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虽已建立,但每次改选中参加选举的选民数量,一般是不广泛的,党在选举运动中的领导非常不够,建立真正的代表会议制度是目前苏维埃组织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城乡苏维埃要建立各种委员会,如查田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等,来进行各项工作,吸引每个代表到各个委员会,使之担负一定的经常工作。要使每个代表与所代表的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经常报告代表会的决定,并将群众意见传达到代表会中去。对工作不好的代表,应由选民会议来撤销并选新代表,这就必须注意改选代表时须按村来选代表。代表会必须做到按期开会。省县区各级政府同样要建立集体领导和各部门工作,多吸引群众中积极分子来实际参加各部工作以健强各部的领导。

(四) 地方武装。首先要纠正有些地方忽视地方武装的严重错误,要吸引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加入赤少队来扩大这一红军后备军组织,这是红军从义务兵役将来转变到征兵制的极重要的步骤。在党员军事化口号之下,相当年龄的党团员应全体加入赤少队,切实建立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委员制和少先队中的党代表制,加强对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教育训练,依照中央政府的训令迅速编制完毕。目前要加紧动员赤少队和模范营集中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并且要动员整营整连地加入红军,这应成为今后扩大红军的一个重要方法,以应战争

日益胜利开展的需要。

（五）反帝与拥苏同盟。因这两个组织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中央局决定合并为反帝拥苏同盟。在目前帝国主义加紧准备武装干涉苏联和正在积极进攻中国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反帝拥苏同盟应成为极广大的群众组织，深入开展反帝拥苏的群众运动。互济会今后亦应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广大群众组织。党应纠正过去对这些组织不管的现象，必须加强其领导。

（六）青年团工作。过去党对青年团的领导是不够的，表现于：一是兼党的团员少，党在团员中的发展是关门的。瑞金县在十二月底的统计，全县六七千团员中只有八个兼党的，一月份方才发展到七十人。兴国县十二月底的统计，八九千团员中，兼党的只二三百人。二是地方党部对团的工作很少检查，更少有专门讨论团的工作，互派代表制度没有完全实行，对青年运动的取消主义观点，在有些地方还未完全肃清。这些表现是对青年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和扩大红军等作用之估计不足。一年来团的工作是有进步的，但群众化、青年化的转变还极不够。团员的数量除兴国县有个别的区超过党外，都是比党还少。少先队几个月来数量上还相当减少（一部加入红军），儿童团包括的儿童也不广泛。党团对立与团的先锋主义在部分的地方仍然表现着。国际十二次全会指出：“共产青年团必须转变成为群众组织，并责成一切共产党保证改善青年中的群众政治工作，党在共产青年团中应加强其领导。”我们必须根据国际指示纠正过去的错误，加强党对团的领导，使团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党最有力

的助手,使党经过团来团结更广大青年群众,胜利地进行战争动员工作,并且吸收大批积极团员加入党(不必脱离团)。团应向党供给干部,但调动团的干部必须得到团的同意,而不致妨碍团的工作。

(七)妇女工作。一是必须切实普遍地建立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来动员妇女参加一切战争动员与一切苏维埃建设工作。要坚决反对对劳动妇女中工作之过低估计,要与轻视妇女的观点和现象作无情斗争。二是坚决向劳动妇女开门。现在女党团员的数量很少,在江西九个县的统计中,四万多党员中只有五千女党员,只占总数百分之十二,这是极不够的。三是要领导劳动妇女对本身利益的争取,反对任何对劳动妇女斗争的抑制。

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 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

湘西北革命运动的新形势 和敌人新的进攻

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坚决地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叛）和刚由江西调来进攻我们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城市。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

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在湘鄂两省集中约十一万人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一月四日湘鄂川黔省委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给各级党部与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一月六日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中央代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作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本文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

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五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群众的斗争已经从打土豪进到分配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更高阶段。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从国民党军阀长期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得到了切身的基本的利益,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首先表现在群众热烈地参加红军,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扩大了一倍以上;其次是创立了大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正在同地主武装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各地群众都积极地分配土地,组织工会、贫农团,建立赤少队的组织,为保卫革命政权和已得利益而坚决斗争。

同志们!正因为我们的伟大胜利与成功,这就给了国民党军阀以很大的威胁。目前,他们正在征调力量,组织对我们二、六军团和新区的大举进攻。据我们由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湖南军阀何键从进攻我西方军的战线上抽调了两三个师,湖北敌人也调动了三四个师,总共调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布置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目前党的紧急战斗任务

湘西北的革命斗争形势已进到更残酷艰苦的阶段。我们要粉碎从外面进攻我们的敌人，同时要消灭苏区内部的封建势力和一切反革命活动，来保卫、巩固和发展我们这个新的苏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词，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新的胜利局面。摆在我们党前面最基本的战斗任务，就是以争取决战胜利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去动员、组织、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在满足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发扬群众积极性，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关于战争动员工作，省委已有一个给各级党部的详细指示信，这里只简单说明几项工作的中心内容。

一、目前战争动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广大群众当中进行艰苦的政治动员。

我们要使全体党团员个个都了解现在战争的紧张和战争动员工作的重要。到会的同志回到各县、区、乡去，应当有计划地召集县或区的活动分子会议，布置战争的动员工作，随即召集支部小组会，在党员中报告和讨论执行的具体办法，并实际分工，做到每个党团员做一件战争动员的具体工作，成为战争的组织和领导者。在党的各种会议当中，要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首先是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示张皇失措、悲观动摇、退却逃跑的右的倾向，同时对忽视敌人进攻放松艰苦战争动员的“左”的倾向也要给以严厉批评。

我们的动员不仅在党团内，还要去告诉广大群众，使群众清楚了解目前战争形势，相信我们能够胜利，巩固群众对战争的必胜信心。因此党应经过革命委员会和各群众团体、

赤少队游击队去召开各种会议,报告和讨论战争动员工作。县区一级应组织战争动员的宣传队,根据省委关于战争动员的宣言、标语,到各乡各村各屋坊中去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

二、在战争动员中摆在党前面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如何去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

第一,我们要保障完成省委扩大一万二千新战士的计划。一月份(一月十日至二月十日)应扩大四千新战士。我们如何去扩大?(一)依靠党、政府及各群众团体,在分粮、分田、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密切联系扩大红军的工作。这里要反对认为群众不愿当红军、当红军的早已去了的观点。(二)整批动员赤少队加入红军。我们编好了赤少队,就要抓紧其中心的工作,特别是模范营,准备整批动员起来加入红军。此外,动员游击队一部分加入主力红军,一部分加入独立团、营。我们提出永顺、保靖、郭亮〔67〕、大庸,每个县在一月份至少要做到有一个模范营加入主力红军。(三)切实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十八条,过去这一工作是未引起各级党和政府的注意的。要立即动员群众去优待红军家属,在群众中造成当红军最光荣的社会舆论。

第二,我们应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要认识这是配合主力红军争取决战胜利的一个主要条件。游击队要真能深入到敌人侧后方,积极行动,吸引和分散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瓦解白军,并领导群众斗争,消灭地主武装和敌人单个部队,发展游击队。这里必须保障游击队能绝对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现在许多区乡都有游击队,但领导不强,力量又分散。我们应该将分散的游击队以区为单位集中起来,组成区或县

的游击队。加强游击队和独立团、营中党的领导是异常迫切的问题。在每一个连队中应建立党的支部，坚决洗刷其中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第三，迅速把赤少队编制起来。我们若能将几十万群众武装组织起来，这的确是可以当得几万几十万军队力量的，因为他能迷惑、钳制和疲困敌人。譬如敌人进到永顺城，我们以赤少队配合少数部队四面八方将敌人围困起来，断绝他们的粮食，可以做到敌人不敢随便出城行动，这是便利我们主力各个击破敌人、消灭敌人的。赤少队编制好了，应加紧训练，一个月至少应下两次操，由区委或支部派人去上政治课。应经常准备好一切，以便能随时动员去参战。最近全省应做到动员三个模范营、四营赤少队去前方配合作战。

与巩固部队和保障战争胜利不可分离的，就是收集粮食的工作。这一方面是要从深入阶级斗争中，把查出地主的谷子，在说服群众、得到群众赞助下留出大部分供给红军，并且将它撤到安全的地方集中隐藏起来。另一方面，就是组织群众随游击队到白区去搬土豪的谷子。这里要防止脱离群众的现象，就是说要分一部分给当地群众，并向群众宣传解释充裕红军给养的重要，把谷子搬进来，分发一部分给搬运的群众，留出大部分保存起来。各区乡要组织粮食委员会和保管委员会来负收集和保管的责任。

三、迅速消灭新区内的地主武装，镇压反革命的活动。造成巩固的赤色后方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最近的事实证明，地主武装在敌人大举进攻和新区内阶级斗争深入的时候，必然要更加积极活动起来。我们若不能迅速消灭他们，

将给我们以很大的阻碍。消灭这些地主武装的办法：第一是靠我们武装去打。但必须领导游击队和独立团、营，配合赤少队去袭击包围消灭他们，利用土枪土炮土炸弹去对付他们，不应依赖主力红军去打。其次，除了用打的办法外，还应该用政治工作去瓦解地主武装和土匪队伍。分田时，他们中间工农出身的士兵应同样分得土地，要利用他们的家属或派人进去，进行瓦解工作。

被我们推翻了的豪绅、地主及富农必然要更积极活动起来。他们的活动方法主要是：（一）背起零星的枪支隐藏在上山，袭击暗杀我们的工作人员；（二）混进我们的武装和政权，破坏革命，阻碍分田斗争；（三）用欺骗威胁的办法来和缓群众的斗争，欺骗落后的分子。我们对付这些反革命是要以革命群众的暴力、用赤色恐怖手段来镇压他们。第一，对付藏在山上的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应该发动赤少队，搜山捕捉；对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立即由群众公审枪决。第二，平时应发动群众严密监视地主富农的行动。要揭破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骗阴谋，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和利益上不相信他们的欺骗。第三，要立刻检举混入政府、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中的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积极活动的必须捉起来公审枪决。

过去在肃反中，表现最危险的倾向，就是对反革命容忍姑息，妥协让步，我们应开展反对这种倾向的斗争。少数地方发生过捉到土匪不审查成分，不分别是否首领就杀，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要妨碍我们瓦解他们的工作。

四、彻底分配土地，是完成战争动员不可分离的任务。

这个工作我们已有一些经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靠我们发动农村中的基本群众，热烈参加这一斗争。群众起来了，地主富农是容易清查出来的，土地人口也很快可以登记，并且瞒田也无办法，很快便可把田分好。这里贫农团和工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必须加强和扩大其组织，并发挥它们的作用。我们要反对迟缓分田的现象，因地主富农就是希望迟延分田的。我们要反对原耕不动的分田原则，因为这要使分进田的贫农、雇农、工人得不到好田，而且富农可以从中作怪。过去有些地方分配土地斗争中，不去经常严格检查，甚至地主富农混进了土地委员会都不知道，这必须严格纠正过来。各级土地没收分配委员会必须坚强。首先就是检查这里面的成分，经常指示他们进行工作的方法。龙家寨杉木村分田时，不要土地委员会，由群众互相盘田，这并不是好办法，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分田中有许多事情必须要有一定的机关来领导指挥，没有这种机关是做不好的，并且富农地主可以利用机会窃取土地革命果实。分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中农的态度，不使他们发生动摇、恐慌。要向他们解释，土地革命是不会侵犯他们的利益，而且是于他们有利的，使他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站在贫农雇农方面，一同来反对地主富农。这里首先就要靠我们从打土豪分东西起，直到分田，都不致侵犯他们的利益。特别要防止把富裕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的要立刻纠正，并赔偿他的损失。把富农当地主打，消灭富农的个别错误也必须纠正和防止，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引起中农动摇的。

在分好了田的地方，应即进行分山、分鱼塘和房屋的斗

争，并应进行查田的运动。如分田分得很坏的地方，地主富农窃取了土地革命利益的地方，则应重新分配土地。各地方党应抓紧这个基本的斗争，求得迅速解决新区的土地问题。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土地问题正确解决了的地方，群众积极性要高些，各项工作都有成绩。

五、加强和巩固党与政权机关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成为目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首先，是要反对依然存在着的关门主义，求得迅速在各部分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在每个乡村、工厂、企业、街道、学校等和武装中的每一个伙食单位，都要有党的支部，这才能够保障党的领导的加强。在今天发展党的组织，要把力量用在那些没有党组织的地方，特别要向工人、雇农、苦力大开其门，大胆地吸收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里要反对那些“和平发展”的说法。要晓得，我们今天是一个斗争的环境，有什么和平可说！问题只是在于大胆发展当中，要注意防止异己分子混入我们党内来。

第二，仅仅有了很多党员还是不够的，必须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领导。支部要有很好的分工，每一个党员都要负担一件经常的工作。要健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使它真正能领导本乡的政府、赤少队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真正成为执行党每一决定的机关和群众中间的核心，这才是健强和巩固了党的领导力量。加紧党员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这主要是通过分配党员做实际工作去训练，其次是经常开办流动训练班。县委应开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大批新干部。要加强区委的领导，因为区委组织和领导加强了，才能推进支部的工作。

第三，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我们在工作中碰了钉子，工作推不动，就要研究其原因，从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方法。譬如塔卧乡开始分田的时候，群众会议总召集不成功，后来发现土地委员会中有个反革命分子，他在周矮子〔68〕时代帮周矮子压迫群众，红军来了他就借红军名义打贫家人的“土豪”，并且威吓群众说，现在分田将来革命军来了就要杀头，后来把他捉起来，经群众公审枪决了，群众热烈起来分田，什么工作都好做了。所以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党和政府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健强起来，党不能去代替包办政权的日常工作，而是应该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培养政权独立工作的能力。大的问题决定了，大胆交给政府工作人员去做，建立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权力，使群众认识政权是自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里面的消极怠工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应加以清洗，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改进并健全本身的组织机能，使它成为目前战争中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分好了田的地方，应马上进行苏维埃的选举运动，把革命委员会转变成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各级军事机关也必须以大力去健强其组织与工作。我们要认识，党、政府、军事机关在领导革命战争当中，是三个主要的机关。我们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危险倾向。

当然军事机关是有它的直接指挥系统的，但在军区的指示方针下，各级军事机关必须协同当地同级党委讨论决定具体执行的办法。

在边区和战区的党，应有秘密工作的准备，特别是边区的党更要注意，因为敌人容易伸进来破坏我们党的组织。在敌人暂时占领区域的党，应在当地继续活动，领导群众反抗白色恐怖和反对拉伕、修马路、筑炮台的斗争。全党应注意瓦解白军的工作，除对白军士兵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外，应利用各种关系打入白军活动，特别是边区乡、战区和被敌人暂时占领地区的党，要努力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

同志们！这就是目前党最紧急的战斗任务。我们同敌人的决战快要到来了，我们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各个战线上正在那里与敌人肉搏冲锋，前方战士正在那里摩拳擦掌准备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战争形势是很紧张严重的。我们及时把上面的任务完成了，才更能增加前方的战斗力量，保障迅速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最后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红二、六军团会合后 红二军团的成绩和存在的弱点

红二军团的成绩：

（一）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

（二）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在二、六军团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虽然还不完备。其他如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也在开始建立系统的工作。

中央代表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后称红二军团）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会师后，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他和军团长贺龙主持下，批判了原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解散党团组织、取消部队政治机关等错误，作出了加强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决定，并为此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本文是报告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三）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

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龙家寨、大庸、陈家河几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广大的新苏区。

（四）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虽然我们还谈不上是铁的红军，但是正在向着铁军的道路前进。

如果看不到这些成绩，那就是机会主义；然而仅仅讲成绩，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工作转变是无益的。据最近的考查，现在红二军团的部队中还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弱点：

（一）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危险倾向。这种错误与过去取消政治机关是有连带关系的。

（二）对新战士的力量估计不足。如某团长说：“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有一排长说：“老战士提走了，要我带新兵我就请假不干。”这与过去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是有关系的。要晓得这些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只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加紧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又有老战士作里面的骨干，新战士同样是有战斗力的。

（三）提拔干部中非阶级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不按干部的成分和政治觉悟程度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这是极错误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新干部不信任的倾向，这也是有害的。干部军阀习气残

余还没有肃清。

（四）游击主义的习气和保守主义。这在执行军委一切命令训令，在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问题上表现出来。不了解我们已经是正规的红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我们检查部队中的军事技术工作，则可看到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在慈利，某营担任游击，打了一千四百多排子弹而没有打死几个敌人，这可以看出我们军事技术上的弱点。但在我们提出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不错了”。狭隘的经验论调还在那里阻碍我们工作的转变。

（五）在敌人新的大举进攻面前产生了新的动摇。如有个别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力量，缺乏战争胜利信心的状况，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六）我们的政治机关最近一个时期是作了一些工作的，但对于展开思想斗争，克服我们部队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尽到应有责任的。这是最大的弱点。

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

由于我们的胜利，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举行新的大举进攻。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战线上，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和四方面军的敌侧方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

对我们的大举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

根据这一紧急战争形势，我们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应当是：

（一）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作到短期内每个战士都很纯熟地使用手榴弹，会刺枪，会射击。班排长还要学会使用机关枪。干部要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这里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还要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二）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发展党的组织要作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三）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

（四）健全军事行政机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军事行政机关，必须健全自己的组织，人员不齐的马上调齐，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要严格纠正过去供给部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杜绝贪污现象。各部门和机关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于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

（五）扩大我们的部队，创造新的师、新的团。要努力在短时间内使部队扩大一倍，同时应加紧干部的培养，加强新战士的教育训练，最大限度地巩固新扩大的力量。

这五个问题是目前二军团建设的基本任务。这里就要我们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消灭上述部队中存在着的一些不正确的倾向，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善我们工作方式和方法，使已建立的列宁室、十人团〔7。〕等组织成为有工作内容的工作机关。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连队和支部的工作，要发扬连队中每个战士的积极性，要在他们的自觉的热情上去进行工作。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看到当前任务的严重和工作中的缺点，以最大的决心来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能够团结在党中央的路线下，克服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努力奋斗。

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 在粉碎敌人“围剿”中红二、六军团的基本任务

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持久战斗当中，我二、六军团在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战略意旨下转移到湘鄂边地区，最基本的任务是：

第一，以自己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活动，达到分散吸引敌人用以进攻和“追剿”我中央野战军的兵力，配合与协助我主力红军顺利地转移和在主要战线上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以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第二，在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壮大红军有生力量的条件下，坚决进行战斗，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扩大新

*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六军团粉碎了敌人从二月开始的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九月初，蒋介石又调集了一百三十余个团的兵力，再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为了总结前一段冲破“围剿”的经验教训，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红二、六军团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本文是任弼时在会上所作报告的第一部分。

开辟的游击区域，使之成为巩固的新根据地，贯通江西、四

川两大基本苏区。

根据这两个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我们于去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进占永顺，十一月中取得龙家寨战斗的胜利，将进攻我二、六军团的湘西军阀陈渠珍部约十个团击溃，乘胜进占大庸、桑植城，威逼辰州。涪溪河的胜利击败敌军三个团，占领桃源，包围常德，震动了长沙、岳州，逼使蒋介石不得不从“追剿”军中抽出三个师的兵力暂时来阻止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这个短时间内所造成的胜利局势具有下列的重要意义：

第一，威胁了“追剿”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当时中央野战军在湘黔边之通道、锦屏地区），给我中央野战军以有力的配合。

第二，开辟了以永顺、大庸、桑植城为中心的广大游击区域，使这一区域广大群众得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财产、粮食的利益。

第三，震动了湘鄂军阀的统治，兴奋了全国劳动民众。

在我们胜利开展的局势下面，敌人开始组织对我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边新区的“围剿”。

二 敌人“围剿”计划的内容和我们的策略

当时国内革命战争的阵势是：

第一，蒋介石正以全力“追剿”我中央野战军，我中央野战军在向川黔边转移途中给蒋军吴奇伟纵队及黔军以有力

的打击。

第二,我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积极活动,连续击败四川军阀的主力,中央区、湘赣、湘鄂赣等区域的游击战争正在开展。

第三,我二、六军团正在胜利地开展中,但所依托的永顺、大庸、桑植是新开辟只有两个月的地区,而且是没有连成一片的约有五十万人口的游击区域。

当时敌人的战略意图是:

第一,因为惧怕中央野战军与我们会合,因此努力阻止我们西进,同时防止我们向东南破坏其长沙、岳州主要后方交通,后来又惧怕我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企图包围消灭我们于单独的孤立的地区。

第二,抓住我们没有巩固根据地的弱点,同时依据其战役计划上的要求(肃清其侧后红军,以便抽出力量增加到“追剿”“堵剿”我中央野战军方面去),企图在比较短促时间内以强大力量来消灭我们。

在上面的形势和意图下面,敌人的计划是:

第一,调湘鄂两省可能抽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从“追剿”军中抽调三个师(十六、六十二、十九师),从进攻湘鄂赣苏区部队中抽调一个师(二十六师),共计有八十一个团的兵力,除一部分驻守周围城市和碉线外,分成六个纵队进攻,每纵队配备六个团到十二个团的兵力,此外还配有两队战斗飞机。

第二,充分武装新区周围和隐藏在新区内部山上的地主武装,经过地主富农拉拢土匪部队(在湘西北大小股土匪极多),组织地主富农零散武装以及法西斯别动队、便衣队,深

入新区积极活动，破坏交通和地方工作，使之成为有力的尖兵和前哨。

第三，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破坏苏区与白区通商关系，特别严禁药材、布、草、粮、盐等军用品输入苏区。

第四，在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如利用飞机散发传单和叛徒的宣传；派遣反革命分子混入红军地方部队中，进行勾引收买等反革命活动；推行新生活运动（7 幻的复古愚民政策；缩编湘西老军阀陈渠珍部，声言废除陈渠珍的苛捐杂税等。

第五，在战略战术上，一般是依据第五次“围剿”的持久战和四面包围的堡垒主义方针。但敌人估计到我们是一个新地区的弱点，和它在战役计划上要求迅速消灭我们，因此在开始一个时期内，企图迅速分进到适当位置，然后包围我主力在狭小地区以内，进行合击，并以飞机轰炸来消灭我们。具体表现在：

1. 依靠“进剿”和“防堵”主要方面的简单封锁线（由慈利经四都坪至王村、保靖之线，以及由龙山经来凤至宣恩之线），此外是在周围各城市及最重要的市镇构筑碉楼工事，即向我们基本地区推进。

2. 利用原有马路及河流为交通，没有采取进至一地即修筑马路的后方交通网计划。

3. 推进的行程较大（每日三十至六十里），不是每进一地待驻地碉堡及与并进部队之横线碉堡完成后再行推进，有些纵队推进时并不沿途筑碉堡。

然而这一求胜心急的分进合击计划受到几次打击，以后即采取了较严密的四面构筑碉堡封锁线慢步推进的计划。

在这一“围剿”部署中，敌人存在以下明显的弱点：

第一，湘鄂军阀军队在指挥上不统一，各自保存实力，协同动作差。

第二，鄂敌缺乏与红军作战的新经验，湘敌大部因经过“追剿”中央野战军的长途行军而疲劳且不充实。

第三，敌人是被我们调动到广大无堡垒地区，极便我们去在运动野战中消灭它。

第四，湘鄂敌人除极少数未曾与红军作过战斗者外，都是被我二、六军团击败过的，因之敌人胜利的信心是差的。

在上面的形势和敌人“围剿”计划下，我们的策略方针是：

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的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力，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

这一策略方针的目的是在于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向四川转移的中央

野战军，同时依靠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以及白区群众斗争的配合，争取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我们有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及新区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参战，相信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完成自己任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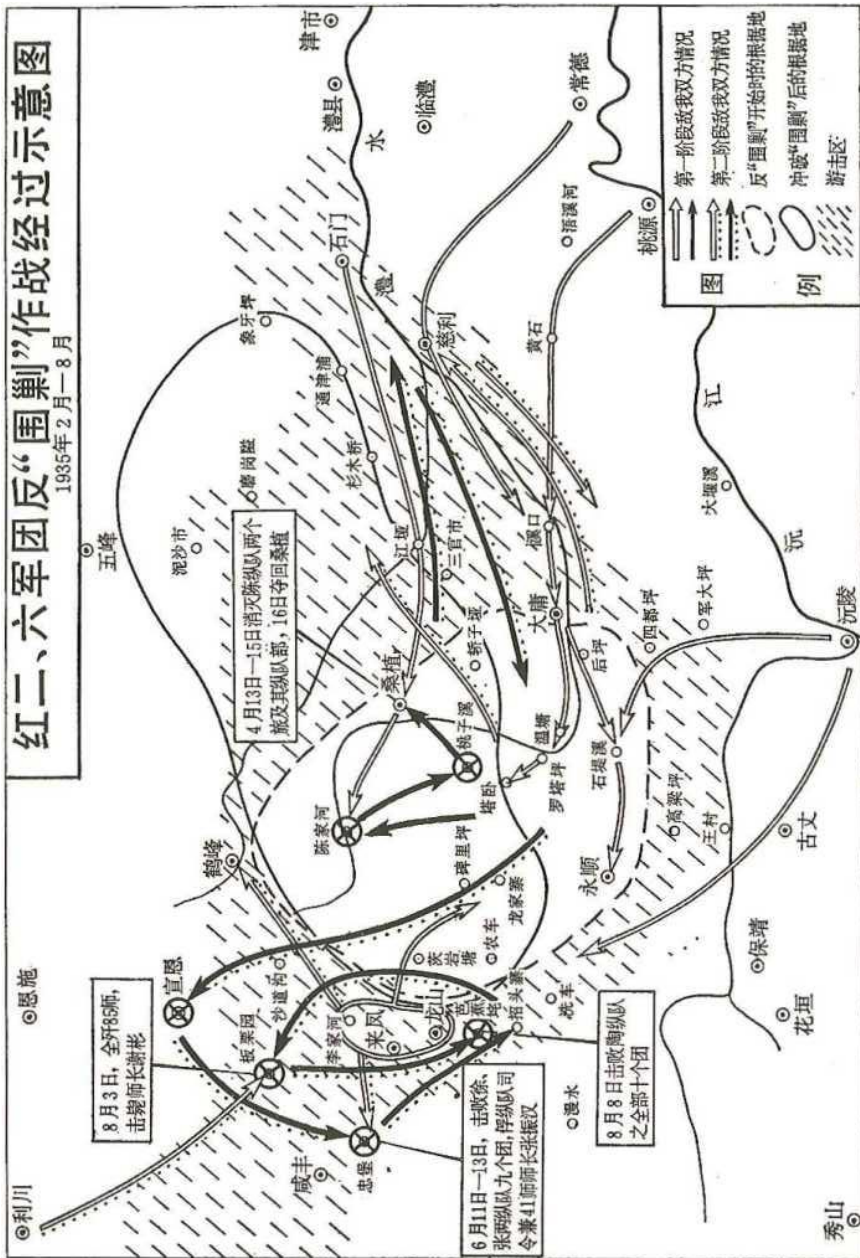
三 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经过

敌人“围剿”的军事行动是在今年二月开始的，其兵力分配是以陈耀汉、郭汝栋、李觉和陶广四个纵队，从东南方向大庸主要目标推进（当时我主力是在东面大庸地区），以徐源泉、张振汉两个纵队从西北逐渐向桑植、永顺推进。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整个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溪口战斗到退出塔卧，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胜利，击破陈纵队为止。

第二阶段是从击破陈纵队恢复桑植城，到板栗园、芭蕉坨战斗胜利，全部冲破敌人“围剿”为止。

在第一阶段中，敌人东南四个纵队，陈纵队由石门县经江垭向大庸以北地区推进，郭纵队配合李纵队向大庸以东地区推进，陶纵队之一部进至四都坪，主力向大庸以西之永顺地区推进，测其企图，似将以这四个纵队的力量合击我军于大庸地区以内。西北之徐、张两纵队，除一部扼守乌江，防我中央野战军东进外，余均集结龙山、来凤，向茨岩塘及以东地区推进。



在这一阶段,我们是集中力量击破敌人从东南方面的进攻。二月八日在溪口,三月十四日在高粱坪,及三月二十一日在后坪,进行过三次重要的战斗,给敌郭纵队、李纵队与陶纵队以创伤,然而未能大量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没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敌仍得以进占大庸城,并继续向着我们的基本苏区逼进。

最后,敌陈纵队乘虚进占桑植城,并以一部推进北面之陈家河;郭纵队经温塘渡澧水进占罗塔坪逼进塔卧,当时离在塔卧的省级机关只有五十余里;李纵队及陶纵队之大部进至石堤溪,一部转到永顺城,陶纵队之另一师推进至农车、洗车;张纵队进占茨岩塘,向我们医院、兵工厂、被服厂所在地龙家寨逼进,造成四面严密包围封锁。各方敌人离我塔卧、龙家寨基本后方仅一日至一日半行程,即五十里至一百二十里,准备合击我们于狭小的塔卧、龙家寨地区以内。这是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的情况,在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区内同强大敌人决战是于我们不利的。党的省委和军分会采取了下列的决定:

第一,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基本地区。

第二,集中全部主力,以地方武装之大部编入主力,充实和增强主力的战斗力量。

第三,击破敌之封锁线,从敌人之侧翼后方坚决突击敌人,来击破敌之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以开展新的胜利局面。

四月十二日我们退出塔卧、龙家寨(敌同日即进占塔卧)向北突击,十三日在陈家河消灭敌陈纵队之一旅,十五日在桃子溪继续消灭陈纵队之另一旅及其纵队部,将由东北来进

攻之陈纵队全部击溃，十六日即夺回了桑植城，恢复桑植苏区。敌人原有的包围封锁合击我们的计划已失其效用，而我们依据以桑植为中心的广阔地区转入自如的有利的地位。

击败陈纵队恢复桑植城后，开始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从原来握着军事上的主动的地位，转入到被动的困难地位；相反，我们由军事上被动的处境，转到主动的进攻的优势地位。

我们利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地位，采取了坚决反攻敌人的策略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决定以主力远出东面敌人的侧后方，伸出到江垸、慈利之线，调动敌人离开基本苏区，并求得在敌人远距离运动中，抓住敌人之过失，给以新的胜利的打击。

四月底我主力进占江航伸出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同时又表露有北渡长江的形势。东南方面之敌军后方交通，完全处在我们极大的威胁下面。

在我们这一行动的威胁下面，李纵队全部及陶纵队之一部，首先急促地由石堤溪、塔卧之线经澧水南岸东调慈利，郭纵队全部及陈纵队之残部相继调至石门，以堵我东进。龙山、来凤地区之张振汉、徐源泉两纵队之大部亦向鹤峰转移。后据被俘之张振汉说，是到鹤峰、五峰、渔洋关、长阳之线堵我北渡长江。当时大庸、塔卧、永顺只有固守碉线之薄弱敌人。

因为这些被调动的敌人不便于我们攻击，我军乃决以主力回入永顺、桑植间寻求新的机动。五月七日在塔卧、永顺道上消灭敌之一营。塔卧、永顺吃紧，李纵队复由慈利回援

塔卧、永顺。五月九日我军伸出石堤溪、大庸道上迎击该敌未成。十七日转入龙山、来凤，突破龙山、宣恩城，给施南（湘鄂边“剿赤”总司令部徐源泉根据地）、利川、万县（即蒋介石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主要长江交通线）以极大威胁，以期调动张、徐两纵队，寻求击灭该敌之机动。

六月十一、十二、十三日三天内，经忠堡地区的连续战斗，击败徐、张两纵队九个团，俘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胜利后，以小部围困龙山城，大部休息整理。敌在连续失败中增调了两师兵力于西面战线，企图增援龙山城，巩固西北阵势。七月三日我主力之一部，在永顺、洗车线上之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陶纵队。七月十日在来凤、龙山间之象鼻岭击溃援龙山之潘善斋旅。七月半间在咸丰、来凤线上之胡家沟，打击援龙山之黄新纵队（张、徐余部所组成者）。七月二十七日撤龙山城之围。二十八日在招头寨迎击继续援龙山之陶纵队。八月三日在咸丰、来凤间之板栗园，全部击灭新调来之八十五师，击毙其师长谢彬。八月八日我军转移于芭蕉坨，再击败陶纵队之全部十个团的兵力，结束了我们奋战的第二阶段。

板栗园、芭蕉坨战斗的胜利，我们认为国民党在五次“围剿”的过程中对我们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冲破了。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敌人原来部署的六个纵队的兵力和以后增调的生力军，均被我们击败，并消灭其一部分重要的有生力量。

第二，敌人只依据失败后的所有实力，已无信心也不能继续组织“围剿”或反攻。

四 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及其意义

我们的胜利：

第一，我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北地区，在极短促的时期当中，共经过大小战斗三十次，前后与我们直接作战之敌计有八十六个团，除依城或据点困守之一部，即在沅陵、塔卧、龙山、宣恩共约十个团外，均被我军击败，前后占领过七个县城。

第二，我军前后共计缴获敌步枪约一万枝，生俘敌约八千余人，缴获敌轻重机关枪约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五全架，山炮二门，子弹约一百二十万发，生擒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师参谋长二、团长三、营长及以下官长二百余，击毙敌师长一、旅长二、团长五、营连排班长百余，敌伤亡兵力在一万以上。

第三，我二、六军团与十倍于我们的强大敌人半年多的艰苦战斗，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也没有减少和削弱，而且比以前扩大一倍以上。在这一过程当中，除成立了十八师和十一及十七团并且成为有力的战斗部队外，我们还成立了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

我们胜利的意义：

第一，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

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第二，我们从艰苦流血奋斗中保卫了新开辟的苏维埃版图，有些城市与村镇虽然因战略上的关系被放弃，现在还被敌人暂时占领着，但是开辟龙山桑植边一块新苏区，以桑植为中心开辟的地区仍然是我们胜利进展中的根据地。我们保卫着这一基本新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中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它使江西、四川两大苏维埃基本区域的联系具备了基础巩固的桥梁。

第三，我们这种战胜强大敌人的英勇果敢的奋斗精神和取得的成功，再一次在全中国和世界的民众前面表明红军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给了那些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前途表现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的痛击，将要更加推动和兴奋起全国革命斗争的浪潮。

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伟大胜利与成功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我们红色战斗员、指挥员的英勇果敢、不怕艰苦、坚决奋斗的牺牲精神和我们干部的组织创造才能。我们因为要抓住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时常在一天之内行军八十至一百二三十里，来同强大敌人作战。最后一个时期，因为遇到粮食的绝大困难，在作战中每天只能得到一两餐稀饭，个别的部队甚至两天只吃一餐饭，还是不疲倦地同敌人顽强作战。

第二，是因为有新区和游击区域群众的拥护和热烈的参战。我们在敌人翼侧行动和作战当中，广大群众加入红军。

在龙山、来凤、宣恩和咸丰地区扩大三千新战士，在江垭地区扩大一千余，最近在津市、澧县和石门扩大三千以上。群众还自动帮助我们运送伤员、侦察敌情和带路。

第三，是由于党省委和军分委一般的正确估计和依据全国革命形势，来灵活运用中央及军委关于粉碎敌人“围剿”新的战略战术方针，特别是退出塔卧以后。

五 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教训

（一）我们为什么在粉碎“围剿”的第一阶段中，不能够在东南战线上胜利地击破敌人的进攻？

第一，我们在这一时期当中，虽然一般是依据中央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新的作战方针，但是对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指示，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大庸、溪口未失去以前一个时期内，我们集结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远出迎击，而没有坚决采取转移到敌人之翼侧后方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当时情况可伸出到以黄石为中心的地区活动），寻求打击消灭敌人的机动，而这是我们当时能够阻止敌人前进，破坏敌人分进计划，一直到在东南战线上击破敌人进攻的最适宜的策略。

第二，后坪战斗是改变当时敌我阵势的关键一战。当时大庸失去后，李纵队向后坪、石堤溪推进，陈纵队、郭纵队、陶纵队有同时分向桑植、温塘及永顺配合推进之形势。我们

如能击灭李纵队，可逼使郭纵队固守大庸，停止陈纵队及陶纵队之急进，再转移我主力于桑植地区，迎击陈纵队或陶纵队，仍然可以乘胜击破东南面敌之进攻。因为当时在兵力、地形、天候上我们处于优势地位，有大部以至全部消灭李敌的可能。但因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还有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未按时移动部队占领阵地，致使我们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敌人仍得以继续进占桑植、永顺，逼进塔卧、龙家寨基本苏区。

第三，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少队〔涸等〕）未能完成消灭新区内之地主武装及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并且受了部分损失而日形减弱。这就使一部分担任守卫地方和钳制敌人任务的主力不能完全使用到前方。而且地主武装反日形猖獗，破坏交通联络，摧毁一部分地方党和政府的组织与工作，使我们动员的范围日益缩小。地方上参加战争的群众动员不能适应前线上的要求，主力部队在连续战斗中不能及时得到人员的补充。地方武装不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有力配合主力行动的弱点，直到现在仍然是存在着的。

（二）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消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

第一，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是最有害于进行战斗的。后坪与招头寨战斗表现得最为明显。后坪战斗中，如果前面部队能按时到达，占领优势阵地，我们仍然可以取得战斗的全局胜利，消灭李敌大部或全部有生力量。招头寨战斗，如果所有部队都能按命令规定动作测一方面我们主力到达之前，前

面即有较大兵力可以阻止和扼制敌人，并占领优势地形（后为敌所占去），以待主力集结进行突击；同时主力也可早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赶到，可能在当日的战斗中将陶纵队先头七个团全部击溃，而且消灭其大部有生力量。

第二，我们的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的提高还不能适合战争的需要。我们射杀敌人的技术尚落后（部队流动性太大亦有关系）。干部在战场上的机动还差，如板栗园战斗中某部若能迅速抄敌退路，则少数残敌亦不能逃脱。这些都使我们失去消灭更多敌人的时机。

（三）围困龙山的教训。

在现在我们的兵器条件下，攻击具有新式武器且有工事的城市，一般是应该避免的，但我们围困龙山的决定是依据于：

第一，敌人增援部队在半个月至二十天内没有到达的可能（鄂敌在忠堡惨败后，一时不能增援；湘敌因粮食困难，远道亦不易进援）。

第二，守城部队（一团白军及一个保安团，只一千四百人）及城内居民共约万人，没有存粮，至多只够维持十天到半月的给养。

第三，守城部队炸弹极少，工事不甚坚固，在地形上我们容易接近城垣地带，可以施行坑道破城。

第四，龙山城攻下后，来凤孤立，可能逼退驻守来凤之敌。我们若能取得龙山、来凤（两城只距十五里），在地理及其他条件上最适宜作我们基本根据地。

在上述条件下龙山城是有夺取的充分可能，因此以少数

兵力利用休整时间围困龙山城（不是强攻）的决定是正确的。围困龙山城开始的几天内，即以政治攻势将西北两面碉楼内守兵争取过来，碉楼为我们据有。东面碉楼在我军炮击之下亦已占领。经二十天围困，城内居民饿死的日多，敌守兵已把菜叶、草根食尽。但最后我们未能困开龙山城而撤退，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第一，是敌飞机最后能每日供运少数粮食，将毙之敌得以苟延。我们对这一点事前没能估计到，而对空射击技术又太差，未能阻止敌机降低到三百米以内的投掷粮食的动作。

第二，我们坑道作业技术太差。我们挖掘的地道已超过了城角还不知道，被敌从城内掘毁。

第三，我们未能及时利用最好时机袭城（有一晚通夜大雨，城墙周围敌之照明灯均熄灭）。最后袭城时，我们动作与技术上差。

第四，在困城时，对城内守兵及居民的宣传号召，未能达到发动白军士兵及居民暴动哗变的要求。

因为上述原因，围城三十五天，各方敌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仓促进援龙山城，乃决定撤围城部队，集中力量迎击援敌。撤围后十三天之内，进行了三次重要战斗，即招头寨、板栗园和芭蕉坨战斗，将敌人“围剿”全部击破。这同时证明最后撤围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四）忽视了白军及白区的工作，不知道运用军阀矛盾和组织反日反蒋运动的策略，使之有利于红军武装斗争的开展。围困龙山的时候，如我们在守城敌军及龙山城居民中有工作基础，是具备着组织暴动和兵变来配合夺取龙山城的充分

条件的。湖南军阀与湘西军阀间尖锐的矛盾是有利用的充分可能的。何键与蒋介石之间存在而且正在发展中的矛盾，都被我们所忽视。这一切证明，我们对中国革命发展当中新的特点还没有深刻了解与认识。

我们要足够估计我们的胜利和意义，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血战中得来的教训，要坚决消灭我们存在着的弱点。

红二、六军团 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关于行动的方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自桑植的刘家坪出动，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七个月零十天，行程约一万余里。整个长征经过可分下列四个时期说明：由刘家坪至石阡、江口为第一时期；由石阡至黔西、大定、毕节退出为第二时期；黔西、大定、毕节退出后至中甸为第三时期；中甸以后为第四时期。

第一时期

第一，二、六军团冲破敌人“围剿”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形势和我军退出苏区的决定。

* 这是任弼时的一份手稿，原题为《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经过报告大纲》，记叙了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过程。

（一）二、六军团在龙山、来凤、宣恩地区将敌“围剿”冲破后，主力进入津市、澧县、临澧、石门地区补充整理，开辟东面广大游击区域，威胁常德、岳阳。

（二）敌在“围剿”失败后，继续布置新的大举“围剿”，一方面以原有的兵力共约八十七个团，巩固和增筑南西北三面封锁线；另由鄂赣增调新的兵力约四十二个团，从东面向西压迫，企图逼退我军于龙山、桑植、永顺间狭小地区，包围封锁而聚歼之。这时南西北三面之敌为防堵性质，东方为攻势。

（三）当时各方面的条件：

1. 日本正积极图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

2. 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安附近活动。

3. 我主力经半年战斗后，在津市、澧县、临澧、石门地区得到约六千新战士补充，计有四、六、十七、十八师十二个团，红校约一个团，四个独立团（约等于两个团）及少数游击队。

4. 原有活动地区，东西约三百里，南北百余里，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粮食缺少，地形上不利大兵团进行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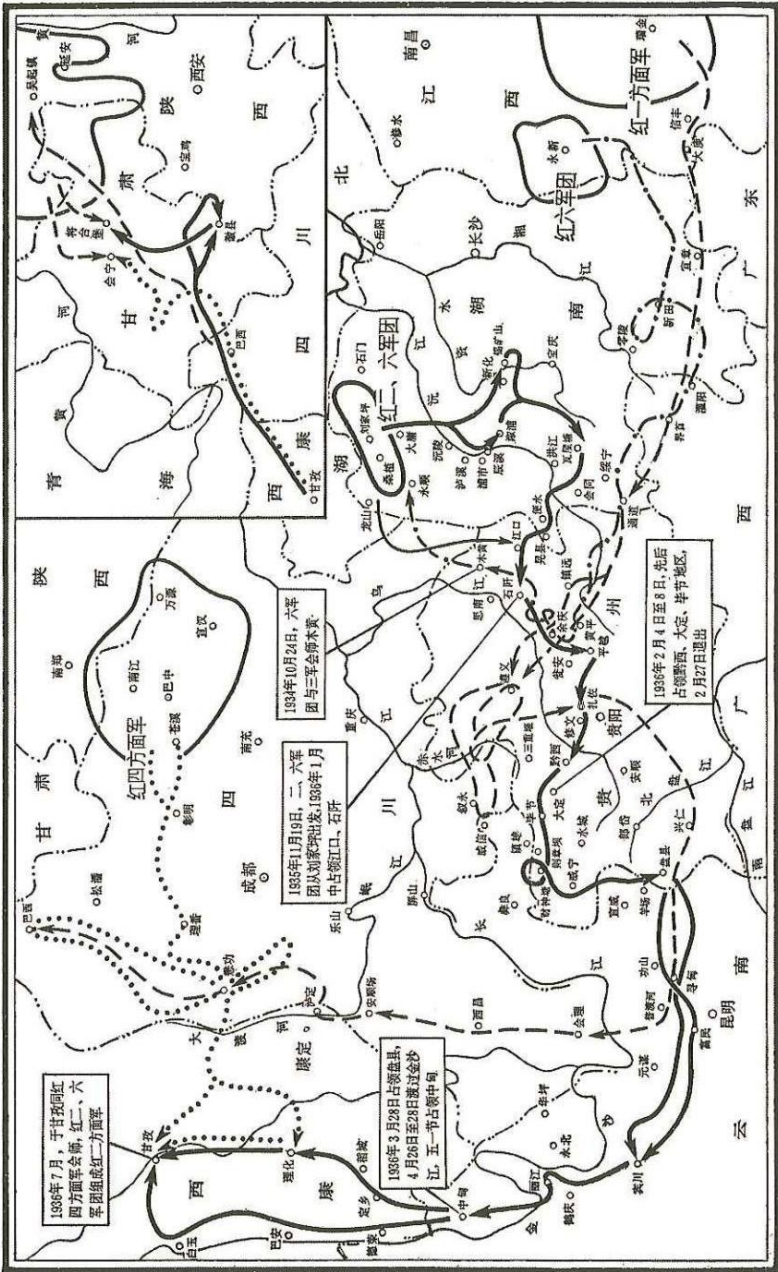
5. 二、六军团及湘鄂边苏区位置长江中部，接近武汉、长沙，它的存在发展对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与对敌威胁均颇大，故蒋介石决心以大力进攻。

（四）行动方针决定的经过：

1. 最初拟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地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

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示意图

1935年11月—1936年7月



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但因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以及东部地形关系和主观方面条件，认为在当时敌情下，依据活动在不宽广地区击破敌新“围剿”是困难的，因此向军委建议主力转移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

2. 军委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对我军行动的指示是：“在现小地区内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十月十九日又指示：“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但说明这是一些建议，由我们按实况决定。

3. 按当时情况，北面除敌封锁外，地形极坏，且有清江、长江；西面附近地区敌兵力较大，有碉堡网，且西北有乌江、长江；东面地区狭小；南面有澧水、沅水之隔。且我主力突出封锁线外，敌必进入苏区，不易再回原区；而在附近虽可能取得战斗上的一些胜利，但难能久停。因此，最后决定突出封锁线，向湘黔边之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本拟由西南突破向湘黔边前进，因敌特别防我由西南面突出，故决由东南渡澧水、沅水）。

第二，出动前后部署与经过。

（五）出动的部署：

1. 原有区域内留一个主力团，并以地方游击部队在主力出动后集中编为一个团，担任龙山、桑植、永顺地区游击战争，尽量吸引周围敌人，掩护地方组织工作（准备秘密条件下工作）。

2. 将地方独立团分编为第五师及第十六师，随主力行动，

以后方机关裁员补充主力，出动时全部人员近一万七千人。

3. 当时估计，敌在我军突出后，重新部署追堵，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定采取逐步向湘黔边转移（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首先分布在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号召，发动群众斗争。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集中力量求得运动战中击敌。并预定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六）突出沅水南后的形势与经过：

1. 顺利地渡过澧水、沅水之封锁线后，二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占辰溪、浦市、淑浦等城镇，六军团同时期内占新化、锡矿山、蓝田。长沙、宝庆(7)震动。

2. 敌在我军突破澧水封锁线时，即开始新的追堵部署，其大要是：以樊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敌经慈利渡沅水，向新化、淑浦开进，李敌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激浦开进。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进沅水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个团）调长沙、岳阳防守，并作预备兵力。新化、激浦以南较空虚（仅几个保安团）。敌似防我西进，如不能给我打击，则极力将我向南（两广）压迫。

3. 在我军占领新化、激浦、辰溪后之两三天，李纵队先头即逼近浦市、辰溪，樊敌进至新化、激浦以北地带。我军当即放弃辰溪、新化，集结主力第四、五、六及十七师，远出迎击樊敌之右纵队，调集余部任对李敌钳制之任务。但因情况变化，樊敌未打到，而李敌乘虚进占淑浦城，当时樊、李靠近，陶、郭分布沅水西岸，激浦、新化间地区已不能停留。

4. 依据军委当时电报, 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之指示, 我军分途向东南的宝庆、新化间移动 (曾企图打击南追之樊敌, 但因李敌迅速靠拢未果), 造成再渡资水之形势, 迷惑敌人 (当时樊、李两敌靠拢尾追, 汤敌由长沙向宝庆开进, 陶敌到淑浦南沅水东岸之龙潭), 再向西急进, 并决心侧击阻我之陶敌 (陶敌向南急伸阻我)。瓦屋塘战斗, 因陶敌先一日到达布防, 战斗无结果 (我伤亡三百余)。我军继经绥宁、洪江间北转渡沅水 (此时桂敌廖磊部约六个团进入桂湘边之会同、绥宁等县境防堵), 转入全部追堵的敌军之西面, 进到湘黔边广大地区。

第三, 湘黔边活动与继续西进之决定。

(七) 适应我军在湘黔边创造新根据地之总目的, 决心在晃县、芷江间反击尾追之敌, 以求得新的有利局势之开展。便水战斗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仅给急追之敌以创伤 (敌我均伤亡在一千左右), 但表示我军有战斗能力与决心, 使其不敢轻于猛进。

(八) 便水战斗后, 我们向西北转进, 占领江口、石阡, 并准备休整几天打追敌与西打黔敌。敌对我军估计与调动是:

1. 敌防我由湘黔边北进再转回原有苏区, 同时防我在湘黔边境创造新根据地。

2. 其部署是: 以李纵队尾我进路后追, 以樊、郭、陶三个纵队绕至我军东北, 防我北进; 以许绍宗及徐源泉之一部巩固酉阳、秀山; 开始调动驻黔部队从西面防堵; 汤纵队则调回湘南防粤桂。敌此时不能打击我军, 仍企图将我军向桂黔边压迫。

(九) 我军向北迷惑敌人, 在敌重新部署下, 大部在石阡、

江口线得到近一星期之休息。依据下列敌我形势和各种条件，放弃在湘黔边创造根据地企图：

1. 因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有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

2. 敌依据原有碉堡线（已成碉堡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近形势，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

3. 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

4. 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离敌策源处较远的地方活动，但勿入太荒野地，敌力虽多，我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势。

根据上述情况及军委指示，乃决继续西移，寻求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并拟在黔省西部争取创立根据地。

第二时期

第一，由石阡到黔川滇边——黔西、大定、毕节。

（十）我军突破镇远、黄平、余庆封锁线后，占领瓮安、平越，侧击黔敌未收大效，进入黔省中部逼近贵阳（占领扎佐、修文），有北渡乌江形势。当时堵我之黔敌急赶贵阳，李敌随后跟进，郭、樊纵队向遵义地区转进，郝梦龄敌沿乌江北岸防堵。但陶纵队停止在松林麻江线，追敌此时不甚积极。

（十一）军委指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据此我军即

渡乌江，进占黔西、大定、毕节等城市。

（十二）到黔西、大定、毕节后，军委指示：“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 第一项为宜”。

（十三）根据军委指示及我们估计，在全国革命形势激剧开展条件下，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西、大定、毕节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我军活动，故决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第二，黔西、大定、毕节根据地布置及斗争经过。

（十四）敌之部署是：以万耀煌、郝梦龄两纵队为主力，配合樊、郭敌由遵义向黔西逼进，以九十九、二十三等师及李纵队布置乌江上游防堵，以川敌约三十个团位赤水河北及长江一带防我入川，以滇敌孙渡纵队八个团在威宁、宣威地带堵我入滇，企图包围消灭我军于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而以东面之万、郝、樊等蒋系部队行动较积极。

（十五）我们除以小部任钳制方面并担任掩护地方工作外，集结主力迎击东面急进之敌，争取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灭东面敌人，消灭其一部，以开展有利局势。

（十六）与敌战斗经过：（1）有力地阻止了东南面敌人，但未能迅速占领东北面有利地势（三重堰），又未能坚决打击首先急进之敌；（2）未完成西南移动及东北伸出击敌之计划；（3）对万敌估计之错误；（4）几次迎击敌人，因敌情变化未收大效；（5）最后敌靠近，而我成被动局势。

第三，黔西、大定、毕节之退出。

（十七）因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城不保），周围约一百二十团敌人，包围线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故决自动退出毕城。

（十八）在黔西、大定、毕节时军委曾指示：“（甲）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乙）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我们在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选定向安顺地区转移，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

（十九）我军退出毕节城后，敌企图逼我在毕节、威宁道上（该地带粮极少，居民稀，山大而道路面简单）而歼灭之，当时李敌进水城、羊场，郝、郭敌由毕节、大定急向水城协同李敌堵截我军南进，樊、万敌由毕节向西急逼，滇敌孙纵队集中威宁及附近坚工防堵，川敌西移防我渡长江及北进。

（二十）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李敌急由水城伸入威宁与孙敌会接防堵，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节、威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中处境困难时期。

（二十一）我军在迎击樊敌未收大效后，即以急行军拟向东再南移，突破敌之包围，进入安顺地区，但敌迅速东调防我东向，中途遭遇于则章坝、财神塘而未果，乃继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此时敌我均疲苦，敌比我更甚。

第三时期

第一，滇黔边的活动。

（二十二）我军神速进入滇东时，敌主力樊、万、郝、李等尚在毕节、镇雄、黑章的地区，仅孙、郭尾我跟进。宣威战后，我军东移滇黔边界并占盘县，有东渡盘江姿势。此时疲劳之敌主力不甚积极，拟移盘江东岸防堵，似有暂隔江休整，重作进攻部署之形势（敌一部万耀煌及傅仲芳等师移贵阳安顺地带整理）。

（二十三）我军根据下列条件，拟在滇黔边活动，并创立根据地：

1. 北盘江以西，南盘江以北，牛栏江以东乃一广大地区，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我军活动。

2. 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滇军作战经验少，战斗力不甚强，黔西为犹国材统治区域），距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武汉较远，交通不便，增敌进攻困难。

3. 当时周围敌兵力减少，只孙、郭、李、樊、郝纵队约五十余团。川敌在长江北岸；附近黔敌一部如九十九、九十三、二十三师等，退出“追剿”，巩固黔防（对桂），且敌极疲劳，减员大，士气极坏，一时无援兵。宁、粤矛盾下，桂敌不致积极，且兵力亦不大；李、郭自称减员过半，早请调回湖南；仅孙敌较积极。这有利我军各个击破，是我军远征过程中最有利环境。

我军曾拟集全力首先击溃孙、郭两敌，以开展新的局势，创立根据地。

第二，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决定经过。

（二十四）宣北战斗以后，军委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应你们”。“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二十五）因军委无肯定之指示，我们不知是因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很难战胜敌人而要我们北上。三月二十九日在盘县，我们曾请求军委决定我们行动，其电文如下：“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以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二十六）军委三十日复电：“1、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2、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3、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4、究应如何请按

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因为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

第三，北渡金沙江之经过。

（二十七）当时敌主力在盘江东岸，距我有四五日行程以上，孙、郭两敌在我西北成对峙停止状况，我军决经昆明以北渡普渡河，争取在元谋北渡金沙江，经华坪、永北北进。

（二十八）我军突过孙敌，逼近昆明，孙敌以急速行军赶至昆明、普渡河，会合昆明及迤西驻军，扼阻普渡河，严防我入迤西地带，企图压迫我军于功山地带消灭之。与敌接触后，我再逼昆明，乘虚在富民西渡，因求脱离追敌（孙、郭），防川敌北阻，顺利渡过金沙江，乃以急行军到达金江（最后路线）之江边，虽接应部队未能赶到，亦顺利北渡。

（二十九）我军北渡后，孙敌达江南岸停止，李敌继到，郭、樊敌赶到永北、华坪，我军乃进至中甸集结休息，与主力会合 计划大体告成。

第四时期

蒋敌“追剿”最后决心之失败与我军继续北进。

（三十）当我渡过普渡河进入鹤庆、丽江时，蒋敌尚决心消灭我军于长江天堑以南之狭小地区，并有万一北渡之后消灭我军之部署。迄我军进入中甸后，因藏民区物质、地形上限制，“追剿”部队过于疲困，乃停止而成防我南进之部署。另以川军（刘湘部李家钰）及驻川西蒋军，由大渡河及理化、巴安截断我们与四方面军联系，并向西南金沙江边逼迫。在四方面军配合接应下受阻后，其“追剿”消灭二、六军团计

划乃全归失败。

（三十一）自中甸以后，乃纯藏民区域，气候、生活习惯全异于汉民地区，藏民民性强悍，给养困难。我军在中甸短期休整，即分途经德荣、巴安、白玉及经定乡例、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北进。中途只与藏骑接触。

（三十二）中甸以后行军最缓，部队一般的情绪虽好，但因粮食困难，居民逃避及生活不惯，病亡大增，体力甚疲劳。

二、六军团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

第一，这次远征的成功：

（一）二、六军团突出敌之包围封锁后，蒋敌以最大力量与决心，企图乘我脱离根据地用“穷追猛剿”办法消灭我军。在第一时期追堵敌力计有七十余团，第二时期内前后计一百三十余团，第三时期内六十余团，最后时期尚有五十余团，努力阻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万余里长征中，敌曾几次努力“包剿”（淑浦、新化间，江口、石阡间，黔西、大定、毕节间，彝良、镇雄间，金沙江边等），我军并未受到损失，虽未能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但仍给敌一些小的打击（瓦屋塘、便水、平越、将军山、黄家坝、以则河、则章坝、宣威、六家、小松元等战斗），最后能胜利地与四方面军会合。蒋敌“追剿”消灭我军之企图一般是失败的。

（二）七月余经万余里之长途远征，大小十余战，一般的尚保存了有生力量。行军作战中，虽有不小的减员，但沿途曾有很大补充。黔西、大定、毕节退出时两军团共比桑植出发时增加三千余员。盘县时尚保存桑植时数目。盘县后的急行军到中甸，比桑植时约减少一千名。进入藏区后得不到补充，比桑植时乃成减少趋势。现在两军团人员计有一万四

千，比桑植出发时少三千余。武器虽沿途落伍逃亡中有些损失，然现在尚保持桑植出发时的数目，部分的还有增加，如五师增加一倍。

（三）这次远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三十余县城，是广泛地传播了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扩大了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组织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揭破了国民党卖国殃民的罪恶，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

第二，我们未能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原因与错误：

（四）我们脱离湘鄂边苏区转入湘黔边创立新根据地的决定，一般是正确的。这一企图失败的原因：

1. 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敌新“围剿”部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部署。

2. 因此在湘中时我军兵力过于分散，失去消灭敌人时机（如打陈光中及李敌之时机）。

3. 瓦屋塘、便水战斗又未能给敌有力打击，致成被动局

4. 发动群众斗争与统一战线策略具体运用得不够，最后政治纪律松懈。

（五）放弃湘黔边及转入黔西、大定、毕节，在川黔滇边创根据地的决定亦是正确的，未能成功的原因：

1. 进入黔西后，未能乘胜占领有战略意义之地区，又未能以坚决的战斗夺取这些地带。

2. 未能乘敌调动兵力部署未妥之有利时机，坚决各个击破敌人，东北出动计划过迟。

3. 对敌估计上的错误，如对万敌之急进估计不够，以致失去一些战略要地（如大定瓢儿井），各方敌又逼近，我成被动局势。

（六）几次战斗中某些战术上的错误（未有总结）。

第三，我们所得的主要经验：

（七）在不可免的脱离根据地而采取长距离之转移时，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转进这一策略。

1. 可以减少部队远行军的疲劳，减少落伍和疾病。

2. 可在中途停留时，争取人员物资的补充，可能使部队扩大，保持有生力量，惟须避免进入过穷僻地带。

3. 但力量不宜过于分散，要准备在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4. 更便利做群众工作，扩大政治影响。

这种策略下完成远征计划不一定是削弱有生力量，正确的运用甚至可以壮大部队，造成创造新根据地更有利的条件（我军若非中甸后进入藏民地区关系，可能比桑植时还要壮大）。

（八）为着顺利地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

1. 在到达预定根据地地区前，求得运动中取得有利战斗的胜利，求得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并可采取曲线的行军，声东击西以迷惑欺骗调动敌人，造成有利消灭敌人的良机，握住主动地位，以疲困敌人。

2. 既到预定根据地地区后，必须抓住敌进攻部署未妥善的时机，克服暂时的疲劳，集结主力，乘敌调动而各个击破之，巩固战略要地。必要时应伸出基本根据地以外，远出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击灭之机动。要力求连续胜利的战斗，以挫追敌，使之疲困而停止急追，转入缓进或不得不重新部署。这才能保持基本根据地，并使我们能得到休整与补充，开展根据地之基本群众工作，聚集力量，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九）我军在远征中，不应避免有利的战斗，并应抓住有

利时机求得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总要以能取得大小胜利为前提，不可避免的战斗自在外）。这不独不致损坏战士情绪，反可增高勇气，同时使敌不敢轻于猛进，我取得休息的可能，但须避免无利的战斗。在夺取要点，通过封锁线与抢渡口时，应不惜疲劳和不可免的减员。若处处避免战斗，见敌即走，反增部队之疲劳，降低战士情绪，增大敌人勇气，实际是一种退却逃跑。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 国共合作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我完全同意洛甫同志的报告。

一、国民党国策转变的原因：（一）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政局的发展，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转向抗日；由于这一重大的变动，使得中派不能不转向抗日。（二）由于我们一年来统一战线的号召与努力，不但深入群众中而且影响到各军队上层分子，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各派都公开谈抗日，加以我们的让步，更促成这一和平的实现。（三）国际形势的变动也推动了这一转变。

由于这些原因，促使国民党内部分化，使得它不能不转变。这一转变，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更有帮助，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严重的打击。

然而应估计到，日本要企图争取南京，破坏中国的团结；同时，要估计民族资产阶级害怕真正革命的起来，动摇妥协是

*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并作政治报告。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本文是任弼时就这项议程所作的发言。

不免的；并要估计英国的方针。亲日派虽然受到一些打击，但打击并不厉害，因此，蒋并未脱离中间的立场。他仅仅表示了一些对日的请求，而在国防上并无具体计划；对于日本还在企图它有些让步，不过在外交上较强硬些；同时又利用日本和缓而对抗日力量加以限制，特别是对我们更采取苛刻条件。因此，我觉得他还没有最后脱离中间立场。

将来趋向怎样？这主要靠斗争。日本如能作原则上的让步，让步到修改大陆政策 A)，才能争取南京。但是这种可能在日本是很小的，相反的，它更要侵略中国。它仅仅以一些表面上的和缓来引诱南京，这就说明基本的趋势是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在这里，我们应争取南京，不要使它受日本的引诱。日本企图用“以华制华”的策略来破坏中国，我们必须揭破。对于托派污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亦必须揭破。我们应竭力巩固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并使它更向前发展。

二、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有了接受我们的主张的表示，虽然是不明确的。如果它有诚心于国共合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次国共合作的前途，我们应加以估计。前一次是失败了。今天的前途怎样？现在的客观条件比第一次是不相同的：（一）在国际间是处在第三次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严重关头，世界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前夜。（二）当着日本积极的侵略中国，国内阶级的变动比第一次也有些差异，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对日仇恨较深，也表示同情抗日。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国内反对汉奸，所以我们战斗目标更明显。（三）我们党的力量与群众的力量和上次不同，我们有武装与地区政权，并且有丰富的经验。这就是我们比以前不同的取得胜利的条件。大

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比上一次更复杂些，因为国民党也有十年内战的经验，它必将到处来限制我们，所以这一次和上一次比，斗争是更加艰苦的。

同时，要估计到国民党十年内战中的反革命罪恶，在群众中是无法洗清的，虽然在今天它转向抗日，影响较好些，但群众对它的信仰是下降的。而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抗日的真诚和革命的彻底性是深入人心的，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我们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过程中会更有利。

我们应从哪些地方努力呢？这包括着在目前的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爆发后的时期，都应表示我们对民族的忠诚。我们应巩固我们的武装，争取民主权利，这一个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在这工作中来争取与巩固我们的领导权。

争取民主主义的实现，这是很大的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这样做的，需要很大的长时间的斗争，应该逐步地扩大。在民主斗争当中，党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在前方有些同志认为民主共和国就是苏维埃，我想不是的。必须指出由民主共和国到苏维埃，应该具有相当距离的。不过在党内解释，对于它的前途应指出有两种：一是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占着优势，是可以走向无产阶级争取的前途；二是相反的，在抗日实现后，资产阶级取得领导而排挤我们，那前途是不同的。当然，我们应该争取第一个前途。然而两个前途是必须指出而加以教育的。

关于中日矛盾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样指出是对的（9刀）。在这里要注意到的，就是曲解了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而放松群众利益斗争的领导。阶级斗争是历史上产生的，不是我

们取消得了的，我们不仅不取消，而且要组织。我们在组织群众斗争中便发动他们来参加抗日。土地问题的解决在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并不是完全把它取消，在相当时期，我们可以采取改良办法来满足群众要求，在资产阶级妥协时，我们一方面从上而下的解决，一方面可采取不同方式，来发动群众求得解决。在前方，最近发生忽视群众利益的观点，我们是应该反对的。

党的组织发展跟不上政治影响的发展，红军进到渭北地区，影响是扩大了，共产党自西安事件后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在今天，我们的任务应加强党在全国的发展工作。对于党的教育的提高，在今天环境里是特别重要。在党内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并不会减弱我们的战斗力，然要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仅如此。对党内教育，办有力刊物是特别重要。

山西抗战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

一 晋北战线的形势与山西在抗战中的地位

当八路军进入山西的时候,平绥线上的敌人已经攻破了南口、张家口,占领了大同,正向晋北屏障——雁门关东西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乘势攻破长城隘口,逼取太原。而在平汉线上的敌人亦正积极进攻保定,期与平绥之敌取得配合呼应,夺取石家庄。据平型关战斗中夺获的文件证明,当时敌之主力还是用在晋北方面的。

因为雁门关及其东西附近地势险要,而且构筑了比较坚固的国防工事,敌知正面攻夺之困难,仍以攻占南口、大同之经验,在正面将其一部向雁门及其东西之杨方口、茹越口佯攻,用其主力绕由蔚县向国防工程较为薄弱之平型关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绕至雁门以南,则雁门关可不攻自破。

当时的情势是严重的,因为前线退守雁门长城各口的军队已相当疲劳,如果雁门长城各口被突破,敌有很大可能逼

* 这是任弼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时写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新华日报》。

近甚至夺占太原，这时就要影响整个华北的战局。

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隆、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依托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不仅便于防阻和迟缓敌之前进，且利于我们部分地消灭敌人。因为敌人的攻击要依靠其重兵器——坦克、大炮、飞机发挥其性能，但山西的地理条件，使敌人的重兵器大大地减少了作用，甚至失去作用（如坦克、重炮在某种地形限制下不能使用），而极便于我们进行运动战来打击或部分地消灭敌有生力量。从全国范围来说，上海、津浦和平汉三方都是平原，交通便利，利于武装齐备之日军进攻。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

如果从研究抗战经验教训的观点出发，我们觉得在整个抗战布置，至少是华北抗战布置中，没有清楚认识到保卫山西的重要战略意义，而未能以更多的精锐部队首先使用于山西的保卫，这是造成后来山西失利，致使整个华北局势处于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雁门关长城各口不致那样快就被突破，山西方面是可能在比现在有利的局势下支持更长久的斗争，并且可给敌以更多的打击，华北局势也必比今天不同。

二 八路军作战的方针和 平型关的胜利

八路军是在支持华北战争的战斗任务下开入山西的，它是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协同该区内一切抗日友军来进行战斗的。

在晋北战线严重局势下，八路军成为这一战区的一支生力军。所以八路军入晋时，是得着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的，同时对于华北前线抗战军队与全国人民是一种极大的兴奋，他们对我们表示着一种极大的期望。路透社的电报对日本也带着警告式的说，日军还没有开始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而红军正准备着与日军长期奋斗。

当时我们认为，与日本军队作战，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单纯采取正面防堵、依靠坚固阵地与敌对战是不适宜的，而且我们的消耗将比敌人还要大。我们认为应当采用新的战法，求得能够消耗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使战争能持久，这就是利用山西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同时组织和武装广大的民众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以这样的作战方针来配合我国其他部队达成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战局的任务。

在这样的作战方针下，开始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以及在敌人侧后取得大大小小的胜利。平型关战斗的确是给了敌人主攻方向以有力的打击，部分地更动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可惜在这一战役中，我国军队没有取得很好的配合，未能一举将敌歼灭，使我军能够顺利地扩张战果，绕击进攻茹越口

之敌，而茹越口终于几天后被敌攻破。敌从茹越口绕至雁门、平型险口之侧后，使这些险口终不能保，晋北屏障乃为敌所占。

平型关的胜利告诉我们，日军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它虽是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军队，但是它仍有很多的弱点：它的步兵攻击精神并不旺盛；它疏忽于侧后的警戒；它占的阵地并非不能攻破；它运动起来很迟钝；在它轻敌的观念下产生许多可乘之机。特别在山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可能给它打击和战胜它的。平型关的胜利，就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

敌受平型关的挫折，发现八路军以后，也就不得不相当改变自己的战术。它常使用的以支队包围或远离主力迂回我军侧后，逼我正面混乱撤退的战法，因怕我们在运动中消灭它，也就不敢轻易采用了。当它久攻忻口不能突破的时候，也未曾采用两侧山地迂回的战法，而这在别种情况下是必然要采用的。

三 忻口抗战的经过

在雁门长城各口失陷后不久，保定、沧州相继失陷，平汉线上的军队撤至正定、石家庄，敌进攻华北的第二步作战计划已完成，开始它的第三步计划——攻占太原、石家庄、德州，驱逐我国军队于黄河以南，完成其军事占领华北的侵略意图。

为着最后努力保卫太原，生力部队于此时向晋北开进。在晋北之崞县、原平、忻口的激烈战斗相继开始了岢亭县、原

平都经过一星期的固守。我们对于漳县特别是原平守城的晋绥军，那种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是非常钦佩的。由于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迟缓了敌人的前进，使增援的生力军得有充裕时间集结于忻口，使忻口后来能够坚持将近一月的抗战。敌深入雁门关以南作战，其后方交通愈加延长。当时，不仅同蒲路北段因车辆南移不能利用，且平绥路因被破坏一时也不能利用。它依靠汽车和牛马车的力量运输，其主要运输线是经雁门至大同和经平型关、灵邱、广灵、蔚县至张家口的两条汽车路。它不仅要供给前线大量的弹药、汽油（坦克和飞机用），而且粮食、菜蔬也靠后方供给。因此，后方交通成了它前线军队作战的重要生命线。

我们把扰击敌之远近后方和破坏、切断敌之交通运输，阻断敌之接济与增援，作为配合我国主要部队作战的主要任务，而以一部协同我主力军作战，以期陷敌于孤军苦斗，求得于较长的斗争中，削弱以至最后消灭其主力，而改变晋北不利的战局。

这时候，如果在晋北有充裕的生力军，能够抽出适当的精锐兵团，组织得力的野战军，沿太行山伸出保定、南口间地区，作有力的活动，威胁敌平汉、平绥线策源之北平，断绝敌后路，调动敌于运动中给以打击，这是增加敌之困难，配合正面作战最有效的办法。在顺利情况下，可以逼迫敌人改变其作战计划，而引起战局的变化，至少使敌难于迅速完成预定计划。可惜，当时缺乏这种精锐兵团来组织这样远出的野战军。

敌曾以全力猛攻忻口，遭受了忻口抗战部队猛烈之打击。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郝刘（1 傾两将军在前

线同时作了最壮烈的牺牲,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我深入敌远后方,在平型关、灵邱以北及在崞县、雁门关、大同间活动的部队,以最高度的负责的积极行动,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打击敌之掩护部队和运输队,夺获许多辎重汽车,彻底破坏公路。首先将平型关、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线完全截断,并乘势克复平型关、繁峙、沙河、大营、灵邱、广灵、凉源、浑源、蔚县、阳原、易县、完县、唐县、行唐、平山等广大地区,进而扰敌与破坏平汉、平绥铁路。在雁门南北活动的部队,曾几次占领雁门关,将大同至崞县之汽车道上的桥梁、险隘、电线尽行破坏,阻挠、迟缓敌之增援,袭击敌之辎重与飞机场,逼使敌人疲于奔命,使之无法保持其安全,其交通辎重部队亦不得不停止行动,或者用大的兵力附工兵与重兵器掩护其辎重,节节修路前进,然中途仍须遭受我们不止一次之袭击,始能到达。通过后,其交通联络仍被破坏如前。

敌在攻忻口遭受严重打击,后路又被截断与扰击,曾陷于非常孤立、困难状况之中,弹药和一部分粮食依靠运输飞机运送,因为炮弹、汽油的缺乏,大炮、坦克不能大肆活动,士兵依靠在当地抢劫的小米杂粮充饥,它当时已无力量攻破忻口阵地。同时,我守忻口部队经过二十余天的战斗,又无新的生力军增援,要迅速消灭敌人亦不可能。但如果有长久的时日,逐渐消耗其力量,断其后方接济和增援,在我方增加新的生力军的条件下,消灭其大部或逼其向后撤退,这不是不可能的。

在晋北敌处危困待援情况下，因石家庄、德州相继失陷，敌乃以平汉线上的全部力量及津浦线上之一部，沿正太路向娘子关、太原进攻，以策应和解除晋北敌人之危，达成其攻占太原的任务。晋东战况乃日趋严重。我八路军为着挽救东线危局，协同友军保卫山西大部领土之完整，乃以一部主力由五台以北急向东线转进，但在部队尚未到达预定地区以前，虽经友军猛烈抵抗，娘子关、旧关已被敌突破，我军虽有广阳、沾尚几日之战斗，然已无法挽回战局。寿阳失陷，太原已危，忻口抗战军队乃自动撤退，东北两面之敌得以会攻太原，太原亦相继失陷。

四 我们动员群众的基本方针

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几个月来的努力，在战区和敌人后方，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建立起大批的民众游击队和义勇军，这些民众的组织和武装，已逐渐成为抗战斗争中一支强大的力量。根据几月来的经验，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虽然需要艰苦和深入的下层群众工作，但收到动员群众的实效并不是很困难的。

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宣传资料。

日寇在疯狂的侵略政策下，采用一切征服殖民地的最野蛮、凶恶、残暴的行为，来对待我被占区域的同胞。它每到

一个城镇，多将未逃走的居民杀去半数以上（仅嶂县县城被杀者二千余人），对政府职员和抗日领袖分子，则用火烧和活埋的方法处死，两岁的小孩子亦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去，青年妇女几无不被其轮奸，奸死者不知其数，未死者亦多遭杀戮，且大批强征青年妇女以汽车后运（仅朔县维持会就为日寇征集三千青年妇女）。其最残暴者，莫过于最近高邑县之惨案。其经过是：十二月十九日，日寇七人到东塔镇强奸妇女，激起当地群众之愤怒，群起抵抗。二十日开来日军，将该村群众一百余人，均以铁钩悬于树上，割开肚子，拉出肠胃，复将人头击破，灌以煤油，以火焚之，然后将房屋焚毁而去。

这种悲惨残酷的事实，是最能激发同胞的民族仇恨的。只要我们能够很好地抓住这种日本的“王道”，加以“宣扬”，是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的。

要把发动起来的群众组织成为武装斗争的力量，要使壮丁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义勇军，要使妇女抽出时间参加洗衣队、看护队，要使群众参加放哨、侦察和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只要有人去指导、推动和帮助，群众是愿意的。我们看见山西的人民是负担着繁重的战争勤务的，然而要使他们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提得更高，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去，则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

然而要使抗战的军队能够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首先决定于这个军队是否能够为群众所爱戴。如果这个

军队处处脱离群众，侵犯群众利益，甚至抢劫、奸淫，使群众望而远避，这就无法接近群众，更无法进行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而且对军队本身的行动增加许多困难。因此，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这又是军队去动员、武装民众的先决条件。

我们是本着这些方针与方法，协同当地政府、抗日团体与友军去进行群众动员的工作，而第二战区及山西当局在阎百川先生领导下所颁布的一些进步法令和战地动员的组织方式——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更给群众动员工作以极顺利的条件。

五 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与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围剿”

有些人感觉抗战中群众动员工作是重要的，但总以为这非三个月半年之后不能见效，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功夫，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大地发扬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今天还留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我们的正规军队，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他们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区域可以说是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

在那些区域活动的我军及群众武装，开展了模范的游击战争。由于他们的积极行动，不独使敌人的后方交通时刻受

着破坏与威胁，而且在广大的领域内，敌人无法建立其伪组织。敌人的小部队不敢进入游击区域，而游击区域又随着游击部队的积极活动更加扩大，游击队也繁殖得更多。几百万同胞在这些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保持了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没有遭受亡国奴隶的惨痛。

敌未攻入太原前，虽已感受其远近后方被破坏骚扰而带来的各种损失与困难，然而为着达成其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不能分出大的力量以对付后方。在占领太原以后，逼使它不得不以大的力量进行肃清后方的工作。它以将近两万人的军队，配备骑兵、大炮、坦克和飞机，分成八路对晋察冀边区举行“围剿”，另以五个支队向晋西北地区进攻，以若干支队向正太路以南进扰，企图消灭我晋察冀边区的军队和游击队，驱逐晋西北及正太路附近的游击部队，以便将来向南继续进攻。

一个多月来的斗争，我们部队配合当地游击队，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曾给进攻之敌以重大的打击。虽有某些城市已被敌人占据，然而乡村仍在我游击部队手中。每次战斗的结果，敌人的伤亡总是远远大过我们的。有些城市，敌来之时进行了坚壁清野，敌进之后被我游击部队四面包围，断其交通接济，敌在非常困难与不断削弱的情况下，又将城市放弃。在那些区域，我们就是这样地正在与敌相互争夺着。

游击队在斗争过程中，学得了许多战斗的经验。他们与当地群众有亲密的关系，熟悉当地地形道路，能时常给敌人以奇袭。有一次敌千余由寿阳向盂县进攻，事前被盂县游击队侦知，他们就设伏于险道，待敌进入，突然袭击，敌伤亡五六十人，我游击队仅伤五人，停止了敌人的前进。后敌查明是

当地游击队，次日复进，然此时附近正规部队得游击队之报告，赶来增援，又给敌以严重打击，敌伤亡百余人而退。这里可以看出，游击队是正规军作战最有力的助手，时常成为正规军的耳目。

地方群众在斗争过程中，也学习了许多斗争的经验。在敌人奸淫烧杀抢劫之下，情绪愈见激昂。他们逐渐学会了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和肃清汉奸等种种对付敌人的斗争方法。有一次敌两三千，以坦克为前导，由易县向紫荆关方向进攻。沿途群众坚壁清野，躲避于两边山地。敌进入后，正规军队袭击其先头，两侧群众协同游击队登山袭扰，敌疑被我大军包围，仓皇后退。是役敌伤亡甚大，我缴获步枪数十支，并夺得坦克一辆。

在群众斗争开展的条件下，汉奸不敢抬头活动，敌人进到之处，已不能顺利地建立伪组织和伪军队。因为群众相信可以与敌坚持斗争，敌人无法欺骗，汉奸分子亦畏惧群众力量，不愿出头组织。故敌这次进占涞源将近一星期，伪政权始终没有建立，经过游击队配合群众包围袭扰，敌乘夜逃退。

晋察冀边区乃太行山、恒山、五台山山脉纵横交接复杂险要之广阔地区，极利于游击战争之开展，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敌人的“围剿”是无法征服我们的。相反，时日愈久，基础必愈巩固，将成为支持华北抗战的一个坚固的堡垒。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使敌占太原后不得不暂时停止南进，至少也是敌未即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使得在山西抗战中过于疲劳的部队，得有机会收容、整理与补充，保持晋南大块土地直到今天还是完整的。

六 山西抗战的几个经验教训

几个月的抗战，虽然有些土地与城市暂时被敌人占去，但是敌人还是付了很大代价的，而且占领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而抗战的军队与人民的自信心，却在斗争中大大地提高了，那种认为日寇为不可抵御之洪水猛兽的恐日观念，逐渐消失。在山西抗战的军队，大家思想着如何巩固加强抗战力量，怎样努力向敌人进行长期持久的斗争。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保障，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基础。

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同日寇长期斗争，必须改善我们的作战方法。我们要依靠于持久抗战去消耗敌人，来取得最后胜利，单纯防御的正面抵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由于有在敌人侧后积极活动的配合，忻口支持了将近一月的抵抗，而且还可以继续支持。敌占太原后不得不停止前进，去肃清其后方，这就使战争能持久，敌人的消耗愈大。反之，平汉线的战斗，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不能抵御敌人进攻。如果当时将主力使用于平汉线之西，依靠太行山脉侧击敌人或扰击敌侧后，以配合正面抵抗，这种积极的防御，我们相信，敌人决不能在突破保定后能够不遇抵抗地突进三百余里，而达正定、石家庄。这样不仅平汉线可以持久抗战，而且能够配合晋北抗战获得胜利，以开展华北整个局势。

敌占南京、杭州、济南后，中国不屈服投降，它是不会停止向华中和华南进攻的。但敌人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困难愈多，弱点愈容易暴露。根据山西抗战经验，我们认为今后的抗战，除正面必须选择要点，依托坚强工程，加以顽强抵

抗外，应以精锐部队，组织野战兵团，伸入敌侧后，抓住敌之弱点，求得运动战，给以打击，或诱敌于运动中消灭之。战争的运动性增大，是只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的。

抗战的军队要有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并且严格军队的作战纪律。军队间应有坚强的互信心，以求作战中切实协同与配合。抗战军队应在忠诚于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去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一方面保障每一个命令的完成，同时又需要见机而动，不失去每一个能够打击敌人的机会。高级指挥机关应给前线指挥员以机动的可能，对其机动处置所得的胜利，加以表扬；稍有过失，则不应责之过甚。

山西抗战的经验又告诉了我们，不仅在敌人深远后方可以发展人民的游击斗争，而且能够收复广大领土，成为持久抗战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敌人以正规战争从正面击退我军比较容易，而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则成为不可能。在今后抗战过程中，要以更大的注意和努力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派出许多小的游击队，配带大批民运和军事工作干部，定下与人民国土共生死存亡的决心，深入敌之远近后方，领导组织民众游击战争，是一个急迫的战斗任务。

抗战军队与人民关系急须求得改进。军队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必须从加紧部队政治教育和严格军队纪律两方面去加以消除。纪律好的军队，要进一步在自己活动区域，加紧地方群众动员组织工作。要使一切抗战的军队，不独成为群众亲切爱戴的人民武装，而且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真正达到军民合作一致抗战的要求。破坏群众利益，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欺骗民众。“这样，不如让日本军队来”的怨言，足够使我们警惕其危险！

最后，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应视政治工作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这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政治组织，应把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立在连队之中；要提高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威信，这又依靠于政治机关用自己负责的实际工作和军事指挥人员对政治机关的重视与尊重去达到。政治机关应当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抗战教育，增高战士信心，保障战斗任务的完成，应当发动和指导部队进行居民中的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

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 坚定我们奋斗的方针与信心

半年来的抗战，中国北部和东部大块土地与重要城市被暴日暂时侵占。我方虽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利——但决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失败，然而却换得了中华民族从来未有的团结，冲破了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这种举国一致的顽强抗斗，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使日寇“不战而胜”、“战即速决”的政策遭受了失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这里面是隐伏着我伟大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寇的胜利因素的。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是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不移的国策。它这次动员了经过数十年准备的武力、人力和财力，撕毁了一切国际信约，不顾一切地疯狂侵略。它是不会以占领华北为满足的。它在北平设立了“中华民国”的伪政府，且准备正式承认之手续。它在快要占领太原和上海时成立了大本营。它宣布在占领南京后，除非中国政府屈服，是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之必要。这一切表示它过去步步并吞中国的侵略计划，想在

*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的《新华日报》。

这次侵略战争中一次完成。

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有两条相反的道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投降屈服，一是继续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投降屈服的结果，实际上是要走到灭亡的。或者有人设想，在接受日本条件之下，中国中部南部大部领土可保完整，以图养精蓄锐，将来寻机再行反攻。殊不知在日寇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下，在你战败之后，它的条件之苛刻，将不会容许你有准备反攻之机的。而且它占有中国北部及沿海富裕之区，利用占有区域之资源财富，成为更强大的侵略国家，将来的反攻条件比现在继续抗战要困难若干倍。而且中国现在所争得的国际同情与帮助将随之失去，国际地位必大为降低。日本将用其“以华制华”之惯技，造成中国更为纷乱的内争局势，以便达到它最后并吞之目的。

因此，接受日本条件而投降屈服，只有黑暗悲惨的前途，是汉奸托派卖国贼之徒所走的道路，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隶的人们所反对的。

只有继续抗战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光明的大道，是一切黄帝子孙所应走的道路，是蒋委员长今天所采取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所抱定的主张，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隶的人们所拥护的政策，也就是日寇所最惧怕的，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与国家所同情而愿意赞助的。

但是继续抗战到底的前途如何呢？是否可以获得最后胜利呢？是否继续抗战也是走到最后灭亡的悲惨结果，或是得到光荣灿烂的新中国呢？有些绝对不愿而且真正反对投降屈服、主张继续抵抗的人们，他们看见几个月抗战结果，大块

土地被敌人占去，中国军队大量消耗，目前摆着许多困难难于克服；看见日寇要继续向中国中部南部进攻，感觉没有力量抵抗而无出路，甚而至于消极悲观。因此，是否有力量继续抗战到底？继续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是我们应当考虑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我们决定方针所必须依据的基础。

我们的答案：在继续抗战当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涌现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阻止日寇的前进。它将在奋斗中日渐扩大雄厚，它将得着国际间的更多同情与帮助，它将在日寇内在的矛盾困难增长的情况之下，使着今天困难的抗战局势转入有利的形势。中国将由部分的战役的反攻，走到战略上的反攻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这自然是一种极端艰苦的斗争过程，但这种胜利前途的可能条件是具备的。我们应当建立起这种坚毅的信心，不要受失败主义者的理论所影响；要揭发那些缺乏自信心的失败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虽然它不同于亲日派、汉奸、托派的思想，若不加以克服，是会走到投降屈服道路上去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抗战困难的过渡时期，今天的任务是如何努力使这种过渡时期缩短，使我们迅速过渡到有利局势的新阶段。

二 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巩固与扩大国防军队

要缩短抗战困难的过渡时期，主要的就在于如何巩固培养和生息涌现出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

首先，我们要相信，面对日本继续向我国中部南部的进攻与屠杀，中华民族在坚决抵抗之下，必然会更加团结。最偏僻落后地区的同胞，也会激发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加以政府正确适当的领导与推动，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隶的同胞，是可以做到牺牲一切来为着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动员起大量的人力，来补充现有的国防军队，并且可以组成大量新的国防军队。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财力，组织一切力量，忍受一切困难，来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战。

我们知道，西班牙政府在战争的初期，是遭遇着比中国现在更为困难的境况的。政府的军队，几乎完全叛变，当着佛朗哥率领叛军进攻首都马德里的时候，政府手中没有足以抵抗叛乱的军队；政府中的有些人物也是丧失了信心，许多人预料政府方面无力支持长久的斗争。但由于当时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的领导者，号召全国人民为拥护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势力而奋斗，在最困难的保卫马德里的斗争境遇当中，不到一年建立起五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和足供军队需要的军事工业，保卫了西班牙大块领土之完整。

以国土大若山西，人口比山西只多二百万之西班牙，而能创造如许强大之国防力量。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除充实现有军队外，再组织五百万人的正规军队，只要稍加改善动员的方法，是完全可能的。

有些人感觉部队增加了新兵而未经训练，很难作战，更以为新组成的军队是不堪用以与日寇作战的。不错，未经长久训练的新战士，在军事技术上是赶不上久经训练的老兵，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具有其他方面的优良特点:首先这些新战士是在日寇疯狂侵略屠杀的亡国灭种危险当中被动员起来的,他们具有为着祖宗后代而拼死救国的决心;第二,新动员起来的战士,绝大多数是从田野工厂或其他职业初脱离生产的,没有某些老兵的不良习气与嗜好,他们将忠诚于自己的职守。

我们可以而且一定要相信,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的兵员质量,是要优秀于原有军队的。这种军队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学习进度,也必定很快,战场上及对居民的军事和政治的自觉纪律也容易建立起来。他们初脱离生产,知道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就不会随意去侵犯人民利益,使着军民合作更能关系密切。

但是,要使新动员补充和组成的军队,迅速成为坚强有战斗力的部队,还须具备其他的条件。首先就是干部的选择与配备。干部的条件,必须是具有高度忠实于民族利益,坚决勇敢,有作战经验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一切以自己荣华富贵个人享受高于民族利益的贪生怕死之徒,是不能充任这样军队的干部的。须知军队中的干部,是有模范和决定的作用。今天军队干部的选择,最好是从实际抗战军队里,去选择战斗中表现忠诚而坚决勇敢的分子,加以必要速成的训练,以之去充任新组成军队的中下级干部。其次,新动员组成的军队和补充起来的原有军队,都必须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和健强的政治工作机关,消除军队中干部与士兵间的鸿沟和恶劣的关系,使军队有高度政治自觉与亲密团结。

具备这样政治质量的兵员,加上优秀的干部,加上健全

的政治工作,迅速完成必要的军政训练,如果能够(我想将来是能够),再加上新式武器的装备,这样的军队是坚强而有力量,可以抵御日寇的进攻,直到最后击败日寇的。

三 建立强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

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估计到敌人的封锁,而且这种封锁的范围还可能扩大,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逐渐做到在持久抗战中军火之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

西班牙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西班牙国内的原料,不会比中国富足,它的工业基础虽高于中国,但中国如果能集中全国兵工厂和各种重工业的力量,其总和不会弱于西班牙的力量。西班牙以自己的高度努力,加以国外各种同情与帮助,建立起足以自给的军事工业,出产质量与数量足够的飞机、大炮、坦克和机枪步枪,使自己的军队装备成为近代化的质量兼优的军队。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倘若佛朗哥没有德意的支持与帮助,早被政府军所击败,而德意帮助与支持佛朗哥,使政府在艰苦奋斗当中,创造了坚强的国防力量。这话是有相当真理的,“多难可以兴邦”。我们应有如西班牙政府的决心,加上中国的地大物博,在长期抗日斗争中来兴我国邦,创造雄厚的自卫力量。

日寇为实现独霸东亚而疯狂进攻,它要驱逐与毁灭英法在东方的势力与利益。这在今天,尤其是将来,对英美和其

他国家是一种很大的威胁。但我们今天不能设想这些国家能够出兵帮助我们去打败日寇。因为他们必须权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日本毁灭之损失，与自己同日本以兵戎相见所造成的损失，孰轻孰重。就是极端同情与愿意帮助中国之苏联，也必须依据自己的政策，估计到世界整个利害来决定帮助中国的程度。然而，这些爱好和平、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是能够给与中国抗战以各种帮助的。中国愈坚决抵抗，这种帮助也必随之而增大。

我们今天应当运用自己现有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加上同情国家可能的帮助，去努力建立并扩大长期抗战的国防军事工业的坚固基础，保障将来能够出产必要数量与质量的飞机、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和子弹等，使我现有的和新组成的国防军队，达到技术装备水准的提高而趋于近代化，准备在万一全部对外交通被敌封锁时，我仍能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这是我国坚持抗战到底在目前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四 努力把全国民众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战

半年来的抗战，表示了全国军民上下一致，在政府坚决抗战方针下，去为着祖国的生存而斗争。人民忍受日寇最残酷最野蛮的烧杀、奸淫、抢掳，而毫未动摇其抗战决心，或有何怨言。全国军队在统一指挥之下，经过浴血苦斗之后，犹能再接再厉，虽遭受不小的损伤，而未有甘心屈服者。敌人虽

以各种方法,以图破坏抗战之团结,阴谋引诱中国向之屈服,但中国抗战的团结与决心,是愈趋巩固与坚决。

在抗战的过程中,开始激发了民众参战的积极性。然而,抗战力量的生息与强大,使一切不愿意亡国灭种的同胞成为更有组织更有战斗能力的力量,仍然是持久抗战中一个急需继续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反对侵略的抗战战线已延伸到我国境内深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发展人民积极参战的活动,这将成为极伟大的力量,使敌人到处受到我们的反抗、威胁与损害。如果不善于组织、领导和运用这个力量,被激发起来的群众就会感觉无所事事而苦闷,以至于消沉,尤其在敌占之区,容易被敌欺骗,甚至为敌所用。

我们要以周密的系统的宣传方法,把日寇灭亡整个中国的侵略阴谋,把敌军烧杀、奸淫、抢掳的残暴行为,把持久抗战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条件,把每个国民应负的责任,把群众参战的具体方法,进行最普遍的宣传鼓动与教育,鼓起群众炽烈的爱国热情,建立起坚固的胜利信心,积极起来参加各种抗战的实际斗争。

我们要使被激发起来的每一个民众,组织在各种形式的救国团体或人民武装组织之内。而这些组织,又必须实际地去进行抗敌救国的动员工作,如新兵的动员,壮丁的军事训练,抗战政策法规的宣传解释和推动其实现,财力、物力和战争勤务的各种动员,扰乱敌人、传递敌情、封锁消息、铲除汉奸等等工作的组织。使这些人民的组织成为政府所能依托的力量,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使抗日团结有更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如果放松这项工作，简直是一种罪恶。这有赖于领导抗战的政党、各级政府与已有民众团体，共同协力而密切合作地去努力。

五 加强在敌人远近后方游击运动的领导与组织

在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运动，有组织地和自发地逐渐开展，在今天已经增加敌人不小的困难与顾虑，为中外人民所重视，因为这是中国支持长期抗战的一支最重要的辅助力量；而在敌占区域（如华北及苏鲁广大地区内），又成为持久抗战的主要斗争方式。游击战争愈发展，人民战斗情绪可更增高；敌人的顾虑必愈增，兵力不得不更分散，前进也就随之而更困难。敌人消耗愈增加，使抗战亦愈能持久。这也就是游击运动今天被人重视的原因。

游击队运动是抗战以来滋长出来的战斗力量，它将随着抗战的持久而要更加发展的。它在今天，只是处于敌人深远后方作零散的破坏骚扰的活动，然而我们必须预见它的前途，是可以从斗争中壮大锻炼成为较正规的军队的。那时候，不仅可以分散进行游击，而且可以集中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斗；不独可以在敌占区域内保持大块土地与人民不受敌人蹂躏与摧残，使敌人无从利用占领区域内的资源财富，而且要

逼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强大的兵力,去对付其后方的抗战力量。这就能更有力地配合正规国防军进行持久灭敌的战斗。

这样从艰苦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武装力量,是有其更优越的特质。首先,这些战士是在日寇直接屠杀压迫下,出于完全自愿而参加的;其次,是由小的单位独立奋斗而汇合的,它将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性能和充分的战斗经验。

我们要看到敌人远近后方游击运动的重大国防意义,而加以尽可能的帮助与指导,使之迅速滋长发育与壮大。政府应供给其干部与必要的物质资财,内地人民应作种种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声援、鼓励与帮助。在没有游击运动的敌占区域,应即派遣适当的干部去迅速发动组织起来。游击运动较发展的区域,要逐渐创立比较统一的指挥机关,整饬其军政纪律,特别要注意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防止土匪主义破坏统一战线之危险。

六 努力争取迅速过渡到抗战局势 胜利开展的新时期

上面的叙述,说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育起来。在最大的决心与努力之下,国防军队可以巩固与扩大,军事工业可以建立,人民愈发动愈团结愈有力量,游击运动愈扩大愈斗争也就愈坚强。这一切的总和,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不能看到这些力量可以长成与壮大,则对于今天的抗战,会要陷于悲观与失望。

我们的抗战愈持久，力量就愈加壮大；而敌人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则其不能解决的困难将愈增加，恰成相反的发展。故我利于持久以取胜；敌须速决，持久必遭失败。

敌国能充兵役的人丁，至多不能超过五百万人，最多只能保持前线一百万人的作战力量。它在东方，主要敌人不是中国。它必须保存必要力量，以应付将来对苏对美的大战。敌国的财政，已到相当严重的困难程度，据外报估计它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月消费的金钱，已超过日俄战争的全部，超过攻占东北的几倍，每月约需耗费五亿元，政府已无力支持。它几十年战争准备的储藏，只够大战开始的半年供给，有些只够三个月（单与中国作战或可稍长）。原料的供给，也开始感受困难了。

中国抵抗侵略的战争愈持久，愈是可以得到国际间更多的同情与帮助。但日本侵略战争愈深入愈延长，则其国际地位愈孤立。能够帮助它的德意两国，是如日本一样的穷凶极恶的，他们只能在西欧牵制英法以声援，不能以大量金钱原料来帮助的。

日寇在被迫延长侵略战争情况之下，只有加重对国内人民和其殖民地的压榨，以图困难之解决。然而因为壮丁的被征调，对外贸易大为减低与入超，国内生产更趋凋零，人民忍受不了国家的增税与无止境的公债负担。占领东北后，日本人民生活实际上比未占东北以前更为降低，厌战与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高。殖民地的斗争活动，也将乘此时机而开展。

中华民族愈抗战则愈见团结。日本愈侵略则必愈形分崩，这将影响日寇远离家乡的前线士兵发生动摇以至反抗。

然而在今天，日本的法西斯军阀和军火商人，是不会停止其侵略战争的。日寇将在中国不投降不屈服之下，驱使其精锐的海陆空军，继续向我国中部南部进行其残暴的侵略。它如不被中国打败，或因国内矛盾之尖锐而引起革命，或受其他强烈之压迫，是不会放弃屠刀的。

日寇向我国中部南部继续进攻，我们在继续抗战的初期内，还可能有些地区被其占领。这对于地面宽大、军备薄弱的中国与装备优势的侵略国家抗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然而，这仍绝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这里我们必须看到，日寇的继续深入，因战线纵横的延长，其困难必为之大增，兵力将更分散，前线战斗实力必更见削弱，弱点也就会随之而更加暴露与生长。

在中国抗战力量逐渐巩固、滋长、壮大，在日本力量逐渐削弱消失，在敌人更深入，弱点愈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会看见中国的持久抗战将产生由失利而取得许多小的胜利，由不利局势转入有利局势，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的战略上反攻的新过程。这就过渡到有利的胜利时期之到来。

这种时期从何时开始，是由各种斗争力量成熟的过程来决定的，然而这是可能产生的过程。

中国军队经过半年的抗战，虽在军事上有过不少的失利，但也有不少战术上、战斗上部分的胜利，渐次熟识了敌人战略战术上的长处和弱点。这说明中国抗战军队，不仅打破了恐日的情绪，而且学得了与日军作战的许多宝贵的战斗经验。抗战的军队，在血的教训中，已逐渐改变自己的战略与战术，以期求得适应各种条件，去给敌人以打击，而使自己的损伤

减少,使敌人的消耗增加。

我们可以预想到新时期到来的最初,必定是在敌人更深入、更分散、更薄弱,弱点暴露得更多的时候。抗战军队在新的作战方法下,首先求得给敌人弱点以连续的胜利的打击,这就会造成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而须更集结行动。在这样大小胜利的情形之下,抗战胜利信心愈见增高,群众斗争行动与情绪更见积极,游击运动猛烈地扩大,国防力量滋长会愈迅速,抗战军队更见坚实,装备得到初步的改进。当着敌人集结兵力前进时,我们可以求得在运动战与阵地战中给以更强大的打击,乃造成敌人不敢再前进深入,而呈比较固定战线的形势,使战争进到对峙的局势,由此而逐渐转入战略反攻的新时期。

这样的对峙局势,将使中国争取充分时间,在更有利的国内与国际条件之下,来培养壮大自己的各种力量,使国防军队更臻于巩固与坚强。相反的,日寇各方面困难将随之剧增,军心愈见动摇,深感战线扩大延长之难于应付,而需要更加集结力量,缩短战线,依据交通便利之退路与后方进行抗斗。这时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或者反攻形式是困敌于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完全截断其交通接济与外援,求得歼灭或消灭其可能增援的力量,以困死最前线之孤军。如果国际形势起了强烈的变动,则更有利我们胜利的反攻。

这样反攻胜利的结果,可以收复大半已失之领土,我们强大的条件亦必随之愈增。敌人困苦愈急,或由于我们最后将其驱逐与歼灭,或由于敌国内部的革命变乱,而逼使其退出,或加上同情于我之列强的逼迫,而使之最后归于完全失

败。这种惨败是可能引起日本国内革命的胜利，而使中国在抗斗争中得到从日本强盗侵略之下的完全解放与胜利，以达到自主自强、成为有着坚固国防力量的新国家。

这是一种可能的转变过程，然而是一种最艰苦奋斗的过程。这过程中的磨折，必然也会很多。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更坚固地团结一致，不能坚持艰苦的长期抵抗，而受日本挑拨阴谋的陷害，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悲惨的发展结果。然而我们应当努力争取胜利发展前途的实现，这是每个不愿做亡国奴隶的有血性的儿女应有的责任。

努力巩固培植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力量，以争取胜利局势新时期的迅速到来！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已经写在书面报告大纲里面，现在只是根据那个大纲的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和补充。

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一）中国九个月抗战的简单经过。

中国抗日战争，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1(1)起到现在，共有九个多月，战争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并且是在继续扩大当中。

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是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有顽强持久的抵抗，初则想以少数兵力，占领平津，屈服中国；继则同时进攻华北、上海，想以速战速决方针，击败中国而达到占领华北之目的。然在上海、南京、太原失陷后，中国仍不屈服，

* 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四月十四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本文是对书面报告大纲的口头说明和补充。

乃采取第二期作战方针，企图继续进攻武汉，并夺取西安；同时在政治上运用其“以华制华”手段，利用汉奸、亲日派、托派，破坏中国的团结与抗战，使德意从中活动调解，企图从各方面逼迫中国承认其灭亡中国的条件。到现在止，中国政府仍然是采取坚决抵抗方针，且抵抗力量逐渐强大，使日本第二期进攻遭到中国强烈抵抗而遇着很多的困难。

九个月当中，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也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到上海战争爆发以前。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是动摇不定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时还不愿立刻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尚希望用局部抵抗解决中日冲突。认为全面抗日战争，需要有四五年或至少两年的准备，一方面增调一部分军队北上，另一方面由宋哲元与日本谈判。但是日本利用谈判时间，继续增兵，占领平津后，又分三路向西向南进攻洞时进攻上海。

第二阶段，是从上海战争爆发到太原、南京失陷。上海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进攻的逼迫，我党抗战的号召，全国人民与某些实力派要求抵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乃定全面抗战方针，由临时召集之国防会议，调动全国各省军队，开赴前线，划分战区，进行各种动员，乃展开了华北与上海的战争。

第三阶段，是从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后到现在。日本原拟以占领中国首都南京来威逼中国政府，使之接受条件而屈服。占领南京后，即经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下列谈判先决条件：

1. 加入防共协定，肃清反日反满运动；

2. 撤销中国某些城市地区的军队；
3. 中日满经济合作,用日本顾问；
4. 赔款。

中国军队在上海、太原、南京失陷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在南京失陷后,政府当局丧失了阻敌深入和保卫武汉的信心。蒋介石及其左右对持久抗战各项具体办法,当时亦无多大兴趣,而表示希望苏联出兵。蒋介石虽拒绝了德使的谈判条件,但政府中主和分子相当活动。当时的情势是相当严重的。

当时我党采取下列方针,努力争取抗战能够继续。

1. 向蒋介石继续提议,支持前线,并提出一些抗战的基本方案。

2. 争取前线将领,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推动阎锡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稳住前线。

3. 推动白崇禧设法加紧巩固前线与整个部队的工作。

4. 推动陈诚担任政治部的工作,以整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

5. 继续作建立军事工业及新军队的活动,并与国民党讨论招募兵役运动与开展民运等。

6. 迅速集中新四军,派出南京、上海、杭州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

7. 由党中央发布宣言,号召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由于这些活动,前线得以支持,蒋介石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中央政府,宣言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并且召开各个战线将领、参谋人员及政治工作

等会议，传达坚决抗战方针；严整军队纪律，枪毙了韩复榘，制裁了一些畏缩的军官；政府中的主和派亦不敢大活动，使中国第二期抗战得以继续开展。

（二）九个月抗战的估计。

九个月的抗战，中国在军事上虽然遭受了部分的严重的失败，华北和华东大块领土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绥远、济南、芜湖等重要城市被敌占领，这些地区的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中国军队有八十到一百万的消耗，但是，日本的部分胜利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的。根据日本自己在今年一月宣布的材料，它的军队伤亡已达二十万。到现在止，总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左右。财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日军士兵中的厌战情绪是在生长着。而战争愈持久，日本的消耗和困难必然是要更形增加的。

中共中央估计，中国的抗战只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与挫折，而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失败。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去解决。

中国在九个月抗战中，虽然遭受了军事上的部分的严重失败，但是在抗战过程中，使着中国有了迅速的重大的进步。

中国在过去百年来，经过中英（一八四〇年）、英法联军（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中法（一八八四年）、中日（一八九四年）、八国联军（一九〇〇年）、中日（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等战争，遭受失败后，中国政府对外来侵略完全采取投降屈服的政策，对于邻近的日本尤为惧怕，养成一种积弱的传统与恐日病。广大人民对外来侵略虽有深刻仇恨，但常为政府屈辱方针所限制。这次抗日战争，表示着

全国人民、政府与军队一致合作,打破了这种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坚决起来为着保卫民族生存而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而且在抗战当中,使着中国有了下面显著的进步与收获:

1. 由于坚决抗战,造成了中国内部从来未有过的统一团结。中国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政府后,经过长时期不断的军阀内战,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又经过了十年的内战,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向少合作。抗战起后,各党派重新合作,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关系密切起来,人民对政府的关系也改善了。

2. 中国政府过去在对外政策上,对日本的进攻只是妥协让步;对内政策上,以一党专政,进行“剿共”。抗战起后,中国中央政府逐渐成为国防性质的政府,由降日而抗日,由“剿共”而联共,相当地实现了民主。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紧急治罪法》,某种限度的开放民运,召集国防会议,最近成立人民政治参议院,准许进步分子参加政府某些机构,同汉奸及不守职责人员斗争等,都是进步的具体表现。

3. 中国的政府军队,过去是一种互相争夺地盘,对内进行战争的工具,地方军队不能受中央指挥调动。抗战起后,也逐渐成为统一的国防军。全国各省军队均被调赴前线(惟以青海、宁夏两马最坏,一般能够受中央统一指挥,并且能够以民族利益为前提而英勇坚决地进行战斗(经常在前线作战的约有一百万军队)。韩复榘被枪决后,情形更好一些。

由于中国团结一致,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提高了许多。我们估计在继续坚持抗战当中,必然会更加进步。

这些进步，如果没有发动抗日战争是很难得到的。

中国抗日战争遭受军事上失利，是由于客观上和主观上的许多原因：

在客观上，因为日本是一个武装齐备的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侵略准备与布置，且有德意的援助与配合，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不统一的，武装不完备而且还少抗战准备的国家。

在主观上，有不少军事上与政治上的缺点与错误。

首先就是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致使敌人利用了时机，调动兵力来华。而中国军队，反因和战未定，未能全部动员，以致未经激烈战斗，即失去平津，使敌得依托平津为军事重点，迅速沿津浦、平汉、平绥三路，向西向南进攻。

其次，在战略布置上，没有能够以基本主力使用于华北战场，利用开阔战场，打击与消耗敌人，而被敌人将中国主力，吸引于上海不利地区，与敌人决战。上海战场狭窄，中国军队精锐消耗甚大。上海失陷后，又以重兵守不易固守之南京，复受重大损失，而华北主要战场多系各省地方军队，战斗力弱，并且复杂不易指挥，故在溃退中损失甚大。

再次，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术上，在整个时期中，多采取消极正面防堵作战方针，而未采取积极防御的侧后方面的运动战的配合。以武器居劣势的中国军队，特别在平原地带，是不能抵御敌人新式武器——坦克、大炮、飞机的强烈火力，而容易被突破溃乱下来。

在政治上，政府机构中未能坚决淘汰亲日主和分子，吸引进步分子加入，而加以改革。这就一方面影响坚决抗战方针，

同时使许多应有的动员工作及进步法令不能实现。对群众抗日运动，则惟恐群众起来走入共产党影响之下，而不敢完全开放。这就使公债（五万万元公债只销了二万万元）和新兵动员成绩很差。

一般说，中国与日本作战，战争的初期，遭受某些失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如果没有这些主观上的缺点错误，早可能取得更多胜利，使战争的发展处在比今天更为有利的情况之下。

在南京失陷后的第二期战争当中，显然有一些新的进步，其最显著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军队在作战的战略战术上，有了一些进步。在血的教训中，开始改变过去单纯正面防堵的阵地战，除正面防阻敌人外，部分地组成了野战军，在敌人侧后进行运动战，并注意游击战的配合。津浦线徐州以南及以北，就是用这种方式，迟滞了敌人前进。最近台儿庄胜利〔123〕，也是因为战略战术的进步而获得的。山西方面，也因为蒋介石严令所有黄河北岸军队，不准南渡黄河，敌虽进到黄河北岸，因有三四十万军队留在山西、河北敌人后面，打击敌人，断截其后方交通，敌陷于孤军深入而不敢贸然地渡过黄河。

第二，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近两三月来，有着普遍性的发展，政府和军队也去注意组织人民的游击队，或由正规军拨出小的部队，深入敌人后方，配合人民发动游击战争。所以游击战争不仅在八路军活动的华北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山东、江苏、浙江一带，也有着很大发展。敌人因为被游击队到处袭击，破坏其后方交通线（铁路、汽车路），

已感受重大的威胁，而不得不出重大兵力，以应付游击队。

第三，中国军队本身也有了一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进步。官兵的政治觉悟有了一些提高，开始注意部队政治工作的建立，纪律比以前严紧，指挥上比以前更统一与进步。军阀制度逐渐减少，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比以前稍改善了一些。政府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的武器，故一部分军队技术装备也提高了些。特别是空军的战斗力，又重新恢复并比以前还要增强。

这些进步，使着中国抗战开始了一些新的转机，不像过去那样遭受严重损失，或是随便向后溃退；使敌人的消耗增大，困难也增多。

(三) 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与前途。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因为它在军事、经济、财源及政治上，都是需要求得速战速决，战争延长是于它不利的，而在中国，则需要采取持久的抵抗，在持久战中，去消耗敌人，组织自己的力量，求得最后去击败敌人。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

中国的持久抗战方针，是具备着以下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军队在武器上虽然比日本落后，但中国是一个版图宽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国家；中国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虽然被敌人占去大块领土和许多重要城市，但依托现有地区，仍然可以继续抵抗。敌人则因兵力限制，只能占据交通要道与重要城市，而不能巩固已占区域，使中国仍然可以在敌占领的广大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中国是处于被侵略的地位，在持久战中，中国会更加团

结，民族仇恨愈益加深，新的力量可以培养生息。这都有利于持久的抵抗。

第二，日本虽为军备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其国家的人口和财富有限，且其侵略方针并不能得到全国的拥护。战争愈加持久扩大下去，一方面它的兵力将感不够，兵力愈加分散，弱点困难必更增加，且经济财源不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矛盾必然增大，反战情绪可能增高，以致引起前线作战士兵更加动摇厌战。

第三，这一次中国的抗战，与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上次是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局部稳定之后，中国革命比现在要孤立些。现在是国际资本主义总危机过程，和平阵线的力量正在增大。且日本在东方的侵略，加重了与英美法的矛盾，使中国的抗战能够得到比上次大革命时代更多的外援。

这一切条件，都是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致胜日本的。如果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加紧组织各种力量，奋斗到底，的确是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必须以很大的忍耐心。要取得战争胜利，免不了经过许多挫折、困苦、艰难的斗争过程。

在目前中国抗战局势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与危机。这些困难与危机表现在：

第一，政府的机构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分子和贪污作恶分子，还是包容在政府机构中。他们破坏与动摇中国的抗战方针，阻碍抗战动员工作（不过目前他们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决心将其驱逐淘汰出去。

第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当的困难，政府的基金快要用完，借外债也很困难。现在到英美法等国购买武器均需现款，而中国本身的军事工业基础本来薄弱，在抗战中又受到了一些损失，这就使中国的武器来源觉感缺乏。现在有些军队在战争中受损失后，人员补充起来了，而轻重机枪甚至步枪还未完全补充齐备；而政府对于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很迟缓的，认为中国缺乏钢铁，建立军事工业很困难。

第三，政府及国民党对群众运动，虽然比以前开放了一些，但是还表示一种畏惧的心理，对群众运动加以限制。如今年二月，还要解散西安某些群众团体。因为群众运动不能充分发展，故新兵动员的成绩还是很差，过去多以强迫方法去征集新兵，引起人民的不满，只能勉强补充原有军队人员的损失，因此新军队的组织成绩还是很差。

因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情形，武器的缺乏，旧有军队力量削弱，而新的军队建立很慢，使得抗战派内部的一部分人，缺乏持久抗战的胜利的信心，甚至感觉在敌人更大进攻时无办法与失望。

敌人在台儿庄失败后，目前正增加新的军队，继续向徐州积极进攻，仍未放弃第二期作战计划夺取武汉的企图。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取得新的胜利，使河南、武汉、陕西能够长期保持在中国手里，则中国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组织新的力量——组织军队和建立军事工业，这对以后继续抗战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如果徐州失守，河南、陇海铁路一概被敌占领，武汉、西安危急，甚至短时期内被敌占领（我三月初离开中共中央时，按照当时的情形，中央估计武汉在两三个月内有失

陷可能），则可能引起政府对抗战方针产生新的动摇。因为武汉、西安失守，可产生下列情况：

第一，武汉是今天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它可以连接北面与东南的战线；西安是今天中国一条最主要的对国外的交通线。如果武汉失去，则中国北面战线与东南战线会被分割；西安失去，则外援的困难增加。而在这一战斗过程中，中国军队必然会有更大的消耗，一时来不及补充、整理，组织新的力量的条件比现在更坏，会引起失败情绪的增长。

第二，在新的困难情况之下，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派等，必然抬头活动，他们会要积极起来，破坏政府的抗战方针。

第三，日本在占领武汉后，可能提出一些和平谈判条件，且提出的条件在表面上可能比过去还要低些，以便引诱和威逼中国政府承认。如三月初日本曾向蒋介石夫人提出的和平条件，比南京失陷后经德国提出之和平条件，表面上要温和些，其内容如：1. 黄河以北为特区，并请日本顾问；2. 日本有权驻兵平、津、京、沪；3. 中国赔款三万万元，而不提参加防共协定及中日满经济提携等类条件了。

第四，因为日本畏惧中国长期抵抗，想逼使中国承认其条件而屈服，可能邀请英国出面调解。英国近几个月来，外交政策之改变，有向着侵略主义者投降的倾向，此时也可能出面调停。这可能引起中国政府中某些分子的动摇。

但是，我们虽处在这些困难与危机前面，就目前的情形看，在中国坚持抗战的力量，还是超过主和投降派的力量。目前政府中，亲日与主和分子，主要的是政学系的张群（行政院

副院长）、熊式辉及汪精卫、何应钦等，但他们没有实力；而主战派中有许多实力派和一部分国民党中的元老，如两广军队将领，蒋系之陈诚、罗卓英、卫立煌、胡宗南、汤恩伯、孙连仲等，在今天均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阎锡山亦主张抗战。川滇两省军队在前线作战有进步，尚坚决。东北军（于学忠）、湖南军（刘建绪）、山东军（原韩复榘部）、陕西军（原杨虎城部）虽不能起重大作用，但还是要抗战的。一般说经过九个月抗战，军队虽受相当重大损失，但所有前线抗战将领尚未灰心，更无整个部队叛变投敌，如满洲失陷时那样可耻的现象。在国民党元老当中，如孙科、冯玉祥、于右任、张继、邵力子等，现在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他们有政治上的号召作用，但因无实力，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在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蒋介石，今天还是表示要坚决抗战的。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是不愿投降而需要抵抗到底的。

以上说明中国抗战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与危机，特别是武汉万一失守，可能产生严重动摇。但今天的情形是，台儿庄胜利后，抗战有些新的转机。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可以提高中国军队及人民的抗战自信心。如能继续取得新的胜利，则抗战能够顺利地支持下去。即如武汉万一失守，只要很好地去推动、影响政府和前线的军队的将领，在困难的情形下还是可能争取继续抗战的。

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目前最中心的一环，是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以一切努力保卫河南、武汉与西安，巩固徐州与津浦南段，阻止敌人由山西及平汉铁路南渡黄河，继续争取新的胜利，以达到破坏敌人第二期进攻计划。

万一武汉、西安不幸而被日寇占去，我党亦应推动政府与军队，仍然坚持抗战方针，并且提出继续抗战的具体方案。估计在武汉、西安失守后，中国仍保持有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仍然可能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保障抗战能够持久，而且使抗战转入有利的发展，直至战胜日寇的最基本的任务，就在于培养与创造新的力量。这须要从各方面推动与帮助国民党、政府真正地而且迅速地组织新的军队，建立必需的军事工业，使中国军队在质量上和技术上逐渐提高。

为着防止和克服政府对抗战方针的新的动摇，须努力提高政府、军队与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反对一切投降理论与失败主义的思想。

这就是中共在目前抗战问题上的中心任务。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般状况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方针。

中国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久已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结束，国内战争停止以后，才逐渐具体化。一九三七年二月，

国民党中央召集的三中全会，在原则上接受了我党的建议。七月，我党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发布两党合作宣言；之后，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我党亦取得初步合法的活动地位，过去被国民党拘捕的党员也次第释放出来。经过十年血战的两党重新合作，我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飞速地提高和增大起来。

在去年十二月前后的短时期中，两党合作问题上引起了一些摩擦。如捣毁《新华日报》馆，限制我们活动，甚至诬以汉奸名义拘捕共产党员；造谣说八路军不听指挥，不愿牺牲等；禁止我们成立游击队，不准八路军就地筹办粮食，不优待八路军新扩大兵员的家属，以限制我们的扩大等。

这些摩擦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上层分子看到共产党与八路军在全国群众中有极高的影响，八路军不断地壮大，引起他们的畏惧。他们还抱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故意从各方面来限制和破坏我们。同时，我党对国民党转变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在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缺点也是重要原因。

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对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详细检查了统一战线工作，认为我党号召的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由于国共的合作，发动了抗日战争。同时指出，目前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又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与

先决条件。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认为此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长时期的。并且指出,目前抗日战争的任务与动力,同苏维埃革命时代有了一些基本上的改变,即:过去中国党六次大会上规定的任务,是打倒一般帝国主义和消灭中国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革命的动力是工农;现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则只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的亲日汉奸,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革命动力不仅只是工农,而且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认为这一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是很长的。

其次,指出与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就是抗日。一切抗日的力量,都可以而且应该合作,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应服从于抗日的基本利益,提出的要求不应过高与过左。

再次,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之下,共同奋斗,不是谁去削弱谁的力量,而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虽然不能消灭,但是要尽量减少和避免。

各个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指出我党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关门主义的

倾向。

中国党根据这些原则教育全党同志，同时并向外宣布。在去年十二月宣言中，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是长期的，不仅为着抗日，而且在抗日胜利之后，共同建国。这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上有了一些进步，如建立两党委员会，准许我党公开在武汉办日报，周恩来同志被邀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

共产党、国民党以外，中国还有一些力量不大的小党派，如第三党（不超过一百个党员）、国家主义派（只四五百人）、国家社会党（只数十人）等，他们过去也受国民党排挤压迫，现在向我们表示尚好，也参加了统一战线的活动。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很小，所以国民党是不重视他们的。

另外还有一个政学系，他们是由一些政客、官僚、买办组成的，也不过数十人，他们中的领袖分子是亲日的。

（二）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合作中的困难与阻碍。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十年以前的大革命时代有过一次合作（一九二四年一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间经过十年的武装斗争，现在又重新合作。上一次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单独地加入国民党，而共产党仍保持它独立的组织。

这次合作与上一次合作，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

上次合作时，国民党仅有广东一省尚不十分巩固的政权和数量不很大的军队，而且是受着外部与内部敌人的压迫；现在它有了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全国的舆论机关。

上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但在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力量相当强大；现在是有自己的军队和独立的地区，在全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

上次合作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北洋军阀，这次合作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上次是打倒军阀的内战，这次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战争。

从上次合作到这次合作中间，经过了十年血战，共产党曾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已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立了军队，实行了土地革命。

因为国民党现在一方面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军事力量，并且有十年一党专政的统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过去十年的反动统治，失去人民的同情与信仰，且有了过去与共产党斗争的经验，惧怕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故它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因此，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的障碍与困难。

国民党在卢沟桥事变不久以前，在它的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政治教材中说：现在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现在共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它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一分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国民党还可以保持优势地位，中国还可以与苏联平等谈判。如果共产党力量在抗战中不消耗，苏联再帮助它一分，则它将有六分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

将要到莫斯科请训，那就不好。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的畏惧心理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

山西的阎锡山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枝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枝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但共产党有一个漏洞，他们是不要祖国的；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时，德国共产党虽然有很大势力，但后来终被希特勒压迫下去。他说，山西政权在他手里，将来还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存着削弱企图和自大心理，故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我党合作建议的决议中，还用着“根绝赤祸”的名称，表示共产党是向它投诚。我党要求共同发布宣言，亦被其拒绝。而我党单独发布之宣言内，所提“国共合作”字样，被其删去，改为“国共两党，推诚相见”的字样。国民党还禁止在其报章上用“国共合作”的名词，不愿意公开表示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

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各个党派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他在抗战爆发前，曾提出一种合作方式，是在两党之上成立一个共同的党，两党分子均可加入，由两党选出同等数量人员组织最高委员会，而以他为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必需服从这最高机关的决议而行动，共产党不再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即由最高委员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这一建议，被我们拒绝了。

后来他想引诱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即想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内，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认为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他说：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

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并说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均取消而加入为一派，党内是可以有派的。

复兴社的上层领袖，勾结托派分子，更依据蒋介石的意图，利用“统一”的名词，利用我党七月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向我党及八路军进攻。在其机关报《扫荡报》上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并引证苏联、德、意都是一党专政。因此，中国现在应当尊重国民党的惟一性，拥护国民党的领导权。他们说，中国团结有两种方式，一为联合，一为统一，而联合式的团结，不能坚固，亦不能持久，而且在某种情形之下，还要火并起来。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溶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则根本没有离心倾向；所以主张加紧团结的人，应该主张合并。又说，这个合并，根据一九二四年九二七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他们说，共产党既承认三民主义又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是反复无常的。他们并谓中国有两种危险势力：一种是封建势力，一种是反动势力（指八路军）。散布封建势力抗而不战，反动势力游而不击，这两种势力不肃清，中国不能统一等等谣言，中伤我党。他们在行动上，收买流氓，捣毁我党在汉口的《新华日报》馆。今年一月间，在武汉一带，造成相当严重的形势。

复兴社这些领袖，与托派勾结，想借统一之名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们这种活动，除得到国民党内一部分对共产党成

见很深的分子的同情外，还有少数政治见解很低而希望中国

统一团结的分子，也对他们盲目地表示一些同情，以为其他党派都取消，而加入国民党，中国会更团结统一，更好反对日本。

为着答复复兴社分子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揭露蒋介石引诱我们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派别的意图，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谈话，说明苏联一党存在，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其他政党的社会基础。在德意两国，虽为法西斯党专政，但还有其他政党不合法的存在与活动，并非只有一个党。指出英法美等国许多党合法存在，仍然保持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说明国民党过去以武力消灭其他政党的企图，经过十年纷争，已遭失败，今日合作，反能统一，并能抗战。那种借统一之名，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理论，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最后引用孙中山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能够相容。我们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绝不会放弃相信了多年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发表后，一般是得到很好的印象。国民党中一部分元老和许多党员及进步群众，都认为取消共产党是办不到的，而对复兴社和托派分子所引起两党关系之恶化，表示忧惧，惟恐因此而引起两党合作的分裂。对于复兴社利用与勾结托派，表示不满意。他们之中，仍有人提出新的方式，如提出在各党独立存在之外，另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各

党分子均可加入。有的认为可以保持现状,有的则赞成我党提出之合作组织形式,也有主张恢复上次大革命时代合作方式的。

蒋介石后亦声明并不取消共产党,只要意志统一,思想可以自由,并表示复兴社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意见。自此以后,一个党、一个主义等类口号,也不再提出了,且下令各报不谈党派问题。

我们党本来提出的各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采取民族联盟的组织形式,即按民主原则,由各党派派若干代表,成立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委员会,依照共同纲领而行动。各党派仍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这种组织形式的建议,因为复兴社及托派分子的捣乱,及蒋介石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并未完全打消,故尚未得到具体解决。这次国民党临时大会对此问题,亦无具体决定。目前尚只是由两党委员会进行了一些谈判,与蒋介石及其左右和国民党元老中一些进步分子,讨论某些重要问题。两党委员会内,因为国民党的四个委员(陈立夫、张冲、康泽、刘建群)有两个是复兴社顽固分子,故谈判得不到很多具体结果。

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形式之主张,我党准备加以赞助,因为这可以吸引广大青年,经过它可能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和改造。这次国民党临时大会,已通过成立民族青年团组织。

(三) 国民党的现状及其进步的趋势。

国民党主要依靠民族资产阶级为其基础。当它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它便靠拢小资产阶级以至工农,逐渐淘汰地主、

军阀成分，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及许多工农也加入了国民党，军阀势力被淘汰出去，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工农的政治联盟的组织。当国民党离开革命的时候，它又与封建地主、军阀势力联合起来，逐渐将工农小资产阶级排挤出去。如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它进到专门以反共为主的反动时期，它必需与军阀、地主势力结合，军阀、地主就大批涌进国民党内，并占主要地位；工农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从里面分化出来。

现在，国民党由反动地位又重新回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来。既然它要起革命的作用，就需要革命的群众力量来支持。它必须靠近工农小资产阶级。

在抗战起后，国民党一般的是在向前进步的过程，它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起来。除去对外对内政策改变，重新与共产党合作，国民党的上层，如蒋介石及一部分元老和进步分子，已渐感觉到国民党组织之无力量，不改造无以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下层党员，对国民党组织之腐败无能，毫无民主生活，也表示着深刻的不满，而要求改造。故蒋介石近已提出复兴国民党的问题。在这次临时大会上，也讨论到一些关于改进国民党的问题。

我们估计，国民党在继续抗战过程中会要进步，但进步的速度，因为许多条件的限制（内部腐旧分子把持，有害怕群众与共产党等思想成见）不会很快。而在国民党前进中，其中的顽固分子，还可能从事破坏。

我们要使国民党不仅能与我们合作抗日，而且能与我们共同在抗战胜利后合作建国，就必须使它的机构进步。故我

党对于国民党的复兴与改进运动,采取赞助方针,设法使其组织内能够增加大批进步的成分,逐渐淘汰腐旧的封建的分子,争取内部民主的实现,以达到其内部左派势力壮大,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为着这个目的,准备以一些色彩不浓的共产党员加入进去。这样可以推动国共两党向着巩固合作的前途前进。

这次国共合作中,中共因为有着比上次大革命时代不同的条件——有红军和苏区,这是顺利地取得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还是太小;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力量,今天还不大。因为我们有军队,有地区,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有战争经验,我们能与它合作,经过与他们的上层谈判,能影响国民党的对外、对内政策及军事上的进步。但正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群众中的组织力量薄弱,不能以群众力量影响和推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机关。而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仅开始,且内部顽固分子尚在捣乱,故今天国民党对我们还不能以平等地位相待,使合作中遇到许多的困难与障碍。

然而,这次与国民党重新合作,是在对日抗战的过程当中形成发展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军事进攻的状况下,必然要推动中国更加团结,这比上一次的合作有着更加顺利的条件与基础;在日本的进攻之下,国民党要抵抗到底,就必须进步,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这种客观条件,是可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向着巩固的前途发展。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

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方面的力量更加 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

（四）当前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任务。

中国党认为,中国要战胜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必然还要遭遇许多的困难与挫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合作,则能抗日,能够胜利;国共两党如果分裂,则中国的抗日必定要失败。日本、亲日派、汉奸和托派正从各方面来破坏中国的统一团结,首先就要破坏和挑拨国共两党的团结。特别是日本最近的进攻遭受一些挫折后,它必然要以更大的努力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因此,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仍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当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虽然在国共合作当中,还有许多的困难与阻碍,党还是在努力说服国民党及其领袖,使他们打消那种并吞或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使得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之间,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合作的共同纲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各种具体问题的谈判。

中共认为目前的统一战线,尚偏重于上层的活动,广大群众缺乏组织,这就使得统一战线的下层基础不坚实、不宽广。因此,将广大的无组织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成为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最重要的迫切工作。

抗战起后,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军队对中央政府的关系,人民对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显然比抗战以前大为进步。但这还没有达到必要的密切程度。有些地方军队对中央政府不给予

他们补充与枪械，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人民因政府的许多设施与处置的不得当（如强迫征兵与强募公债等），尚有许多不满，这需从各方面推动，使这中间建立起合理而密切的关系。

我们准备在国共合作关系进步的基础上，推动国民党政府采取更多的进步的设施，逐渐改革现有的政治机构，淘汰亲日派、汉奸、托派，引进进步分子参加政治机构，充实政府组织战争的能力。

以上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摆在中国党前面的迫切的工作。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及其最近状况

（一）八路军的工作方针和它在抗战中的作用。

八路军是由过去中国红军改编而成的。它在过去十年当中，曾经击败过国民党几次的进攻，是在这种不断的战争当中长大与锻炼出来的。所以它有着革命战争的丰富的经验。但是八路军的武器，都是在过去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夺取过来的，所以是比较陈旧而不整齐，并且没有重兵器，连山炮都是没有的，更不必说大炮、坦克、飞机等类新式兵器了。它作战主要是依靠战士的政治觉悟与热情，指挥人员在战术上的灵活机动，指战员作战时的坚决勇敢，以战胜敌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首先向政府要求开赴抗日前线，并开始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当时蒋介石还不许我们开动，因为他恐怕八路军首先开赴前线扩大了影响；并

且他尚在和战未决当中，恐怕我们军队去了，会把战争扩大起来。在那时，蒋介石还不给八路军成立总指挥部，只许改编为三个国防师，由他直接调动，并分开使用到各个战线上去。

去年八月，华北战争吃紧，蒋介石这时才给了八路军的名义，调八路军到平绥路南口附近作战。八路军去年八月即由陕西向山西北部开进，参加晋北的战争。当时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注意与兴奋。

我们军队到达山西时，即确定了下列方针：

第一，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单从正面防守办法。我们是从敌人的侧后面去打击敌人，在敌人远近后方发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打击其增援部队，配合其他友军作战，并求得我们行动的胜利，以影响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

第二，在八路军作战的过程中，加紧做组织与武装地方居民的工作。在敌人后方，创造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以配合正规军队作战。以这些工作的成功来证明：只有发动和组织民众，发展人民的游击战争，才可以使战争能够持久，能够胜利，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去注意组织民众和发展游击战争。

第三，加紧八路军内部的政治工作，及对敌军的瓦解工作，建立与居民的亲密关系等，来推动其他军队去改进政治工作及改善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起到模范先进的作用，去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

由于我们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首先就取得平

型关的胜利。这是抗战起后中国的第一次胜利，击溃了日本最精锐的第五师团，消灭了将近一个旅团。后来，我们的军队转入到敌人的侧后方，截断它深入山西北部后的路。正面有国民党军队的坚决抵抗，我们在敌人的后面，打击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夺获和毁坏敌人千辆以上的辎重汽车，二十架飞机，使得进入忻口（太原城以北）的四万余敌人没有粮食、炮弹和汽油，大炮、坦克被迫停止活动，仅靠飞机运送少数粮食和弹药，使忻口得以支持二十余天的猛烈战斗，敌人陷于非常危险的地步。

我们的这些胜利与成功，逼得敌军不得不改变过去常以支队迂回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法，因为这种迂回的小支队时常被我们在侧面消灭掉。同时逼得敌人不得不分散一些兵力，去守卫交通线上的据点。

我们的这些成功与胜利，一方面使着国民党抗日军队的作战信心提高，他们说八路军的武器比他们坏得多，还能够打胜仗，他们一定能够同敌人拼一下。这就使得当时向后溃退的军队，也坚决抵抗起来。另一方面，使得国民党军队逐渐认识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互相配合的重要意义，而开始采取新的作战方针，推动了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上的进步。最近台儿庄的胜利和津浦南段战争能持久，就是由于战略战术上进步的结果。

八路军在山西北部作战过程中，毫未放弃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八路军活动区域以内，经过一两个月工作，成立了许多救国会、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成立了大批的人民游击队，由八路军抽出一批有游

击战争经验的干部去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的武器，一部分是收集民间的旧枪和中国军队在抗战中遗散在农村中的枪支，另一部分是在行动当中夺取敌人的枪支。自然，他们的枪支数量还是差得远。他们的粮食和给养，则由当地群众供给，特别是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之下，向地方上的富豪募集一部分粮食或金钱。自然，游击队的生活过得很差，有的到冬季还没有棉衣。医药对于他们更是困难的问题。

那些区域的游击队，在不断的战斗当中力量逐渐壮大，而且逐渐集中起来形成较大的队伍。特别是在晋察冀边区，已经由游击队编成了几个独立师，每师有五六千人，设有军区，统一指挥他们的行动，成为在敌人后方创造新军队的模范。他们时常伸到北平附近，越过平汉铁路，到津浦路附近天津以南地区打击敌人。

在晋察冀边区内，现有四十多个县、五六百万人口的地区，已经恢复了中国的政权，并建立了该边区的统一的政权。这政权能够在我党领导之下工作。这一区域内，普遍组织了民众，建立了党的组织，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时常截断平汉、平绥、正太铁路，给敌人重大损伤。敌人曾经用了很大的兵力，分八路去围剿他们，但是他们用着很灵活的游击战术，将敌人击退。现在，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人后方一个有基础的游击战争根据地。

八路军在红军时代，就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今天依然是保存着的。士兵中系统地进行了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许多问题的教育，战士的政治文化水平比中国一般军队要高，

他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打日本和持久战能致胜日本的基本知识。入伍后经过相当时期的战士，都能识得一些文字。部队不论是在驻军、行军或作战当中，都有各种不同方式去进行政治工作。部队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同时生活上能够刻苦。指挥员与战斗员间建立起友爱的同志的关系。共产党支部起着领导和模范的作用。部队中逃亡的现象很少，作战时坚决勇敢，部队内部有团结活泼的精神，这是引起友军非常敬慕的。有一次，一个国民党报纸的新闻记者，到八路军总指挥部来访问朱德同志。当他走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门口，看见一个年纪已老的人，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戴着眼镜看报纸。他走进司令部内经参谋长介绍，才知道这老人就是朱总司令，引起了很大的惊异。他与朱总司令同吃午饭，饭菜极简单，与士兵所食相同。他又找了八路军士兵、伙夫谈话。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八路军有一个极大的特点，上自总司令，下至士兵、伙夫、马夫，所说的话，观点完全一致，只是程度有深浅不同而已。他说，八路军的教育与团结，真是值得钦佩的。

八路军除内部政治工作外，在抗战中还特别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为着这个目的，除印发许多日文、中文、蒙文、韩文传单小册子，利用政府飞机或经过游击队和地方居民，以及组织武装宣传队，散发张贴到敌人区域，并教育指战员学习几句简单的日文口号，以便在作战时向敌人宣传。对俘虏的日本士兵，给以很好的优待和教育。我们散发的传单小册子，对日本士兵已起到一些影响，时常从俘虏以及战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可以找到我们散发的宣传品。在战场上被我们

包围的日本士兵,经过我们喊口号,有自动缴枪过来的。俘虏来的日本兵,有很少数现在帮助我们写日文传单小册子,他们甚至要求留在八路军工作,并要求设法将他们的家眷也搬到中国来,以免受日本政府的摧残。

八路军与地方人民间,建立了很亲密合作的关系。首先是由于八路军有很好的政治纪律,他们驻扎民房,须先征求居民的同意,损坏东西要赔偿,更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请我们到他家里住,送许多东西来慰劳,而别的军队到一个地方,群众多逃走。特别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纪律很坏,发生掳掠甚至强奸妇女的现象,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一些办法,就是别的军队到了,由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我们的队伍因为得到群众拥护,在作战时,群众自动替我们搬运伤兵和战利品,修补难走的道路,使我们好通过。平时则帮助我们运粮食、弹药,给予我们以很大的便利。

由于八路军部队内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工作,特别是与居民的亲密关系,引起了其他抗日友军很大的注意与兴趣。他们便回想到北伐时代,那时北伐军内部也有政治工作,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便提出恢复北伐军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要求,并开始建立政治工作。因此,在中国大本营下,设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并请周恩来同志为副部长。现在,各个集团军招收了许多学生,正在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阎锡山新组织的军队,仿照八路军成立政治部,并设政治委员制度。

八路军是从土地革命中,从小的游击队逐渐生长壮大起

来的；过去十年经过残酷的反国民党军队的斗争，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行军力极强，并能刻苦耐劳；指挥员多有独立行动和机动的能力，故在作战中有许多特长。能够集中起来打大的仗，同时又能够分散开来，独立行动去发展游击战争。能够以少数兵力，勇敢地去攻击数量强大的敌人。

因为八路军的战术运用得灵活，在山西作战的过程中，使敌人遭受重大的损失与消耗。敌人在山西被八路军击死和伤者近三万人，而八路军伤亡只有敌人伤亡数三分之一。这种作战方法，是消耗敌人的最好办法。我们缴获敌人的文件中，有一敌军官的日记这样写道：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因为我们与敌作战，如在极不利情况下，就避免过大的牺牲而迅速组织撤退，以引敌于运动当中再去打击它。敌人对中国别的军队的行动很清楚，惟对八路军行动是不明了的。敌很难主动地找到我们决战。

八路军在抗战的战略战术上，军队政治上，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上，起到了推动和模范作用。蒋介石最近也逐渐相信八路军的作战指挥。他拨出七个师和一个旅，交八路军指挥作战，但八路军因为还没有重兵器，如大炮、坦克、飞机等，所以还不宜于从正面与敌人进行顽强、持久的阵地战。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手里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国民党最害怕的。汪精卫在去年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两个不同的政府存在，而说是一个统一的政府；有两个不同的军队存

在，而说是一个统一的军队。在法国人民阵线〔149〕中，法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中国共产党要统一战线，就要取消红军和苏区。

蒋介石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初则只允许我们成立三个师，发给三个师的经费，不设总指挥部，要朱德、毛泽东出洋或到他的中央政府工作；继则想尽方法，削弱共产党在八路军中的领导。他要派副师长、参谋长及政治部副主任，要求把我们的军事干部调到他们的军队中工作，美其名曰“交换干部”，可以交换工作经验。我们的政治干部，则须调到南京受训后，才回原队工作。他要求八路军内的教育和管理，完全与他的军队一致等。

当时红军的数量，本来不只编三个师。为着避免过分的争执，我们就应允编成三个国防师。抗战起后，蒋介石才给了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到山西后，更升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他的其他要求，均被我们坚决拒绝了。直到最近，才准许他派四个联络参谋（每师一个，总司令部一个），这只是一传达情报的性质。自然他还是想利用联络参谋来侦察八路军内部的情形，和进行瓦解我们军队的活动。我们不放松随时考察其行动。

蒋介石在这些要求没有达到后，随即采取不补充八路军的办法，使八路军在抗战中消耗后，不能恢复和壮大。第一，他不补充我们的新兵，并采取一些办法限制我们自己扩大；第二，不补充我们的武器；第三，不增加我们的经费，并下令不准军队就地筹粮。除此以外，自然他还要进行一些秘密的办法来勾引和收买八路军的干部；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八路军能够打击敌人，他还是需要利用这一个力量，不得不接济我们必需的弹药和一定数量的衣服等。

在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的情形下，八路军虽然在名称上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但原来红军时代的各种制度仍然是保存着的，并仍旧保持着共产党在这一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我们也公开向国民党提出：这一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决不放弃或稍减弱对八路军的领导。

现在八路军中，团以上各级均有健全的政治机关，营有政治教导员，连有政治指导员，师、旅、团仍设有政治委员。营以上军政干部百分之百为共产党员，连排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各个连队，均有党的支部组织。全体军人中，在出发到山西时，党员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五；现在因为部队扩大和战争中伤亡很多党员，党员占全体军人百分之二十。在八路军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共产党在八路军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绝对的领导作用。

八路军的社会成分，仍然保持着工农成分占绝对多数。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人数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贫农、中农占三分之二稍弱。此外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在部队中经常进行党的主张、政策的系统教育。

八路军人员，虽然在战争中消耗了得不到政府的补充，而且自己扩大也受到一些限制，但我们仍然进行了扩大新兵的工作。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努力，去补充在战争中的伤亡减员。我们党把扩大路军作为自己的一个任务。

因为八路军与居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有着过去的扩大军队的经验，我们在作战过程中，组织了一批有活动能

力的干部与战士，在战区进行扩兵的工作。我们的扩兵，经过群众中的政治动员，群众极踊跃地自愿参加八路军。因此，我们新兵的补充并不感觉困难。去年三四个月内，我们在山西前线作战的军队，不仅补充了减员，而且扩大了三倍。只因为经费上的限制，我们在去年十二月底，就停止了扩兵的工作。如果经费、武器问题能够解决，八路军再扩大十万人，在今年年底即可以完成。

因为部队的迅速扩大，战争中一些干部的伤亡，现在部队中开始感到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目前正由后方的学校及前方各师与总司令部开办的随营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因为八路军受着经费的限制，现在部队是过着极苦的物质生活。许多扩大来的新兵，还没有发衣服、鞋袜、毯子，冬季没有棉衣；士兵虽规定每月发中国钱一元，作为买鞋袜、烟草等零用，但因为经费的困难而常常不能发给。伙食费虽规定每人每月为五元，但也不能发足。至于干部，则与士兵生活相等，虽曾规定零用钱连排长每月二元，营长每月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也因经费困难，不能经常发给。我们的干部的生活，与其他军队比较，是相差很远的。他们的薪水连长每月有百余元，师长有八百元，总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们的武器也很缺乏，许多新兵现在还是徒手，或者拿着手榴弹去参加战斗。缴获敌人的枪支，自然可以补充一小部分，然而很不容易缴到完全好的。敌人打败仗时，往往将枪支打坏，缴来后不能使用。

除八路军外，现在中国沿长江流域，又组织了一支与八路军性质相同的新四军。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小些，但也是共

产党领导的军队。

新四军是由保存在中国中部南部原有各个苏维埃区域，如江西苏区，福建苏区，浙南、皖浙赣、湘赣、湘鄂赣、湘鄂边、鄂豫皖等苏区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的。这些区域的游击队，在三四年前，中国主力红军离开那些区域以后，保存在原有区域内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过长期游击战争。他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了三四年的游击战争，故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

这些部队也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内部也有很好的政治组织与工作，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原来不愿意他们集中起来编成独立部队，而想编到他们军队里边去，经过长期交涉，才允许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

新四军已由各个区域集中起来，大部分开到南京、芜湖、上海、杭州之间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一部分在长江以北，深入安徽北部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军事上的任务。

为着使得八路军及中国党所领导的其他军事力量，逐渐在抗日战争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这就需要党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在数量上能够扩大，并要在技术装备的水平上提高，使之成为近代化的军队，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为着这个目的，中国党正在注意提高现有干部的军事技术水平，培养能够掌握新式兵器的干部与技术人员。

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有其特殊重大的作用与意义，而且随着中日战争范围更加扩大，特别是万一武汉等城市失陷

以后，它的作用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中国经济、地理、交通的许多条件，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游击战争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最近，正选派干部和一部分队伍，到敌人后方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创造像晋察冀边区同样的许多游击根据地。

估计到国民党还未放弃削弱我们军事力量的企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托派等，必然想尽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军事力量。同时，我们现在的斗争环境，比过去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外界影响容易侵入我们队伍中来，故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是目前中国党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任务。

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一）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一般情形。

在九个月抗战当中，中国人民一般的是英勇地起来参加抗日的各种斗争，然而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因为国民党还未能完全放弃控制包办政策，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人民经过大革命的教育，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在这次抗战当中，虽然忍着巨大的牺牲，还是表示不愿屈服，而且人民参加抗战的各种斗争正在发展着，如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展便可看出。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对付中国的人民，是采取最残酷的最野蛮的政策，企图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怕战心理。这就是在其占领区域内采取疯狂的烧杀、奸淫、掳掠方法，和用空军到中国内地到处肆意轰炸。凡是日军所到之地，常将铁路、汽车路两旁的村镇、县城及附近房屋尽行烧毁，任意屠杀人民。特别是它在某一遭受中国军队的打击或游击队的袭击的地方，它便将这些城市或村落中未及逃走的居民，大肆杀戮。奸淫中国妇女，更是最普遍的现象，而且在日军中被承认是合法的行为。至于财产的掠夺，则更普遍。中国人民在敌人屠杀、奸淫、掳掠之下，对日本仇恨愈益加深。故在战区和被敌人占领地区，人民自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向敌人斗争。同时在中国后方，各种群众组织与各种活动也在发展。国民党虽想控制这一运动，然因群众力量的壮大，也就逐渐难于控制了。同时他们自己也采用一些方式去组织群众，想使已经起来的群众运动，仍得被其控制。

在各种群众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表现是先进的，积极的。特别是交通、军事工业工人，在最困难危险的状况中，他们不顾一切牺牲，修复被敌空军炸毁的铁道、桥梁，保证军事运输得以连续。在上海、山东等地和平汉、正太、同蒲、沪宁等铁路沿线敌人占领区域的各种工人，许多人自动组织游击队或参加群众武装组织。上海的工人，在上海战争时，组

织有参战队，积极协助军队作战。

农民抗日斗争，在战区和敌人后方也极为活跃。在战区，他们担负着极繁重的军事劳役，如征集农民的骡马、车辆，帮助运输粮秣、弹药、伤兵，修筑工事及道路，参加武装组织等。在敌人后方区域，则有大批农民参加游击队及各种武装组织。但在中国后方地区农民的抗日斗争，除某些省份进行军事训练和两广农民运动有些发展外，尚未能很大地发动起来。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抗日运动中也表现了很大作用。学生除参加一般救国团体，进行后方宣传动员工作外，近几月来，有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军队。现在各省军及中央军收容了大批青年学生，正在加紧军政训练，准备培养为军政干部。有些学生，直接加入军队里当兵；有些学生，参加到游击队中活动。城市贫民，特别是被占领区域的贫民，过着极苦的生活，他们中间有许多参加到军队中当兵。

妇女以至小孩，都有些积极的活动。组织有许多战地服务团，流动剧团，经常到前线做宣传慰劳工作，或在后方募集慰劳品，看护伤兵。如上海有一个儿童剧团，是由八岁到十八岁的工人和贫民的子女、小学生自动组成的。他们冒着一切危险，到前线与后方进行演剧宣传。

工人、农民、学生是抗战群众运动中最积极的力量，并且工人、农民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增加起来。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抗战起后，他们是站在抗战方面的。他们希望战胜日本，但对抗战的胜利信心是不坚强的。在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太原、青岛、济南等大城

市失陷后，他们的企业受了很大损失。他们现在还是希望能战胜日本。但他们有过去大革命时代的经验，惧怕共产党取得抗日领导权，故对真正的群众运动表示畏惧。这反映在国民党的方针上，就是抑制群众运动的发展。

中国地主阶级，一部分大地主和绅士被日本利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组织伪政府。中小地主在敌人残暴政策之下，对抗战还是表示一些同情。如在游击区域，他们还可以出一部分粮食，供给游击队。日本必然要找到中国地主阶级、绅士、官僚、老军阀和一些流氓，作为它统治占领区域的社会基础。故我们的政策，是不应过于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尖锐化，不要把地主阶级推向日本方面去，并争取其中某些部分能继续同情于抗日的斗争。

在大后方的人民中，有许多工人、职员，有的将自己每月工资的一部分捐作抗经费，有的甚至将全部财产捐出。南洋和美国的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热情高涨，对募捐也非常积极。

总之，中国人民虽然忍受战争的最大牺牲，他们还是坚决要求抵抗。不管国民党怎样想方设法去控制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一运动还是在日益发展、普遍与深入。战争愈持久下去，群众抗日斗争力量毫无疑义的是只有更加扩大更加强有力。

（二）中国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及组织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当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和威信。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今年一月出版的《新华日报》，二月时已销售到二万余份。在武汉出版的《群众》

周刊，近二万份。最近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报，销数亦达万份。文化界和救国团体出版有大批刊物和小册子，是在我党影响之下，上海失陷前，有五十三种小刊物，其中有四十九种是在我党影响之下。武汉最近有四十种刊物，其中有三十八种是在我党影响之下。此外，在广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还有许多同情抗日或在我党影响之下出版的刊物杂志。许多书店，自动印发一些关于八路军的小册子，或汇集我党刊物上重要文章，出版小册子，因为有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领的文章，在中国销路特别大。

因为我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我党获得公开或半公开地位，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但因为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和工作的，于过去十年内战期间，遭受国民党白色恐怖摧残有极大损失，在统一战线成功后，才开始恢复。陕西的党，在前年西安事变后，就逐渐恢复起来，在西安城及农村中，建立了一些基础。西安及各县的许多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是在我党影响之下。国民党曾下令要解散我们领导的团体，现在正努力争取这些群众团体能够合法存在，并与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求得统一起来。山西的党在八路军的协助之下，近半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并在山西的游击战争及群众团体中，起到很大的领导作用。山东、河南北部的党，也有新的发展，他们正在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上海的党，在上海战争时，有些恢复与发展。自上海失陷后，许多同志难于立足，党的工作也就困难得多。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地，也已经派了干部去恢复工作，最近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但是党员数量还是不大；他们参加了国民党所允许

的各种群众团体内的活动,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在武汉,文化界救亡协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自卫抗战慰劳团等组织中,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党在工人中的工作,还很薄弱。

国民党在抗战起后,只允许各地民众成立抗敌后援会,承认它为合法组织,并由国民党地方党部派人主持。另外各城市 and 交通工人中,过去有国民党的工会组织,然这些组织都没有广大群众基础。我党在群众运动方面,现正采取统一的方针。在工人运动中,即号召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工会,不另成立独立工会;我们原有的赤色工会,也加入到国民党工会中去;在没有工会的地方,即用国民党允许的工会组织去建立工会。对工会和其他国民党允许合法存在的群众团体,逐渐充实其群众基础,争取内部民主,推动这些团体进步,并逐渐在其内部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敌人占领区域,我们党的活动比较自由,未受到国民党许多限制。这些区域,我们仍是采取统一战线方针。由我们在敌人后方恢复政权的地区,准许各个党派合法存在,并与合作,共同恢复政权,建立群众工作。但在那些地方,我们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特别是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在群众斗争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可能范围内求得改善群众生活,不提出过高的口号与要求,并且采用合法方式,使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能够顺利地实现。一般地说,不是号召群众采取直接斗争的方法。

中国党在原来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尚在恢复时期。

党在这些区域的政治影响很大,而组织群众力量的工作则落在后面。特别是工人运动中,我们的力量尚薄弱。但是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有着恢复和发展工作的条件,我们依靠党的正确的工作方针,群众运动是能够迅速发展的。党最近将召集的七次大会,对群众运动及工会工作,将有详细的讨论。

陕甘宁边区是由过去的苏维埃区域改变而成的。该区域内土地过去已经分配了,地主阶级已被打倒。党在边区内有坚实基础,每个乡村都有党的支部组织。

我党在边区内的工作方针,是使边区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同时又是中国最民主与进步的区域,拿这些去影响和推动国民党区域政权的进步。最近决定在边区允许国民党成立其党部,并且按照民主的原则,重新改选各级政府机关。在民主选举中,准许各个党派公开参加选举运动,并准备在新选举中,吸引一部分国民党人参加政府;并以边区内准许国民党公开活动来取得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内公开活动的地位。

我们边区内正在加紧战争紧急动员工作。现在全边区有十万壮丁组成的自卫队,五万青年参加的少年先锋队,正在加紧军事上的训练,准备在必要时动员补充八路军。边区政府同时加紧领导群众的春耕运动,以增加耕地面积和农产品。

边区工人有工会组织,加入工会的有三万五千工人。除政府的印刷厂、兵工厂、被服厂外,均为农村手工业工人。工会以外尚有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包括有六万余会员;儿童团的组织,包括七万多儿童。

国民党要派它的中委丁惟汾来任边区政府主席,以前我们是拒绝了。后来我们同意了,而它尚未派来。到现在止,

国民政府还尚未正式承认边区政府为合法组织。

（三）中国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任务。

中国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走向反对日本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党的地位大大提高；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也起得了很大的推动中国军队进步的作用。中国党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依靠于中国党政策之是否正确，来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正因为它在中华民族存亡命运中，有重大的决定作用，国内外的敌人，必然要设法来破坏中国党；故中国党更加要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为着党在组织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得到加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全国党的坚固基础，成为目前重要的工作。首先要在各个主要城市和产业、交通工人中，以及敌人占领区域内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地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大批吸引工人、农民及先进的青年学生，加入到党里来。

估计到党内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党在最近将有大批新的党员涌入，估计到一般党员对党的统一战线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还表现着关门主义及旧的工作方式；同时，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阶级敌人托派等，必然要利用党的弱点来破坏党，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以高度警觉性，防止敌人和奸细的破坏，也是党的迫切任务。

培养大批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改善和学习统一战线中群众工作的方式,建立地方党健全的领导机关,这又是推动党在全国工作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的一环。

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大会,现在全党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 纲领而斗争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47〕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立了抗战建国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对外对内政策的基本方针。在纲领上并且首先指出了抗战建国大业之完成，没有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是不可能的。

这一纲领的确立，是适合当时民族抗战的客观需要的。它的正确性就在于吸收了过去九个月抗战和第一次大革命中许多经验教训，认清了要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必须依靠于民族力量的组织与发动，依靠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奋斗。这是适合于孙中山先生临终叮嘱的遗教的。

这个纲领的颁布，无疑的，是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这个纲领可以作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纲领，而愿为其完全实现而奋斗的。

这一纲领之实现与否，对于中国是否能够坚持长期抗战

* 本文是任弼时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一一一期《抗战三周年纪念特辑》。

以取得最后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

抗战已经经过了三年，今天我们检查这一纲领在全国执行的程度是如何呢？我们的答复是极其不能使人满意。

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区域，是认真地为着这一纲领的实现而奋斗。那些地方的民族抗战力量的确有着显著的发展，表现着新中国发育滋长的气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内，是没有真正去求其实现的，而且有些不顾国家民族亡国灭种危机的顽固的人们，背道而驰，公然违反着这一纲领。这些地方的民族抗战力量，显然是没有法子能够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而且呈现着倒退削弱的危险过程。

中国经过了三年抗战，未能动员和组织起全民族更强大的力量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今天还没有具备反攻敌人的条件。一部分人们感觉抗战没有胜利前途而悲观消沉甚至动摇起来，乃正是由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认真执行这一抗战建国纲领的结果。

中华民族现在进入比从前更艰难更困苦的抗战第四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彻底贯彻灭亡中国政策的一年，是可能引起抗战营垒中更大分化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将要转入国际国内更有利的斗争条件的过渡年份。

已经到来的抗战第四年，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要求中国能够更加强固地团结，更需要勇于发动和组织全民族所有能够抗战的力量，来克服当前的困难，克服投降分裂的危险，坚持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这也就是说，处在今天国际国内条件下抗战的中国，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的抗日党派，更加团结一致，认真地彻

底地实现抗战建国纲领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废除一切足以破坏团结、阻碍抗战建国纲领实现的设施。顽固不化的人们,如果还继续着倒退、顽固的政策,那只是帮助敌人来灭亡中国,甘心去作日本的奴隶。

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认清大敌当前,中国应当一致对外。对于一切不顾国家民族当前危机,不以全力去对付外敌,而公然违反抗战建国纲领所指“捐弃成见”、“破除畛域”的方针,专事对付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以制造国共两党的磨擦,破坏中国内部团结的人们,应当给以迎头的痛击。

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的第二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认清只有充分地发动起全国人民,才能完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伟业。对于那些惧怕广大人民的兴起,而公然违反抗战建国纲领所确定的改善政治机构,保障抗战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方针,反对必要与可能的人民生活之改善,用各种方法限制民众抗敌救国活动,排斥一切进步设施的人们,必须加以坚决的反对。

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的第三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认清我们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国策。对于那些不相信中国自己的力量,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依赖帝国主义列强的调解,没有外援就不能抗战,而不去认真地采用适合于抗战需要的经济财政政策,对建立军事工业和强大军队采取消极怠工的人们,也必须给以无情的指责。

是否能够彻底执行自己的宣言与纲领,是对于政党之是否能够忠实于自己的事业的一种测验,宣布自己的主张而不

去忠实地执行，只有丧失自己的威信。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和诺言的。它过去曾是，今后也还是要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和一切进步设施而斗争。希望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同心协力，为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奋斗到底。

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

自从皖南新四军万余人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将其大部歼灭，和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成为全国各界人士以至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士所注意的一个中心问题。

这次皖南事变是日寇和亲日派、汉奸破坏中国民族团结，挑起内战的一个极大的阴谋。同时，也就是国民党内一贯反共的顽固派企图组织大规模反共战争的尝试。如果亲日派和顽固派不能够悬崖勒马，停止这种合伙破坏统一战线和挑动国内战争的行为，那末，在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有濒于破裂的危险，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要受到极大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宣布国共合作，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以后，它始终是努力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

* 皖南事变后，为了使各地党组织明了政治局势，加强工作，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了各县干部联席会议。本文是任弼时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可载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十六期。

战线而奋斗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积极地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几年来，在敌后发展着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了已被敌人占领的广大土地，创造了强有力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了一半还要多一点的进攻中国的敌军，配合着全国其他抗日的军队，支持了将近四年的抗日战争。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这一些军队的努力，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这也就是日寇和亲日派、汉奸所惧怕的。亲日派寻找一切机会来挑拨国共内战以破坏中国抗战，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其军队在抗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不仅没有加以任何的赞助，反从各方面加以破坏和限制。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前面，不愿与全国人民团结，增加民族力量来击破民族敌人的进攻，以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反而企图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来牺牲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继续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状。这就是这次皖南事变发生的基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其历次的宣言和决议当中，都指出巩固国内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六中全会上，指出国共两党不仅应当合作抗战，而且应当合作建国。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当中更指出了合作应当是长期的。他说：“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同时指出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任何一个抗日党派的发展，都与抗战有利。在六中全会的《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当中指出，日寇所怕的，更没有比中国人民的团结

统一更厉害了，并说：“当此战局转向新的阶段之际，日寇一定加紧其挑拨离间的阴谋，这就要求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更进一步的亲密团结。”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的声明：“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同时六中全会又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成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主张共产党员用公开的交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一切都是为着巩固团结，避免误会与磨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与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然而，国民党中代表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不仅没有接受这些真心为着国家民族利益的宣言和建议，而且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和其政治影响的发展与扩大表示恐惧，把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看成比日寇的进攻还更加危险。他们的理论是宁可亡于日本，也不愿共产党发展，因而坚决抱定反共的方针。日寇和亲日派更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和反共方针，来实现其破坏中国民族团结、挑起国内战争的阴谋，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国民党顽固派，远在抗战爆发以前，就企图在抗日战争当中，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材当中，曾经指出：必须使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间消耗五分之三。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在实际上不承认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拖延陕甘宁边区问题的解决，同时高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权、一个军队的论调，企图溶化和吞并共产党。当他们这种企图

被我们公开反对而不能实现时，他们便利用其政权、特务机关、新闻出版事业以及军事力量，实行其所谓“反共”、“限共”、“溶共”、“制共”的政策，来打击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当去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举行广泛的天空轰炸，准备向重庆、昆明、西安进攻等加紧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引诱中国投降的目的的时候，我党在“七七”三周年纪念宣言当中，着重号召全国同胞和各抗日党派努力于国内团结的巩固，宣言中指出：

“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磨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抗战到底，各党各派的诺言必须实践。”

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该宣言中也曾经声明：

“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军冲突的行动，而在战区及敌人后方则与一切抗日友军协同作战。但要求各抗日友军对其部下亦应加以约束，勿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足以引起冲突的任何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

然而我们这种忠心于民族团结的努力，仍然是没有能够动摇国民党中顽固派分子一贯的反共方针。相反的，他们总想要寻找一个有利时机，大规模地来进攻共产党。

在去年，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公布以后，英美从他们本身利益出发，由以牺牲中国来拉拢日本的政策转变到支持中国

的抗战；苏联继续其一贯帮助中国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处于国际孤立和困难的地步，这正是中国加紧组织力量打击日寇的良好时机。但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没有利用帝国主义间矛盾加深的有利条件，来组织向日本军队的反攻，相反的，他们认为大规模反共时机到了，决心协同亲日派，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反共战争。他们以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惧怕国内团结的破裂的，而企图首先消灭和打击华中和江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达到其各个击破的目的。为着实现这样的计划，先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后来以蒋介石的命令方式，限定在华中、江南之新四军、八路军，在一月底以前一律移到黄河以北。同时在华中和江南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华中和江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它的目的就在于逼迫华中和江南十几万八路军、新四军，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敌人堡垒封锁线周密的华北地区去，让日本军队将其消灭；否则，就用国民党的军队来消灭华中和江南的新四军、八路军，以取得日寇的欢心，而便于将来好向日本妥协投降。

我们党顾虑到巩固国内团结、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之重要，曾经委曲求全地答应了江南新四军的北调。江南新四军军部及所率领之部队万余人，一月四日遵令向北转移。正当其开始向北移动之际，国民党即调动军队将其包围，经过七昼夜的血战，终被七倍于我们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将其大部消灭，并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制裁。同时，命令汤恩伯属部十余万人，向华中新四军与八路军驻地推进，准备继续消灭华中的新四军与八路军。

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动命

令的发布,我们党估计这些事件不过是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之开端,是日本、亲日派、汉奸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实现整个阴谋计划的开始,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国民党敢于公开宣布抗战有功的新四军“叛变”和取消新四军番号,是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与国际外交方面之重大压力,是不能够停止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的这种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的。

我们党在这次事变发生之后,着重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来注视事件之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同时对国民党严正提出下列的条件: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月良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同时,因为新四军的军部既被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亦被国

民党宣布为“叛变”了，但它还有九万余人的部队，如果没有统率，对抗战是很不利的，有被日本和国民党消灭的危险。因此，重新由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了陈毅为新四军之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令其统率全军继续抗战，并避免为国民党所消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条件，特别是要驱逐政府当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停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方针，实行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中国内部团结和国共合作具有强固的基础。

自从我们党宣布这些条件和谈话之后，是获得了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竭力动员反共的舆论，强迫全国报纸登载解决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向国际宣传说：这是极平常的事，非严重问题；是简单军纪问题，而非政治党派问题；是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的谈话同样是以军纪问题来减弱事变的严重意义。但是，中国一切抗日的人们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广大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士，都认为国民党这种办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从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都对于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表示愤恨，认为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如内战，就要灭亡。许多青年学生职员工人，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有的流泪，有的苦闷，有的愤怒。有许多学校的进步学生，因失望和惧怕国民党特务的逮捕与谋害而纷纷逃走。

其他各个党派和中间派，对于国民党大失所望，都感觉到

有为实现民主、反对内战和争取团结而奋斗的必要。他们想发起一种民主联合运动，来抵抗国民党对于他们的压迫。这些党派和中间人士，从前很怕共产党采取过于强硬的政策，现在也赞成我党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这种无理的压迫。自然也有一些中间势力，看到我们采取强硬的政策与立场，而担心国共合作从此破裂，因而表示悲观动摇的。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队，他们看到这一次国民党消灭皖南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在抗战过程当中用各种方法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认为国民党中央将不许杂牌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存在，因而也不满意于国民党这样的办法。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行为，以及我党坚决公正的立场，引起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亲日派的何应钦，广西派的白崇禧等，虽然还主张要痛快地干一下，他们曾经命令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部积极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进攻，并且要傅作义、马鸿逵、胡宗南等部队作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布置，但国民党比较进步的元老和广大的国民党党员群众，对于国民党当局这次的干法，深深地表示不满。某些元老认识到何应钦这种干法是一种阴谋，并说：只有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国家大事才能够解决，对于这次事件表示非常愤慨和忧虑，恐怕因此要闹成国共两党的破裂。不少的国民党的老党员，都说这种办法是自取灭亡。至于许多国民党的党员，都担心恐怕因为这样而引起国共的破裂。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党务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感觉到国民党这次作得过火而表示恐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以及其他有名人士，联名致书蒋介石，指出何应钦亲

日派的阴谋，希望蒋介石不要为这些奸小所迷惑，而要悬崖勒马，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感觉到对抗战的前途失望，他们说，不论事情经过的始尾曲折如何，当局这种措置是绝对错误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从这些情形看来，可以知道，国民党内部还有许多人不满意于顽固派、亲日派这种干法的。

英美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和顽固派采取“反共”的政策是赞成的，但对于这次消灭皖南新四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取消其番号，也认为这种干法可能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內战，而不能达到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除少数的外交官员和某些反动的外国记者赞成国民党这种干法外，大多数的外国人，认为这次事件要直接影响中国抗战的前途。许多英美人士，要求其本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并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以免事件的继续扩大。他们说，中共军队如全部开往河北，国民党军队就会与日本军队划定缓冲的区域，如此就便于日本的南进。香港有一家英文《华南日报》之社论说，新四军之撤退区域，闻已被汪精卫军队占领。中共的力量早已被人公认为抗战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从哪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要求、希望及其远见，要比抱有封建观点的民族领袖强得多，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的内部纪律才行。

由于顽固派、亲日派这种挑拨大规模內战的行为，使英美怕国民党从此会走到完全投降日本。因此，美国对华的借款和中印的航空谈判听说都暂时停止了。传说英国大使曾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的冲突。英美方面对国民党表示说：中国为

了大局，中央处理问题不能够求之过急，以免迫成大的事变。苏联对于中国之抗日固然是支持和帮助的，但若国民党进行反动的国内战争，自然它不好帮助了。英美人士和他们的政府所采取的态度，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美国借款和中印航空谈判的暂时停止等，自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是一种压力。

这次顽固派和亲日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以及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只有日本和中国的伪政府汉奸表示兴高采烈。在江南新四军被大部消灭以后，南京举行庆祝大会，汪精卫在庆祝大会上说，蒋介石数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还不错，赞扬顽固派这种反共行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所采取的这种反共方针，自然是赞成的，它是希望国共两党内战起来，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想造成内战，以便好向日本讲妥协的价钱。但日本对于国民党的不能迅速投降屈服，也还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因此，日本正乘着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调动大军向华中深入的时候，突然由信阳、开封南北几路向汤恩伯集团举行扫荡。日本企图以这种军事扫荡行动来威胁国民党更迅速地向它投降。这次汤恩伯集团十几万人正由豫西通过平汉路向东开进，而被日军南北夹击扫荡，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使许多将官感到这次又上了何应钦的大当。

综合上面各种情况，这一次皖南事变发生，使亲日派、顽固派挑拨内战的阴谋计划，完全公开揭露出来。我们党正确而强硬的立场，英美以及苏联在外交上的对国民党的压力，广大人民和中间派对我们的同情和对国民党的愤慨，以及国

国民党内部在反共内战问题上意见的不一致，加上日本对河南的进攻，使得蒋介石和顽固派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境遇当中。

国民党顽固派想抓住我们惧怕内战的弱点，趁着今天国际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面，不去打击日本，而来各个击破我们，以达到他们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之目的。但是，我们党在这次事变以后，知道向国民党再退让，只有削弱抗日の中坚力量，增高顽固派、亲日派进攻的气焰，那就真会引导到国内团结的完全破裂，使政府当局无阻碍地投降日本。因此我们党采取坚决强硬的立场，表示国民党当局如果决心发动内战，那我们就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用自己的力量来击破反共军的进攻。只有用这种强硬的立场去求得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这一次的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才能制止内战的发展，保持统一战线和抗战的继续。我们党这一方针是为全国人民所拥护而且得到它的成效的。

顽固派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已经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传说国民党当局表示新四军可编入八路军成为一军，并提出延缓八路军北调的期限。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还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次皖南事变是由亲日派何应钦等所策动而被顽固派所采纳的。因此，我们坚持要国民党必须把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从政府机构中排除出去，必须停止国民党一贯的反共政策，撤销对于华中和边区的进攻部署，实行民主政治。只有答应这些基本条件，才能够真正解决这次皖南事变后所引起的国共关系问题，并且保证以后能够坚持抗战到底。

目前形势，我们虽然已经取得国内外广大的同情，可能逼

迫着顽固派不得不向我们作出某些让步，这次反共高潮有可能被我们击退，但国民党是否能够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条件，这还要看全国人民反抗这次事件以及外交压力的情况来决定。照目前的情况，它是还没有准备接受我们的基本条件的。

在国民党几年反共政策的过程当中，过去没有承认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而且调集大军包围我们边区。在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周围，经常集结大军二三十个师，修筑几道封锁线，并且还不断地骚扰我关中区，侵占边区的土地。目前对我们虽然还只是采取一种准备进攻的步骤，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如不最后停止反共和内战的方针，或当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利诱之下而迅速向日本投降屈服，那就随时可以向我们边区进攻的。因此，边区的党必须时刻警觉地注意时局之发展，同时必须加紧巩固边区的内部，努力办好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着一切的条件足以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这应当是边区党当前工作的基本方针。

按：此报告是二月十三日作的，距本刊出版已有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内，于三月一日到十一日开 过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我党曾决定 在国民党当局没有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前，共产党的代表不能出席这次参政会，并于三月二日又提出了一个临时办法十二条（见《今日新闻》），声明在 政府接受并得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由于国民党 没有接受，我们也就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国民党曾 御用这次会议作了一些反共宣传，但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这些干法和国际上种种压力的关系，在会议后，国民党当局向我们表示愿意和缓

两党尖锐对立的状态。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时局有继续拖下去的形势。

弼 时
三月十九日

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二月）

我们的会已经开了好多天，大家就大会提出的中心问题进行了讨论，今后就是下去传达与执行了。为了提起同志们注意，我再概括地讲一些问题。

第一，目前时局如何，蒋介石是否下了分裂的决心？

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是具有破裂的决心的。上次说过，自德意日三国同盟后，他就大举反共了，但他反共是有一定步骤的，皖南事变就是他大规模反共的开端。而事变以后，时局的发展与他原来的估计相反，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内部的不满，我们态度的强硬，外国的压力等，使蒋介石软了一步。因此时局有拖下去的可能，但这只是一种可能。

蒋介石为了使问题缩小，粉饰国内团结，证明皖南事变当真是“地方事件”，以便取得英美的援助，因此提出召开国民参政会。原定二月二十八日开会，现又改为三月一日。我们怎样呢？我们提出，如果十二个条件不得到圆满答复，参政会我们是不出席的。因此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在各种压力下面不得不让步。这是一。二是使他们以后

* 本文是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的又一次讲话，时间在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八日之间。

再不敢这样办，让它知道共产党不是好欺的。我们要在这样的政策下，求得抗战继续下去。

过去蒋介石抓我们怕破裂这一弱点，而我看，今天蒋介石因为与日本也有矛盾，他也是怕破裂的，所以我们的政治攻势是完全必要的，是坚持抗战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抗战中，革命力量一定会继续发展，而反动力量在这场战争当中，一定会被削弱的。今天的力量对比，国民党比我们还强些，到了我们共产党力量成为全国决定的因素时，那我们就可以阻止国民党中的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同时，我们可以逼它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专政。因此，拖下去倒还比较好，还是于我们有利的。但是也并不是说国民党会有很大让步，时局目前就会好转，因为好转归根到底决定于我们力量的增长。

在目前这样的局面下，蒋介石一定会更加依赖于英美，但也不就是加入英美集团。至于是否加入英美集团，那是要看英美与德意等国战争发展的前途而定。

第二，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说时局拖下去对我们有利，有好转可能，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我们的工作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我们的工作还是要放在最坏的即可能破裂的基础上，尽管蒋介石现在还没有作出最后的表示。不管时局将如何发展，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时局好转，它是我们的后方，把这个后方建设好，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假使全面破裂，那边区就更加重要了，我们党就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那时我们就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继续支

持抗战局面。当然，那时可能有大部分国民党的军队会到我们方面来，我们只消灭那少数的顽固派。假若这局面到来，我们的任务是何等重大呀！同志们，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时局的发展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同时要努力争取好转。为此，我们要防止和反对两种思想倾向：

一、认为关系闹得越坏越好。这在我们部队的个别同志中间当真有这种情绪。这种倾向不好，我们要反对，因为它违反我们党今天的基本方针。有的想要打过去。就是要打过去，我们也不是要恢复到苏维埃时代。我们还是要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二、惧怕内战。这种情绪容易在老百姓中间产生。它会妨害我们今天在边区进行必要的建设工作。我们要防止这种倾向。

不论时局或好或坏，我们的统战工作、建设工作仍是要继续坚持的。

我们认为，就是在时局坏转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赞成我们的。所以，统战工作十分重要。我们今天的统战工作，不但要继续保持过去结交的一些政治上的朋友，而且还要建立经济统战工作。我们需要外面的东西，外面也需要我们的东西，像我们的盐外面都要。在这贸易往来的关系上，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这工作做得好，也可以巩固我们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战。我们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要巩固边区，准备力量应付任何突然事变，就必须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为了做到这点，要大大发扬民主，彻底实施“三三制”。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任务之一。

我们实施民主的“三三制”，不仅在政权组织方面，执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规定，而且在政策方面，也要执行我们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上照顾抗日各阶层的利益。去年党的十二月指示中，有一项就是针对“三三制”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在这次选举后，真正建立起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

有些同志说，这次会议又是讨论“三三制”与经济建设的老问题。我认为同志们这样说法是很不妥当的，试问“三三制”今天我们做好了没有呢？我们是没有做好的。在党内少数同志中和党外都有很多阻力的。这原因是，中国人民缺乏民主传统教育与习惯，虽然基本上他们是要求民主的。因此，真正做好“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两者缺一不可，忽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像我们边区的参议会，要能够认真讨论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具体问题，人民才会拥护它。这就是说，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地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巩固我们边区政权的基础。因此，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同志们，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这是一个麻烦与细致的工作。如果这工作做得不好，老百姓还会脱离我们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边区的经济建设，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就是政府提出的为多收四十万石救国公粮而斗争。粮食生产一半靠天一半靠人，现在雪下了，其他就要

靠我们人的努力了。假使粮食生产增加了，那对巩固政权和改善人民生活都是有利的。当然在执行中间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就成为我们领导同志的中心工作。这里我附带提一提盐，今年我们准备运出六十万驮盐，可以收入一千二百万块钱。出产盐是不成问题的，就是交通运输成问题。这工作要靠我们政府和党去很好地组织。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要用先进的合理的办法做给老百姓看，起模范作用，推动群众干。这也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也需要同志们更加努力，来完成此计划。

第三，要改变我们的作风。

我们要完成上述的建设事业，就要求我们党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由比较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这方面来。我们过去是习惯于而且有经验做群众动员工作的，但对一点一滴的细密的经济建设工作，我们就不行了。同志们，建立工厂、医院，比到外面打游击要细致和麻烦得多。但是在过去，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经济建设和技术工作往往不愿做，而且看它不起，这是很要不得的。今天要进行经济建设，就要重视技术工作，不但要依靠外来的技术人才，而且要大量培养党内的技术人才。因此这一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一定要转变，当然我们已经有些地方在转变了。

细致的经济建设工作已经提到我们党面前来了，我们过去没有经验，因此今后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上级党部必须培养我们的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对经济建设工作，还需要我们有远大的眼光和长期的计划，可能开始时不会在短时期内看

到成绩，但我们不要怕这一点，我们要有决心，大胆地做。

这次提出乡村工作的讨论，是因为乡村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乡村工作做得不好，我们上边的工作就都落空了。陈正人同志的乡村工作报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许多新办法，这些都要同志们去认真地研究，下去后认真地干。在乡村工作中，不能妨碍老百姓的生产，这是第一个原则。因此，一定要把握住少发空论多做实事，反对没有内容而只有形式的各种小组，减少那些乱动员消耗老百姓劳动的做法，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 报告大纲

（一九四一年）

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然而这都不能超出一定的社会环境而孤立起来看。

四、我们中国共产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并且它本身都具有些什么特征？

1. 我们的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就是

* 这是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写的报告大纲，成文时间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中。这个社会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

2. 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原来在经济上多半是独立的、个人的、分散的，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他们便会把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

3. 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血统化了的无产阶级那样的集中和受过那样严格的锻炼。他们自身不是从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中脱胎出来的，便是刚从破产的小资产者中出身的。甚至自己是产业工人，但同时又与农村经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4. 因为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和任务的要求，无产阶级需要与各阶级合作，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党在它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决不是偶然的。显然地，在今天的环境中，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我党在二十年来的艰苦斗争中，一天一天地强大起来了，健壮起来了。它是经过长期锻炼的，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然而今天在党的某些组织中，某些党员身上，尚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情形和材料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了这些不良倾向和现象。

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严重的，存在着严重的危险。

那么，为了克服这些倾向和现象，为了增强党性的锻炼，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该在哪些方面修养呢？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不然便会成为盲从者。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

要使我们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成为自觉的、自动的和积极的，这首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因为缺乏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人，决不会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洞时，他的所谓忠实性和坚定性也会成为相对的东西。如果党员不能培养出自己对党的利益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那他的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一样会变为泡影的。

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对于这点，党的组织应负责教育党员，而党员自己则必须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锻炼。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

及党员对党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也同样是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并且这一切,都相互影响着,相互制约着,同时又相互促进着。

要具有阶级觉悟,要把握住阶级意识,决不是在口头上讲几句漂亮话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强烈的斗争过程。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为了具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为了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得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只有这样,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显然地,这不是一天或者几天之内所能做到的。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第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要“必须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对马列主义(即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无论在学习它的时候,或运用它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然而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 式

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同时，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 and 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我们已经讲过，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因此，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因为这些倾向是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的。“党只有当他自己的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统一的整个部队——由意志之统一、行动之统一、纪律之统一所团结之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底斗争和指引它走向一个共同目的。”

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倾向，是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是产生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的根源。若果不适时地制止它，不与它作斗争，让其发展下去的话，是会发展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的。

所以，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

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他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当斯大林同志讲到什么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时，曾经说过：“它（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中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底代表时，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底有组织的部队时，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显然地，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说，首先自己应该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所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

所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

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总而言之，今天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且应该对照这个决定中所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对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主要的要求：要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且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要即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果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要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这就是培养和锻炼增强党性的几个重要关键。

为什么要作出增强 党性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在党校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什么没有在遵义会议前提出来？在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的锻炼？我们说：过去在党内党性锻炼是一般地提出过，而不是把它当作特殊问题提出的。过去各地党校或训练班都有一门功课——党的建设，这就是党的教育和党性的锻炼；过去反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也是党性教育，是在实际斗争中间锻炼每个同志的党性。我们可以说过去的党性锻炼只是一般地提出来，没有把它当作特殊的问题提出来。

那么，为什么在去年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到底有什么必要和原因？我想，党中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首先，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又是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

* 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本文是报告的第一部分。

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使我们党发展壮大。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党今天是有武装的，而这个武装从党的历史上说是最大的，它有着五十万的军队。我们党在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种政权是在我们党领导下面的。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大的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现在国民党要决定是不是还继续抗战？它不能不顾及我们党的态度，不能不顾及我们党的力量。如果它投降日本，那么，我们党是不答应的，会出来反对的。我们的反对可以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并且可以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正因为我们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这样重要的决定因素，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为了对付我们党采用了许多办法。很明显的，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尽力想办法削弱我们，想利用我们某些党部和中央意见的不同，关系的不好，想拉拢我们那些党部，来分裂我们党。国民党曾想分裂八路军、新四军，想把新四军拉到他们那边，或者想造成我们的军队与党对立。它采取许多办法打进我们党部和八路军、新四军里面来收买我们的人，瓦解我们。日本也是一样。这说明，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的前面，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

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我们党在抗战以来和几年的统一战线当中，有了迅速的扩大，新成分涌进，已经由比较小的只有四五万人的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有八十万党员的党。这八十万党员里面有七十五万是新加入的，而且是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到共产党里面来的，成分相当复杂。新党员里面很多已经成为好的干部。但是，大批新党员今天很需要党更多的教育。同时，我们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被分成许多小块的地方坚持斗争，坚持长期的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我们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比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像文件里所举出来的那些倾向，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些情形也告诉我们党，今天更加需要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我们内部。我们党的任务是这样的重大，只有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

第三，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抗战过程当中的一些严重的事件和现象正向我们警告。

党的历史上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张国焘的叛党。同志们都知道，他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

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张国焘这种分裂党叛党的事件,我们已在党内进行了教育。党的六中全会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报告里所提出的党内团结的重要,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

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些重大的问题,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组织上闹独立性,还明显地表现在某些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与政权工作的同志中间。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工作部门特殊一些,做这工作的干部突出一些,不大愿意受党的政策的领导。这些都是抗战以后发生的事。这些现象就是告诉我们党应怎样保证自己的团结。

附带答复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党性强不强表现在哪个历史时期上,哪些地方上?”我想这个问题提法不大妥当。虽然我们说党在某个历史时期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如立三路线的错误,苏维埃后期的错误,但是不是说在这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党员,所有的干部都是党性不好呢?我想恐怕不能这样说。在路线错误的历史时期,使党的工作、使革命受到很

大的损失，那个时期的负责人，负责的机关，在那里领导，决定路线，决定政策，他们不是依据情况来决定的，是党性不好的。是不是在那个路线下工作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党性不好呢？那些党员干部为党的路线坚决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坚决奋斗、英勇牺牲的行动是好的，这样的同志我想不能说党性不好。我们应该估计到每个党员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所以说，那些同志的党性还是好的，只是某些机关具体负责的人党性不好，不能说那个历史时期党性完全没有。拿地区来分，说哪个根据地党性不好，也是不妥当的。任何地区都有党性不好的同志，某些具体的人党性特别差，但不能说那里所有的党员干部党性都不好。譬如张国焘自然是党性不好的，在中央没有指出张国焘路线错误以前，在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工作同志，党性都不好吗？不是的。因为当时那些同志是把张国焘看成中央的代表，把自己看成是为中央的路线而斗争的，我们不能说那些同志各个都是党性不好的。但当中央已经指出张国焘的路线是错误的以后，如果还坚持，那就不好了。我们也不能依地区来说山东的党或冀中的党党性不好，这是不妥当的。

为什么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就是我们看到了上面的一些原因：我们党是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我们党是处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已由小党成为大党；我们党的历史教训；统一战线中某些严重的事件。这许多情形使得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历史教训我们，党内要团结。为什么在遵义会议的时候不提出来呢？那时提出是比较困难的，过去血的教训没

有总结起来，而且在那样的战争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提出来也不能像今天在全党起这样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并在战争的环境中又发生了许多的事实，所以有特殊提出来的必要。

这个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组织问题，有的同志说是思想问题。我想就决定的本身来说，是组织问题又是思想问题。这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上面讲的一些客观的、主观的和历史的原因都告诉我们，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统一的集中的党，就不能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任务。今天特别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也就是为着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今天强调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这的确是偏重于组织上的问题，但又是思想上的问题。是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呢？我看是偏重于组织思想方面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党，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更加需要组织上的团结，而且从思想上告诉我们的同志今天党内团结特别重要，因此这这也是一个思想问题。我们党过去对思想方面的领导是不大重视的，甚至有时是忽视的，特别是遵义会以前的时期。自从去年五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后，中央政治局对于思想领导问题特别引起了注意。中央政治局在自己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这几项，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

从去年五月以后，注意整个党的思想方面的总结，研究了一些问题，党性问题就是在这许多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把它形成决议，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重要文件。在这一决定以后，中央又陆续发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主席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这些决定和报告都是解决思想问题，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联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而增强党性的决定则强调组织思想的问题，也就是这一决定的中心思想和中心内容。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对于我们党的建设起了什么作用？

首先，这个决定是总结了我们党二十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我党和资产阶级从合作到分裂，又从内战到合作抗战；二十年来，我党组织和领导了各种武装斗争，参加了北伐、内战和抗日战争。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生长起来的，这就是党在建设上表现特殊的地方。这个决定总结了这个过程当中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来巩固党的团结。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我们党的建设有其特别重要意义。

其次，这个决定发出后，对于全党是起了教育的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一些像过去那种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的现象，最近是没有看到了。这表现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统一了。在组织上也是一样，那些闹独立主义倾向的情形比较少了，能够把局部利益服从于党的整个利益，这表现了党的进步，表现了

党比过去更加统一巩固一些。就拿延安来说，去年八九月以前，许多事情要统一似乎还很困难，八百诸侯，你肯了他不肯，他愿意你不愿意，这学校 and 那学校合并也觉得困难，统筹统支很不容易办。在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事情比较好办了，许多事情比较统一，解决问题也比过去容易，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这些都说明了同志们在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进步。

第二，这个决定发出后，对这次的整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这个决定加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其他决定的发出，引起了全党对于思想问题的注意及思想方法的学习，展开了今天这样广大的全延安党的学习运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一文件，特别在整顿党风的学习中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

反对宗派主义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此，毛主席把反对宗派主义与反对主观主义同时提出来，这不是偶然的。

究竟什么叫宗派主义？替宗派主义下个完满的定义很困难，一般地说，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来去服从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这大体上就是一种宗派主义。换句话说，把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只注意到个人的和局部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形就可能形成宗派主义或者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

宗派主义的排外性，常常使有些同志表现出我们党是很高明的，看不起人家，仿佛只有我们党里面的人是最好的，最革命的，其他的人都赶不上我们，不配同我们在一起。这种排外性就形成我们党对外的关门主义，认为关着门自己搞革命就可以成功。宗派主义的排外性使我们党与基本群众——

* 这是任弼时所作关于增强党性报告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工人农民不亲近,与同情我们的人更不接近,跟他们隔离。我们的基本群众里面有许多进步的觉悟的分子,而宗派主义者不要他们加入到我们党内来,向他们关门,认为他们对于我们没有好处。这些人对基本群众的生活要求也不大关心,更不能为他们的要求去斗争。宗派主义者对于党外的同情革命者是轻视的态度,认为只有我们党才是革命的,其他阶层的人不一定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样就使我们党脱离我们的基本群众,拒绝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这种宗派主义者看问题是很主观的,他们对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实际形势,往往不愿意或者也不可能正确地去加以了解和分析。比如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深入东北,深入到许多地方,国内的阶级关系起了变化,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要求抗日,就是国民党里面也有要求抗日的,甚至有要求和我们联合抗日的。但是宗派主义者对这种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他们对于那些要求抗日的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觉得那些人是国民党的当局,是不革命的坏得很的危险分子,认为他们是以“左”的面目欺骗群众,是最危险的敌人。如福建事变的领导人,他们当时公开反对蒋介石,反对当时的政府,要同我们合作。可是我们错误的领导者却认为他们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虽然也和他们有来往,也办了交涉,但是没有真心诚意地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合作。结果福建事变失败了,使得蒋介石能够集中力量对我们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这些宗派主义者是不晓得应该如何去利用党外的力量,哪怕那些人是暂时的同盟者,或者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能同我们合作的,对他们统统采取了关门的拒绝的态度。像

这样的对外宗派主义的表现,在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相当浓厚。

现在我们党里这种对外的宗派主义,当然没有那个时候严重,但是仍然存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导机关和某些干部,在实行“三三制”这个政策当中,表现出不愿与党外人士合作,对党外人士惧怕,觉得开会时如有一两个党外人士参加,许多话就不好说,也就不痛快,因此就觉得有他们还不如没有他们好办事些。有些地方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也还不是诚恳的态度,对他们是另眼看待。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好像是摆摆样子,有职无权。他们提出的意见,本来是好的正确的可以采纳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采纳。有时候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应该同他们商量,可是有些同志就是没有这样做。因此党外人士对我们的“三三制”产生怀疑,或者开始相信,参加到里面后感到困难,做不了什么工作,又消极了。像这种不能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现象,在今天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政府机关和某些干部中间仍是严重的。这些同志还不了解“三三制”并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与党外人士认真合作。要使我们的同志知道,中国的事情同党外人士合作是办不好的,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是有好处的。比如,过去我们习惯于包办一切,因此有时对执行政策较马虎。对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大部分干部并不是真正深入了解,也不去好好研究。“三三制”政府里面的非党人士,他们对我们的施政纲领是重视的。他们看到我们做事不符合政纲,就提出意见。这对我们党的干部是有帮助的,能锻炼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党的政策,更加灵活地运用党的政策,更加细

致地办事，这对于我们是一种磨练。所以，我们必须肃清这种宗派主义的排外性。

宗派主义的排内性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的表现为本位主义，就是只注意自己工作的这一部门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有的表现为小团体主义，或少数人的小集团的活动。宗派主义的小集团多是由同乡、同学、同族的关系而形成的。如在某根据地有一个支部是一族包办，对其他族的人则排斥。有些是同学、同乡，甚至同在哪一国留学的，以这样一些关系结合起来的。还有一种表现则更厉害，闹同党对立的独立主义，闹反集中的分散主义，闹无原则的纠纷；有的甚至结合少数人公开违抗党的决议，公开与党的路线政策对立起来，成为政治上一种反党的派别活动。这样闹独立、闹派别的结果，造成党内无组织的状态，使党分成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闹这样一些宗派主义的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私自利，把部分利益同党的整体利益对立起来，有的还有政治上的企图。

宗派主义者在党内对于某些和他们主张不同的人，即所谓异己之见者，往往采取许多办法来对付人家。他们对于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首先是想办法利用他们，争取他们；如果不被利用，争取不到，就想办法打击他们，把这些同志在某些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夸大起来，说成是原则的路线错误，随便安一个什么机会主义的名字，然后来一个残酷斗争，进行无情的打击。宗派主义者对许多所谓异己的和同他们主张不一致的干部，虽然这些同志有很长的实际斗争经历，有

工作能力，但是如果不跟他们一道搞的时候，就要撤销他们的工作，打击他们，甚至于开除他们的党籍。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哪怕是思想意识不大正确的，没有工作能力的，哪怕是入党不久的，只要赞成他们的主张，奉承他们，和他们一道搞的，便可以一步登天地将其提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以巩固他们的派别，实现他们少数人的企图。这种宗派主义分子总想在党内利用各种可能爬得很高，甚至采取一些阴险的不正派的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办法，把党的权柄拿到自己手里来。这种情形在党的历史上是有过的，像张国焘，他在党内历来就是闹宗派主义的。他闹本位主义和独立主义，后来靠着枪杆子发展成军阀主义，公开反抗中央和分裂党。这是宗派主义的排内性最严重的表现和恶果了。

党内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是表现得很严重的，闹得党内很不正常，毁坏了党的许多原则。现在这种情形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是闹本位主义独立倾向，企图个人突出，同党对立起来的现象，在许多地方的某些同志当中还是相当多的。如果我们不认真注意克服和防止，在今天的斗争还是相当独立分散的局面下，在某些时候，在遇到某种更困难的情形时，各种宗派主义的倾向还是会生长和发展的，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怎样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呢？

闹宗派主义，闹得党内不团结，是党性不好、不纯良的表现。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是中国这个半封建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同时，我们党内对于党员的教育和锻炼不够，也是一个原因。关于社

会根源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讲演中已讲得很多,并且讲得很透彻。我们党对于一般党员,在理论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教育过去注意得不够,掌握思想领导很差。实际斗争对于一个人党性的培养有很大作用。有些干部参加实际斗争很少,在这方面锻炼也很不够。因此,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

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提出六条纠正各种违反党性的倾向的办法,最基本最主要的是第一条,即:“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这是增强党性的要求和目的,也是反对宗派主义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反对宗派主义,从加强党内教育方面来说,除了理论思想教育外,主要的是进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

我们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是按照列宁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我们的党是战斗的党。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今天是最团结最好的时期,是一个整体,但是也不能这样就满足了。我们党的成分,绝大多数不是来自无产阶级,而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有其他阶级出身的人。这些党员大多数是团结在党的路线和政策下,为党工作。但这些党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很浓厚,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现象在党内的表现还相当严重。我们党是一个大党,有

这样多的军队，又是领导政权的党，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干部去做。我们大部分干部虽然缺乏理论修养，但他们的党性是很好的。他们为了党的路线、政策不惜英勇牺牲，完成党的任务。但干部里也有少数人思想意识不好，有闹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个人突出的，也有为名、为利、为地位、为势力的。如果不很好地进行教育和锻炼，他们就会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在有军队、有政权的地方，利用自己的地位闹出许多不好的名堂来，就会闹得党内不团结。因此我们说，现在党内进行基本组织原则的教育，在全党党员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干部来说则更为重要。

要使我们党成为一个更加集中的整体的党，就要求干部党员首先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也就是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对于党应该是很忠诚的，要忠实于党的事业；要有组织观念，尊重组织，服从组织。党员也是有个性的，但要站在党的立场、服从党的利益下发展个人的个性。一个党员，当他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牺牲个人的利益。当自己的意见与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自己是错误的，应该迅速改正；如果自己是对的，为了不使组织分裂，也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对自己的意见暂时保留，所谓委曲求全就是这样的意思。个人对于党应当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话就讲，有话埋在肚里不讲出来也是不好的。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要使党员了解，组织已经决定了的就要服从，而且要绝对地服从。个人与党的关系的摆法就是这样。有些人从个人出发，过去他做的是重要的工作，现在要叫他做次要的工作，那他就不大痛快，只要上，不要下，这就表现

个人与党的关系没有摆正确。

其次，应该摆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党的整体的利益；局部是整体的局部，局部妨害了整体，整体便要吃亏。这是不用多解释的，大家都明白，但问题却随时可能发生。譬如，今天提出精兵简政的口号，一些不充实的部队要缩编，三个营改成了两个营，或把大团改成了小团。对群众团体，今天正在考虑把工农青妇各个团体合并。政府机构也须适合战争的环境，进行精简合并。在冀中某些地区，像过去那样摆一套是困难了。在战争的环境下，党政机构、民众团体必要时要和军队一道走，摆在那里不行了，只好在军队里挂一个名义来工作。某些区域、某些地方，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我们工作的方式也要随之改变，这样就要把许多的局部合并。如果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摆不正确，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不了解战争的环境需要这样做，不愿意改变，我们精兵简政的政策便不能贯彻，对于抗战便有妨害。又如，延安要实行统筹统支，下面生产的东西必须交上来，有计划的分配。如果闹本位主义，只看到局部的利益，上面要交，下面隐瞒，统筹统支便没有办法。只注意局部利益，往往妨害了整个政策的实行。所以要使干部打破局部观念、本位主义，消除了这种思想，才可以消除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局部观念消除了，以后要发展到独立主义便困难了。

还有，上下级的关系也要摆正。这一点大家也是清楚的。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今天是战争环境，要更加强调集中，和平的环境下，民主可以扩大些。今天的环境要求加强集中，集中才好办事。如果每件事都要开一个会，讨论一

番，再决定通知，往往来不及了。今天要更快更灵活一些，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可以少吃亏，这个道理很清楚。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又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纪律，在六中全会上虽已提出，但是不是大家都照这样办事了呢？我看还不是的。现在要把这个原则在党内特别是在干部中进行充分的教育。这对于党性的锻炼，消除独立主义或独立倾向，从组织上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是很重要的。组织的统一要靠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如果我们的同志都能把个人与党、下级与上级、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摆正确，便可以保证政策的贯彻实现。

我们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在思想上还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概念：党的组织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许多闹独立性、闹宗派主义的人对此常常不清楚。从事政府工作的少数同志，对上级的党还可以，对同级的党便看不起；某些群众团体的个别同志，强调自己的工作特殊，向党闹独立。这些都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其他的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合作社和工农青 妇群众团体都在内。过去华北根据地是军队开辟的，开始的时候地方党很弱，甚至没有党的组织，是靠军队帮助建立起来的。现在华北根据地党的领导慢慢健全起来了，要建立和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这就要把有威信的人选到党的机关中去，要想办法使政府、军队、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参加党委，要使有威信的，懂得党务、军事、政治各方面工作的，有理论修养和能力强的人在党委负责。这样，便可以保证每一个地区

的党委，成为这个区域的最高领导中心。

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纪律教育十分重要，中央的决定中也指出了这一条。我们对党内不正确的倾向要加以纠正，说月良解释，开展斗争；对干部的错误思想的纠正应该抓得很紧，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组织不应该随便给一个同志作结论，但对于错误倾向的纠正和斗争应该是不客气的。如果经过了说服教育，有些人硬是不改，党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加以纪律制裁。如果有些负主要责任的干部在思想意识上、团结干部上有严重的毛病，是否应该继续做领导工作，或是撤销他的职务，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高级干部的思想上有问题，闹宗派主义，党发现了他的原则错误，更要和他讲清楚。如果他承认了错误，完全改变了，不是两面派的态度，并保证以后不再犯，还可以做领导工作。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不彻底承认他的错误，多少有两面派的态度，我看这样的干部在独立的区域里做领导工作，大体上是不大适宜的。

总之，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在党内普遍地进行这一教育，把这许多观念搞清楚，可以克服和防止闹独立性、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这在一般党员中是很重要的，在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更加重要。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了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党中央所发布的“九一决定”，就是要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中央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里面，像这样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没有普遍地完满地建立起来，党政军民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比如有某种部门工作向党闹独立性的，有下级向上级闹独立性的，有某些个别同志对于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的。这些情形，如果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对于我们坚持抗战以及进行根据地建设，都会有很大的妨碍的。

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比如，在军队方面，对于党的尊重是不

*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和工作。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演。本文及《向贺龙同志学习》、《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两文，都是这个讲演的一部分。

够的，自以为与党是平列的，甚至觉得比党还要高一些、大一些，认为自己是中央的军队，就不把自己的工作时常提到西北局去讨论，对边区党的决议也没有认真去执行。在政府工作方面，前一个时期，有某些政府里面工作的同志对西北局的决定不很尊重，没有认真按照决定办事，如发票子、运盐等问题，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在群众团体方面，曾经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向西北局闹独立性，走到“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这次大会中有个同志指出，除了政府以外，青年都单独有一套，如青年农场、青年运输站、青年商店、青年食堂和青年武装等等。而究其实际，边区青联又何尝不是青年政府呢！政府管不到，党也管不到，公开向党要求尊重青年运动的独立性（并不仅是青年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甚至在青年的会议上对党表示反抗，闹得多么严重！西北局向这种青年运动中闹独立性的倾向曾经作了斗争，严正地指出了它的错误，以后的情形是改善了许多。此外，在党部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党部，它知道成立了西北局，就不仅是领导边区内党的工作，还要领导整个西北范围内党的工作，而它觉得西北局的成分，似乎没有能力来领导友区内党的工作。这些不尊重西北局领导，向西北局闹独立性的事实，就不能不给边区工作以很大的损害。这次会议中，大家揭发了这些现象，分析了这些现象，一致认为它不只是简单的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党的决定而已，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某些同志在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党的认识上，有着原则上的差别。这就是说，边区党内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

在某些同志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同志们，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因此，我们今后要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就必须揭发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克服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我们的大会，在这方面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一 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

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就是对党的认识是模糊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央“九一决定”都指出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在我们边区说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党的领导机关——西北局，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政府、军队、各种群众团体、合作社和学校等。这是就党与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而说的。至于在党内关系上，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自然，这个集中制又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这样一个党的最高原则，我们的某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是否真正的了解它，奉行它呢？事实证明，某些干部并没有真正了解它，他们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党是阶

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西北局是边区的领导核心。相反的，他们把自己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看成为与党是并立的，平行的，甚至是高于党的，似乎没有“责任”一定要接受西北局的领导，似乎没有“责任”一定要按照西北局所决定的一切政策去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地”去进行他们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

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对党的地位与作用有一种不正确的见解。他们怀疑党的主张与政策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尽管是最革命的最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总不能说党的主张全等于人民的主张。也有同志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只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那里有没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那里政权中多几个党员或少几个党员，都是无关重要的。也有同志认为，如果某一政党在政权机构中占优势，就等于某党独霸了政权，因而我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就不必要有优势。也有同志认为，对于政府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它们所执行的政策与进行的工作，党没有事先研究讨论与决定的必要。他们把党对这些组织的领导作用，看做了党的包办。同志们，把这许多观念联结起来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如何否定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最高原则，如何取消了党的领导作用。

我们说，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利益，又是与全民族解放

的利益一致的。比如，我们党今天所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社会政策，像减租减息又要缴租缴息，像改善工人待遇又要资本家可以赚钱牟利，以及前年西北局所发布的“五一施政纲领”，这许多主张和政策，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意见，是不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呢？我们应该给以肯定的答复：是的。我们的这些具体政策，都是从照顾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同时也照顾了少数地主资本家的利益；照顾了现在也照顾了将来的。因此，笼统地提出党的主张不全等于人民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主观主义者不根据具体情况，不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经验而提出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张，是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党内是曾经发生过的，恐怕今天某些个别工作部门也还会存在着的，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应有的现象，是一种特殊的“例外”，不能从这些“例外”的情形而做出一般的结论，说什么党的主张不全等于人民的主张的论调。

由于这种模糊的认识，自然会产生忽视或者否认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作用这个错误思想，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党没有取得优势的必要。我们提出了政权的“三三制”，提出了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的数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有时

超过了还要退出，另选非党人士补充，这个办法是正确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党在政权中不要有政治上的优势；相反的，只有保持党的政治优势，才能够保障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巩固这种领导。我们所说的“三三制”，是除了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外，其他三分之二，要保证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人民中的进步分子（赞成抗战与民主）和中间分子（赞成抗战，对民主也不坚决反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政治优势。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三三制”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因此有个别地方，把一些很坏的人随随便便请到“三三制”政权里来凑数。这样，党的政治优势就会要丧失，党的领导作用也就会被取消。

由于这种忽视或否认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作用，就可能产生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有无党员和党的组织是无关重要的错误思想，这是一种取消党的变相说法。在我们看来，每一个乡，每一个行政村里，有很好的党员，有党的小组和支部，就更可能保证党的主张的实现，以及政府法令的贯彻执行。由于忽视党对政权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就可能产生政府的政策和设施不必经过党去研究、讨论与决定的错误思想。我们知道，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这些革命组织（如政权、群众团体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说，党的主张与政策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来实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些革命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和所进行的工作，党必须加以研究、讨论和决定，以负起领导的作用。自然，这种决定并不是直接命令这

些组织里的工作者去执行，而是经过这些组织里面的党员的活动以达到目的。如果这些组织里大多数人不能同意党的主张，那么，党是不能命令它的，应当尊重这些组织的民主集中的原则，仍须采取民主的决定。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里的党员，在其组织内部，仍然必须努力解释党的主张的正确性，继续争取其组织能够接受党的主张，因为党员应该绝对服从党的决定，这是一个党内纪律的问题，“九一决定”中已经规定了。这种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依靠党员活动的积极性而产生的党的领导作用，决不能称之为包办。什么才是包办？就是事无论大小，党都要去干涉，比如征公粮的时候，乡村支部里秘密的决定了那个派多少，这个派多少一类的事情，这是要不得的，它是有弊无利的，我们应该反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包办而认为党的正确领导也与包办无异，一直走向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

抱有上述错误认识和思想的同志，自然就不会尊重党的领导，自然要向党和党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这是由于缺少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产生的。这种思想上对党的模糊认识，就会妨害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的建立，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二 对边区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

还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就是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我们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虽

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一般说来，它早已是民主的政权，是中国最进步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已经直接参加政权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又是为人民办事的，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因为边区占一半人口的地区里曾经实行过土地革命，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田可耕，而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里正在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改善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因为边区人民已经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一直到组织人民武装的自由。像这样的政治，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政治。但是有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认为边区的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的政治，离开人民自己作主的境地还很远，似乎现在的政府，并不是由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种“治者”。这种估计是不合事实的，它与党的估计是有原则的差别的。

说边区政治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并没有否认它在形式上、内容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比如说，被选到政府中的人员，有些还不是选举得很好，还不能真正替人民办事。也有个别的人员，本来是工人农民出身，但他被选到政府机关中以后，并不真正为群众谋利益，反而沾染上了统治阶级的剥削意识，利用其地位以剥削与欺压老百姓。也还有个别的反共特务分子钻进了政权机关里，利用时机以进行一些破坏与暗害工作。这些人都需要从政权机关中清洗出去。其次，某些地区的下层政权还被地主阶级把持着，减租减息也没有认真执行；那里党的组织力量还很薄弱，群众的斗争热情还没

有被鼓舞起来。对这些地区的政权及其所执行的政策，必须加以改造，必须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来加以改造。最后，政权机关里的一个比较普遍严重的缺点，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兴风作浪。这次精兵简政中的最后一条，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斗争去克服它。我们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因之各级政权在一定期间的改选，自然是必要的。这便是我们对边区政治所应有的认识与估计。

认为边区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政治的同志，他们确实是看到了上述边区政治中的一些缺点，深恶痛绝，而想要改正这些缺点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和边区政治的本质区别开来，没有把这些缺点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反而被这些不好的现象，或者在个别地方发展得很严重的不良现象所蒙蔽，把它扩大起来，就认为边区政治距离民主政治还有天远。这种不合乎真象的说话，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它适投反对边区政治者之所好。

这些同志既然否认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就大大提倡“不断选举”论，似乎民主的主要内容就是选举，似乎不断选举就是改进边区政治与保卫边区的唯一法宝。在他们看来，边区之所以有力量自卫，日寇与反共分子不敢来摧毁边区，就是因为边区真正进行了“不断选举”似的，这是如何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呀！他们没有看到不满意革命的民主政权的人们，正在利用“不断选举”来企图改造边区政权，以求适合于他

们的利益与要求。不仅如此，他们根本不了解边区的民主主义不仅限于选举，尤其重要的，在于选出的政府真正能为人民大众办事情，谋利益。在他们眼里，只看到了一个选举，而不知选举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

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同志，认为今天边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选举。请看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指示信里所说的吧：“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同志们，这两个“等于”不晓得把好多党员及革命群众都送进“不要革命”的营盘里了。在“选举第一”论者看来，选举就是一切，边区之所以能够保卫，能够巩固，能够发展，并不是由于我们有能够打仗的军队，并不是由于边区老百姓的努力生产建设，并不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而只是由于“不断选举”的结果。存在着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自然不去注意研究边区党的各项建设政策，不去注意组织边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和军事建设等工作。

同志们，必须认识，今天边区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选举第一”，而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这就是说，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如果有人问，在边区党和政府最中心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答复应当是：如何组织每户每人的劳

动生产,定出他们的生产计划,使男女老幼都来参加生产事业;如何组织变工队,使有劳动力者,缺少劳动力者,或是缺少耕牛的农民,互相调剂他们的劳动力,使每一个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发扬互相帮助的精神;如何组织合作社,使所有合作社的每一个社员,都能像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社员一样地享受一定的权力和许多实际的利益;如何组织运输合作社,合理地使用民间的运输力量,把“三边”的食盐运销到边区以外去;如何组织妇女纺纱小组,使妇女在纺纱中能获得一些经济权益,更加改进她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如何移民开荒,兴修水利,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如何发展植棉、纺纱、畜牧、养蚕等事业,使人民可以获得廉价的布匹以解决被服问题;如何改进学校教育,使乡村儿童乐于读书,并逐渐消灭文盲。所有这些 都是今天急于要做的工作,党和政府要善于组织这些事业,各级政府与参议会要经常讨论这些问题,订出具体的计划,认真执行,并按期检查,和全边区的老百姓一起来办好这许多事情,这就是边区民主政治的实质。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

由于对边区今天的民主政治的中心内容认识之不一致,就产生政策上的分歧。“选举第一”论者认为边区的中心工作就是选举、选举、不断的选举,使之与党所提出的生产建

设的中心任务相对立，要求党和政府以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办选举，而把生产建设事业这个中心任务放在一边，不去过问。对西北局关于生产建设一类的决议，不去详细研究和讨论，不想出具体执行的办法，而采取消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对民主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对现行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也必然要造成不尊重党和闹独立性的恶果。

三 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

再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发生在某些军事工作的干部中，就是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是模糊的。由于这种模糊的认识，就产生了一种军阀主义的倾向。

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是人民当中比较觉悟的分子所组成的，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它对敌人是毫不留情的，是需要霸道主义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杀死敌人，以求自己的胜利。但是它对于人民就不应该霸道，而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对于地方党与革命的政权，应该是尊重的，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批评。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老百姓依靠军队来保持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既得的果实，军队也必须依靠老百姓才能

生存、巩固与发展。因此我们党自有武装以来，从很小的游击队到大规模的红军兵团，以及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与老百姓及地方的党政机关建立着亲密的联系。我们时常把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比做鱼与水的关系，就是说鱼没有水不能生存，军队没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其另一表现，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打成一片。指挥员经常关心战斗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战斗员也是自觉地参加部队，自觉地服从指挥员的行政和作战的指挥。因此指挥员和战斗员共甘苦，同患难，衷心地团结一致，没有什么隔膜，绝不像军阀部队中那样上下隔膜甚至是互相仇视的官兵关系。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就是因为在在我们军队内部，建立了优良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不断地加强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一般指战员的觉悟程度，使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在战斗中成为英勇坚决的战士，而且还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我们的军队是有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机关和部队中的党，有其极高度的政治威信。

同志们，我们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虽然一般地还保持着过去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队中，产生着一些严重的现象，它对于过去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和摧毁的作用，这种现象，就是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倾向，但它却在发展着，我们必

须努力克服它，防止它发展，然后才能巩固我们的部队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当然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只是一种倾向，还没有成为军阀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军阀主义的体系。但是如果任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张国焘主义就是发展到最高峰的军阀主义，他利用党的武装力量，公开反对党，分裂党，因此值得我们警惕！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他们要想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若要调动他部队中的人员或干部，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自己离开原来的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在对党的关系来说，往往是利用他在部队中的地位与势力和党对立起来，在他的脑筋中，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样他就会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对党的政策不研究，更不必说去坚决执行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某些部队内，干部和士兵之间的关系，较之红军时代，起了一种变化。今天的留守兵团中，一般地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关系比之红军时代，恐怕要差一些。某些部队中的某些指挥员，产生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他们破坏了革命军队过去所建立的各种严格的优良的制度，甚至于浪费和贪污的也有。这种人的思想和品质是在逐渐蜕化着，他们已经不会真正去照顾士兵的生活问题，已经有着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即使有时对士兵实行打骂，他们也认为算不

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些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从正确的原则关系变而为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瞒上欺下，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却起着一种腐蚀和瓦解革命军队的作用。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之松懈与削弱，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也日渐降低。对部队中所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不去作积极的斗争和纠正，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这样就使一些不良倾向更加滋长，如嫖、赌、贪污、逃亡的现象，在某些部队中相当严重。有几个人集体贪污的，有花费十几万元开赌场的，逃亡的数目也相当大，几年来干部逃亡的也不少！在这些不良倾向较为严重的个别部队中，是邪气胜于正气的。同志们，这种不良倾向还不够严重吗？这不是说明革命军队的纪律松弛了吗？这不是说明部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是被削弱了吗？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种不良倾向较严重的个别部队里，简直是没有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地位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较之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一般地说，是差了一些。军队照顾人民的利益和帮助老百姓做事是不够的，而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发生得相当多。军队遵守政府法令的精神不够，而破坏政府法令的现象却不少，比如私用法币，包庇走私，偷漏税收等。甚至有人这样说：“有政策就是有违反政策的，有纪律就是有破坏纪律的，不然个个都是布尔什维克，哪儿还有开除党籍的人？”同志们，这就是他们“坦白的”说出了他们对

党和党的政策所采取的态度！军队中有些干部骂政府，甚至骂到边区政府的头上。他们对政府的一切法令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的。无怪乎有人这样说：“政府的法令，只能够拥护，不能够执行！”这便是某些部队对人民、对政府采取军阀主义倾向的结果。至于过去政府对军队的照顾不够，优抗工作也做得不够，这也是事实，在这里我不打算来谈它了。

以上种种，都证明在留守兵团的某些部队中，是生长和发育着一种军阀主义倾向的。自然我们还不能说在留守兵团里已经有了严重的军阀主义路线，也不是说我们军队的本质是差的。相反的，我们军队的本质是很好的，基本上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和战士都是经过长期的战斗生活的；在有一些部队中，是很少或者是没有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的。而且几年来留守兵团是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并且在经济的自给自足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解决了许多困难，这许多成绩是值得表扬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产生，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严重地提出这个问题，不想办法去克服它，任其自流地发展下去，那是可以使我们的军队逐渐变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说，某些个别的干部，在这种倾向的滋长中，是已经开始起着质的变化了。

产生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客观上军队的地位很重要。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今天我们是处在民族抗战的战争环境中，军队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样就使某些军事工作干部，主观上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以为自己了不起，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高，似乎他真有了了不起的本领，天下都是他打出

来的,甚至党和政府都是他一手创造的。另一方面,在长期统一战线与和平环境中,有些干部失掉了警惕性,反而沾染了中国社会中的军阀主义的恶习,忘掉了自己是革命军人,模糊了对革命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认识。此外,在几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各部队自己进行生产,又由自己来分配,使过去严格的供给制度破坏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多用一点似乎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引起了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起了变化,跌入浪费、享乐和贪污的泥坑。但是,这里必须严重地指出产生军阀主义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留守兵团的最高级领导机关不但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并向之作积极的必要的思想斗争,反而他们自己本身也存在有这种倾向,把军队看得比党还要大,不尊重党,向党闹独立性。当中央军委派考察团到留守部队去考察工作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这样他们自然就不能很好地积极地在部队中进行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领导工作。今天我们的党,提出了思想上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党为中心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

四 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

上面我讲了三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即有某些同志对党的认识上,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上,对革命军队的认识上的许多模糊或错误的观念。同志们,边区党所执行的总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是正确的,但在对于以上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及

认识问题的方法上，有某些同志还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分歧，还产生一些偏向或倾向，还不能完全一致。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是夹杂在政府的领导思想当中的。它虽然在政府的领导思想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但它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是有某种程度的妨害的。在政府工作的同志中，还有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如林伯渠同志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对于边区所处的战争环境的认识问题，对于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认识问题等。在留守兵团的领导思想中，也还有对于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建设根据地问题，存在着与党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这在贺龙同志的整军报告中已经指出了。在过去青年运动中的“青年主义”和“第二党”的倾向，文化工作者中的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某些专门家在边区建设方针上的意见不一，这许许多多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偏向，都在这次高干会中揭发了出来，以求党内思想的统一，以奠定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牢固基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这次高干会上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底地揭发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无法建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法执行，无法贯彻到底。因此，这次高干会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许多现象里兜圈子，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边区的党，在思想上奠定了领导一元化的基础。我想，这次会议以后，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

化领导,在边区应该是能够很巩固地建立起来的。

今后西北局的领导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思想上的领导,继续这次高干会着重检讨思想问题的精神,更加努力地达到西北党在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克服存在着的和可能生长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这是第一个业务。其次要抓紧当前边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并注意干部的学习领导,用全力研究与掌握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的各项政策,以指导全西北党政军民各种工作,并组织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

西北局以下的各级党政军民关系,也要建立健全的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今后各级党委的任务是更加重大了。边区党各级的干部,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西北局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局的决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向贺龙同志学习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后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过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而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立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对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这说明了他是对党忠诚的，是反对军阀主义的。他最近时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恐怕只有对老婆的爱情才是属于私人的吧；但是当必要时，当党的工作需要而调走自己的老婆

时，自己还要服从这个调动。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对于党所赋予的任务，或者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情，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这样，当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使你感到有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存在着，就会增加你的胜利的信心。

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一 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

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对于领导战争动员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熟练的。每一个动员任务来到的时候，不管怎么困难，都能迅速地突击式地完成它。但是从整个边区的工作看来，除开延安、靖边、清涧、陇东一些地区或者还有一些地方之外，许多地方的情形是：在一次动员任务完成之后，便感到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或继续做第二件动员工作，似乎是除了动员以外，就没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样子；或者是不管什么性质的工作，缴公粮也好，运盐也好，组织冬学也好，办合作社也好，既不区别哪些是取之于民的，哪些是帮助老百姓或给予老百姓以利益的，又不分辨哪些是临时性的工作，哪些是经常性的工作，一律当做动员工作来看待，一律采取动员工作的方式去办理。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了我们边区许多地方的工作，还是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是动员工作的方式代替了一切其他的方式。这种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

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两相比较，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自然没有从前那样亲密。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造成这种情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变化了，任务也变化了，而我们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还没有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我们的领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法，这就需要我们今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

这几年来，我们边区所处的环境有些什么特点呢？一方面是我们面对着战争，全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敌人与我们隔河相望，而在我们的周围又有几十万数目的友军，时有向我们闹磨擦的威胁。这样就使我们不能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以求保卫边区的人民和边区的人民政权。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处在一种和平的环境，边区是一个前线的后方，敌人虽然对我们有空袭，有隔河炮击，但它的兽蹄还没有和无力踏进边区里来。抗战以来，国共之间的武装斗争已经停止，虽间或有过武装磨擦，但并未破裂两党的抗日合作。这样的和平环境，对于边区是有利的。战争也是为着求得和平。华北、华中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经常遭受敌人的反复“扫荡”，遭受敌人“三光”政策的破坏，那种情形在边区是没有的。同时，就今天国共两党关系的形势看来，也可能走向好转，大规模的磨擦战争大体上也不会发生。因此，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

同志们，我们应当怎样建设，应当建设些什么呢？边区

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遗产太不丰富了，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因而我们不能妄想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样样都作好，样样做模范，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小学到大学，从托儿所到养老院，像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我们应当从可能和需要出发，应当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在今天说来，最可能与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列宁曾经教导过我们：“仅仅一般的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徒，共产主义的信徒那是不够的……需要在每一个时期里，找出这样一个特别的环节，对这个环节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把它抓住，以便握住整个链子。并巩固的准备过渡到以下一个环节”。在边区，在和平局势下，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发展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中，尤以发展公私农业生产为中心。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这就是说，只有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起来；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问题；才能给我们以物质的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养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胜利开展的局面。同志们，应该认识边区今天的斗争任务，比较处在敌后的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前进了一步。那里是战争的环境，中心的任务是战争，是打开局面，击破敌人的“扫

荡”。而边区已经是有了比较完整而且巩固的和平的地区，斗争的任务也就前进了一步。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和斗争的需要，在民主和建设上，今天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这不仅可以给予将来也要进入和平环境，也要以建设任务为中心的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以榜样，使他们少走摸索的曲折的道路，而且这些办法与经验，也可供大后方经济建设事业以参考。这样，加强边区对全国的影响，提高边区在全国的地位，便不致于流为空谈。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过去对于经济建设事业的努力程度如何。我们说是作了一些工作，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应该自我批评地说，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还不善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真正抓紧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时常听到有些同志这样讲，工作非常多，指示也不少，但似乎没有一种带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虽然党中央和西北局老早已经提出发展边区经济的积极方针，指出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有许多同志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就妨害了这个方针的贯彻。比如在军队方面有了“打出去”的不正确的想法，自然不会积极地来建设边区。大会上已经批评了军队方面对边区经济建设消极的错误。但地方党政方面，对经济建设工作是否可以说已经是足够的注意了？照我看，同样是注意得不够的。产生这种放松经济建设工作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九三九年之前，边区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依靠外援解决的，忽略了从经济建设中解决自己困

难的任务。另一方面，两次的反共高潮，边境上的磨擦战争，以及反共军队可能进攻边区的威胁，也妨碍了我们作长期打算，积极地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而最基本的原因，是军队也好，党政机关也好，对于生产建设的重要性之认识是不够明确的。大家还没有深刻地了解，在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正因为这个真理未被全党同志所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才被忽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才未被抓紧。只有某些区域的党政机关（如延安、靖边、陇东的某些地方等）和某些部队（如三五九旅、保安部队、警备一旅的第一团）真正抓紧了经济建设工作，作出了很多成绩，探寻出一些生产建设的规律，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经济建设事业的方针。如果边区的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干部，及时地认识了新环境下的中心任务，及时地抓紧这一中心环节，以全副精力来进行生产建设，那么，我们边区的生产会更加发展，自力更生的基础会培植得更加巩固，边区的地位和影响会较今天更加提高和扩大。假使地方党政机关，都能像延安一样，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解决生产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移民开荒、劳动互助、妇女纺织、合作社等，那么全边区的人口会比今天更加增多，边区人民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加富裕。假设边区部队都能像三五九旅等

努力生产建设的部队一样地去开荒种地，合理地组织战士进行生产，那么各部队也必然具有比今天更雄厚可靠的经济基础，也必然会减少更多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错过了一些时机，如果我们能早加注意，我们的成绩和收获是较今天更多更大的。这次高干会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经济建设事业，使大家认识了经济建设是当前边区工作任务的中心环节，了解了今后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这样就扫清了许多对于中心任务，对于建设方针的模糊认识。

同志们，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和平环境的建设工作和战争环境的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进行的方式也就不同。过去的老一套方法，在今天和平建设任务之下是不适用或很少能适用的。内战时期，陕北是处于一种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心工作是组织队伍，进行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群众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打土豪、分田地在当时是为他们谋利益的，群众就比较容易发动起来。在那种战争环境当中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动员人民参加游击队，并要他们帮助军队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兵，打扫战场。那个时候所建立的临时政权，因为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也没有好多的建设工作可做，粮食和经费主要是从打土豪得来的，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分配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帮助军队进行动员工作，或者可能从事一点文化建设的工作。总之，那个时候的工作，是一切适合于战争的需要，我们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一套作法，已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掌握了许多规律。但是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作法，

却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凡事起头难”,经过一阵摸索之后,才会逐渐发现一些规律。比如许多机关所办的工厂,大体上都是先赔本的,因为赔本,才加以改进,随后才进入获利时期,其原因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办工厂的经验。我们往往用建设军队或建设机关的方式来建设工厂,用了一大堆不从事生产的工作人员,如厂长、副厂长、指导员、管理员、采买员、勤务员等等一大套,应有尽有,比直接参加生产的人还要多。或者是把都市中大工厂的设备应用到我们的小规模生产里来,致使成本过大。或者是强调自觉遵守纪律,反对严格管理,致使劳动纪律松弛。赔了本,受了教训,才会想方法改进,逐渐使其走向正轨。再如办合作社,起初是简单地、机械地按照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规章办事,办得群众都不愿意参加,卖的东西也不比商店便宜,使许多合作社遭受失败,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不断的改进,才发现了真正合乎群众需要的像南区合作社那样的形式,它是与南区人民血肉相关的深受群众爱护的很重要的经济事业机关。其他如修水利、开荒、移民、运盐、纺纱、国民教育等,都是经过了摸索或失败的过程的。在军队方面,情形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建立了战争时期的一套制度和工作方法,但是对于和平驻军时期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没有经验。几年来留守部队虽然有某些部分或某些工作,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工作规律,但整套的适应新环境的工作方法,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由此可见,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在边区,

经常性的建设工作的传统和作风，还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来，而只是在少数地方如延安、靖边、陇东某些地方逐渐培养出这种新的工作作风，但还是不够完整的。从整个边区看来，还是处在由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转变到普遍建立建设工作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过渡阶段当中。但是在上述少数区域以内，已经创造出一些适合和平建设环境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必须传布到全边区去，为大家所学习，并加以发扬。今天某些干部在工作中感到苦闷的原因，就是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以建设为主的工作环境，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感到“棘手”，感到办法少，这也说明了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必要。

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这种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的独立解决问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同于闹独立性。我们不要因为反对闹独立性而走入另一偏向，就是妨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同志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下，按照具体情况，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发展。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现象。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只要这件事情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建设的利益的。在发扬这种独立工作的能力，发扬这种创造性时，应该注意

的是，必须打破公式主义，不要像过去办合作社一样，使群众觉得与己无关，甚而是一种负担。打破公式主义，就是要我们尽量运用群众习惯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比如不用劳动互助社的新名词，免得老百姓不懂、害怕，以为又是向他们要东西的新花样，而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变工队、扎工队一类的形式而加以改进，使它们实际上成为劳动互助社的性质。其次就是善于在事业的进行中，很好地组织人民的力量。要改造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办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像南区合作社所进行的业务那样，如代缴公粮，老百姓既可免去麻烦，又可作为股金，自然是非常满意。这样，合作社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它在群众中的信用更加提高，它的业务也就可以更加发展。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二 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

在领导作风问题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限制他们对于问题的了解，也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

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

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并没有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些党部对上级发来的书面指示,也不正式提到会议上去讨论,只是由党委的一两个负责同志看过一遍,就关在箱子里,置诸高阁,时间久了,决定的内容已经忘却了,更谈不到研究当地的情况,定出具体执行的办法了。比如边区经济建设问题,西北局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已经作了决定,送发到各个地方。那个决定里,一般说来,是正确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建设任务,指出了发展生产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但这个决定并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部的注意,或许有些党部根本没有讨论它,或许有些党部随随便便讨论一下,致使大家还没有把经济建设看做自己的中心工作。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这样,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本来是与群众有利的,群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使群众不满。比如过去办合作社、办学校等,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毛病。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有了一个计划也是摆样子的,不去组织执行,更不去按期检查执行的程度,而一味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东也计划,西也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这就是固临县委组织部长说的“在桌子上跳舞”,因为他只是在办

公桌上写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不可以行通以及如何才能行通。军队里也有“计划多、报告多、工作少、麻烦多”的现象。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在我们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里，还有这样的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也正如固临县委组织部长所说的，这些人“脑子里装满了法币”，因此就可以贪污，可以作恶，可以无法无天。

同志们，像这种官僚主义倾向的坏作风，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像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的新的工作作风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这次高干会总结了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明确地规定了生产与教育是目前边区的两大任务，而经济建设是我们工作的中心环节。那么，转变我们领导工作的作风，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究竟如何来建立我们的正确领导，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呢？少奇同志在他的第一次讲演中已经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职责，并清楚地提出了许多办法，我们应该照那些办法去改进我们的领导。斯大林同志对领导问题曾有总结性的正确指示。他

说：“正确的领导——这就是说：第一，必须正确的决定问题。而为要正确的决定问题，就非估计到群众所有的经验不可，群众是亲身遭受到我们的领导的结果的。第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而为要组织这种执行，也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而为要组织这个审查，也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 幻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正确的领导必须建立在正确地决定问题、正确地组织决定之执行和经常地组织对决定执行情形的审查，而这些工作必须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假如不得到群众的帮助，那我们正确的领导也是无法实现的。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正确决定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不应当以主观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制订计划；就是要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要不使我们的决定一到实际中就破产，不使我们的决定成为空洞的不能执行的口号，不要像我们过去一般地背诵一遍所谓领导春耕、夏耘、秋收工作等口号一样，而要学习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像这次他所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一样。他不是笼统地提出要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而是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边区究竟有多少荒地，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半劳动力，能够移民多少，依据这些条件决定我们究竟可以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并且为使规定的开荒和增粮的数目字能够真正实现，又研究了如何增加劳动力的具体办法。比如发展带有劳动互助性质的变工队组织，利用变工队的形式来发展在私有经济基础之上的集

体生产，以获得增加和调剂劳动生产力的效果。延安的同志和靖边、清涧的一些同志，过去就是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决定问题的，他们在组织春耕、开荒、移民、合作社以及植棉、水利、纺织等工作时，都是用这种态度去解决问题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地区的同志来效法的。

在问题决定了以后，不能让这些决定变成为空洞的口号，成为纸上谈兵。要使这些决定变成积极的行动，而且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保证它的实现，就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就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决定的执行。比如我们这次大会所通过的毛主席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是按照需要与可能制订出来的，但要这些计划由可能实现进而为实际的现实，首先就要各级党部仔细地研究与讨论这个决定，按照各县各区各乡不同的具体情况规定出该县该区该乡执行这个计划的具体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克服一切中途的困难。要执行计划，要把事情办好，这里不能忽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挑选和配备适当的称职的工作干部。另一方面，必须把这个计划在群众面前进行很好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这个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益的，使他们拥护这个计划，自愿为这个计划的实现而行动起来，也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的计划变为群众的计划。我们每一个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模范。比如毛主席特别号召我们发展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要我们普遍采用集体生产性质的变工队的组织形式。我们首先就应当使党员和群众认识这种变工队的好处，可以调剂劳动力，调剂耕牛，增加粮食生产等，使他们乐意来采用这个办法。这样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善于挑选农村中富有生产经验与劳动热忱的农民去担任变

工队的队长,要善于配备与组织变工队的干部。假如我们马马虎虎找一个劳动力和劳动经验都不够强的,或者简直是吊儿郎当好吃懒做的人去当变工队的队长,那么其他的队员自然就不高兴、不满意,变工队就不能组织得很好,工作的进行也必然不会好。相反的,如果我们挑选农村中被大家所佩服的积极劳动的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像吴满有这样的劳动英雄来领导变工队,那么,在春耕、夏耘、秋收的时候,他指挥别人从事劳作很得法,今天帮助这家,明天帮助那家,参加变工队的农民自然就会很高兴,就会拥护变工队这个组织。同时要使变工队能够及时地迅速地组织起来,就需要农村里的党员同志积极参加变工队,发挥高度的劳动热忱与帮助他人的精神,成为群众参加变工队的模范。这样,变工队就不会搞不好。再比如,我们办一个纺纱或织布工厂,特别重要的或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挑选和配备干部。我们要善于在群众中挑选出有办理这个工厂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同志来担负这个工作,这样工厂才能办得好。群众中是不缺乏这些人才的。假设我们随随便便配备了一个没有经验又没有组织能力的人去办理这个工厂,他一定要浪费许多时间、精力和物资,重复过去摸索过程中的许多缺点,摆很大的架子,用很多不从事生产工作的“工作”人员,花费很大的成本,结果只有一条道路,贴本以至于关门大吉。如果这个工厂是由群众集股举办的,那它马上就会在群众中失去信仰,而且会使群众对于党所号召的其他建设事业也冷淡起来。因此,每个正确决定通过之后,事情还不算完结,而必须进行很精细的耐烦的组织工作,特别是慎重地挑选和配备干部,因为干

部的才力和品质对于一种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有了计划，有了干部，工作在那里进行了，但这还不等于工作已经完成。工作中有了毛病还需要改正，有了经验还需要总结，总之，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斯大林同志指出这种审查和督促之“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为只有实行这样审查，才可以透澈无遗的认识工作人员，查明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为只有实行这样的审查，才可以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为实行这样的审查，才可以查明该工作指示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斯大林的这些话，第一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为配备了好的干部，事情就可办妥，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的干部，可能是适于组织运输队，适于组织合作社，但却不一定适于组织变工队。也可能这个同志原来适宜于组织变工队，但因为他后来不善于团结队员，或者不能公平地恰当地分配队员的劳作任务，惹起队员的不满和反对。因此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审查，从工作审查中去了解干部的品质，了解他的德和才是不是适合于他所担负的工作。

第二也就是说，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去了解执行机关是否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工作，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好好的审查执行程度——这是一种探照灯，这种探照灯帮助我们随时查明机关工作的状况，并揭露官僚主义者和文牍主义者的原形”顷。

第三也就是告诉我们，只有经过经常的实际的审查，才能够发现我们原订的计划是否有主观主义的成分，是否真正

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

总之，只有在经常的审查中，才能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发出具体的补充指示，以便更好地更进一步地解决具体问题。比如我们发现了我们原来配备的干部不恰当，怎么办呢？就及时地调换这种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干部代替他们。比如我们发现了执行机关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工作的，怎么办呢？就及时地改造这个执行机关，或者设法纠正执行机关的这种错误态度。比如我们发现了原订的工作计划和指示本身是有缺点，是不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怎么办呢？就及时地修改或补充原来的工作计划，使它成为真正能够行得通的可以实现的计划和指示。

当我们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审查的方式和方法。第一，我们审查一件工作，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具体结果。第二，我们在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比如我们审查一个工厂的工作情形，不仅要派人去审查这个工厂的管理机关的工作，和经过管理机关去进行审查，并且要发动这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由下而上地审查它的业务计划进行的实际情况，审查工厂管理机关的领导工作。只有采取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配合的审查方法，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无遗，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

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应当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了解工作中的情况，而在于从了解工作情况中想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在一件工作进行完毕之后，就应当进行经验总结。如果这个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本来就是经常性的工作，那就要恰当地分出一定的阶段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一件工作，得出了许多经验教训，就必须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教育工作，因为它是最好的最生动的最具体的教育材料，并且要把这些经验教训在各地运用起来，使它更加丰富。比如我们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教训，就拿来进行教育，就在各地普遍地采用起来，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好的改进。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各地对于总结工作还是做得很差的，或者是做得不够的，这也使我们的工作不能迈开大步前进。

我们应该依照这些原则，来建立我们经济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风。但是从整个边区看来，在警备区，在陇东，在南边的鄆县一些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那里的民主政治的中心任务，首先是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只有真正减少了租息，使群众得到了利益，他们才会安心地努力去生产，才会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谈得上开展经济建设的事业。一般地说，减租减息政策在那里还没有被认真地普遍地实行，那里有些地方的下层政权还在地主阶级的手里，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有少数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是采取怀疑态度的，他们中间有人这样说：“究竟现在是山羊和绵羊之分，还是谷草和莠草之分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还有一种群众的呼声，他们说：“地主怕农民，农民怕政府，政府怕地主。”地主

怕农民是因为农民有力量，农民怕政府是因为政府有权力管理他们，政府怕地主是因为这个政府还不是真正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这告诉了我们，那里的下层政权还是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减租减息的政策还不能很顺利地执行，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被改善，老百姓的政治权利还没有被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还被压抑着。我们应当给那些地区分配以有力的干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改造政权，使之成为真正的“三三制”政权，并由这个政权去领导经济建设的事业。在那些地区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同样的也应该依照上述的原则去建立。

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是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而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

三 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

毛主席在高干会演说中，曾经号召我们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也曾经指出，在我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中，还存在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存在有贪污、腐化、堕落的严重现象，军队中也存在有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许多要反对要肃清的东西。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进行斗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

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我们这次高干会之所以开得好，就是因为我们正确地运用了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什么话大家都说，有什么缺点不隐瞒地揭发出来，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来改进今后的工作。像这样的发扬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过去在边区的党内还是不够的，而这种民主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常常会被有官僚主义或军阀主义倾向的人们和贪污腐化者、自由主义者所阻碍、所压抑，因为他们是害怕批评的。

边区的党，今天是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它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地方，因为战争的环境，就更加需要集中，党内民主就不得不比较缩小些。而我们边区的和平环境，就使我们有可能和必要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一些，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不如此，坏的东西就无法肃清，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彻底转变也会受到阻碍，即使这次高干会所通过的很好的计划，哪怕是毛主席亲手写成的，也会落空，也会无法贯彻。

在边区的留守部队中，应当怎么办呢？一般地说，军队是集中的军事组织，军队中民主的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但我们

留守部队，今天是处在和平驻军的环境中，而我们部队中又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和贪污腐化的严重现象，不克服它就会阻碍我们的建军工作。因此，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定的时期内，部队中党的组织内的民主可以有意识地扩大一些，发扬部队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与批判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这对于今天的整军工作也是必要的。

同志们回去之后，应该根据这次会议中正确地运用的党内民主与开展自我批评的精神，去传达会议的一些决议和计划。必须把高干会的这种精神带回去，发扬起来，并且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召集各地党的会议时，也要采取高干会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民主讨论的办法，把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工作加以检查，丝毫不隐瞒地揭发工作中的某些弱点或某些倾向，以治病救人的办法，使大家认识那些错误，纠正那些错误，改正自己的作风。这是转变整个边区工作作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然的话，大家在这里讨论得很热烈、很严正，而跑回去之后，又把这种精神置于脑后，对于当地工作中的某些错误与倾向，反而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那么，我们整个边区工作的作风就不会真正地转变过来。

我们时常看见有一些同志，他们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只喜欢人家表扬他的成绩，却害怕人家批评他的缺点，因而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正如一个人生了疮毒，讳疾忌医，结果溃烂下去，整个身体的健康都要受到损害。列宁曾经说过：“政党对于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

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这个党是否郑重和它是否在事实上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义务。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那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对待自己错误所应持的态度，整个党如此，每个党员也如此。

或者有人会这样设想：如果发动下面的群众来检查领导机关工作和进行批评，那岂不是要丧失领导人的或者是领导机关的威信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恰恰是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与不负责任的习惯，才能更加巩固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使每个工作者成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人。

四 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当前的任务

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既然是发展经济，那么，就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机构，它的人员，它的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

今后的农村支部与乡政府，都要以如何领导农村生产事业为它的中心工作，改变过去那种多开不必要的会，多花费

有用的时间的老作风。据高岗同志的统计，我们边区三十万的全劳动力，花费在开会和其他勤务工作的时间，每年约为二十万人的一个月时间，用它可能生产出十万到十二万担的粮食，我们应该减少这方面的浪费。支部大会不要开得太多，不必要的可以不开，甚至一年只需要开四次支部大会，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征收公粮时）之前各举行一次，决定一些进行这些工作的好办法，或者还可以少开一些。平时可以利用时间举行小组会，其内容也要很好地和农村生产事业、生产组织相结合。比如说，将来农村里要普遍组织变工队，我们就可以使小组的经常活动与农村变工队的经常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支部干事、小组长，都需加以重新审查和配备，挑选富有生产经验、劳动中积极的分子和党性强的同志去担任这些工作，以加强农村支部、乡政府对于农村生产事业的领导。群众团体也不要再梦想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时代那样的大刀阔斧的作法了。它们的组织与工作，今后必须转到一个新的方面，就是要用变工队、运输合作社、纺织小组等群众所需要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去进行工作，这样才可以使群众团体不致于脱离群众。

干部决定一切，因而我们要重新审查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工作中的干部是否称职，是否适宜于领导这些工作，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动，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给以训练，培养与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同志们，生产建设是繁重的工作，同时又是最实际的工作，不但要用脑子去考虑问题，而且要用用手用脚去改变事物，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的和党性坚强的

干部。为着加强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甚至于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的比较次要部门抽调到下级的主要部门中去，从上级的不直接组织生产的岗位抽调到下面的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也是应当的、必要的。只有各级党委都能抓紧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党上下都能重视经济建设工作的进行，才能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特别重要的是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在国内战争时期，贪污的现象是很少的，那时贪污了几十块钱就要枪毙的。到了今天，在统一战线的和平的环境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产生了这样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我们不加注意，不努力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干部与党员就会起着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大会上提出了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贪污腐化现象，汉奸和特务分子正是要寻找这些人，抓住这些人的弱点，利用他们去进行破坏工作。尖锐地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把那些思想上已经蜕化而成为异己的分子，坚决地清洗出去，在今天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抓紧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和配备坚强的干部以外，应该号召我们每个党员同志成为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同志们，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呢？如果他是努力生产的，

热心劳动的，从劳动生产中得到收获，一方面家庭的生活较前富裕了，另一方面，缴公粮，担任各种勤务时也能成为群众的模范。这样的党员，公私兼顾的党员，应该说是一个好党员。我们应该在开展群众的生产运动中，测验我们的党员同志。过去，有这样一种党员，不缴党费，不到会，不做工作，我们称之为落后的消极分子。但是这些人的中间，有没有一心一意想把生产搞好一些，因而不愿麻烦，不愿管闲事的呢？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对于这些人还是要进行教育，还应该在今后生产建设的方针下继续考验他们，不适宜很快地让他们离开党。也有这样的一种党员，他们在党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今天，还是不改变对于生产的惰性，不愿意从事劳动，多少有点“二流子”的习性。对于这一种人应该好好向他们解释，要他们改变对于劳动的态度，并指出如果执迷不悟，就会妨害党所领导的生产事业，就可能被清除出去。同时，在生产建设的运动中，一定会有许多努力生产和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在群众中涌现。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增添新的血液，增添许多对生产事业抱有极大热诚和进取心的新的成分。

只有改善党的成分和干部的配备，并根据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原则，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去改变某些组织机构，使之更加适合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才更能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更便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共产党员应当善于 向群众学习

（一九四三年六月）

二十二年来，我党已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成为今天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为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柱，成为广大民众争取解放和胜利的旗帜。我们今天庆祝党的伟大发展，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要加强责任心、自信心与创造能力。每个党员更应当在整风学习中，努力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这样才能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任务，才能有办法克服坚持抗战中的一切困难，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胜利。

为了在整风学习中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我想再强调地提出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每个党员是否能照这样去做，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

* 这是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而写的文稿。

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因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而要这样做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这就是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因此，毛泽东同志曾不断地指示我们，共产党员要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正确地去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好。最近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完整体现，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在领导方法上的经验结晶。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必须反复钻研去把它弄通，去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尚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比如，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

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不知道只要依靠群众，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领导方法，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都学会使用。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的问题呢？有些同志在讲哲学时，都抽象地懂得理论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一到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使这两者统一起来，不是读了《资本论》不能解释边币、法币问题，不能做好实际工作，便是以为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工作中，没有什么理论，不能学得什么理论，更想不到可以发展马列主义。其实，我们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在处理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一切实际工作中，要避免盲目地摸索与乱闯，便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当着我们抓到了规律后，便使我们的行动由盲目的变为自由的，有明确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计划前进。所以，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

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二十二年来，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必须认识，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而基本群众的解放，又是要他们自己起来动手，才能真正得到的。所以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今天，在我们许多党员干部中还非常缺乏这种群众观念。他们在处理一切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

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这种入党性大成问题，应该坚决纠正。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今天在整风学习中，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

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四年四月)

一 一九四三年边区财政 经济工作的估计

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后和财经办事处及各地财经分会成立以来,一九四三年边区财经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的,最主要的表现是:

(一) 确实开展了广大群众的生产运动,军队也贯彻实行了屯田政策,使边区的粮食棉花大量增产;公营企业、合作社都有些进步。

(二) 分区各自负责从农工商业及一部分税收中保障了自己的供给。这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渡过了财政上的困难。

(三) 公家和部队机关建立了相当雄厚的家务,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

* 本文是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曾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原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

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四）贯彻了统销政策，这对政府收入和供给上是起了作用的。粮食税收工作也有些改进。

（五）使陕甘宁和晋西北的财经趋于统一。

（六）在分区财经领导统一的基础上，使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统一。

这些都是去年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没有高级干部会的整风，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西北局和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和督促，以及全党同志的努力，那是不可能取得的。

我们应当指出，去年经济建设的成绩是空前的，这些成绩使我们得到下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爱护，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党和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我们在生产事业上的胜利和发展，给了全国人民以奋斗的方向和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当它认真来干这件事的时候，它可以依靠群众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难，而且是极富于创造能力的。

由于我们去年生产获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也随着而获得进步，如军队工作、政府工作、群众工作、防奸工作、文化事业等，特别是领导作风，经过反官僚主义倾向与反军阀主义倾向后有巨大的转变。在这一运动中，党政军民的关系更加团结与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我们应当足够地估计这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收获。

经济建设大体有两方面的任务——生产和分配（消费），即生产必需物资，并将它适当地分配给消费者。对于自己还不能生产的东西，则必须以多余之物资向外面去交换必需之物资——即以己之所余易己之所无，来满足消费者之需要。这里面就产生了包含生产、贸易、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的政策问题，构成整个经济建设的复杂的内容。

去年我们在生产方面（主要是农业生产）获得很大成绩，但是在贸易、金融、财政等问题上，还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有些缺点和错误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恰当的组织 and 调节，还存在着未能协调配合的严重矛盾。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尚未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有些缺点错误是应当避免的，但有些缺点错误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也是难于免除的。

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政策，就必须了解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存在一些什么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和相互斗争的关系。下面我准备讲讲这个问题。

二 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边区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边区经济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内战时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这时期

的特征是带着破坏性质，即以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破坏反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革命的内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摧毁旧的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为着便利于后来经济的发展和。因为战争频繁，一方面是敌人破坏，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人力物力不得不有很大的消耗，时间与环境不可能容许我们进行普遍的、计划性的经济建设。那时的供给是依靠于打土豪没收反动阶级资财解决的。

（二）休息民力时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这时期内的政策是恢复民力。当时国内已取得和平，对日战争只限于黄河边沿区域，我党在国内影响大增，因此也获得巨大的外援力量。这种环境容许我们休养民力，也必须使民力休养。人民对政府负担轻微（一九三七年缴公粮仅一万石，一九三八年一万石，一九三九年也仅五万石），因此民力经这三年的培植也逐渐恢复起来。此时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外面的捐助筹集，直到一九三九年还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是靠外款。边区人民、部队、学校、机关等除食盐、皮毛及大部粮食之外，几项重要生活必需资料如布、棉、铁、纸和部队机关的一部分粮食，一部分煤油，都需要靠外面采购来保障供给。这里表示我们在经济上对外的依赖性是很大的。

（三）边区经济发展时期（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这一时期的方针是发展公私经济（工农商业），争取自力更生。从一九三九年底起，国共之间发生军事磨擦，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经费的办法，来断绝我们一切外援，企图藉此削弱打击我们。我们在极端困难之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业中求得由半自给到全自给。工业在一九三八

年已开始创办，但带倡导性；一九四一年有大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底止，我们已有公营的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和石炭等企业六十二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二元，职工九百九十一人。农业方面，从一九三九年起，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植棉亩数逐年增加，牲畜也是逐年发展的。四年内开荒二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亩，植棉由三千多亩增到九万四千多亩。其他如盐的产、运、销，煤油的增产，商业的整理等，也获得相当成绩。一般说是解决了困难，渡过了难关。然而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带有许多盲目性，思想认识上有错误和不一致，没有总结经验找出其规律性。

经过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总结财经问题以后，思想方针获得一致。去年一年的努力，使边区经济依据正确的规律有着极大的发展。农业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超过计划一倍），按总产量和消费量相对比，可余细粮二十二万石。今年计划再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二十万石（连军队在内三十万石）。植棉面积去年已扩大到十五万余亩，产棉花约二百万斤，可供全边区近一半的需要。公私纺织企业共生产大布十万匹。今年计划扩大棉田到三十万亩，产棉花四百五十万斤到五百万斤，棉花收获以后就可以再不要外面供给了。去年造印刷纸五千五百令，迷信纸、麻纸一万二千刀，今年计划纸的生产全部自给（据绥德同志谈，警备区纸厂月产可达七千刀，如全部设备能力发挥起来，全年以六个月生产计算，就可够边区人民三万刀用纸的需要而有余）。去年各种公营自给性工业也有发展，经工厂会议与整风

后，生产率提高，管理改善，成本减低，质量也有改进。肥皂已有些出口，火柴今年计划达到全部自给。去年产盐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运销也有成绩，长期合作的运输牲口比前年增加十倍。煤油产量大增，足供边区消费而有余。农业工业和军工业需要的铁，也有可能大量开发，今年计划自给百分之五十以上，明年则可能完全自给。

总之，几年来特别是高干会以来，由于党的领导，政府和军民的努力，使边区在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基本生活的必需资料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料、火柴和肥皂等，或则已经自给有余，或则今年即可自给，或则经过一时期的努力也能完全自给。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边区在经济上正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都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很大的错误。

去年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对这个特点认识不够，或简直没有认识到，故在工作中产生了或“左”或右的缺点和错误（关于这问题我下面还要说到）。

第二个特点是，边区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个体农民经济散布在广阔的地区之内，虽然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人民的生产热忱提高了，但这种散漫情况如不加以改进，则生产力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去年高干会后，在全边区内发动的劳动互助运动，解决了新民主主义下农村经济如何建设

的一个原则问题——合作化的问题。去年之内，全边区三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个劳动力中，已有八万一千一百二十八个约占百分之二十四的劳动力组织在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之内，个别县份，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了。全边区有十三万七千六百余名妇女组织在妇纺组织之内。各种性质的合作社共有二百六十多个，连它们的分社总合有八百个以上的合作社单位，社员有十五万人，南区合作社的方向逐渐普遍地被采用着。

农业劳动的合作化——变工、扎工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能，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出集体劳动的效果。

表一 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

一个劳动力	种地（土向）	打粮（石）
不变工	11.6	6.45
变工	17.9	10.45

以不变工为一百，则变工种地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变工打粮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较原来增加一半多。

表二 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

种地一亩	个人（工）	集体（工）
开荒	6.5	2.5
下种打土	2.0	1.0
锄草两次	2.0	1.0
收割	1.0	0.5
合计	11.5	5.0

变工较不变工可节省六个半工，省工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劳动的成效等于三人。

在发展生产与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运动中，我们用表扬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的方法（去年产生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用提倡革命竞赛的方法，用实行按户计划的方法，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合作互助运动中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去年劳动英雄大会总结了合作劳动的经验，今年经过党的领导和各地劳动英雄们的推动，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七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据说安塞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组织起来了。这样就使边区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成为在私有基础上比较有组织的合作经济。这种合作经济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这是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那种在私有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体化的某些办法，目前也不宜采取。

因为劳动合作化的结果，劳动效能大大提高了，大大发展了生产力，按过去耕作标准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使劳动力剩余下来，这就给我们扩大耕地面积，改良种子、肥料、农作方法和兴修水利等的便利条件，同时还可组织多余劳动力，去求得农村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也更便于我们组织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由于互助合作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产生的新问题，正待我们作更具体的研究和解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合作化将使边区农业（包括副业）手工业等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是我们今后更进

一步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至于农村经济以外的部队、学校、机关和政府举办的公营企业(农工商业),原是建筑在集体劳动所得完全归公(为该集体的全体人员所享受)的基础之上,现在也充实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因素,个人能够分得一部分生产成果,而各人所得多少又是按其出力多少为比例,并要求各人都要有适合于公私利益的个人生产计划,这就能够刺激和巩固部队、政府、学校、机关的公营经济更加合理地向前发展。比如杨家岭的运输队,自去年实行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以后,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增强了,运输力提高了,过去大车载重不过九百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二百斤至二百二十斤。去年全年,中央直属的运输队在同样的牲口车辆情形之下,比前年多运一千五百万斤,并替公家节省了运输开支,折合一千余石小米。今年一月起,该队又改为“交任务”制,给该合作社以更大的经营自由,分红也改为等级分红制,以刺激工作积极性,在制度上也有些新的规定,使今年第一季度工作更加改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今年三五九旅的生产也采取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办法,规定每个战士全年要生产六石一斗粮食,除四石一斗归公外,下余二石完全归个人所有,这就使战士更加积极生产,使部队更加巩固。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边区虽然是一个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组织,现在已经走上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的道路。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就更加保障边区经济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迅速向前发展。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特点，我们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也必须照顾到这个特点。如此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大错误。

去年，有些同志不认识这个特点，故在工作中不是采取互助合作的方针和办法，而是相反地采取防范态度，自己孤立自己，结果陷于孤军奋斗，孤立主义（关于这问题我下面还要说到）。

除开革命与战争是我们边区所处环境的一般特点，这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必然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上面所提出的两个特点，就是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当中表现的最基本的特点。从这两个特点就可以使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就是：我们边区经济，恰恰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相反，它是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日益向上发展的，其原因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使生产力有着充分发展的条件；而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是日形下降的，其原因就是那里的统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那里的政治是买办封建专制下倒退腐败的政治，他们把国家银行与国家财政机关，看成为少数人从中谋利的工具，他们今天的经济政策是向着扶植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农业与工业生产发展的。他们利用《战时国家总动员法令》，把人民生活日用必需的物资和对外出口的物资都统制起来，不准自由运销。由于棉花的统制，棉农因棉价不及成本而不再种棉；由于糖的统制，内江农民不再种甘蔗；由于桐油的统制，人民把桐树砍作柴烧；由于食盐的统制，自流井出盐区域的农民买不到盐吃；由于粮食的统制（假调剂供销之名），农民的粮食被夺去，又买不到

粮食吃；由于棉纱的统制，许多纱厂被迫缩小生产或关门。总之，举凡一切受统制的东西，没有不是产量大减的。

今天，大后方农村经济破坏的现象非常严重。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逐年公布的农情报告，大后方十五省的耕地面积、农作物产量及耕牛逐年减少，截至一九四一年的统计，耕地已较战前减少八百万亩，总产量减少二万万市石，耕牛减少三百万头。今天大后方的工业，由于原料与产品的运销受统制，由于不能从银行借到周转资金，所以由沪、汉等地内迁的工厂有三分之一的机器未被使用，甚至对于重要国防工业的炼钢厂，也因利润不及商业投机的大，而让许多机器在那里闲放着。总之，大后方的经济是日趋破坏的、衰落的，广大人民因此陷于破产、饥饿、死亡的惨状。农民没有要求减租减息的自由，工人没有获得工资的自由，中小工业资本家没有发展自己经济的自由，各种小本生产者没有发展自己生产的自由。一切被垄断干净，垄断得使广大的人民活不下去。

正由于边区经济的日益向上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困死我们的企图，更激起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仇恨。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要求中国内部团结准备对日反攻的情况下，他们虽然不敢轻易发动对边区的军事进攻，但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的企图，必然会要更加紧在经济上来封锁我们，运用他们的力量来和我们作经济斗争，派遣他们的特务打进我们里面来进行破坏活动。这种情况是我们应当足够估计到的。

虽然整个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是破坏的、衰落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经济力量比重上，今天还是他

们的力量比我们要强大，因为他们统治着广大的而且是富饶的地区，有工业城市，有外国的援助，有全国性的政权。我们边区是很小的，原来是贫穷的，且今天又无外援，同时我们边区今天的经济又不能与国民党区域完全断绝关系，因为我们有若干必需品尚不能完全自给，需要从国民党区域购进，而我们的货物也需要大后方的市场，这就使国民党能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困难。更由于我们共产党人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对于经济建设事业还在开始学习，还没有完全学会，从这里就可以认识我们与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的任务，是非常繁重而艰巨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陷于盲目的乐观，放松对这方面的注意与应有的努力，而使我们在对外经济斗争上要受到失败。

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必须根据上述两个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而产生的与国民党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与相互尖锐斗争的关系出发，这就是说，我们边区人民的财富和经济力量，比两三年以前是大大地增强而且是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在经济上对外依赖性日益减少，独立性日益增强，但与国民党的经济斗争也日趋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上采取独立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依赖的方针。我们只有正确地掌握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才能够使我们更有力量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保障边区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来检查我们去年的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便可以发现我们有些直接负责管理贸易、金融、财政的同志和机关，对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形势是缺乏

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此也就产生了政策上偏右或偏“左”的错误，主要是偏右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他们对于边区经济力量的估计不足，而对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的估计过分。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缺乏独立的主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一些投降主义的因素。比如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认为不可能出超和“出超无益论”，不赞成全面地管理对外贸易，不主张统销而主张对外贸易的自由等等思想，这是由于在经济上依附外面的思想和不相信边区经济力量增强而产生的。又如金融问题上，主张边币发行的外汇基金制和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的思想，以及反对“边币一元论”，在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的主张等，也是由于过分地估计了法币的力量（不懂得法币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地要降落的），不相信我们在金融问题上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产生的。上述这些思想和政策上的错误，对边区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起了消极、妨碍作用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在财政、金融、贸易方面负责的同志当中，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他们以为我们边区经济有了发展，而我们又掌握有必要的物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没有足够地估计到国民党对我们边区的封锁和破坏所产生的困难，不了解边区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的巩固是要从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争取的，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去依据自己可能的收入，采取必要的节约，防止浪费，以求得在财政上的收支平衡。由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思想，我们的银行长期规定了法币一元兑换边币两元一角的牌价，不管边币黑市如何继续高涨。他们认为边币

可以不费气力地回到两元一角的比价,放弃银行在扶植边区经济发展上可以进行的一些业务。必须指出,这种表面上“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对边区经济的发展、物价金融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是有损害的。

确定今后正确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必须克服上述偏右偏“左”的两种倾向。只有克服了偏右的依赖观点,才能够保障我们采取主动的独立的政策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而使我们获得胜利。也只有克服偏“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才能认真去认识经济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才更能够加速边区经济的发展,更加增强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

三 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必须有很大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具有更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为此目的,必须有一些基本方针的规定。

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

上面我们指出边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边区的人力及资源的作用,努力发展边区经济,边区是可以迅速达到完全自给,可以完全摆脱对外的依赖而独立地主动地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要保障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并达到出超;稳定金融,提高边币;收支平衡,财政基础稳固,

这就必须全党更进一步地去努力发展生产。

去年下半年的物价猛涨，金融发生强烈波动，引起社会生活不安，成为我们去年工作中的极大缺点。如果这样设问：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可以答复：除因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之外，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此地不去列举）。为什么会产生入超呢？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加上贸易政策上有很多错误，因此就产生物价高涨、金融波动的结果。

明了了这种情况以后，就在全党的面前清楚地提出了当前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

在粮食增产上，去年我们获得很大成绩，的确是把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一步。今年我们要完成西北局提出的开荒百万亩、深耕细作增产细粮二十万石、边区驻军产粮十万石的号召，使我们在粮食上不仅能够完全自给和余存一年备荒的粮食，而且能够使粮食将来有大量的输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粮食增产和输出是有很大前途的。因为边区有大量的荒地，人口逐年的增加，耕地面积可以扩大，粮食的增产是大有希望的，而边区以外的周围地区，因征拔壮丁，负担繁重，农业经济日形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也是很难恢复到战前农作物的产量，这就保障了我们边区粮食能够大量的有利的输出。因此我们应当多生产粮食，输出边区以外，这是保障将来能够平衡进出口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而且如有粮食

输出，就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刺激农民的生产，保障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

棉花、布匹占去年入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和军工上需要的铁有百分之七八十依靠外面输入。根据这次会议的研究，这两项东西只要我们大家努一把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今年就要决心完成三十万亩棉田、产花四百五十万斤到五百万斤的计划，明年再不需要进口外面的棉花、布匹了；更要以最大的努力组织铁和其他金属的生产，以现在边区铁的蕴藏量和我们的技术来说，要做到今年产铁至少能供给一半以上的需要，明年做到全部自给，再不买外面的铁了。此外，必须完成造纸、种蓼蓝、造肥皂、造火柴、多榨植物油的计划，调整盐的产、运、销，增加煤油产量，继续发展畜牧业。

除开加紧整理政府和公家所举办的公营企业，使之继续求得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成本减低（最近的工业会议将详细讨论）而外，今年还必须强调发展广大群众的手工业生产。要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因合作化而节省出来的广大劳动力，去发展边区的手工业和农业上的副业。要把边区所生产的棉花织成布匹，边区出产的铁制成为农具，制造纸张的原料变成农民提高文化和日常需用的纸张，不然有棉花、生铁和原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件很大的组织工作，丝毫不能容许对之采取自流的态度。边区合作社应当改变自己的方向，今后要以组织上述各种生产合作事业作为自己基本的业务（今年合作社会议应作详细讨论）。各机关部队除完成自己的农业生产计划而外，也应组织自己可能组织的劳动力量去

发展各种必需的手工业。对这类手工业合作生产事业，除开充分利用民间游资使它变成生产的力量而外，贸易公司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投资，银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放款，以扶植这些生产事业的发展。

只要使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国营企业今年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就必然会使边区经济力量大大地增强一步，保障我们明年能够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

如果上面提出的任务都能实现，那么我们便可以完全保障出入口平衡，并且可以达到出超。机关部队，除开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粮食自给外，其他的生活必需物资，也可以做到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自给。这样税收也能够增加，财政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去年边区党政军民全年开支的总额为六十万万元，其中有三十八万万元是由各部门生产自给解决的，几乎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今年更要增加）。

出入口既平衡甚至能出超，金融物价也就必然会平稳，边币可能迅速的提高，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不至继续发展，甚至可以有些缩小，而缩小这种剪刀差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努力的。

我们要做到能够胜利地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就必须：

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争取今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组织到各种合作组织中去，并改进这种合作组织的内容：

采取公私兼顾，奖励竞赛，按户计划和个人计划等刺激和组织生产的许多办法，提高劳动热情，发展生产力；

组织和边区的交通事业，尽量做到运输机构合理，

减低成本和运费，以便利于边区内物资的交流、调剂和输出物资到边区以外去。

全边区经济的完全自给，又必须建筑在各分区的经济能够自给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

这个基本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求得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

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曾指出：“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毛主席这里所指的“公私兼顾”，是适用于一切公私关系上的。例如在金融贸易问题上，及公营经济的分散经营与分配问题上，也要采取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而不是只照顾公家不照顾群众，只照顾自己不照顾别人，或损人利己以求自己的发展。这都是国民党作风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的反映，是足以妨害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的。

先从金融贸易问题来说，由于我们的民营经济还是建筑在小私有商品生产制度之上，不能不依靠货币与市场去进行买卖，因而市场就有调整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当此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之下，边区内部贸易必然会要随着发展的，内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般小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市场，其发展情况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投机商人、高利贷者、兼营商业的地主和巨富，往往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借以剥削人民。而人民的生产也

是盲目的，他们并不知道市场上的需要如何，也没有真正为着人民利益的机构来指导他们按社会需要去进行生产和调剂他们的产品。这就更便于上述投机商人等来操纵、剥削。这种情形，就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蒙受重大损失，而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边区民主政权下的经济，与国民党统治及敌伪统治区域的经济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又有其相当独立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注意使内部市场的发展和活动能够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便于小商品生产者的有利交换，反对一切投机操纵，藉以帮助和刺激农业（包括副业）手工业的发展。

但必须指出，过去边区内部市场上的情形，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物资局、银行、公营商店、合作社等未能互相结合，互相帮助来调整市场的需要；相反，甚至还是互相竞争，促使市场上盲目性增大。

我们是否有条件使日趋发展的内部市场能适应边区经济而更合理地比较有组织地发展，使我们能更团结内部力量便于对外斗争呢？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因为政权是我们领导的，我们有银行，有贸易公司，有合作社，有公营商店和企业；有党的领导，有政策；而我们的生产如产粮、种棉、制铁等又是可能比较有计划地进行。只要我们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那我们就有力量和一切投机商人作斗争，来调节市场需要和价格，使市场处于一种平稳安定的状态而利于人民经济的发展。

在调整市场上，我们的公营经济、银行和合作社，都负有

重大的责任。

我们的公营经济虽然在全边区生产上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商业上因为它有巨大集中的资本,有高度组织的力量,足以控制金融与市场。这就要求它们要严格服从政府的法令与政策,不但不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而且其唯一的任务,就在于为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与十万党政军人员的生产与消费起集中的组织与调节的作用,一切离开这个任务的方针,就是危害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的方针,就是国民党式的剥削大多数人的方针。

我们的贸易公司,应当时常照顾到群众的生产 and 消费的需要而加以适当的调整。它必须协同建设厅,经过广大合作社并与之很好地合作,去收集民间的土产品,如陇东地区大量的棉花、三边的皮毛药材等,首先调节内部市场上的需要,多余的则有计划地由贸易公司或帮助合作社组织外销,换取边区人民必需的物资。这一方面使农民多余的物资获得销路,不致因为生产过多而跌价吃亏,以此来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使缺少这些物资的地区获得供给,不致因缺少这类物资而涨价,引起金融物价波动。同时贸易公司又须注意,在对外贸易上不仅要换得十万公家人需要的物资,而且要换取边区人民今天还不能够生产而又必需的物资,经过合作社、公营商店、骡马店有计划地分配到各地市场上去,尽量保障人民消费的需要,不致因这种物资的缺乏而使农民购买不到,或要用过高价格去购买因而吃亏,甚至于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如农民买不到犁铧铁器等)。

我们的银行,必须时常照顾人民生产上的需要和调节各

地市场上的金融，来保障物价平稳，杜绝投机者活动的机会。如某地合作社或人民需要发展必需的自给工业（如造纸、纺织等），或有着农业发展的需要（如修水利、改良种子等），银行必须尽可能给以贷款的便利。市场上发生了金融波动以致引起人民生活不安时，则又必须尽速地加以调整使之迅速趋于平稳，防止因此而妨碍生产发展及引起市场上的混乱。

我们的公营商店和企业，应当成为调节市场需要、稳定金融物价的力量，成为与一切投机操纵者作斗争的工具。为着这样目的，有时吃点亏也是必要的。公营商店要将一部以至大部资金逐渐转到真正生产财富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方面去。

各种公营企业，如果都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处处从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在内）利益出发，那它就自然在一百五十万人的生产与消费中起着组织与调节的作用。而边区内部的市场也就能够正常地向前发展，真正做到内部发展与团结而利于对外进行经济斗争。

再从公营经济的分散经营与分配问题上来说，今天的条件不能不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而领导上则须绝对服从统一的方针，反对不照顾全体的本位主义现象。士兵及一切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劳动的结果，不应全部归公，应以一部分归私，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生产的积极性。

从这种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观点来检查过去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

比如物资局，过去对小公家和群众的利益是照顾不够的，有时甚至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以致造成了同他们对立的形势。

在某些物资的代销上，曾经使物资的所有者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盐的统销上，卖出和购进的盐价相差太大，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的运盐队不能够获得利益，甚至于亏贴很大。这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又如在物资的分配上，过去物资局没有照顾到各系统的小公家及各分区、各合作社和群众的需要，以致使他们分不到必需的物资而表示不满意。过去物资局更没有想到与广大合作社和各营商店合作，从帮助他们发展中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帮助，以求得统一和集中力量去进行对外斗争。我们的银行，在扶助国民经济上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样，自然就不能达到团结内部的目的，而只是造成自己孤立的状况。

有些小公家和个人，站在本位主义和私人利益上而不照顾到整个边区利益的现象，也必须纠正。比如财政厅，从财政本位出发，不顾情况地发行边币，虽然在财政方面解决了去年和今年很大的问题，但因而成为影响金融大波动的重大原因之一。又如食盐的走私，破坏了统销和等价交换的政策（如公家规定一斤盐换一斤四两铁，走私的结果，变成一斤半盐交换一斤铁，使公家受到极大的损失，自己也吃了亏）。或者是任意对统销物资加价，小公家虽暂时获利，但因此使大公家积压了大批的货物不能够销售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公营商店过去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有一些公营商店的情形也是严重的。他们不是以执行政策法令、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与投机商贾作斗争作为自己经常的任务，相反的，有些时候是依靠破坏法令政策（如囤积居奇、买卖黑市等）去获利，反而助长了金融的波动和物价高涨。某些个人在图营私利的目的上不惜破坏政策法令的事情也还很多。

因此，要团结内部就必须克服这类损人利己、为私忘公的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长期的斗争。

由于一九四〇年以后，国民党封锁边区和断绝我们的外援，曾经造成大小机关极端困难的情况，各个部门既没有家务，又没有很多的流动资金，要靠自己的经营去维持生活和解决办公需要的经费，这就发展了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甚至于是损人利己的严重现象。在极端困难的经济状况之下，这种情形也是难于避免的。但经过几年自己动手发展经济的努力之后（政府也曾投下了不少的资金），现在的情形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各个部门都已经建立起必要的雄厚的家务，并正在厉行生产和节约。各个单位就应当严格地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打破本位主义的思想，增强内部团结互助的力量，以便利于进行对外的斗争。

大公家、贸易公司、财政厅和银行等，由于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也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力量。他们更需要从发展边区经济的观点出发，积极努力照顾局部的、小公家的以及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只有这些局部、小公家和群众在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才能使大公家的事业有更大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为着保障各个局部和小公家能够严格地遵守政策和法令——而这又是统一步伐和进行对外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就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问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如有些公营商店因为他们的上级机关规定了过大的获利任务，致使他们不得不从破坏政策中去求得任务的完成，要使他们能遵守法令政策，就得减轻其任务，这就必须由大公家拿出一笔钱补贴其所属的机关）。尤其在今年，提出发展民间各种自给经济当作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时，物资局和

银行以及财政厅必须以很大的注意和力量加以帮助。只有各种自给工业真正能够获得具体帮助和迅速顺利发展时，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

由于边区经济逐年向上发展，边区人民的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需要消费的东西也增多，正需要我们有计划地发展自给经济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达到完全自给，或者某些公私需要的东西（比如一部分兵工通讯器材、医药卫生器材以及老百姓所需某些日用品）边区还不能生产，还必须依靠外面的供给，我们需要从边区以外取得一部分物资满足人民的需要，但又不要因此妨碍自给经济的发展，这就增加了我们对外斗争的重要性、严格性与复杂性。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的情形可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出：

**安塞高川村 1940—1943 年
表三 经济发展情况**

项目	1940	1941	1942	1943	1943 年与 1940 年 相比 (%)
户 数	10	11	13	15	150
劳 动 力	10	11	19	15	150
半劳动力	5	6	3	9	180
耕牛(粮)	3	4	8	9	300
耕地(亩)	540.0	783.0	1,143.0	1,380.0	255.5
收细粮(石)	109.0	145.0	220.0	313.7	287.8
驴 (头)	7	10	15	24	342.8
羊 (只)	85	135	265	410	482.3
猪 (头)	5	10	13	17	340.0

鸡 (只)	75	95	116	150	200.0
-------	----	----	-----	-----	-------

(根据 1944 年 3 月 27 日《解放日报》杨光的通讯改制)

上表告诉我们，四年来该村总财富增加百分之五十到近四倍。

边区人民因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消费能力增加的情形，又可从下面延川拐穷村农民蓝凤城的情形中看出来：

蓝凤城：全家三口人（本人及妻一、子一，子现年十六岁），革命前一无所有，靠揽工度日，并有大烟瘾，贫苦不堪。革命后分得窑两孔，山地十晌，川地四晌，共计十四晌，本人烟瘾也戒掉了大半，但光景仍未见有大出息。抗战后除经营农业外，兼营副业，生活蒸蒸日上，一九四〇年存款一百六十元，以此款开了一片小店，到如今吃穿不愁，竟是丰衣足食之家了。

从下面几个表中，可以看出他光景的发展：

表四 蓝凤城 1941—1943 年收支对照表
单位：折粮食石

项 目	1941	1942	1943
年总收入	5.413	19.939	21.807
年总支出	3.762	12.648	17.448
年存余	1.651	7.291	4.359
说 明	本年度本人无牲口、农具，劳力还不很好，故农业收入不多。		本年度店中生意不好，更因儿子问媳妇破费，故存余不多。

表五

蓝凤城各项开支表

单位:折粮食石

项 目		1942		1943		说 明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主要必需品	自给	2.467	19.50	4.125	23.64	米、麦、线、棉等
	购买	2.120	16.76	2.264	12.98	盐、火柴、碱等
	合计	4.587	36.26	6.389	36.62	
次要必需品		1.651	13.05	1.950	11.18	染料、坤袜等
非必需品		2.180	17.24	1.306	7.48	迷信品装饰品等
嗜好品		1.200	9.49	1.076	6.17	水烟等
牲 畜		1.739	13.75	2.173	12.45	
负 担		1.291	10.21	1.144	6.56	
其 他 (股金及特				3.410	19.54	特支指问媳妇
总 计		12.648	100	17.448	100	

表六

蓝凤城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

物品的费用对照

单位:折粮食石

项 目	1942		1943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总支出	12.648	100	17.448	100
边区外	1.576	12.46	1.268	7.27
边区内	7.314	57.83	10.911	62.53
自 给	2.467	19.50	4.125	23.64
负 担	1.291	10.21	1.144	6.5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农民的收入和支出都是逐年增加的，而负担则减少了，表示人民财富逐年增加，购买力逐年提高。在开支项内可以看出自给的数量增加，说明自给经济力量在扩大；大部分物品从边区内部购买，一部分还需要靠外面供给。

上面的统计数字还告诉我们，正因为人民财富增加，消费量增大，如何有计划地去管理对外贸易，就非常重要了。只有执行正确的对外贸易和税收政策，才能保障边区自给经济有充分发展的条件，同时也只有有计划地把边区自给有余的生产品，如盐、皮毛、药材及将来的粮食等，输出到边区以外去，交换在边区内不能生产或还不能完全生产的一些必需物品，才能保障出入口平衡，争取出超，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否则对边区经济的发展是极端不利的。

总之，一方面因为国民党（敌伪也如此）不愿我们的经济向上发展，加紧同我们作经济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来保障我们的经济更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就必须正确地从管理对外贸易中来进行对外经济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获得胜利。

要使我们取得对外经济斗争的胜利，必须团结内部的力量，也必须实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方针。

西北局现在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来统一管理全边区的对外贸易，并责成它要由局部的管理，逐渐做到全面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的贸易公司必须善于依据自己和可能使用的民间力量，首

先从主要的出口物资如：盐、皮毛、药材和可能出口的粮食、油类等的出口管理起，不要企图立即去统制一切出口贸易。有些次要货物的出口可交地方或部队去组织，但必须指导他们的贸易方针，使之符合于总的对外斗争的利益。贸易公司要把这一工作做好，绝不能再采取像过去物资局那样不联系群众的孤立政策。它必须善于与合作社、公营商店、机关、部队以至于私营企业和商人密切合作。它必须善于去组织边区内的群众和边区外的商人，来冲破封锁，尽量输出我们需要输出的东西与输入我们需要输入的必需品。它必须紧紧掌握对外贸易的原则，贯彻发展与保护边区经济的方针。它必须经常很清楚地了解边区内外的商情，能够主动地及时地和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贸易公司的一切活动，只有认真实行公私兼顾与群众路线的方针，才能团结内部，统一步调。总之，贸易公司的任务，应该明确地规定，它是对一百四十万人民群众及十万大小公家人员的生产与消费（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上，其次也在对内关系上）起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的机关。在这里，并不废止私人的对外与对内的一般商业，贸易公司起的是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它不是从中夺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机关，它是与国民党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作斗争的机关。它是保护一百五十万军民的经济利益的机关，它是一个大合作社。只有这样，它才能完成西北局所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对外经济斗争能获得胜利，不仅贸易公司要努力负责，所有合作社、公营商店和企业也要自觉地负责地协助贸易公司去进行这个斗争。我们的一切党政军民机关，也要领导群众自觉地去协助贸

易公司进行对外经济斗争。比如我们要号召大家自觉地完全服用土货，不用外货，自觉地忍受一时的不便，甚至暂时牺牲小己的利益去顾全全面的利益。当着某些口岸被国民党特别严紧封锁，或在某处大量运进货物（如去年三边运进大批布匹）企图捣乱我们金融，或当贸易公司为着对付国民党的封锁和破坏而主动地决定某种东西暂停输出或贴价输出，或暂停购进，或为巩固边币而打击法币时，各方面都要协同一致地去做，不能因为与局部利益冲突，便任意破坏政策，错乱步调。当着贸易公司及银行在对外经济斗争中发生困难时，各方面都要自觉地给以支持。如前年十二月及去年三月紧急动员各机关交出法币以克服边区金融波动那样。

总之，我们应当了解，与国民党作经济斗争是一个繁重的任务。要看到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今天比我们还是强大些，但是它内部存在的不能调和的矛盾是完全可以被我们利用的；我们的经济力量虽然今天还处于劣势，但我们内部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必须克服内部矛盾一致对外，做到随时能够集中调动自己的力量，既便于进攻，也便于退守，那样才能使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免于失败并获得胜利。

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我们陕甘宁边区现在是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环境，我们比敌后各根据地具有进行经济建设的优越条件，能够通过建设逐渐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和平环境是存在于全国抗战的局面当中，是处在敌人和顽固势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包围封锁状况之中；另一方面，陕北历史上又经常发生严

重的灾荒。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除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之外，还要能够准备足够的力量，以便将来进行驱逐日寇的反攻战争，并且也要具有充分的力量保卫边区，以防止反共势力的突然袭击；同时又要积蓄必需数量的粮食，以防止万一到来的灾年。这就在我们的面前提出了积蓄力量的严重任务。

积蓄力量的办法有两个，就是生产和节约。从生产中使我们的公私财富逐年增加；从节约中使我们的财富能够积累，不浪费，更多地用之于发展生产。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从组织人民生产中保障人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真正做到在战争环境当中可能做到的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浪费现象，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

节约的方针不是要减少必需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以便建立公私雄厚的家务，能在坚固的基础上保持长期的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们之所以要保证必需的消费，保证一定标准的丰衣足食生活，不仅因为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障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战士与工作人员身体的健康，工作效能的提高，部队的巩固，都有伟大的作用。这是去年一年许多生动丰富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我们之所以要提倡节约，因为去年我们的确还存在有很大的损失和浪费现象。这种浪费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比如，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和在输出物资上没有严格地注意等价交换政策的掌握；银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这些情形，都使大小公家和人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在供给上，

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了供给标准,部分的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比如在被服的供给上,或者不管是否必须增发和添补而滥发了许多可以不必发的被服;或虽然作到了按时发给,但大部分被服质量很差,不能耐久。在肉食、油盐的供给上,也有过量的事实。在窑洞、

表七 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 单位:元

项目	今年 每人 开支			往年 每人 开支		
	数量	单价	年金额	数量	单价	年金额
粮食	1.5 石	20,000	30,000	1.8 石	20,000	36,000
单衣	1 套	10,300	10,300	2 套	10,300	20,600
棉衣	2 套	21,200		1 套	21,200	21,200
罩衣	2 套	10,300				
毛呢衣	1 套	18,000	13,500*			
	(平均穿六年)					
毛巾	1 条	600	600	2 条	600	1,200
被毯	1 条	12,000	2,400	1 条	12,000	4,000
	(用五年)			(用三)		
棉鞋	1 双	1,500	750	1 双	1,500	1,500
	(用两年)					
单鞋	1 双	1,200	1,200	2 双	1,200	2,400
草鞋	3 双	500	1,500	4 双	500	2,000
皮大衣	1 件	40,000	5,000	1 件	40,000	8,000
	(用八年)			(用五)		
绑带	1 付	2,100	700	1 付	2,100	1,050
	(用三年)					
衬衣				1 套	4,775	4,775
合计			65,950			102,725
节约			36,775			
总计			102,725			102,725

* 棉衣 2 套,计 42,400 元;罩衣 2 套,计 20,600 元;毛呢衣 1 套,计 18,000 元,合计 81,000 元。使用 6 年,每年平均为 13,500 元。

房屋、礼堂的建筑和修理上，也有不少的浪费情形。在日用品上，不去努力提倡使用土货或代用品，而去购买外来品。某些机关、部队甚至取消了预决算的制度，形成随便开支，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来自没有长期打算、不去认真建立家务的观点。群众当中也有因为财富的增加开始产生某些浪费的现象。

上面这些浪费损失，如果加以认真的统计，数目必在几十万万元以上。假若能够把这些浪费的资材和金钱用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上，那是可以再生产出成倍于浪费数目的财富的。

从三五九旅今年计划的每一战士在粮食与被服的开支上和往年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节约的数字如何的庞大！

从上表所列，去年每一个战士，按旧的供给标准共需十万零二千七百二十五元，经过各种节约后，今年每一个战士仅需六万五千九百五十元，而并没有减少丰衣足食的标准。每一个人在一年内的开支就节省了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五元。三五九旅这样节约的原则，一般是可以运用到边区其他部队中去的。

今年杨家岭机关发展个人生产和公共生产的结果，与去年政府所发经费比较，完全要政府开支的减少了八项，计津贴费、保健费、卫生费、夜餐费、杂支费、马杂支费、鞋子毛巾肥皂费、伙食费；减少政府一半开支的有办公费及单衣费。另外，今年还决定至少节省粮食五十石。以上总共减少政府开支五千二百四十九万元。以二万元一石小米折算，共节省政府开支二千六百二十四石五斗。以杨家岭一千零二十二个人计算（小孩在内），平均每人节省政府开支二石五斗六升

八合。西北局机关将其个人与公共生产节约合计，平均每人减少政府财政开支亦在二石五斗以上。

以上计算还没有包括马草、路费两项，如将此两项计算在内，每人平均节省开支要超过三石，更没有包括中央与西北局所节省的特费开支。杨家岭和西北局机关的这种生产节约的原则，是应当用到其他机关、学校中去的。

根据上述机关、部队节约的标准来估计，边区全部脱离生产人员的节约，今年至少可以达到二十万万元以上，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开支。若以这二十万万元投入其他生产事业中，则今年还可以生产数十万万元的财富。至于老百姓能够节约的数目，现在还无法估计，但我们必须在群众中进行一些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懂得尽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尽量使用边区自己所造的工业品，来增加自己财富，保护自己生产的发展，比如节用迷信品和其他边区以内还不能够生产的外来物品。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功效的。

由此可见，节约对于发展边区经济，调整生产与消费，节省政府财政开支，保障进出口贸易平衡，稳定金融物价，建立家务，积蓄力量等方面，是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延安各部队、机关节约运动的经验，一般节约方法是从三方面着手的：一是从发展生产中提高自给能力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二是极力减少各大小单位不需要的开支，极力提倡用自制品，减少购买的支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展开节约运动。三是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以一定比例的节约部分划为私人所有，以刺激个人和机关的节约运动。

由发展生产而替公家减少财政开支的事实，去年已经做

到，除粮食被服外，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六十四。今年生产运动更加展开，可以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八十。有的部队如三五九旅已可完全自给，有的在今年秋收后也能完全自给；西北局与杨家岭机关除粮食及部分被服外，已自给百分之九十。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如果继续认真地发展，政府多注意扶持，一两年之内，只要无突然变动，部队是可以向三五九旅看齐，做到完全自给，机关及部分学校是可以同西北局、杨家岭并进的。

就部队、机关、学校本身说，确是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如停止建筑，不使用奢侈品，减少应酬招待等。特别要注意许多供给制度上的改善，如改善炊事工作，既可节省粮食，又可节省柴炭；改善运输制度，既可节省运输费，又可发挥运输力。因此关于节约方面的已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介绍，并且还要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好好创造，来展开公共的与个人的节约运动。

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是促进生产节约运动的好办法。去年延安许多机关、学校运输队的改造，运输力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了二八分红制。中直各机关能节省粮食一千一百石，也是由于实行了公家与炊事员的二八分红制。今年中直各机关订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完全归公的办法，如节省政府所发单衣百分之五十，并决定机关、学校每人节省五升米交公家。二是节约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的办法，如杨家岭各小单位节省的印刷纸张、办公费等，规定以百分之四十归财政厅，百分之二十归杨家岭，百分之四十归私人分配。三是节约完全归私的办法，凡是个人生产任务中规定由公家发给他个人所用的东西，而他能节约者，其所值完全

归己。因此杨家岭工作人员今年在生产与节约中，除交公家任务外，个人所得平均可到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粮食。

在人民群众的节约方面今年要特别提倡使用边区产品的运动，宣传教育老百姓穿土布，用土货。这不仅是一个大的节约运动，而且是一个大的保护边区经济发展的运动。希望各地党政军民根据当地发展自给经济的实际情况配合进行。

我们既总结了去年财经工作的经验，我们相信今后可以克服在对外贸易、财政制度和金融方面的浪费。同时根据上面所讲的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及人民中展开的节约运动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成绩。厉行节约与发展生产配合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任何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一定能使边区经济更迅速的达到完全自给！

四 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我们要承认，随着边区生产的发展，就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如贸易如何管理，金融物价怎样才能巩固和稳定，财政政策如何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何运用因组织起来而节省出来的劳动力，怎样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以推动建设事业发展等。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其内容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过去对这些建设中的新问题是缺乏经验的。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那就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从摸索中去发现其规律性。这不免要感到困难，发生缺点和错误，但遇到这些困难、缺点和错误也正表示我们是在发展当中，它们是发展中的产物。我们要不怕发生困难、缺点和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以学习

的态度与群众联系,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就是要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们过去在贸易、金融、财政问题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从思想、方针、政策、作风方面都加以揭发,算是在财经工作上作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整风,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新方针和办法,只要全党来注意这些工作,我们相信会很快地走上正轨,把这方面事情搞好的。

但是,要使全党努力做好财经工作,首先就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动员和实践,应当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的重要性,也能有如对农业生产一样的认识,也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发现和培养大批的干部,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

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为什么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而且是用战争——不惜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如像过去的内战和现在

的抗日战争一样，去破坏旧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呢？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妨碍生产力，也就是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比如在旧的农村社会中，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垄断了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畜、肥料、种子）和社会财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反而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用高度的租额向地主租佃土地来耕种。地主对农民除开地租的剥削以外，还有劳役和其他的剥削。地主阶级依靠这些用无止境的剥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愿意拿出本钱从改良农作法、水利、工具、种子、肥料等方面去增加土地的产量和社会的财富。广大贫苦的农民因为没有或者缺少土地，而租种的土地又没有佃权的保障，也就无力或者不愿意去改良土地的耕种。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自然就要严重妨碍农业经济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呻吟于地主阶级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来侵占中国，其目的自然不是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使中国人民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恰恰相反，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为它的驯服的奴隶，以便于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掠夺中国的物资，来满足它独霸东亚的野心。只要看现在沦陷区的同胞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们负担着繁重的捐税，自己劳动生产的物品，都被日本强盗和汉奸政权强迫集中或廉价收买，而另以高价“配给”人民。他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

人民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下面，自然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一到这种要求达到觉悟高度的时候，就会不惜任

何牺牲和代价，用暴力和战争去达到推翻这种统治和制度的目的。这在过去就叫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各种革命的政策；在今天就叫做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用减租减息的方法逐渐改变旧社会存留的封建剥削关系。

但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把帝国主义势力赶走，把旧的制度和统治推翻以后，哪怕只在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例如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目前的抗日根据地，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而拥护我们，参加革命奋斗，也需要我们拿出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

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陕甘宁边区，今天是处在相对和平环境，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经过了土地革命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条件下（自然我们要随时准备战争），建设边区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领导所有的人民和部队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

这种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早在一九四一年，当时的边区中央局即现在的西北局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去年高干会期间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小册子，更规定了经济建设中各种具体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对农业第一的基本方针，边区的党和干部从实践中是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和政策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西北局对各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指示，但应当说各地委和县委对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在整个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的。

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金融物价的波动，虽然已经开始引

起了地方党的注意，但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的讨论，以及负责任地来掌握这些政策，贯彻执行这些政策，还是非常不够的，甚至于还没有完全把它看成是自己担负的责任，以为这是物资局、财政厅、银行的责任。而在这些系统的工作同志，认为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受本系统的上级领导，当地的地委县委不能够干涉，闹独立性，使地委县委也难于去管理他们。必须指出，这些情形的存在，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开展是有很大妨碍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波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是起了很坏的影响的，而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也 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大家从切身困难中，引起了对金融、贸易、财政问题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要召开这次高级干部会 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在这次高级干部会上能够 和必须向 全党提出贸易、金融、财政问题的重要性，把过去的经验教训 加以总结，订出今后努力的方针。我想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 是可以引起全党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 或受到障碍，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想出许多合乎实际的办法，来 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从这次金融波动中，也使我们大家认识到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特别是在与敌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更不

能有所差错，有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相反，如果情况了解，措施适当，也就可以获得胜利。比如在边区内，某几种货物规定要用法币交易，结果会促成金融更加波动，引起物价高涨，人心不安，党的政治影响受到损失；相反，决定这几种货物在边区内贸易和在对外贸易时一律改为边币交易，边币市场马上扩大，购买力提高，物价也随着稳定，甚至下跌，边币的信用立即提高了。又如法币贬值时，外面物价高涨，我们不明情况，或者明知法币低落而不去适当地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物资被人家套购出去了，或者变成了不等价交换，使我们蒙受很大的损失。相反，当法币回涨，物价低落，我们不知道按情况降低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货物卖不出去，造成入超，也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些情形告诉我们，要把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做好，必须依靠我们正确地、艺术地、及时地去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否则，是会把事情弄坏的。

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年来我们参加贸易机关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实践中也学会了一些，有了许多业务上的改进，这都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商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行行出状元”，这一句话说明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精微奥妙的高深知识，绝不能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学会一行，就必须虚心地从那一行的ABC学起才行。

列宁说：“问题是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最好的，虽然是非常诚实，忠心耿耿的，虽然他曾经忍受过苦役

而不畏死难，但他却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一个经营商业的人，他没有学习过怎样做生意，也不愿意学习，也不了解他必须从 ABC 学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过世界上最伟大革命的革命家，一个为众目所注视（如果不是为四十个金字塔所注目，则无论如何是为欧洲的四十个国家所注目）而抱着从资本主义下面解放出来的希望的人——他应当从一个普通的店员学习起，这个店员有十年的商店经验，他懂得怎样做生意；而负责的共产党员与忠实的革命家，却不仅不知道经营商业，而且甚至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

的确，我们有许多同志，很好的干部，很诚实，甚至是很负责的干部，正如列宁所说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现在许多同志，至少这次到会的同志知道了搞商业，搞金融贸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进步。

经济建设工作既是当前任务的中心环节，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又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错误，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干部，不仅是供给这一个区域的需要，而且要把这方面有经验的干部供给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各地党组织应当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以健全财经机构，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了对金融贸易财政工作的方针，

到会的同志都有了新的认识，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各地到会同志回去以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妥善的解决。

同志们，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复杂的，其紧张的程度犹如军队作战一样，因此必须强调领导的统一。闹独立性，闹本位主义，互相竞争，不服从决议，破坏政策法令等，都只能是混乱自己的阵线，在客观上帮助敌人。这次高干会决定，各地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必须统一于各个地委的领导之下，各地委又必须统一于西北局及财经办事处领导之下。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应当看到自己的责任是大大地加重了，必须加倍努力把事情搞好。我们相信在加强领导之后，经济战线的事情是一定可以办好的，我们的建设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想我们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对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较之过去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也只是比较而言，因为时间很短促，一方面我们没有可能把实际情形详细地在这个会议上来讲，另一方面又没有许多文件作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据，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旧的文件可参考，因此我们还只能是粗枝大叶地对过去作总结。我的讲话也不能作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最后结论。其所以不能作为最后结论，是因为湘赣过去所执行的路线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是分不开的，而那个时期的党的路线究竟如何，是需要七大作结论的。在七大以后，根据七大的认识来讨论湘赣工作，才能够有更完全的认识。但是这次的座谈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共同的意见或者是初步的结论，因为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延安还分别召开讨论各苏区和各部队历史问题的座谈会。本文是任弼时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 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目的

我们在湘赣做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了，我们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说要懂得我们在湘赣工作的时候，是在四中全会以后，不管旧省委也好，后来的新省委也好，都是执行了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的，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没有把它当错误的路线，相反的，倒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过去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形的。

比如有一种人，他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的反省，应该反省自己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就是说应该反省自己在当时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为什么拥护了那个路线。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需要在这方面作自我批评。虽然错误路线下造成的罪恶应由路线负责，但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执行了那个路线。

另外，还有一种人，在那种错误路线下面，他利用党的错误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活动，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是说是品质不好的人。这种人不仅要反省他的思想方法，而且要反省他的品质有什么毛病，造成什么罪恶。

再还有一种人，虽然在错误路线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误路线，他对错误路线有抵抗，有不满意。这种

人在任何一个苏区里面都是有的，就是说他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而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这些同志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如果是这样反省，也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

也还有的同志有官僚主义的倾向，脱离群众，作风不好，因而使工作受到更多的损失，等等。

总之，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

今天我们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这样对各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益处。

其次，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今天的观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大资产阶级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尺度来要求过去，来看过去，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具备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合作的条件。但在“九一八”之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上是起了新的变化的，在今天来看，当时的某些社会政策可能改变或者应该改变。比如在对十九路军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以争取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那个时候这样的可能还没有，就是说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还不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所以我们说，不能以今天统一战线的尺度去看那个时候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的某些可能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措施，比如“九一八”以后，我

们在某些政策上应该加以改变，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应该有的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点。

再次，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也需要研究出在错误路线下还能够得出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要很冷静很客观地来分析当时的情形。如错误何在，是什么原因，在哪些地方还有成绩。这种态度是很需要的，在教育党教育干部上，必须具有此种态度，同时也只有如此才合乎事实。

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对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

这就是我们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目的。

二 对湘赣苏区历史上各个时期党的路线的估计

为着讨论的便利，我们把湘赣苏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临时省委以前为一个时期，旧省委（包括临时省委）为一个时期，新省委为一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为谭余保为同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的干部到会的很少，我们很难谈到许多的具体问题。这次我们的座谈主要还是弄清旧省委与新省委这两个时期之内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把临时省委以前这个时期的情形简单地说一下。

根据这几天的座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湘赣这个区域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和群众斗争的基础。在永新、莲花、茶陵、宁冈等县内，大革命时就有群众斗争，特别是安源等地方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北伐也经过那些地方。湘赣这个区域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重要的地区，中国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它不是首创也是第一批（大概除了广州暴动之外它就是首创地）。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有群众斗争的条件，其次是有它的地形条件，如井冈山是很好的地形条件。在政治条件上说，它也是比较偏僻的两省交界或三省交界的区域，统治阶级在那里的力量薄弱。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以后朱、毛选择了这个地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毛主席曾在这里搞了一年多，在宁冈、永新、茶陵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叫做革命割据，创造了一套政策，包括建政、建军、建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套正确的办法。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后来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也就是保存了毛主席

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毛红军离开这个区域以后，在立三路线(1)幻时期，湘赣边的党是否执行了这个错误路线呢？应该说湘赣边党的领导机关一般地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路线的。比如湘东南的五次暴动，赣西南的八次攻吉安，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组织行动委员会等。至于执行这个路线时，是不是下面还有一部分同志在那里实事求是地按照毛主席的精神奋斗呢？那还是有的。某些党部、某些同志和许多党员干部不满于立三路线，保留了原来的一套好的东西。我看毛主席的这种作风不仅只在湘赣这个区域才有，即使在其他区域执行错误路线下也是存在的。当然湘赣这个区域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直接参加的一个区域，毛主席的影响更深更广些也是自然的。我觉得在湘赣的军队里面，毛的传统保持得更多一些，这一点我是这样的看法，大家也还可以考虑。

（一）新旧省委执行的路线

旧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些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临时中央从上海搬至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路线是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四中全会只形式上停止了立三路线，而新的“左”的路线在四中全会后不久就产生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能够揭发立三路线的社会的政治的根源。所谓社会的根源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的根源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统治者非常仇恨的思想。这两个思想都是发生“左”的根源，都容易走向“左”

的错误方面去。四中全会也没有指出立三路线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的说来，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并且批评了三中全会（mi）的调和路线，但是并没有看到“左”的根源何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依然保存了立三路线时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而且四中全会不正确地提出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说右倾是主要危险，因此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策如土地问题、劳动政策等，以及许多的个别政策都表现得很“左”。但是，我们说形态完备的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因有日本打中国，有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又有几省的大水灾，就认为革命形势到了，认为中国已经革命化了，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是总崩溃，于是提出要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是夸大了国民党要崩溃的一面，提出了不正确的任务和斗争的策略，成为一个极左的路线。这个“左”的路线是否把各个区域普遍地统治了呢？是否各个苏区都被它统治了呢？那就不一定。比如在中央苏区，就遇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的抵抗，毛主席就不赞成打大城市。但是是否部分的也被执行了呢？是的，如分配土地上就执行了。在临时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有打开，回来之后就再没有打大城市。这就是说实际上并未贯彻的执行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

我想在湘赣，旧省委虽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并没有

充分执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福建打出一个罗明路线来，江西虽然没有指出省委有路线错误，但也打了几个地区，还处分了邓、毛、谢、古。这表明苏区并没有全部执行他们的路线。湘赣之所以被打，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认为福建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是机会主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央局的领导有问题。

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以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极左的路线，这对于中央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这种情形下面，他们认为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求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这里我顺便说到一个问题，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带一个机会主义 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定要带的。为什么？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以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张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 要带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去了上犹苏区，红军 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所以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

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如果现在我们研究罗明路线这个问题,我看错误的不是罗明,罗明倒是提出了一些边界上斗争策略的问题,如武装斗争、两面政策等。他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这些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了,应该很好地去研究解决,但那时候中央不独未去研究,反而抓住这一点来打击他。

至于旧省委和新省委所执行的路线,“左”的具体的内容是表现在各种政策上。

旧省委在土地政策方面就改变了毛主席过去的分田原则,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决定,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重新分配土地虽说是对的,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分田的方法不对头。此外,如驱逐豪绅地主出境也是“左”的。在劳动政策方面是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所通过的七十五条劳动法,这里面有八小时工作制那一套,把大城市的東西搬到农村里应用。文化政策也是共产主义的一套。苏维埃政权建设也是根据全苏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进行的,那个宪法大纲是很“左”的,在那里规定了一切剥削者都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规定富农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简直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了,这就表现了对革命性质的模糊。照那个东西看起来,只有雇农、贫农、中农才能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肃反是在中央苏区时特别授命为中心工作的。在军事行动方面,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这个“左”的口号下面打过一下分宜,但只是打过一下,

以后就没有打了。这一套“左”的政策是为旧省委所执行了的,但是执行得不彻底。比如有些地区分田还是按人口分;军事行动上要与湘鄂赣打通,打了一下没有打通就不打了,因此后来受了批评打击。

新省委因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所以在某几个政策上就特别表现了突出的“左”。

第一,在土地问题上,查田查阶级方面比旧省委表现得更“左”。旧省委在土地问题上也是“左”的,如驱逐豪绅地主。新省委没有驱逐豪绅地主,但是有查田查阶级。驱逐豪绅地主不对,但它还是对地主阶级的,而查田查阶级却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特别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当富农,把富农当地主,甚至查出一些干部家庭成分不好,认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放在劳役队,甚至当作反革命。当然省委并未决定查田要查几代,然而实际上是查了几代。

第二,在思想斗争中的打击政策也特别“左”。反对王首道的机会主义动摇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打击政策,在湘赣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一直到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这种打击政策一直继续到六中全会时,才基本上结束。

第三,是在群众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这里面包括扩大红军,动员担架伕子、借公债等,比过去旧省委时期也为突出。打击政策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扩大到了群众里面去了。在扩大红军方面枪毙的人还少,动员逃兵归队方面枪毙的人就多一些,查田查阶级里面杀人杀的也还少。这一点上得出的结论是,虽比旧省委突出,但与中央苏区也不同。在干部

打击政策方面,我看和中央苏区比较一下也不同。

这三个问题是新省委特别突出的“左”的政策表现。

至于其他政策如劳动政策等都还是继续旧省委的一套,没有什么变化。

总起来说,就是新省委继续执行“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各种政策上,特别在上面举出的那些政策上更加“左”得突出一些。这里也要说明,新省委执行的政策虽然更“左”,但并没有完全达到当时中央所要求的程度,因此使得中央后来还批评新省委有右倾机会主义。

(二) 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问题

在肃反政策上,第二次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几个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怕还是第一次肃反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序些,捉的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干部占的数量为多。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高潮时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区乡都可以杀人,后来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混乱。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经过省府批准(逃兵例外)。有的同志估计第二个时期杀的人质量比较高一些,这是个事实。为什么第一次肃反时旧省委比较坚决,而在第二次肃反或刘士杰捉了很多人时就动摇了呢?因为第一个时期捉的人主要是西路分委的干部,那个时候对西路分委有这样一种观感,觉得西路分委AB团多,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那里,当然这也

还是错误的。但这里面也还是存在着不自觉的山头主义的，觉得湘东南的干部可靠些，对西路分委的干部因为有富田事变的关系，怀疑多些；又因受了中央的命令，因此肃反坚决些。而第二次发生动摇，因为肃到湘东南这批干部身上来了，肃到自己在赣西南提拔起来的一批干部（他们是本地的，是经过旧省委提拔起来的，所以比较熟悉一些），因此对肃反发生怀疑，于是派人到中央报告。王首道、王震、甘泗淇、张启龙虽都怀疑，但派人去报告恰恰碰到更“左”的路线来了，它是以更“左”的精神来看苏区的问题的，所以反而批评旧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不仅没有支持旧省委对过去肃反的怀疑，反而批评旧省委右倾。第一次与第二次肃反，军队里面都要好一些。

以上是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比较。新省委所提出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的口号是不对的，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杀人也还不算很多。当时刘士杰有这样的意见，说带一升米进永新城就要杀，这个意见是被大家反对了。

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的，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但也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样扩大化，因为建立了革命秩序，不会使肃反那样无组织地发展下去。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想肃反问题就暂时说到这里，大家还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三）新旧省委在军事方面的问题

新省委在军事政策方面比旧省委更“左”的有哪些方面？

我看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只是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两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

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面，在苏区斗争的环境下面，军事问题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有时候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军事问题包括军队建设和军队作战方针。我有这样一个认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朱毛红军传统在湘赣军队中保持得更久一些。比如红军三大任务为的作法在湘赣苏区就保持得比较久。后来虽改变了，但在斗争中，在长征中，也还是多少采取这些办法的，有时候是斗争环境使你不得不这样做。在作战方针上，虽然旧省委在“左”的路线下也打过分宜，但经过那个尝试之后，碰了钉子，马上就停止了，而采取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方针。后来新省委也执行过新的军事方针，如修碉堡、筑工事等，但搞了两个月之后，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由永新县转移到遂川、万安、泰和方面行动。在第一次长征（23）行动中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军事作战路线上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的传统。这一点也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保存这样一些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并且还能够取得一些胜利。

一般地说，红军的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旧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为红军的。湘赣红军是第二种形式产生的，湘赣红军是由游击队集合而为大队伍的。独立师是这种情形，赣西南二十军也是这种情形。这样产生的红军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样的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它是在群众斗

争下面产生出来的。

第二，这样产生的军队，对地方党政一般地说服从习惯要好一些，因为一个小游击队过去县委、区委都可以指导它的行动。

第三，这样产生的红军，干部的机动性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要比较好一些，因为它是在群众斗争中由最积极的分子集合而组成的。

湘赣红军具备了这些特点，我们应该估计它的政治素质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

对于创造这个队伍，哪些人是有功绩的，哪些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呢？我们说从本队伍里面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李天柱、萧克、蔡会文这些同志是外面来的帮手，他们对部队的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基本的创造者应该是上述那些人。

那么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它是游击队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比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一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是大一些。我过去也是这样看法，它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

十七师北上，我们就其结果来看，是错误的。湘赣当时处于辅助地位，这种辅助力量为了与主要地区配合，受些损失，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在福建事变以后，如果中央的方针的确是配合十九路军，因此需要湘赣军队到南得路上活动，以这个力量辅助主力，使主力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达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目的，这当然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的十七师北

上，并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北上，湘赣的整个形势虽不会根本改变，但是会使那个区域的斗争坚持得更长一些。至于六军团的突围，还是不可免的。

在十七师北上回来之后是否执行过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退出永新时我记得是有游击战争的部署，那个时候还想占领井冈山。但是我们是不是受了新军事路线的影响还想在那里坚留一下呢？我想是有的。这就是说在五、六两个月基本上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后来，在松山战斗后才改变。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

突围的军事行动，在帮助主力红军方面，成为主力红军的先遣队的作用来说，大体上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突围有没有缺点错误呢？应该说是有的，主要的我看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三 对湘赣苏区新旧省委成绩的分析

旧省委时期有这样几个显著成绩：

第一，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湘赣边原来是分散的，有湘东南、赣西南，还有北路分委，成立省委以达到对这个区域斗争的统一领导，是很需要的。

第二，旧省委深入了斗争，发动了基本群众，巩固了（恐怕还发展了）苏区。

第三，建立和发展了武装，如独立第一师等等。

这些是旧省委领导期间的基本成绩。省委、军区、省政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只这样概括地说一说。

新省委虽然是更“左”了，但也还有它的成绩。概括地说，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上，在扩大武装及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

为什么在错误路线下还可以得到这些成绩呢？我看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首先，这个区域实行了土地革命，虽然我们土地政策上是“左”的，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但不能否定基本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雇农、贫农、中农（虽然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苏区是热情保护的，虽然我们执行“左”的路线，“左”的政策，但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权还是爱护的。

其次，广大党员和干部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干部当中还是存在的，上面虽然规定

了“左”的政策，但有许多干部在执行时，往往对它有許多纠正。如肃反问题，在军队里面并不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搞得很“左”，这就是有些纠正。许多下层干部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虽然规定的政策很“左”，但他们执行时是能做几分就做几分。

还有一点是两个时期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如王首道、张启龙等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如在军事上打分宜打得不好，就不是去硬拚。其他政策方面也是一样，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这也是使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所以两届省委都还是得到了一些成绩。

两届省委存在的共同的缺点，拿思想方法来说，都是有些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具体地说，都是对于一个区域的斗争历史没有加以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的政策也是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这大概是过去党内一般的作风。我们说如果对当时当地的情形加以了解，比如旧省委到那个地方以后，把这个区域加以了解的话，那么我相信对西路分委肃反中的问题会能发现，肃反中的“左”可能有一些改变，对西路分委领导下的干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新省委对过去也是缺乏了解，如果能像我们这次座谈会一样的座谈一下，那么对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也会改变一些看法的。这都是割断历史，因此不能够接受那个区域的历史教训。这一点教训，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是将来任何一个同志到任何一个区域工作时，必须引以为戒的。

篡党篡军这个问题。旧省委是中央派去领导的，不能够说他是篡党篡军，上级派人下去领导就说是篡夺领导，那以后就不能派人。派去的人他并不是以阴谋手段把人家推翻，自己夺取领导，就不能说是篡。王首道以及其他几个同志被派去领导湘赣，中央指定他们为领导机关，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钦差大臣、篡夺领导。至于这个领导机关，接受本地干部参加是不够的。这一点两届省委都值得反省。蔡会文同志去了以后，当军区司令兼政委，并兼八军政委，是否能说他是篡军呢？从形式上来说把军权拿下来了，但也不能说他篡军，因为事实上加强了对这个区域的领导，对地方部队也有帮助，至于大家感觉到他闹独立性，不尊重地方党的领导，这种缺点是有的，但以后还是纠正过来了。

至于刘士杰这个人，他是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的，好在没有让他掌握全权。他当时是被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去中央作了报告之后就被提为党的书记。刘士杰回来以后的确是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这个阴谋是明显的，但对刘士杰的本质是不容易一下认识清楚的。他会说话，是个工人，并且有些小聪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旧省委把他提拔起来，我们那个时候也认为他还有些能力。我对刘是放任了，他就利用我对他的信赖进行私人活动。到什么时候才感到此人不大妙呢？在守井冈山以后。以前从他生活上也看出了一些问题，觉得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在长征中更暴露了他的坏处。到了与二军团会合以后，组织党的领导机关时，对他的认识已经改变了，过去是副书记，此时只参加常委。第二次长征之前，给了他一次很严格的批评，撤销了他

的职务,这次之后他就跑了。今天我反省起来,觉得我对刘士杰的本质感觉不灵敏。他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当时就为他这些假象所蒙蔽。但说刘士杰当时就是反革命,我看则没有根据。我认为刘士杰和陈洪时都是投机分子。当革命胜利之时,当他们在党内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留在党内,当革命困难之时,当他们个人地位动摇时,他们就可离开革命,叛变革命。我们对这样品质的人,当时没有看清楚。在对刘士杰的问题上,我有责任,放任了他,对他的品质认识很慢,虽然认识一个人要有过程,但这个过程拖得很长。

还有一个问题也谈一谈,就是在错误路线下面一些党员违反了党的纪律,如贪污或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等,受了处分,不能说因为路线错误就要根本取消。

湘赣问题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了,上面我已经讲过,现在很难作最后结论,但是把基本意见暂时归纳起来还是可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想一想,我今天讲的这些也只是一个意见,还可以修改。因为一些同志要走了,座谈也还是带搜集意见的性质的,今天我们得出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大家共同的意见,七大以后我们对于湘赣问题再进行更深刻的讨论。

南下的方针与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最近中央曾讨论同志们此次出发的任务及行动的方针，中央认为有必要给同志们传达一下，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

一

这次有许多干部及队伍从延安派到湖北、湖南去，并亦准备派往河南一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有决心要在平汉路南段及粤汉路日寇最近占领区去开辟抗日根据地，在这些地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日本，准备反攻。同时要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预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这一道堤的修筑是很重要的。

为何说此堤的修筑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看出，国民党对抗日不积极，实行民主之希望不大。全世界要实行民主，法

* 为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扩大对口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并准备对付在抗战胜利后可能发生的内战局面，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主的南下支队，挺进湘鄂赣粤。本文是任弼时在南下第一支队出发前的干部会上的讲话。

西斯要垮台，这本来是必然的趋势，国民党应采取民主办法实行反攻，但它不是这样，它害怕，它不愿放弃其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办法，因此它在抗日方面是消极的，而反共反人民则是积极的，并且准备在反攻时打共产党，所谓反攻与反共一同进行，反攻即将日寇、共产党一起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当国民党打我们时，我们有堤挡住它。如将来国民党进步，当然更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提出改组政府及统帅部，即是希望它进步。我们希望它进步，不是消极地等待，而要积极地推动，并且要准备它不进步时抵抗它。现在看来，它的进步不大，因此我们更要筑堤防御。这个任务应当说是很大的。

在这样的总的意图下面，到了湖南、湖北这些区域之后应当搞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搞武装。扩大武装创造武装力量在长江南面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在华北华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只有东江一带有我们不很大的游击队，在长江以南根据地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很小，过去发展的机会也不多。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因此我们要在长江以南努力发展武装力量。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谁武装力量大一些，谁讲话才会有力量。为什么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有这样的地位？因为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但是，我们这个力量今天在华南还很小，拿我们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比较起来看，国民党的军队在数量上比我们多（当然在质量上比我们差）。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华南日本人占领的地方要建立和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华北华中我们现在再发展也比较困难，

将来反攻的时候可以发展。我们要使我们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比如现在国民党有三四百万军队,其中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占了好几十万。我们前不久有四十七万军队,现在则有六十三万军队,将来要作到能有百把万军队,而且我们军队的质量要比国民党的好。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加上地方进步武装,合起来要超过国民党的中央军,超过国民党的力量。这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共产党才更有力量。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才可以使国民党在某些方面表示一些进步;也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地方实力派和中间派才会跟着我们走。因此,为着打日本,为着筑成这样一道堤,同志们去了以后要首先做发展武装力量这个工作。

第二是要组织千百万的群众。我们要把湖南、湖北以及华南没有组织的、散漫的、但是要求抗日和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我们在那个区域存在所依靠的力量。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脚也站不稳的。

第三是准备进城。有了武装力量,有了为我们所依靠的广大群众的组织,我们有什么意图呢?我们要想到在反攻的时候,在把日本人打走以后,占领武汉,占领长沙。今天我们要作这个准备,要这样来布置我们的工作,要从敌人手里夺取这些大城市。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还不进步,国民党这股逆水从西边冲下来,我们就要占住这些城市进行抵抗。今天估计,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他们大概是准备从这些方

向冲下来破坏我们，阻碍我们的反攻。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要有夺取城市，占领武汉、长沙、郑州这些地方的计划。如果国民党进步，采取民主的办法，执行了民主制度，改组了统帅部，那我们当然欢迎，但我们也可以进城，他们也可以进城，国民党进步则共同进城。如果它反动，那我们就要拿这些城市作为防御遮挡它的堡垒。

总之，在总的方针下面，我们有这样三件工作，即发展武装，组织群众，准备进城。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总的意图，这次同志们出发就是要干这些事情。

二

我们估计一下，究竟日寇在长江以南，在武汉这些地方可能停留多久。目前日寇在华南一带继续扩大它的占领区，目的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因为英美打到菲律宾这些地方来了，它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上打通与南洋群岛的交通，所以它必须继续打通湘桂路，与安南取得联系；同时它又必须打通粤汉路，因为海上交通被英美控制了，它在南洋有四五十万军队要撤退。第二个目的是它要把华南掌握在自己手里，准备与英美作战。它想掌握整个华北、华中、华南在自己手里来拖延战争，引起英美内部孤立派的抬头，然后拿中国华南这些地方与英美讲和，与英美作生意，以避免它的完全失败与无条件投降。日本所以要占领华南这些地方，在我们看来不外是这样两个目的。日本的企图是要把华南这些地方占领得比较长一点的时间，但是不是能够实现它的这种企图呢？那就很难说。

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有了很大的胜利，最近在菲律宾又登陆，估计在菲律宾这些区域占领后，可能向台湾进攻，以后可能在中国东南部长江流域一带登陆。如果美国能够在长江流域登陆，可能使日本不得不从南洋及中国南部撤退。如上海、南京这些地方被美国军队占领时，武汉就很危险，日本为了缩短它的战线，就要从南洋甚至从武汉这些地方撤退，撤到长江以北，甚至黄河以北。另外，日本还可能有一种企图，就是从武汉退出，以引起国共两党的内战，它坐收渔人之利。究竟什么时候会撤退，当然现在还很难说。如果说美国后年下半年可能在中国登陆，那么日本就可能于那时向北撤退。我们现在从延安出发，估计明年四五月才可以到湖南那些地方。在那里，至多只会有年把的时间在日本占领下的那些地方进行我们的工作，甚至于还要短，甚至于日本人从那个区域退出还要快一些。这就是说我们要估计到日寇在那里的时间不会很长。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年把甚至半年内，打下我们的工作基础，就是说准备将来日寇退了以后，我们还能够在那些地方继续坚持斗争。因此，我们必须争取时间，要更加扩大我们的力量，发展我们的工作。

三

这次出发的干部，有到湖南的，有到湖北的。到湖南去搞什么呢？到湖南去就是要在湖南建立根据地。究竟在湖南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同志们都谈过这个问题，有的说在山上，有的说在平原，有的说在过去老苏维埃的区域。我想现在

在这里恐怕不能够肯定，但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们创造根据地，比之内战时期是有了不同的形势的。在内战时期，我们建立根据地总是靠大山，在几个省交界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现在的情形是我们要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才能够发展，而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不是山地而是平原，是交通要道。我们也要随着这种形势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根据地是在平原。内战时期我们在山上，国民党在平原，现在是国民党在山上，我们则在平原，在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发展。到湖南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建立根据地？我们现在也不便宣布，但我们要注意选择便于我们组织力量打日寇，便于我们组织老百姓筑堤，便于我们将来夺取长沙，合乎这些条件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我们的力量要使用在这样一个中心区域。对于其他次要的区域，应当派干部去，应当派支队去配合中心区域去发展。日寇没有到的地方也很重要，我们也可以派干部去，在那里做秘密工作，发展党的工作，但必须着重在一个中心区域。派人到湖南去，这是第一批，将来还有第二批。真正准备要夺取长沙，那就要求到湖南去的同志迅速地到达那个区域，很快地发展力量，还必须争取发展三五万军队，必须有几百万有组织的老百姓，真正做到人山人海，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面，这样我们才能够谈得上进长沙。

到湖北去的同志们，到新四军五师那个区域去的同志们，也有一批。现在五师活动的几个根据地，包括平汉路东面西面及鄂南的一部分。湖北这个根据地主要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它本来四面八方都可以发展，但在目前，我们觉得它

主要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向南或者向东。向北发展本来也很重要，但这个任务我们可以另外派人去，而且五师已经派了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队伍去了。五师目前应该向南发展，使之与这次到湖南去的同志们活动的区域衔接起来。向东有九江、无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与二师、六师那些区域打通。向西也很重要，但假如日寇不向西前进的话，继续向西发展我们的区域比较困难，因为那里都是国民党的区域。西面重要不重要？应该说很重要，如果国民党的军队将来从重庆那些地方冲下来，就是从西面来。所以，我们在西面洪湖三水南北如果不能够向前发展，也要求得工作的深入与巩固，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把老百姓很好地组织起来。如果日寇还要占领更多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发展，其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也是准备将来夺取武汉，进武汉。

所以我们说同志们到湖南去的也好，到湖北去的也好，我们都要有这个准备，准备进武汉，进长沙。当然，哪天能进这还要看我们自己的力量，看那个时候的条件。我们要准备进这些城市，并且还要准备进了这些城市因为力量不够又要退出这些城市，当然最好是不退出，但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我们先进去，它把我们又打出来也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即使是它把我们打出来，我们还要在城市周围活动，要准备在那里坚持斗争。

四

我们去湖南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上面我已经讲到，必

须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这里还要指出，我们不仅仅要在这些区域创建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还要有各项正确的政策，才能在这些根据地里得到群众的拥护。我们知道中国还有些人甚至是不少的人，对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表示很尊敬很佩服，但对我们的一套办法，对我们的各项政策，他们还是表示很害怕的。有些外国人也是这样，他们觉得我们共产党有力量，能够联系群众，军队也能够作战，但仍怀疑我们。比如美国人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听苏联的话，是不是跟着苏联跑，是不是执行苏联的命令，我们的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中国人当中有些也怀疑我们的“三三制”政策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们就赞成，而如果是另外一套，他们就害怕。所以我们在这些根据地里，不仅仅在军事上要表现我们有力量，而且要在政策上能够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这就是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政策、财政经济政策、土地政策，的确要能为各阶层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拥护。我们要在实际行动中间表现出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至于许多政策的详细论述，我不准备在这里说，许多同志也都给你们讲过，你们也座谈过了。这里就是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即我们对于这些政策应当很好地去了解，使我们的各项政策都发生很好的影响。国民党批评我们共产党破坏有能力，建设没有能力，我们要表现我们在建设方面有办法，不比他们差，要比他们好。如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在外面宣传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在华中、华南的建设要靠谁呢？要靠我们，就是要靠这次去的同志们。只要我们建设得很好，长江流域的老百姓就会相信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

五

初去这些区域的时候，有几件事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整个湖南及湖北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我们的政权，到湖南去是才开辟工作，我们去了以后要吃饭要穿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要同志们注意，国民党为什么脱离群众？就是因为它在要人要钱上与老百姓发生了磨擦。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如果在路上不注意这个问题，和老百姓的关系就会搞坏。所以在这次路上吃饭怎么办呢？我们钱带得不多，经过城市、村镇时，应通过商会或当地政权机关帮我们筹一点钱粮，但不能使老百姓感到我们筹得多，至少也要使老百姓把我们与国民党区别开来。到了目的地，可以向老百姓借或摊派一些。到政权建立之后，这个事情就更要做得有秩序。总之，在负担问题上，我们要避免混乱现象，不致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意。我们经过的区域，我们初到的区域，这个问题要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不要一去就和老百姓搞翻了。

其次，这里也特别提一下，即一般不要杀人。因为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湘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之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恐惧心理。所以我们这次去，无论在路上或到达目的地，对于杀人要很慎重。只有那些为老百姓所非常痛恨的才杀个把，其他一般不杀，甚至本来应该杀的我们也不杀，判处以徒刑。这样，改变老百姓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那是错误的。所以同志们特

别要注意,无论是你们经过的区域也好,将来的根据地也好,要尽量少杀人,当然也不是不能杀,但总以少杀为好。

第三,对过去自首自新过或叛变过的人怎么办?过去叛变过或曾经自首自新过的人,只要他们今天愿意抗日,对顽固派也表示坚决反对,能够和我们在一起进行斗争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欢迎他们一块儿抗日。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也要注意考察他们。至于党籍问题,我们党内要保持成分的纯洁,一般地说不能一下就恢复他们的党籍。将来可不可以,那要看以后的事实,看他们以后是不是忠诚,是不是有很大的功绩。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将来再说,现在不能够一下吸收入党。

六

这次出发的同志,大部分到湖南,另外一部分到湖北,到五师那个区域去,其中一部分是原来洪湖区的干部,一部分是原来鄂豫皖的,一部分则是去大别山的,大体上是这三部分。中央讨论认为,到湖南去的干部应当在王首道球入王震同志领导的军政委员会统一分配下工作。到湖南以后,哪些同志应当去主要地区,哪些同志应当到次要地区,要听他们的分配。到湖北五师去的,在今天以前有同志已经传开,说我是到洪湖的,你是到大别山的,他是到什么地方。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定到湖北的同志,不管到哪里,应当统一在五师地区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为李先念同志)和司令部下,按照哪个地区有发展前途,哪个地区有需要,由他们看情形统

一分配。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讲清楚，他们分配的时候当然会照顾到哪些干部适于去哪些地方，哪些地方需要哪些干部去，不能说洪湖的干部就一定分配到洪湖工作，大别山的干部就一定分配到大别山工作。根据我们上面所讲，向南发展最重要，并且有发展前途，区党委就可能从洪湖干部中或者大别山干部中派人去。向东要与新四军军部打通，也可能抽干部去。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说清楚，不然将来去了又扯不清。

这次去的干部，一、二、四方面军的都有，大家应当很好地团结。在路上行军时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到了目的地以后，如到了五师地区或湖南以后，应当好好地团结在军政委员会、党委和党的路线下面工作，防止闹独立性。特别是到湖北去的同志，应该注意到情况的不同，因为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创造了基础，已经打开了天下，生长了一大批干部。在那个地方工作，还要靠那个地方的干部基础。李先念同志去的时候，只带了七八十个干部，许多干部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他们在几年的斗争中已经有了发展。同志们，你们这次去了，首先要求得和他们的团结，不要以为我是老资格，是延安来的。应该首先要尊重他们，和他们团结。对上级应当服从领导，对同级应当尊重他们，对下级也要向他们学习。要承认他们那段历史有功绩，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们这次去的同志差一些，我们也应该采取帮助的态度，向他们学习的态度。我们不是去当首长的，而是要自己努力，好好工作，搞到多少人，就当多大“官”，搞到一排人，就当一排长。

七

这里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大后方的党应该如何估计呢？过去在抢救运动的时候，觉得大后方的党大部分不可靠，被特务的红旗政策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这种错觉，现在个别同志或某些同志思想上还有。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大后方的党绝大多数人是可靠的。我们拿陕西的经验或者拿其他地方的经验来看，确实是这样的情形。湖南有五六千党员，在报上宣布自首脱党的有好几百人，虽然有这么多脱党的，但我们估计留在党里的绝大多数还是好的，虽然今天他们没有党的关系（因为撤退了领导机关）。上面没有去联系，但下面仍有组织，仍有党的活动。过去我们在大后方的党组织，农民党员占大多数。国民党对农民一向不注意，不重视，国民党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党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大多数搞去自首叛变，反对我们。我们说小部分党员可能发生问题，但这小部分中间真正坚决反对我们的，我们估计也是少数。那种自首叛变的人中，坚决反革命的，我想也是极少数。困难的是这小部分人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可靠，哪个不可靠，这是很难区别的，因为他们脸上并没有记号。这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斗争里面去考验他们。比如同志们到了湖南，湖南过去有五六千党员，以后省委撤退了，县委也没有了，下面的支部有的撤销了，有的还存在，你们去了以后，会有许多人来找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在那里搞武装，并已搞起了游击队，这些人他说他过去是党员，究竟如何你们刚去又没有

办法判明，只有在斗争里面去考验。是否党员还可以互相证明，是否是坚决的党员，则可以在斗争中去考验，考验他们对日寇、对顽固分子的斗争是否坚决。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好党员，自然，这也不妨碍我们应有的警惕性。对于他们，我们还要严格考察，一般地说，在斗争中考验党员的可靠与否是最好的办法。

八

最后讲一讲这次出发所用的名义和组织：这次出发，有的只到湖北，有的还要到湖南，这一段，我们没有确定固定名义，叫游击支队也可以。队长是王震同志，政委是王首道同志，副政委是王恩茂同志，政治部主任是刘型同志。由湖北到湖南是用湖南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一下打出去也不好，将来还可以采用各种名义。从这里出发到湖南，除开司令员、政委之外，还要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由下面九个同志组成，即：王首道同志为书记，委员有王震、王恩茂、刘型、廖汉生、贺炳炎、文建武、张成台、聂洪钧等八同志。到湖北以后，有四个同志留下来。到湖南后成立党委，用电报和中央联络，那时候的组织到时再来决定。湖南党的组织，应受五师这个地区党的领导。

同志们这次去，任务是很重大的，但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就是说那个地区的老百姓是欢迎我们的。最近我们派了队伍和干部到河南，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快，唯一的感觉是干部不够，部队也不够。我想你们到

那里后也将会是这样的情形。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和任务，我想你们也一定能够完成。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困难也还是很多的，斗争也是非常艰苦的。将来筑堤是不是能挡住逆水，那就要靠同志们很大的努力。还要遇到很多困难，但不管如何，我们要在那个区域坚持斗争，坚持长期斗争。如果国民党那个时候不进步，将来硬要和我们打起来，那么首先从哪里打起来呢？就是从你们现在去的这些区域打起来。我们要抵抗他们，可能八路军、新四军在其他地方把日寇赶走了，并在那些地区已经胜利地占领了大城市，而你们这个方向的战争也许还是很激烈的。你们这个方向担负的任务是很重大的，斗争也将是很残酷的，也可能在国民党的逆水冲下来时把你们隔在后面，但你们还要在那里坚持斗争，那个斗争是很残酷的，参加过内战时期斗争的同志们都会知道。但虽然艰苦，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有军队在那里坚持，我们相信在那里新民主主义一定会胜利。今天有我们的党，有毛主席的领导，胜利的前途是很大的。所以同志们在敌后长期坚持斗争，表面看来是孤立的，但应当看清楚我们是有前途的，最后我们是能胜利的。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要看到我们的希望与前途，胜利也不容易，是要流血的，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办法克服。

总的说，胜利的前途是存在的，是光明的。我今天就把中央上次讨论时涉及的一些问题向同志们报告一下，告诉同志们出去时应该有这样一个方向。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有二十四年了。在这二十四年中，我们党经过了无数艰难困苦的斗争，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我们党有很大的胜利，但是中间也遭到一些挫折。几十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着我们党的主张和事业，流尽了他们的血，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活着的同志和千千万万新加入我们党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起还继续奋斗着。

同志们，我们的努力和奋斗得到了什么收获呢？我党二十四年来英勇奋斗的最主要的收获是：我党的主张获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

* 这是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当时他是七大的主席团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洪涛险浪中的舵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身上。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和我们党在一起，达到自由幸福的彼岸。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党二十四年奋斗的最大的收获。我们党奋斗了二十四年，到今天已经成为这样巨大的力量，要依靠它来决定中国的命运。这表现了二十四年奋斗当中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我们每个同志应该认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是非常光荣的。

同志们，我们现在处在世界大变化的当中。在欧洲，代表最反动的法西斯的主要势力希特勒快要垮台了，民主力量将获得胜利，新民主主义正在欧洲许多国家中胜利发展。在东方，在中国，我们已接近于反攻时期。在最近两三年内，在中国和东方，将要发生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这两三年中，我们要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将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我们现在处在这样大事变的前夜。在这个时候，全国人民，全东方各民族和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巨大的事变中，我们将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步骤，来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时机召开的。

我现在代表主席团正式宣布：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全党一百多万党员所希望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广大人民及外国朋友关怀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又是我们的敌人很注意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

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正确地总结了我党二十四年特别是八年来抗战斗争的经验，提出和解决了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些报告公布之后，一定会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并且增加人民奋斗的信心。

现在我想就四个问题发表点意见。

一 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 什么目标

我党奋斗了二十四年，其目的在于实现新式的民主主义，即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大革命时期，由于后期领导上的错误，革命果实全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窃获，我们被打入地下。土地革命时期，因为领导上犯“左”的错误，结果使自己陷于完全孤立而受挫折。这次抗日战争，我们的

* 这是任弼时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发言稿，没有发表。

条件完全不同:首先,有党的正确的领导,因而就保有强大的力量,而且在国内和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其次,有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如苏联的胜利,民主运动的发展,美英也不能不考虑我们这个力量。再次,国民党的力量,经过战争后更为削弱。最后,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将被打倒,而苏联的影响将增大。因此,我们具有获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中,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以为应当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基本区域获得胜利,至少也要争取在黄河以北(包括东北、陕北)能够获得我们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实现,将来再走到全国的胜利。我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也就是在于动员群众反攻日寇实现这些任务。

现在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是违背世界民主趋势的,它实行消极的抗战政策与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它要坚持一党统治的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治。因为这个统治集团是代表中国极少数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利益的反动力量,又垄断着国家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机构,这就是它惧怕人民起来、反民主反人民、消极抗日的总根源。为着保持其独裁统治,它暗中积极准备内战,同时用某些假民主的形式以欺骗人民,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等。

要这个反动集团赞成和实现联合政府,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一是自动放弃法西斯独裁统治地位,这是它不会做的;二是在外部影响援助之下,内部民主势力抬头,反动集团完全孤立,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这种形势。我们放手动员群众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发展进步民主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和

孤立这一反动集团。因之,要实现联合政府来抗战建国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

很有可能由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同时存在,而逐渐达到统一的联合政府。这就是:

一、在一定地区之内(长江或黄河以北)实现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联合政府,如现在的“三三制民主政府”。

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暂时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某些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

三、在这两者之上的中央政府,暂时也以国民党为主体,随力量消长之变化而逐渐使民主力量扩大,以至于达到优势。

这就是国共分治的局面,是决胜负前的过渡局面,也就是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局面。

如能避免内战,这种过渡局面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利的,而且若有五年十年的休战状况更为有利。这是因为:

一、我们有一亿五千万以上人口的区域,保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如煤、铁、棉花、粮食、石油,可建成强大力量。

二、我们能实现民主政治,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改善,影响扩大,国民党区域民心向我。

三、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展民主运动,分化其内部,瓦解其军力,推动其内部革命。然后我们以优势强大的力量配合其内部发动而达到最后的统一。

这种形势是国民党惧怕的,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也可能经过局部内战之后,达到休战分治局面。原因是:我们力量强大,人民反对内战,英美需要中国和平的市场。

但今天的情况是,国民党反动集团实行积极准备内战的

方针，美英的政策也鼓励内战。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同时也要有充分信心。我们现在的力量比过去内战时期强大，而国民党的力量则相对地削弱了，虽有艰巨的斗争过程，但我们获得胜利的条件是存在的。

二 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决定因素

形势的发展既存有好坏两种前途，而目前又需要组织力量反攻日寇，因此，不论是反攻日寇还是制止内战，争取形势好转，都决定于我们力量之更加增大。

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苏联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的重心，就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统一战线之形成和今天我党之成为重心，就是由于我们有力量、有群众和有武装。

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不仅是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而且还创造出以农民为基础的武装力量。

当前为着打日寇，制止内战危险或应付不可免的内战，要战胜敌人以达到和平民主，就在于如何发展力量与布置力量。

发展力量有三个方面，一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二是瓦解争取敌方的力量，三是扶助争取同盟者。主要是巩固扩

大自己的力量。这里包括练兵，整顿民兵，加强地方部队、武工队，挤敌人，发展新区武装，发展经济力量。

练兵以增强战斗力。老根据地非到大变动时，即大反攻时，军队只能满员，不能过于增加数额。要实行精兵主义，从提高技术、战术、体力以及加强政治工作中增强战斗能力，这非常重要。同时，以寓兵于民的办法，加紧民兵的整训，真正做到有强大的后备，随时可动员扩军。

今天，在敌人所占之长江以南地区，应增派必要力量和干部去创立新根据地，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在发展力量上很重要，而且在布置力量上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如若我们在南中国有三五十万军队，将不仅可掩护北方的巩固与胜利，而且可布下全国胜利的基础。

经济力量之培植非常重要，一方面组织人民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公家的生产，以支持长期斗争。

在分化瓦解敌方和争取、组织各种力量方面，应着重于伪军的工作、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和国民党区域的农民运动。

中国有将近百万伪军，他们或者为国民党所争取成为反共的力量；或者为我们所争取，不仅可成为内应以利我夺取城市，而且利于现在减轻对人民的损害，将来还可成为民主力量。

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支柱。我们要孤立以至将来排除这一反动集团，就得分化和争取这个力量，多交朋友，个别发展，宣传民主要求，万一内战时就能变过来。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大众，应即多方去进行活动，使

民主运动深入广大乡村中。可从减租减息、保障人身自由、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中组织他们，使他们在我们影响之下。这也是制止内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方实力派属中间力量，应多利用其与国民党的矛盾，扶助其发展。同时，扶助民盟以及国民党内部民主派的发展。

自去年河南战役以来，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大大削弱，我们大大扩大。然而它还有近二百万军队和二亿多人口，有美英之援助，它在抗战和假民主之下还可欺骗群众。我们的力量还未达到优势地位，但我们有发展的基地，在全党努力下达到力量优势的可能是存在的。

三 建设事业的重要

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要认识革命的两方面的任务，即破坏旧的建设新的。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人民就特别看实际利益，近两年人民歌颂共产党就是这个道理。

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在战争状况下，一切建设必须服从战争利益，一方面继续破坏和改造旧的，如减租减息、改造政权基础，这也是为着便利新的建设；另一方面开始新的建设，如恢复工厂、学校，组织各种生产及税收等。

我党有丰富的军事建设和战争以及为着战争而动员的经验，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多熟练的干部，但还缺乏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干部。有些同志甚至有轻视建设和经济工作的倾向，在新区创立时，不知爱惜物资、人力和工程器械，有抓一把随

意浪费的现象，对于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分子及原有干部不加重视和争取。总之，缺乏长期建国的认识，因而在支持长期斗争时便遇到许多困难。

这一状况近年有些转变。陕甘宁边区把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面目为之一新。这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有能力建设新的。但同时也证明，建设工作是一种细致科学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破坏旧的更为复杂困难，需要利用和培养大批的干部。

陕甘宁的经验，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在没有较大城市的情形下，最主要是组织农民的合理生产，达到食和衣的自给，发展自给经济，保障用的自给；必须组织军队和机关的生产，以免增加战时人民的负担；同时要努力于管理对外贸易，组织税收工作，发展合作事业等。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敌后各根据地，自去年开展公私群众性的生产事业以来，已经收到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生活的效果。

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特别在我们进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

除思想上认识其重要性外，还必须在现有各根据地开展工作，积累经验，收集、培养和储存这方面的干部。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

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办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

到大城市后，要反对不保护器械财产，随意破坏和浪费的现象。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破坏性。

北方有丰富的地面上和地下的资源，我们要善于组织合作经济和公营生产，同时使私人资本能获得正常合理的发展。要在建设上比倒国民党，充实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

四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二十四年来，我党经过三个阶段的考验，现在中国党已经不能说是年轻的党了。它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生长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有了自己的领袖，奠定了今后不会犯大错误和取得胜利的基础。

中国党是在中国人民需要反对外国压迫和十月革命影响下组织起来的，虽然开始缺乏充分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准备，但一组成就轰轰烈烈地参加中国的政治舞台。它经过最残酷激烈的斗争过程，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在中国复杂的情况下和斗争中生长发展起来，故它又有最坚实的基础。

中国党生存在小资产阶级极广大的环境中，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特别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经历过严重的思想混乱，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疯狂性曾有极大发展，正确的东西

被压迫，直到右的“左”的倾向都遭受了失败、挫折与破产之后，正确的东西才被公认而成为党的领导力量。

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

这次历史问题决议的重大意义，就是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

我党经过三个阶段的锻炼，今天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总的方面相信不致重复过去的错误。但党在重大转变中，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否能经得起考验，那就还要看以后的锻炼和进步。这里，学习中国党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风，还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现在党的路线正确，各地领导工作的同志，都是久经锻炼的同志，就是抗战后入党的，也经过了七八年残酷斗争。这些同志都有相当的工作经验，经过这两年的整风运动，思想上政治上都有相当进步，然而要贯彻三大作风，还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教育。

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 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六年五月）

（一）最近与各地区来延安的同志商讨解放区财经问题，认为在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扩大而且连成一片，在解放区内不仅有广大农村，而且包含许多中小城市，有一部分重要产业如煤、铁已经掌握在民主政权手里。因此，今后如何苏息民力、发展生产，如何与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作斗争，如何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就是说对于今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来注意。虽然今天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很多的经验，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尚待今后继续研究，但目前必须规定一些最基本的方针。

（二）全党必须认识，我们若是不能组织一万万二千万解放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那我们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不独没有力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且也不可能保持已得的胜利，终于是要失败

* 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土地问题。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同与会同志讨论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问题。本文是他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后因形势急剧变化，未下发。

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对手是中国的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我们在经济力量上是处于极大劣势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出路无前途而悲观失望。我们也具有许多有利条件,这就是解放区内控制着富有战略性的原料,如煤、铁、棉花、粮食、食盐、金矿、石油等。而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建立了民主政权,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农民在减租减息清算运动中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必然会要提高,购买力也将大大地增高。我们只要有正确而坚定的方针,整个解放区人民团结一致,节衣缩食,积累资金,学习技术,以解放区人民的力量,是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

(三) 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

(四) 解放区内的基本经济基础是广大而分散的个体农民的私有经济。只有使农民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使每家农民从土地的增产上大大增加自己的财富,才能使我们具有发展工业的雄厚基础。必须了解,民主政权既不可能举借外债,也没有强大工商业基础来积累资金,我们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力量,来繁荣解放区经济。特别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农民富裕之后,有计划地组织和利用农民积累而余裕的财力,去发展解放区的工商业。因此,发展农业经济,仍然是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最主要环节。

(五) 八年抗战,解放区农业受到重大的摧残破坏,耕种的畜力减少十分之七八,农具损失极大,劳动力也大量减少,种子也缺乏,平均土地产量比战前减少一半以上。我们

在农业经济建设上，要提出农业生产量在一二年之内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五年之内争取比战前增加一倍到两倍的任務。这就必须努力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改进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按照过去经验和当地实际情况去组织变工队、换工队等，来解决劳动力缺乏的困难。第二是改良农业技术，首先要有计划地制造大量的改良农具，廉价出售或贷给农民；培植农业上需要的牲畜，贸易机关应负责从解放区外运进牲畜和在内部调剂牲畜；组织和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开水井、水渠可大量增产）；改良种子和肥料；改进农作方法等。在农民获得土地之后，组织起来，改良技术，是保障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各地政府应继续发放大量农贷，认真组织农业试验场和展览会，提倡农业技术的改进。同时要设法减轻人民负担和减少劳力动员，使农民有力量来进行土地上的经营。

（六）据各地报告，农民满足于从清算运动中去获得东西，生产情绪还没有普遍提高，同时也包含有怕生产过多，生活富裕，将来又被斗争的情绪。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仅使农作物产量逐渐恢复和提高，而且要提倡农民多经营副业，如多养鸡、鸭、牛、羊，养蜂、养蚕等，去增加国民财富。

（七）在工业建设上的基本任务，就是满足解放区内部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消费品，争取主要必需物品如衣着、农具、火柴、烟类、肥皂等逐渐走到能够自给。但是，今天解放区还没有能大量出产上述物品的近代工业，也没有力量很快地建设起来，普遍存在的只是手工业、家庭工业、作坊和小规模工厂。它们虽然在技术上是落后的，但还是今天不能不依赖的工业基础。轻视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是错误的。我们

应当扶助其发展，组织各种合作生产事业，并努力改进其技术，来提高产量与质量，使手工业在解放区必需品自给任务上能够保持其一定的作用。特别在解决人民穿衣问题上，在一切产棉区域应发展人民的家庭手工纺织事业，提倡自种自纺自织自用、家家纺线村村织布的运动，而且要多产，以供给无棉区人民的需要。一切能植棉的区域，应发展种棉和纺织事业。

（八）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手工业的发展。若不能组织最必需的近代轻工业，那是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也不可能坚持对外斗争的。因此，各地必须尽最大努力，按原料、交通等条件，恢复和建立必需的近代轻工业，如纺织、火柴、烟草、面粉、食品、肥皂、榨油、蛋厂等工业。这些企业可以用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的方式，但必须保证能获得一定利润，求得成本低、质量好而产量又高。政府、工会、金融贸易机关应给以原料、劳动力和推销的便利条件，并在税收政策上加以保护。

（九）在工业建设上，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发展重工业（满洲情形尚不清楚）。但已经掌握的一部分重工业，如各地煤矿、铁矿、炼钢厂等，应当采取按照需要逐渐恢复的方针，使我们现有兵工厂，或某些难于恢复的重工业的机器，转为生产农具和发展工业必需的轻型机器，如制造弹棉、纺织、榨油机器等，则甚为重要。

（十）在解放区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如何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来与外国资本或中国官僚买办资本进行严重的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政策，主要是保障私人资本企业在解放区能够获得不少于国民党区私人企

业所得的利润，使国民党区域被压迫而趋破产的民族资本家乐于利用解放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政府扶助等条件，而移置其资金机器到我们区域来开办各种企业，繁荣解放区的经济。

（十一）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但必须以尊重中国主权与法律为条件。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十年至多二十年）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但有重大军事意义的企业，如我们的军事工业，则不应让其经营或入股。

（十二）为着发展解放区工业，吸引民族资本以至外国资本到解放区繁荣经济，我们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我党在北伐和内战时期，在工业与工运问题上都曾犯过过左的错误。抗战期中和最近时期，在一部分同志中，由于只看见一时与局部利益，看不见长久与全体利益而产生的“左”倾思想残余也尚未肃清。有些地方采用了对地主清算的方法来对待厂方或店主，以致造成资本外流的严重现象。这种过左错误必须及时纠正，否则必将招致解放区经济的破坏。我们必须坚决向工人领袖及群众说明，无论公私企业，在规定工资、工时及其他工人权利时，必须以各该企业在当地能够继续发展（扩大再生产）为标准。即是说，既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企业所有者有利可图。

（十三）为着解放区农业、工业发展，繁荣解放区经济，今后各个解放区相互之间应当在发展经济上密切配合，互相调剂原料和产品。已经连成一片的解放区之间，原则上应当取消互相的税收，而且要相互约定汇兑关系，发展运输（如

公路、水运），减低运费，以利原料、货物的相互流通，促进生产之发展。物产丰富的区域对于经济力量贫弱的地区，应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总之，各个解放区在经济发展上，应团结互助，以利于一致对外进行经济上的斗争为目的。

（十四）在对外关系上，以后和平实现，虽然在形式上再不能实行如过去那样的关税政策，但为着保护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实质上对于解放区经济发展有重大关系的进出口货物，必须采取不同以前形式的税收，如货物平价税、营业税、贴印花之类，是万分必要的。同时在贸易上，对内应采取自由政策，但对外必须由我们的贸易公司对主要货物如粮食、食盐、棉花、布匹、煤、烟草等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为统一和加强贸易力量，可联合大小公私资金实行公私两利合作经营。在解放区内，除应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号召人民使用土货，保护自己经济发展外，还要普遍组织和整理合作社，以便利于解放区出产的货物以及经过贸易公司由外面输入的必需货物，经过合作社或公私商店，有计划地分配于消费者，同时便利于收集应该出口的土产，经由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向外推销，使合作社成为强大的经济机构，以利于进行经济上的斗争。

（十五）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应当求得物物等价交换，以我多余的原料和产品交换人民必需的物资，特别注意交换为着解放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如为建设轻工业的各种机器，缺少的农具，以及耕牛等。我们应有计划地组织农民生产对外贸易的原料和制造品。有些出口的原料尽量制成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口，这对于改善人民生活 and 内部金融活动有极大的作用。如羊毛制成毛线或毛料，花生榨成油出

口，这不仅在制造过程中使人民得到工资利益，且可换取更多的外汇和物资。有计划地生产和收集对国外贸易的原料和制品，如猪鬃、鸭绒、油类、皮毛潭獭等，争取直接向国外进行贸易，向外国交换必需的机器和物资。外国商业资本家愿在解放区经营商业者，在遵守法律条件下应允许他们到解放区经营。

（十六）为着解放区经济发展，在金融问题上，我们应争取地方设立银行，发行地方性的票币。因为金融机关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武器，银行可以操纵经济命脉。我们还可用钱庄发支票，贸易公司发流通券，组织某种企业如盐业煤业银行，或发行有利于建设事业的股票，必要时可以发行地方建设公债。惟今后银行的发行，绝不能用在财政上的透支，而应使银行的发行主要是为着经济发展上的投资，扶助工农商业和合作事业的发展。要用税收、存款等方法吞吐发行，以免物价过于波动。并应适当地调整物价，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以刺激农业生产之发展。银行应发展各方面的业务，如储蓄、汇兑、贷款、经营企业等。

（十七）财政上，各地要严格实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力求紧缩开支，整理税收。机关部队要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反对正在滋长的奢华浪费现象，倡导节衣缩食来发展经济。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丰衣足食。我们今后应在财政上保持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战争情况下有所不同），消灭目前各解放区严重存在的赤字现象。抗战期中，人民负担普遍在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上，高者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这种情况妨碍经济恢复与发展甚大，再不应该继续下去。在和平时期，应做到人民负担不超过国民收入的

百分之十，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余地。明年公粮制应取消，改行统一农业累进税和工商业统一累进税，平衡农商负担，改善公营企业，彻底实行公营企业的企业化，以增加收入。财政行政应加调整，严格执行预决算、审计、金库及移交等财政制度。划定县财政收入，严格地整理村财政，根绝各种浪费现象。此外，应有计划地试行和逐渐改行薪水制度，以节省开支，并可提高工作效率。

（十八）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全党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即算内战还有一个时期的延长，也必须开始有计划地按照上述方针组织解放区的经济事业。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要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均应成立财经委员会，积累经验，加强对财经建设的领导。而且要有计划地利用和争取大批党外经济技术干部，除开政治上教育他们，还要在物质上给以优厚待遇，使他们在解放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帮助我们培养自己的经济、财政、金融、贸易干部。各重要解放区应即计划开办工农商业技术学校，吸收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培养大批工农商业方面的人才，这已经是非常迫切的工作。

提议建立青年团的两次讲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九月）

一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目前全国各解放区共有二千万青年，其中有四百万左右积极分子，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中间状态的约占百分之六十。抗日战争初期，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普遍地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大部分青年在抗日战争中是积极的，而且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一般地说，青救会的组织是松懈的。现在，各解放区的青救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会员、有组织的，如华中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察冀边区。山东解放区有青救会会员一百五十万人，专职青年干部三千人。另一种是已经无会员、无组织的，如晋冀鲁豫解放区、陕甘宁边区。

现在要商量一下，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是否要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同意

*抗战胜利后，为了讨论是否需要建立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的问题，在任弼时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会后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这是任弼时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建立青年团组织。

在抗日战争初期，很多地区还没有党的基层组织，也没有建立政权，那时农会这个组织可以代替一切。有了党组织和政权以后，农会、青救会应转变工作方式，青年组织应适合青年的要求和特点，但有些地区未跟上，因而感到工作方向摸不着了。有的解放区，青年组织单搞一套，闹独立性，遇到反对，由此也就消沉下去了。

现在，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四百万左右的青年积极分子，能吸收入党的是少数，仅四五十万，今后再发展一批，也不过百八十万，另外还有三百余万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好，还是不去组织？看来还是组织起来好。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要在战后的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现在就应该这样去做。中央青委的同志提议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应当说是有好处的，当然组织得不好，也可能没有好处，重要的是领导问题，工作方式问题。

历史上，青年工作有成绩，也有过缺点，已经有些经验教训了。大革命初期，党的组织还不普遍，青年团工作很活泼；后来，党的组织比较普遍了，青年团还是那么办，工作上不注意青年的特点，思想上又过左，便产生了第二党的现象。其中也有些历史原因，如中国先有青年团，后有党。苏区时期，青年团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总是抄袭党的一套，而且门愈关愈紧，犯了先锋主义第二党作风的错误。抗战时期，又犯有青年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所以会犯先锋主义第二党作风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

点，未去研究适合青年的一套方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今后，这还是一个基本问题，如不认真改进，还可能重犯以前的错误。现在党的领导强了，青年团不容易犯第二党作风的错误，但如不预防，也会闹成与党不和。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如果认真进行研究和改革，把工作做好，广大青年就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各项建设，在各种运动中起模范作用。做好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教育。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教育青年的方法，要研究青年团如何领导一般青年去参加各项建设，也要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共青团的经验。

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名称。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再扩大一点，防止其成为狭隘组织，也可叫民主青年团。名称问题以后还可以再讨论。实质上是党的领导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些共产主义教育。

关于一般青年群众组织。在团组织之外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像山东的青救会，因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历史任务完成了，但可以转成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如文化学习组织、学生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不要太严了。青年团要在各种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

如何开始建立团组织？先搞一套空架子的办法不好。可以采取示范的办法，先从工作基础好的地区做起，在基层党支部内，划出一部分青年党员，发展团员，即可开始成立团支部，

靠党支部去领导。基本上采取由下而上地建立组织，但上面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首先从团支部搞起，然后再建立团的区委、县委。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尽量少，开始县里先配备一两名专职的团干部，其他的还可以吸收政府与教育部门的青年干部兼职去做。地、区两级可以设代表，中央局是否要，再考虑。

建团的试点工作，现在就开始去做。把团建立起来，对目前的解放战争有好处。可以先在非战争区的农村、学校、工厂开始建团。目前战争很紧张，军队中建立团组织，可以慢些，先从地方做起。

二 在中共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处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大家是赞成建立青年团的。也问过毛主席，他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现在起草了一份电稿，请大家讨论。

抗日战争中的青救会是起过作用的，工作是发展的。一九四一年，中央指出个别地方犯有先锋主义的错误，以后，有的地区青年工作放松了。就是现在还有青救会的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也不适应目前的形势和青年的要求了。

现在老解放区有四百万左右青年积极分子。看来，只有把这四百万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推动解放区的两

千万青年，参加各种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因此，建立青年团组织是必要的。当然，要考虑到组织起来是

否能发挥这个作用。

青年团容易犯青年主义、先锋主义的毛病,我们以前已经反对了。现在建立青年团是否还会发生以上的毛病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各地方的党的领导加强了,组织起来,只有好的作用,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做,如何去领导。青年团在工作方法上还要注意,如果仍是过去的那一套,越搞越狭隘,仍有犯错误的可能。现在要建立的青年团,应当比过去的共青团(如)更广泛些,要包括民主青年,只要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都可以参加;入团后,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党对团要加强领导。

这个电稿草案是赞成建立这样一个青年组织的。各地的同志可能一下转不过弯来,这是因为这些年有的地方对青年工作注意不够。苏联的共青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建设,是起了很多好作用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同国民党作争取广大青年的斗争,青年工作就特别重要。国民党建立了三青团,在他们统治地区的学校中,三青团对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我们为了同国民党争夺青年,也应注意组织青年,但目前国民党统治区,不一定用统一的名称。

决定建立青年团这个组织还是较为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去开展工作。过去的经验大部分是在城市里搞青年工作,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建立青年团,如何进行活动。比如在解决土地问题,进行农业生产方面,青年工作如何作法?过去犯错误,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创造出的一套适合青年特点的办法。我们要从工作方针到方法,创造出的一套来。在华北农村,平均七百至一千人口的村

庄中，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青年。如果我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真正做到为青年服务，学习陶行知做青年工作的办法，又专心专意地做这个工作，是会创造出办法的，也会做出成绩来的。在农村建立青年团组织，一定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因此，先作典型试验是很必要的，以便取得经验。青委的同志可以专门座谈几次，收集一些材料；可以派人先在延安试验建团；同时还可以起草一个章程。

军队比较集中。军队中青年工作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军队里过去是搞青年小组，将来怎么办，再考虑。

青年团的名称，可以提出两个，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或民主青年团，请各地考虑采用。

现在总的情况是：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高涨了，而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反而减弱了。今后建立起青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在解放战争、生产运动和土改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文教工作的支持也会更好些。

过去建立青救会，是个不可免的历史过程。青救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它的消沉是青年工作发展的结果。现在是到了决定建立青年团的时候了。

大家都同意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组织。会后，先把文电发下去，征求各地的意见，请各地认真总结青年工作的经验，开始进行建团的试验，并把意见提出来，再请中央作决定。

在军委一局全局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

今天和朱总司令一道来看你们，我感到非常高兴！

你们住在安塞，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与你们的工作是天天见面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前线打仗的同志也常常夸奖你们，这是你们的光荣。

你们二局的历史已经有十五六年了，你们做了很多事情；对于人民的事业，对于党的事业，作了很大的贡献。去年你们的成绩和进步特别显著，今天总司令和我特来慰问你们。

今年将是我们大发展的一年，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二局的同志责任也很重大。我现在向你们提几点意见：

一、去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今年还要做得更好。你们是无名英雄，对党对人民作了许许多多的重大贡献，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请大家放心，党中央是了解你们，而且器重你们的。

你们埋头于这种无名英雄的事业，大家特别安心，特别团结，特别融洽。今后你们应该更加安心，更加团结融洽，更加高度地发挥党的耳目作用。耳目作用怎样体现出来呢？我举一个内战时期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在白区里打仗，当然群众条件没有苏区好，敌人准备迂回到我们前面去消灭我们。当

我们从你们那里得知这个情报后，就以强行军赶到敌人的前面，结果把敌人消灭了。从这里看来，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长征时期更是如此，敌人前堵后追，党中央就是靠你们二局的耳目作用，使得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虽然敌人对我们有压倒的优势，但也无可奈何。所以我们说，打仗基本上靠战士的英勇善战，但也靠我们周密地了解情况。有了对情况的周密了解，指挥员才能下正确的决心。你们的工作就是指挥员下决心的根据。“勇敢、侦察、决心”是战争胜利的必要因素，因之每个战役的胜利，你们都有功劳。希望大家深刻体会你们工作的重大作用，更加安心埋头地工作，更加亲密团结地战胜敌人。

二、由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你们的业务也一天一天地更加繁杂了。国民党反动派吸收了日本的经验，又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来不断地改进他们的业务。因此，你们必须精益求精，发挥创造性，永远不落后于敌人，在新的情况下保持与发挥你们的耳目作用。

三、注意你们的身体健康。我知道你们的工作是很费脑筋而且是很辛苦的，因为这是一种科学，搞错一点就不得了。同志们做这种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社会的前进，为后代幸福，作出牺牲是很光荣的，党应该照顾你们。过去中央对你们虽然有照顾，但离实际需要还远得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组织上并不愿意这样。今年更艰苦，你们的生活标准不能提得更高，因此希望你们好好生产，注意锻炼，好好调剂。党培养你们这批人才是不容易的。你们应该好好注意身体，多多运动、锻炼、娱乐，使自己的身体不致受到大的损害，为

长期干下去有一个很好的健康条件。你们注意，我们也注意，大家都来注意。一方面你们应该强调艰苦奋斗，自我牺牲；另一方面，党应该尽一切可能来关照你们，使你们工作得更好。

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 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主席：

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再三考虑还是将中工委原电转发各地，要各地按情况采择试行为好。不过在原电文中加上了两个“注”：一个是指出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因为现在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其中只有少数好的中农参加，如用农民代表会，则将有一批中农也不能参加，而用人民代表会，人们感觉要民主一些（葭县县委同志有此意见）。另外一个“注”，是在指出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在民主政权下，由贫雇中农上升为富农者，剥去其选举权似不妥，也不必要，如吴满有式的富农，剥去其选举权将产生不好影响。

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否应完全如旧式富农同样处理，也值得考虑。下面由富农手里拿出多余财产等，多是采取逼、吊、打的办法；同时，新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都拿出来，在农民中会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思想。这一问题究应如何处理为妥，尚无成熟意见，可否规定对新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应当劝说他们自动拿出平分（如对富裕中农一样），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财产、耕牛和农具，除自愿献出分给贫苦农民者外不动，或简直规定不动他们多余的东西（土地除外，即土地应平分），以示与对旧式富农处理的分别。此问题请考虑一下。

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得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因此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已电五台、山东、东北将他们在土改中如何分析阶级的情况电告（其他地方的此地已有），待复电到齐后可考虑发出此项文件。

敬礼

弼 时
十二日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

我想讲的是土地改革少中的几个问题。这是几个重要问题，但不是土地改革的全般问题。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获得很大的成绩，在广大解放区内掀起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已经或正在彻底消灭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使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翻了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运动，也是我们今天战争能够胜利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所最为惧怕的。去年九月土地会议，全般的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并作出许多重要决定。中央根据土地会议的结果，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各解放区政府施行。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清楚而明确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指出我党土地政策的方向和办法。对于这个方向和办法，我们应该坚决拥护。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土地改革工作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作，我们为了拥护土地改革，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目的，除了提出土地法大纲之外，还必须对于农民实际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给以正确的具体的解决。我现在根

* 这是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据中央最近的决定，讲讲在这一伟大运动中所发生的、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的下列几个问题。

一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

中央最近重新发出了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给各地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参考文件。这虽是一九三三年的文件，但今天一般还是适用的，其中关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如果许多人定错了成分，那就搞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我现在举一个晋绥的材料来说明这种危险性的严重。据晋绥分局上月讲到纠正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定成分中的错误时说：全蔡家崖行政村（缺岔儿上自然村）共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据一般的估计，在旧政权下，农村中平均地主占总户数约为百分之三，富农约为百分之五，合计地主富农共约占百分之八的户数，百分之十的人数。老解放区内，很多地主及旧富农已经变化，变为其他成分，地主富农的户数应该少于百分之八，而蔡家崖地主富农的户数则比百分之八还要多出将近两倍。后来分局按照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

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的原则，经过农民代表委员会重新评定的结果，认为一百二十四户中，可将破产及下坡地主十一户，生产富农二十户，共三十一户改订为富裕中农或中农。这样则地主富农可减为九十三户，占全户数百分之十六点八四。后又把时间的标准从一九三七年缩短到一九四〇年来评定，则全蔡家崖（连岔儿上共五百七十九户）地主富农可降为七十一户，还占总户数百分之十二点二六。如果按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停止剥削三年者均以农民成分计算，则地主富农的户数应当还要少些。

兴县蔡家崖算是当地地主富农比较集中的地方。该县多数乡村地主富农没有蔡家崖这么多。可是蔡家崖的经验，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兴县蔡家崖从事土改工作的同志们怎样划错了成分呢？据称：三十一户下降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因其祖父、父亲剥削过人，本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前一年，剥削已很少，或已不剥削者，错算了十五户。

（二）本人早年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抗战以前（后半辈）自己劳动即未剥削人，或剥削很轻微者，错算了五户。

（三）本人勤劳劳动，只有轻微剥削，而“铺摊”大（财产多），这样算错者七户。

（四）本人早年很穷，过继或被卖给地主富农为儿子，自己劳动为主，剥削很少或不剥削人者，错算了三户。

（五）因孤儿寡妇无劳动力，中间一段雇过人，父亲是农民，本人长大也是农民，就是说因偶然丧失了劳动力而雇佣长工遂错算者一户。

（六）此外，过去定成分中对经济状况剥削关系很难确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态度决定其成分的升降。

总起来看，在蔡家崖和晋绥其他许多地方，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这样只在一个蔡家崖行政村，就定错了五十多户，约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们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农民对于这许多人定错成分表示什么态度呢？分局的同志说：农民代表委员会上讨论时，各委员均赞同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划分成分法，但他们怕纠正。有的说，早有贫雇农觉得把阶级敌人搞多了，但不敢说，怕别人说是包庇地主富农。多数委员说，有些所谓生产富农本来是中农，勉强定成富农，他们不当兵了，对咱们不利。又说，剥削少的生产富农定成中农，可使中农大胆生产，对生产有好处。由此可见，农民对大批人错定成地主富农，是不满意的。认为这就树敌太多，自己力量减弱，妨碍生产发展。这是很正确的看法。

这里必须指出，我提出兴县蔡家崖划错阶级成分的问题，

只是当作一个例子来说，在晋绥其他乡村，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如像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分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那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像蔡家崖那样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错误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定成分的正确标准呢？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生产资料是什么？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工厂、机器、原料和其他资本。农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

根据上述这一标准，就很容易区别农村中的各种阶级成分。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分一般可划分如下：

（一）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

（二）占有大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和出租一部分土地。

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一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

(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

(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

(五)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农村主要阶级成分,一般就应当是这样划分的。但出租土地或雇用长工的人,是否一律按地主富农处理而无例外?例外也是有的。如孤、寡、残、疾,丧失了劳动力,这些人的小块土地,是可以允许出租的。还有如医生、小学教员、工人,他们家里有少量土地,因自己从事其他职业,而不能兼顾耕种,虽出租其土地或雇人耕种,仅够维持其生活者,也不能算为地主或富农。此外,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形,需要详细规定,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最标本的情形。

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最近决定米取比一九三三年更宽大些的政策,即有轻微剥削(如雇人看牛或拦羊,请零工、月工,甚至雇个把长工,或有少数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债),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这比一九三三年规定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是更宽一些了。剥削部分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新区在建立民主政权以前一年，地主富农即已破产下降为中农或贫农者，即应承认其为中农或贫农的成分。一年就决定改变成分，是因为他们是受国民党统治压榨而逼着下降的。但是由农民上升为地主或富农者，即原来长年贫苦勤劳积累致富者，就须上升三年以后，才算为地主或富农。

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民主政权下因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清算斗争，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己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连续有五年者，应改变其成分，评定为农民（按实际情况定为中农、贫农或雇农）。富农已连续三年取消其剥削者，亦应改为农民成分。但是这些地主富农仍保有許多封建财产者，则仍应交出其多余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地主富农改变了成分之后，是否可以加入农会、贫农团，则应由农会和贫农团加以审查，分别决定之。

在一九三三年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讲：“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九三三年对于红军中的地主富农出身的指战员的处理。现在，被允许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少数地主和富农，他们脱离家庭，受过革命教育，经过战斗考验，如果在战斗中坚决勇敢，又并无包庇地主富农，破坏土地改革的行为者，也应改变其成分，享受一般革命军人的待遇。因为他们是参加流血的斗争，其年限应比在地方上缩短些。在军队中，合乎上述条件的地主富农及

其他剥削者入伍满两年，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伍满一年者，即可改为革命军人的成分。这些人本人及其家属分得的土地财产不能少于一般农民（也不要比农民多）。阵亡、残废或退役者，均应分别按革命军人烈士、荣誉战士或退役军人看待。但在战争中表现动摇或犯有其他罪行者，在土改中表现反对或破坏者，哪怕参军很久仍应坚决加以洗刷。

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不剥削三年，即可改变成分，是否有危险呢？我看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富农的是征收其多余财产，不是全部财产）已经平分了，又有这许多年的劳动，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在改变成分以前，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此深入土改斗争时期除个别被允许者外，一般以暂时停止其兵役权为妥。至于参加担架队与其他支援前线工作，则仍应分配给他们做。

二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

消灭封建阶级，是一个很残酷的斗争，我们必须依靠贫雇农为骨干，满足贫雇农要求，并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才能把事情做好。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上特别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指出对中农费‘细心体贴’；并且说把富农与中农混淆起来，是“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把问题提到这样严重，是因为侵犯中农利益，必使中农动摇，甚至可以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使贫雇农陷于孤立。如果这样，革命就会要失败。

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

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在过去打日本时，中农出力出钱不少。他们打日本是有功劳的。在现在打蒋介石时，也靠他们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粮食。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新老中农。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是值得贫雇农学习的。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完备，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

但据我们知道，在许多土地改革运动发动起来的地方，在一切解放区，却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左”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首先就是定错了一些中农的成分。比如前面说的蔡家崖一个行政村内，就有五十多家中农和富裕中农（甚至还有一些贫农）被错定为所谓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许多地方被错定了成分的，其财产也被没收了，有些连人也被打过。

其次表现为办事不要中农参加。中农怀疑还要不要他们了。除土地已经平分的老区以外，贫雇农团结起来，组织贫雇农团，作为领导土改运动的骨干，那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走到贫雇农包办一切，那就错误了。例如在选举的农民代表会的代表或委员会的委员里面，只有贫雇农，没有中农参加。许多重要问题的决定，例如决定成分、分果实、分配负担等的会议，不让中农参加，那就使中农感觉自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贫雇农手里，表示非常不安。

再则在负担上不照顾中农,特别加重中农负担。有些地方发现了分派公粮时只由贫雇农小组商量决定,因为土改后地主富农无力负担,就把应分派给地主富农的公粮负担都派在中农头上,甚至送公粮也多派在中农头上。这样做法,也是必然要引起中农反对的。

此外,在分配果实时,有完全不分给中农的。因此使中农感觉斗争时候要他们参加,误了很多工,而在分果实时就无中农的份。甚至连开分配果实的会,也不让中农参加。

上面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应该引起全党来注意,必须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

贫雇农与中农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这是可以解决的。中农在旧社会中一般是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消灭封建制度和要求政治民主等根本问题上,具备一切条件,与贫雇农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他们之中的分歧,主要就在于贫雇农不满意中农在斗争地主富农时表示不够坚决,有时动摇犹豫。中农的这种软弱性确是存在的,但只要实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原则,即坚决领导中农向封建阶级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时不损害中农利益和给中农以政治教育,那就可以领导中农一致斗争的。其次在平分土地时,富裕中农可能不愿分出其一部分土地。平分土地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最彻底、最好的办法。在平分土地中,中农的绝大部分是不分进也不分出,只有少数富裕中农可能要拿出一部分土地(其浮财则一点也不能动),下中农还可分进一些土

地,但在实行平分土地时,必须和中农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动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土地,而他们自己表示反对时,那就应当向他们让步,不动他们的土地。在分配果实时,应向贫雇农说明:拿出一部分分给中农,以照顾团结。总之,要在各种问题上注意团结全体中农,要懂得团结农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我们消灭封建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和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要团结全体中农,首先要作到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要定错中农的成分。已经定错的,必须重定。要向他们说明过去是因为没有学会分析阶级弄错了的。如果已经没收了东西的要尽可能退还;已经分用了的,则应在没收地主果实中抽一部分补偿他们。若中农有多余的粮食而贫雇农迫切需要者,可算做借粮。如果出于中农自愿捐出一些粮食救济灾荒,那自然是好的。

其次,办事一定要吸收中农参加。在农民代表会的代表中,农会委员中,要有中农参加,使中农确实享受政治上的权利。在贫雇农占多数的地方,在农民代表及农会委员会中,中农大约可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数,贫雇农占三分之二。在中农占绝大多数的老解放区(其中许多是由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中农所占的比例就应该增高。大约贫雇农占三分之一,

中农占三分之二。各级政权机构中均应有中农参加。各种问题，如定成分、分配负担、分配土地财物等，贫农团（或贫农小组）可以先加讨论，但最后必须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通过才能施行。而且开会时要很好地尊重中农意见，中农的好的意见应当采纳，如果中农有不正确的意见，应作耐心的说服，或给以适当批评，但批评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必要的斗争，仍是为着团结全体中农这个根本方针的。

再次，负担必须做到公平合理。例如公粮负担、支援前线以及其他种种人力、财力的动员等，绝对不能因为地主富农不能负担就通通加在中农身上。这是中农最害怕的，也是不正确的。对贫雇农在负担上适当照顾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与中农相差太远，而且一切负担的分配，最后应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讨论通过。

只要成分不定错，不侵犯中农利益，吸收中农参加工作，负担又公平，平日对中农又能加以体贴，经常给以教育，那一定能把全体中农很好地团结起来。这样，就是合乎共产主义的原则。领导机关要经常注意，时时刻刻加以检查，如发现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倾向，就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这种纠正必须是公开的纠正，必须使一切人都知道，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三 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

在经济上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

尽量设法保存力量，时时刻刻企图复辟。地主富农想尽办法钻到政府和党里面来，把自己女儿嫁给干部，收买狗腿子和坏干部、坏党员。你说要组织贫农团及农会进行土改，他们也可以组织一些假贫农团、假农会，实行假没收、假分配，也开大会“斗地主富农”，用这些办法，达到保存土地财产的目的。所以，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把封建阶级消灭，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晋绥和陕甘宁两区，想在今年春耕前把全部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工作做好，这是不容易办到的。若能在两年至三年内把整个区域的土改工作做得彻底，而且把党和政府也改造好，建立起新的民主作风来，那就很好了。

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财上耽误很多时间，不要将没收地主的浮财堆了很久不去分配，以致妨碍分配土地这一主要环节，如像现在有些地方做的那样。在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的地方，地主把现款投资于工商业比之埋在地下为有利。所以一九三三年时江西等地搞土地革命，并没有把搞地财看得很重要。在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地财可能要多些，若能用适当办法不搞死人命能搞出地财来，那在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困难上有很大好处。但不要钻在搞地财里面，而延搁了浮财与土地的分配，以致妨碍群众的生产。地财可以慢慢地去搞，同时也不能单靠搞地财来解决农民的困难。政府应举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分地后的困难。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对农村生产力

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发展的机会,所以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现在许多地方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对富农和地主用一样的方法去斗,甚至要打死一些人,对地主甚至对富农一律用扫地出门的办法等。打下地主的威风是必要的,但并不要对每个地主富农用一样的方法去斗。首先对富农与对地主的斗争应有区别。《中国土地法大纲》上规定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产及其他财产。对富农除土地一同平分外,只是征收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即征收其多于一般中农的财产,并非全部没收。把富农如同地主一样去斗,不但是混淆了上述区别,更重要的是可能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因为中农是介乎富农与贫农之间的阶层,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总想发展到富农的地位。如果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地主与富农分别开来。

以后对富农只能采取征收其多余财产的办法,不能没收其全部财产、房屋,更不应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去对付一般富农。搞富农地财也不能如搞地主地财一样,因富农自己是参加劳动的,他的积蓄的一部分是自己劳动的果实。

对地主斗争的方法也应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对大地主及恶霸斗得严厉些,借以警告其他地主,使其他地主懂得土改是大势所趋,不能抗拒而拿出他

的土地财产,或是用谈判方式使他们将土地财产交出来。拿出土地财产来的就不一定拿到大会上斗,只要他屈服,低下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

我们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对一切地主除少数汉奸及内战罪犯经法庭审判定罪者外,均应按土地法大纲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如果我们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去偷、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即使是犯罪分子,只要其犯罪程度未至经法庭判决枪毙者,亦必须分给一份必要的土地财产,社会秩序才能安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作,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若地主保有工商业而足够维持生活者,自然可以不分地给他。若工商业太小不足维持生活者,还需分给一部分土地。

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有些贫苦农民,在过去民主政权下劳动生产上升为新富农,在此平分土地时期,应照富裕中农待遇,其土地在平分时应取得本人同意,方能抽动其按照一般中农水平的多余部分,如果本人不同意,则不应抽动。因为这种新式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

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若现在又打击这种富农，就会引起中农动摇。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四 对工商业政策

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各地已发生有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例如陕北神木地区的高家堡，当被我军收复时，连小商贩也没收了。这是一种自杀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一般工商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就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是应当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不要以为这些工商业是地主富农所投资而加以歧视，这是不对的，而应当看到这些工商业的存在，有益于今天的社会经济。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并且确定这些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破坏和任意分散。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你们不久就要打出去，必须严格遵守这种政策，绝对不能重复如像高家堡一类的错误。那么地主在过去减租减息时期将土地变卖而投资工商业者，现在是否可以没收呢？不可以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和鼓励这些工商业，因为这样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需

要的。在斗地主地财时，必须规定不许地主破坏已有的工商业，否则要受处罚。

毛主席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把毛主席这篇道理，向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譬如地主开座煤窑，农民从目前局部利益出发，是可以举手拥护没收分配的，因为将煤窑的工具和物资大家分到一份可以暂时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批准这样做，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说服农民懂得煤窑完整存在的利益，分散了就会把煤窑弄垮，结果自己也会无煤烧，这就妨碍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说解放区经济要独立自主，我们不能做殖民地的殖民地。只有经济上不依靠别人，军事上政治上才会有力量。我们要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就要使公营的、私营的、人民合作经营的手工业、工业，以及农村的农业，都有一个发展，生产人民与军队大量的必需品和粮食，使我们对外贸易能保持平衡，以至出超，不去买蒋区的货物和美国货。

有了工业农业生产品，就需要有商业，例如公私商店、消费合作社等作为桥梁，使生产者能卖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使消费者能够得到这些商品。经过这样的流转，才能使工农业

进行再生产与扩大的再生产。现在解放区内政府的贸易公司还没有力量普设商店（现在许多机关部队所设的公营商店，往往为着解决本单位困难，没有负起应有的任务，甚至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发生），合作社也发展得不普遍而且往往办得不好。因此，私商的存在是需要的。商人当然有剥削，商人的商业行为本身不生产任何价值，他们或者是分享资本家一部分利润，或者是直接对生产者消费者实行剥削；有时囤积居奇，作投机事业，为害更大。但问题不是要去破坏商业，而是要去领导商业。要能掌握整个商业的发展，要商人为我们所用，而不要我们为商人所用。这种政策对于人民固然是有利的，对于正当商人也是有利的。至于小商小贩，大部分是贫苦的，他们的生活只相当于贫农、中农或富裕中农，更不应该去打击他们。如在陕北高家堡所发生的破坏商业的情形，是绝对错误的，那里的商业搞垮了，老百姓买东西就要到榆林、神木或镇川堡，那就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对工商业，应采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绝对不能破坏，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对工商业必须收税，但必须订出恰当的税率，不要收得太重。这种税率，以不致影响他们的经营与发展为原则。否则，就会犯错误。

五 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我们应采取什么政策呢？

我们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知识分子如何看法？教授、教员、

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

这些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是有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过着经济上很困难、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还有不少的失业者。至于在科学上创造发明的机会，更是少极了。他们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

至于学生，从国民党城市近几年的学生运动及我们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学生是不满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去年一年的三次大的学生运动，是我们正在农村中实行土改的时期爆发的。许多倾向革命的学生，包括若干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土地制度，积极地为民主而斗争，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的一个基本部分。其他的许多学生，因为看到了革命发展，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的这种大势，也可能接受进步思想，逐渐转到民主方面来，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统治。在

广大的学生群众中，反革命特务分子是有的，但他们只是绝对的少数。学校中的三青团员，也并不是个个都坚决反革命。其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是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专门反对革命，破坏学生运动。因此我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应帮助他们进步，吸引他们参加反帝争民主的斗争。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解放区内已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还在继续发展。三五年内，革命就可能在胜利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例如建立一个医院，要设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牙科等，就要有许多医生、医助、护士。这些人才，要经多年学习和实际工作锻炼，才能培养出来。例如要修一条铁路，必须有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门家，还要有大批段长、站长等。又如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将来要迅速建设，还要建设新的铁路（现在解放区后方就已经在建设），靠我们军队的工兵连当然是修建不起来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就需要许多农业专家，来改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们办兵工厂和其他工厂，就需要许多工程师、专门家。开商店、搞贸易，需要很多会计。办学校，要教员。这一大批技师、专门家、科学家、教员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要有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多年才能毕业。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多的有知识的专家，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我们一面使用这批知识分子，一面教育和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他们的大多数是有建设热情的，在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其中大多数一定是会进步的。

现在农村中还有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没事做，我们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特别是土地法，不反对共产党的政策，愿为人民服务，不进行破坏活动，如有违法行为甘受政府法律制裁，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可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慢慢改造他们，然后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但不要一下用在紧要的岗位上，而且要经常提高警惕性，防止他们中有些坏分子的破坏。经过长期考验过的，才可放在重要岗位上工作。

我们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农民得到知识，并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或他们的子弟培养成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负担建设任务。如果只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

在抗日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例如李鼎铭等，参加了政府和参议会，这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现在打倒蒋介石，实行土改，是否这些开明人士就不要了呢？不应该。他们过去同我们一道打日本，现在又和我们一道打蒋介石，他们和我们共过患难，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地是要分的，但不要去斗。他们有错误，可以给以批评，不要去打。只有那种错拉了进来，恶迹很多，真是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分子，才应交给人民法庭当作恶霸去处理。过去有功绩，现在又赞成土改、赞成打倒蒋介石的，还可以继续办

事。李鼎铭死了,如果未死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工作。你们假如出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六 打人杀人问题

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资产阶级尚且提出这种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为什么把打人杀人的问题当作严重的问题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更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就造成了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些罪不该死的人,被打死杀死了。这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我们反对乱杀人,并不是说一个人也不能杀。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这

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或更高的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杀人必须公布罪状，不得秘密杀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随便加人罪名而去处人以死罪。须知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这是因为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地主富农在中国农村中占人口约百分之十，全体人数约在三千万以上，他们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中，是完全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封建剥削过生活。当着这种封建剥削制度彻底废除之后，分给他们以如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劳动来生活，那他们就可以逐渐被改造为替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利益的力量。如果任意杀害许多并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地主富农，这不仅会失去群众同情，孤立自己，而且还损失了国家的劳动力，使社会上要少生产一部分财富。如果被杀害者的家属因为缺乏劳动力不能生活时，还要增加社会上的负担。

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群众运动中，出于群众的真

正义愤，而去打了一下压迫他们为他们所极端痛恨的人，共产党人不应当禁止和拦阻，而应当对于群众的义愤表示同情，否则我们会脱离群众。但是共产党人，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应当组织打人。我们必须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应有远见地去改造已经缴械投降了的地主和旧式富农；我们是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并不是要消灭地主个人。对于缴出了土地财产的地主，应当要他们劳动，把地主和旧式富农当作国家的劳动力看待。同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自己。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为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

农村中犯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由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加以审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审查时，有时也有挨打的事。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中很多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因此能够领导人民，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进行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民主改革。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做了许多对不起群众的事。他们在做这些事时，有些是为急于完成上级给他的任务，但是方法不好而发生的。例如催粮草、派担架，时间很紧，又没有学会民主作风，他们就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打骂了群众，得罪了群众。这样的事不能完全由下面地方工作干部负责，上面领导机关交给任务太多，时间规定太急，平时对民主作风的教育太少，也有责任。但有些事，例如多分果实、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等，那是完全违背领导机关历次指示的，那是要干部本人负责的。上级如果也有责任，就是没有立即发觉、制止、处分或根本撤销其工作。但这些区别群众常常并不容易分得清楚。在群众审查大会上，过去

被打过被欺压过的群众,很容易走到用打的方法作为报复的情形。因此,我们要向群众解释清楚,或者在开审查大会之前,就先向积极分子说明白,对被审查的干部,准许群众放手批评指责,但不准动手打人。同时,也向被审查的干部说明,要向群众好好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许报复,违者由政府用法律制裁。在审查会上,要准许被审查者有充分说理之权,不准说理是不民主的。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除此以外,还要允许群众对被审查干部有直接撤职或建议撤职之权。对其中最坏的有犯法行为的干部,群众有权向人民法庭控告。我们说服群众不能打人,但如不给群众这些权利,他们就不敢批评了。总之,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这样规定,群众敢于批评,被审查者也有申诉的机会,就可以达到建立民主作风的目的。

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月）

一 完全抛开党的支部是不妥当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

在我们初步了解晋察冀土改整党情形之后，对于晋绥整党问题特提出下列意见：

晋察冀的经验告诉我们，除对极少数成分太坏、作风太坏的支部外，工作团采取完全抛开党的支部去进行土改的办法是很不好的，应当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容易产生好坏不分、错误大小不分和否定一切的偏向，以致分散和减弱土改的领导力量，而且要伤害广大党员的情感，便于坏的党员去蒙蔽好党员，增加土改工作和其他当前工作的许多困难。区县级干部全部调离本区本县的办法也不妥当，必须将一切好的或较好的干部留在本区本县工作。因为区县级干部全部调离本地，新去的工作团完全不了解本区本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这样容易发生割断历史的毛病，增加工作团进行工作的许多困难，而且可能错误地处理一些问题。

* 这是任弼时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晋绥分局的两个电报。

晋察冀在土改运动开始时，是普遍地召集了一次支部大会，宣布党员必须执行土地法，支持贫农团、新农会，保证其正确决议的执行，不得有破坏土改行为；停止了真正地富分子的党籍，以待将来审查，并且撤换那些很坏的村级干部，把他们调出训练，进行教育与反省；提拔成分好而积极的分子参加支部及村级领导或任党的小组长。但在这以后，也曾有一短时期（约二十天左右）把党的支部冷在一边，只依靠贫农团去进行土改工作。今年一月间就发现这样做增加了许多困难，比如坏分子容易钻空子，党员不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甚至采取消极旁观抵抗的态度，影响一部分农民特别是中农也不敢积极参加，因此，贫农团及工作组就感觉自己很孤立。于是又决定恢复支部的活动，召集有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犯有错误的干部及党员进行反省，群众发言批评。坏分子受到批评、指责或适当处罚。一部分地区这样公开了党的支部组织，进行了党内外相结合的民主批评之后，使支部与群众的隔阂也就开始打破（过去老区支部长期秘密也是造成与群众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这样初步改造过的支部，证明在土改运动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广大党员的情绪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他们参加土改运动在团结中农上产生好的影响（因党员中有不少新旧中农成分），特别在必要动员中农抽出土地时，党员起了带头的作用。晋察冀这次大扩兵运动以及支前工作中，不少干部和党员是带头参军和参加担架运输队工作。凡是工作团（或组）对支部加以改造，协同支部一起进行土改工作的，也就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领导力量，而且更易于全面地了解全村特别是中农的

动态和情况，使贫农团再不感觉自己孤立。反之，凡是把支部完全抛在一边的地方，工作即遇到不应有的困难。同样，对于成分不纯、作风不纯、不采取坚决克服对策的地方，工作即更难进行。晋冀鲁豫及山东等地，也都是采取经过支部的方针去进行的，他们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有的地方比晋察冀做得还更细致些，主要是更多地经过党内外思想酝酿过程，做到党员和群众都能了解整党的意义。

我们认为，晋察冀的经验值得你们参考和学习。我们在来晋察冀途中，也曾问到某些地方整党的情况。代县县委书记郝德清同志认为，一般地超越党支部去进行土改的办法，并不见得要比经过支部为好。他也认为如果经过初步改造支部领导成分，工作组协同这样的支部去进行土改，可能使土改整党工作要做得更好一些。过去机械地要超越原有组织和原有干部与党员的办法，不仅使党员情绪受到打击，而且要失去群众的同情。在三交工作的某些同志也有同样的感觉。根据晋察冀经验和晋绥一些同志的意见，故毛主席在公开发表的兴县讲话中，关于整党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改。

在整党工作进行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恰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根据晋察冀及晋绥党的状况，虽然大多数农村支部的领导干部，过去有严重的脱离群众的现象，但大部分党员和党的支部，还是好的或是可以改造得好的。党员大体可分作三类：经过八年抗战、两年内战考验过的党员，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很好的，他们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努力，真正是群众中先进的积极的分子，其中也有一些作风上不很好的，这是一类。另有较前者为少的

一小部分党员是很坏的,他们中有些是成分很坏,钻进党来为着保护自己及其亲友地富家庭利益的;有些则不仅作风很坏,而且借势图私,欺压群众,无恶不作,为群众所痛恨。这些人如不能彻底改变,是须要从党内清洗出去的,有些则已经证明成为犯罪分子,无可挽救,更应立即开除出党,这是另一类。最大部分党员则是作用不大或不很大,群众对他们也无多大恶感,但这些党员还是可以教育的,而过去我们对党员的教育确实不够,这又是一类。一般党员中真正的地主富农分子数量并不大;原来贫雇农成分约占党员百分之六七十,在几年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已上升为中农,现在贫雇农成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而新旧中农成分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关于支部的情形大体也可分成三类:有一部分支部是好的,这些支部的领导骨干不算坏,一般的能起领导作用,作风也不甚坏,这样的支部只须调换个别干部就可协同工作团(组)领导土改。另有一小部分支部是很坏的,其中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他们拒绝或破坏党的政策的执行,实行反土改、反支前等活动,这样的支部是不可能进行土改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但其中也还有少数党员是好的。对这样的支部就完全应当超越它来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者是宣布解散,吸收其中好的党员另行成立支部。对这样的支部如不超越或解散,那是无法贯彻土改、生产、支前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但在解散这种支部之前,必须先和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准备工作,找到适当的倚靠。你们那里如果是超越这种支部进行土改则是正确的,但这种支部的数目不大,要防止随

意扩大其数目。另有大部分支部是平常的，它们一般可以完成上级党所给予的任务，但是强迫命令的作风相当普遍。支部干事会中新旧中农占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只是个别的，贫雇农也很少。支部干事会中以及农村其他工作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强迫命令或有自私自利行为，有时容易为地主所利用，他们是为群众所不满的。对这样的支部，领导骨干应有更大一些的改变，即须在经过充分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撤换一批很脱离群众的干部，保留一部分较好的干部，提拔党员中成分好的积极分子参加支部领导。经过这样初步改造后，工作团是可以领导这些支部去进行土改工作的。同时，组织贫农团，工作团依靠支部与贫农团双管齐下，并按照支部情况决定以何者为主。此外，要注意在土改斗争的过程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继续进行改造和教育，使支部能够成为独立领导农村工作的力量，以便在工作团离开之后，他们能够继续领导农村工作。

你们过去对晋绥的党，显然缺乏具体的分析。对党的缺点加以重视是完全必要的，但如因为存在某些严重缺点，就笼统地确定应当超越一切乡村原有组织，则是不妥当的，如果不加纠正则将造成错误。

党内存在着的作风不纯和党员政治觉悟不高，一部分党员发展了自私自利思想，支部不能起着更大作用等，上级对他们的教育及检查督促不够也是有责任的。望你们详细检查一次晋绥党的状况和整党工作，应当很快恢复支部的活动。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应大批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有计划地将党迅速整好，使之能够成为农村中的领导力量；

尚未进行土改的地区，在今秋进行土改时，应当吸收晋察冀和你们自己的经验教训去进行土改整党工作，应使整党与土改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即先将支部领导做初步必要的改造，以利工作组协同支部去进行土改，在土改运动发动起来与深入过程中，注意吸收新的成分入党，并继续进行改造党的工作。只有那些太坏的支部，才去超越它或加以解散，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在土改工作完成时，党的支部组织也就很快能够完成整理的工作，在工作团离开之后，庶他们能够承担起农村领导的责任。你们检查整党工作结果及今后整党工作的办法如何，均望电告。

二 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 对待犯错误党员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根据分局五月三日及十八日两次来电，证明晋绥党的基层组织中，作风不纯的现象是相当普遍地存在。有极少数支部为地富篡夺或被暗中操纵。区级以上干部中由地富家庭出身者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大部分努力工作，且已经过长期考验，但有一部分则思想上还存在有毛病，未能完全放弃其原有的阶级立场。下级党员干部中自私自利现象相当严重。这一切说明整理党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步骤，而且是收到成绩的。但两次来电同时指出，绝大部分支部中的党员成分还是不算坏的，地富成分占党员的极少数。如兴县二区八个支部党员共三百四十八人内，只有四个地富分子；平鲁二区八

个支部共二百四十一个党员中，只有一个地主，没有富农。在晋 绥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占全区三分之二的地区内，被群众选举 的三万个区村代表中，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即是说有六千到七千人）是原有的干部党员，而在村级领导骨干中，你们说原有干部党员占三分之一至一半；在五万个贫农团及农会积极分子中，你们亦说包括有一部分原有党员（估计上述区村代表、村级领导骨干，贫农团、农会积极分子中会有一些是重复的）。还有一批党员被群众通过加入了贫农团和农会。在全晋绥四万三千个农村党员中，仍有如上所举这样多的原有干部和党员为群众所爱戴，或并未为群众所抛弃，这种情形证明整个晋绥地方党的基础并不算太坏。加上儿万个新起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会要加进党来（你们已确定大量发展新党员，增加一倍党员），这是一种新的力量。在这数万个党与非党积极分子的基础之上，的确是可以把晋绥党与政府都改造整理得很好的。这是这次土改整党运动中的重大收获。

二、但从这种情况也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就是假如土改开始时，你们即注意把整党工作与土改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去进行，即是说按中央五月八日所指对三类不同情况的支部，加以分别处理，有如上所述大批好的和较好的党员及干部作基础，应当承认是可以把党的基层组织初步整理好，使其能有组织地参加土改运动的，其结果也必然会比一般超越支部组织的办法要好些、健全些。你们也说，“领导上始终还是肯定党员干部多数可以教育”，这的确是你们对党员干部的看法。既然如此，那就应该采取适当的组织政策，来教育和领导

他们参加这次伟大的土改运动，并在运动中考验锻炼他们。就不应当用急于要完成土改以便春耕（其实时间并不那样急，你们去秋就开始采取抛开支部的办法），用“贫农团新农会代表会是实行土改的合法机关”，或用现在要搞土改无暇顾及支部和党员等为理由，来把支部抛在一边。相反，是应当如何运用支部党员力量去加强党对土改的领导。而在当时，的确如你们所说：是在一种揭发党内严重不纯的空气下的一种缺乏清醒分析的错误。而这种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据我们看来，又与当时错误的“贫雇农路线”，认为贫农团比党要好些，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是有联系的。因此，晋绥在土改过程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一般是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是主动积极地在土改斗争过程中去改造它的方针，而一般是采取了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采取了对被群众推选出来的积极分子则加以信用（但又限制代表会的代表中党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对中间态度的则含有“让这些党员干部在土改中去考验，坏的则让群众清洗”的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现在看来，这种整党的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这就一定要减弱党在土改中的领导力量，也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且必定是伤害广大党员及一批干部的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一些困难。这个一般抛开支部的错误方针，你们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态度加以适当的指出，才利于团结广大党员和一批好的或基本上还是好的干部。

三、你们在五月三口的来电中，对于晋绥党员已经有了

比较明确的分析，但对支部的估计，你们认为“少数支部则被地主篡夺，但支部受地主影响，则一般的存在”。这一点，尚希你们作更具体的调查研究。我们必须把支部中某些党员个人与地富有某种关系，和支部领导（即整个支部）受地主影响加以区别。支部中有个别党员受地富影响或本身就是地富分子的现象，可能是相当多的。但这些党员如不是在支部的领导机构之内，不一定就成为支部的支配力量（自然也会有个别这类普通党员能影响支部领导的）。而支部“受地主影响”，应当是表现于支部在领导对敌斗争，在过去的减租减息斗争和近年的土改运动，在生产支前等运动中，不执行党的正确决议上。如果过去的支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决议，特别在执行减租减息、土改运动、生产支前等政策上是坚决努力的，一般能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只是在作风上有强迫命令或有些党员有自私自利的缺点错误，那就不能笼统估计为支部“受地主影响”。比如你们五月二十五日来电中关于说明代县二十一个支部与地富关系的材料，除三个好的支部不说以外，则只能说共有八个支部是包庇地富或受地富影响的（在普遍将错订成分者下降之后，是否还有八个支部，尚待证明）。而其余的十个支部中，有“部分或个别党员与地富有联系”，就不能笼统说这十个支部都是受地富影响，必须再加以分析其中某些是能对支部领导发生影响，某些则只是个人与地富的联系。而且联系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有的属于普通的亲朋故旧关系，他们与之有些平常的来往，有的则是属于包庇地富行为或对地富采取妥协态度。我们承认晋绥党的支部除有一小部分被地富所直接间接控制者外，另外确会

有一些支部是受地富影响的，但对你们那“支部受地主影响则一般的存在”之估计，则有怀疑。望你们再作慎重客观的研究，并将结果告我们。

四、你们今后整党，拟采取只由经过群众选举担任工作的党员，组织整党委员会或组织临时支委的办法，也还值得考虑。因为这种方式，可能会加深党内已存在的某些隔阂。我们意见，还是由区委（如区委组织也已不存在，则须先加以组成，如存在而不健全，则首先加以改造）和原来工作团（必须去掉其中的非党员，或表现不好、思想意识有重大毛病的分子）负责去直接整理支部，会比另组整党委员会或临时支委要好些。依靠被群众爱戴的原有党员和干部，和已经吸收的新党员作骨干，去进行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思想是很好的，在方式上还是一般地以经过原有支部去做为好。即是说，首先一般应当宣布恢复原来支部组织的活动（如已另外成立临时支部者，也应合并进去），召集包括全体党员的（一切未经党内正式合法手续决定开除党籍者，均应承认他为党员）支部大会，由区委或工作团向全体党员宣布整党意义与内容，监督支部进行支部委员会和小组长的初步改组，或指定适合的党员，组织临时支委会（原支委会中比较好的委员尽可能也吸收一二人参加），或任小组长，负责领导支部和小组的口常工作。在支部组织恢复活动，并初步改造支部领导机关之后，就可以吸收一批新积极分子入党。区委或工作团必须善于领导支部开展党内民主，发动批评自我批评运动，检讨过去支部工作和干部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区委或工作团一定要作些自我批评，指出高级领导机关对过去党内不纯及各种

缺点所应负的责任，并指出整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启发自我批评运动。先召集两三次支部大会，在党员干部中作整党的充分思想准备，教育有错误的干部及党员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如何去向群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同时在农民代表会上或自然村的农民群众大会上（群众大会不应开得太多，据各地经验，群众对开许多大会误工很多，表示不满和厌烦，这点你们必须注意！）宣布整党意义和方法，公布所有党员名单，公开党的组织（边沿区在外），要求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对党员及干部充分提出意见，准备派代表（据太行经验，由农民代表会推出代表，比由群众任意去参加支部大会，更能代表群众的公正意见）出席支部大会。经过这种支部内外的思想酝酿和准备步骤，然后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全体大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运动。这种会议上，应特别多注意听取群众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少作甚至不作解释和声辩。经过这样有群众代表或群众参加的会议，并且听取群众方面所提出的批评指责意见之后，再召开支部大会，更进一步开展党内自我批评和反省。对于必须处罚以至不能教育而必须开除者，也作出决定，同时对于过去处罚过重或不适当者，也必须作出修改的决定，然后又召开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大会，又进行批评自我批评。

这次会，则着重由犯错误的干部或党员，向群众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与反省，对群众的误会，也作必要的声辩与解释，宣布对党员的处分和减轻或改正处分的决定，并征求群众对这些处分及改正处分的意见。此后如有必要，则犯错误的同志还可到农民代表会或群众大会上进行反省，承认错误，

表明如何改正错误的决心。经过上述步骤去进行整党,对犯错误者及对群众的教育意义都很大,不会发生打人、乱斗的现象,也便于党内及党与群众的团结。这样的办法和步骤,特提供你们参考。

五、你们主张“采取积极教育的态度,争取教育原有党员被群众处分尚能继续革命的分子,及被群众所暂时停职但仍能继续改造或调外工作的分子,以及改造和提高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员”,认为这是“重大任务之一”;对于开除党员,采取隔级批准制。这些意见和办法都是很好的。

对于“各地发生少数旧有干部党员发牢骚,甚至发展到与地主勾结攻击新起的骨干分子”的情形,值得严重注意。对于这些人,也必须加以分别,按具体情况来适当处理。对那些打击过分的,则应向他们说明当时处理上的缺点与错误,现在改正不恰当的处分,也准许他们向党提出申诉;但他们中有错误的则应当承认确属他们的错误和应得的处分,要他们必须与那些真正是坏的干部和地富分清界限,争取基本上还是好的或还可以教育的干部党员,站到党的方面来,以孤立真正很坏的干部党员。对于那些真正是极坏的、已经蜕化了的、毫无教育希望而且已经开除党籍的坏分子,经过群众批评斗争还不愿改悔的分子,则可由政府宣布法令,明白禁止他们做何项活动,如有违犯,则交由人民法庭审判处罚,以压倒他们的这种活动。但法庭制裁的办法不能用得太广泛,只是对付少数冥顽不改、以至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坏分子,而且事前要取得区或县级的批准。这里必须重复指出,不能对每个过去受了过火处分、现在发点牢骚的人都用法庭力量去制裁,

也不要把发点牢骚的就都看成与地富是有勾结而随意去打击他们。如这样做必会增加将来处理上更多的困难，而且是错误的。那些基本上打击错了或过火了的干部和党员，免不了会有些意见

甚至牢骚，党的领导机关要主动地找他们谈话，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这才便于争取他们。同时，对一个干部或党员也要全面地历史地去分析，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有过什么功绩；看他现在，也要看他的过去。这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你们决定即刻开办五个区村干部学校，招收一部分被处罚和当地群众不拥护的干部集中训练改造的办法很好，望能迅速地举办起来。

六、党内存在着许多严重不纯的情况，因此整党成为巩固党的十分必要的步骤。如果不能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以及不能把党的成分弄得更加纯洁一些，而任上述情形继续发展下去，则我们的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一切认为“整党是多余的”一类说法，那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之产生，不能只由下层组织来负责，上级领导机关是有重大责任的，而且主要地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村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恶劣作风还遗留很多，这些农民党员在掌握权力以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以及自私自利等，是很容易并是必然要产生的。假若党的领导机关不能规定适当的办法和制度去加以防止，及时检查工作，纠正错误，并且不断地进行

教育，则这类不纯的现象就必然更会发展。而过去党的领导机关恰恰没有重视或没有看到这一点，因而就疏于教育与防范，在农村党的建设方面就有某些严重的缺点。例如，我们党从抗日时期以来没有适当地强调阶级成分，对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党员，没有特别地注意加以教育、培养和提拔，他们在党的组织内没有若干适当的与必要的优先机会，使他们在党的各方面的领导上发生应有的影响，相反，在许多组织特别是领导机构内，他们实际是处于被轻视、被排挤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应有的与适当的严格性又有些不够，而这就是造成后来党内成分不纯的主要原因。又例如，我们党对于教育农民党员，防止各种恶劣作风及自私自利的经常斗争和办法亦是不够的，而这也就是形成后来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主要原因。再加之以上级分配任务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促，任务繁重，这就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不甚了解下情，检查工作不够，对下面发生的错误未及时指出并帮助其纠正，这就使强迫命令的坏作风更加容易发展；领导机关平时只知道要党员干部做什么，并未多想办法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程度，很少注意农村环境中容易产生的各种自私自利的倾向及时予以批评，严重者也很少及时予以处分，这就容易形成党内思想不纯的状态。由于领导机关存在有上述这些缺点，因之我们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且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本身的检查和自我批评，而且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成分作风和思想的纯洁性；否则，今天纯洁的新党员和新干

部及作风和思想业已改正的老党员和老干部,在他们掌握权力的相当时期以后,其中又会有不少的人要重复过去的错误的。因此,对于过去犯了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而所犯错误又不十分严重者,就一般地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去处罚他们。如果群众要求处罚他们,也应向群众作适当的与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向群众指出他们过去许多方面的错误是要由领导机关负责的,而他们今天既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不要处罚,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因为在这时的处罚,就要妨害他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如果他们所犯错误或罪行太大,因而引起某些人们的损失和群众大的愤怒,而必须给以党内和行政上适当的处分,甚至须经法庭判罪才能平息群众愤怒者,则在令他们承认错误及适当地退出由于贪污及其他自私目的所得的果实和赔偿损失而外,给他们以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甚至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会使人们觉得没有法纪了。但这种处分亦不要太重,因为他们过去犯这种罪行也是领导机关要负责任的。对过去犯错误者不宜过多过重处罚,这不仅因为如果过多过重处罚,会妨碍或者断送犯错误者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将在其他方面引起不良的影响。例如,若干新干部由于害怕将来受处分因而不肯放手工作的现象,就是受了这种处分过多过重的不良影响而来的。这一点,群众在当时常常是看不到的,常常激于一时的气愤,要求过多过重地处分一切犯错误及犯罪行的分子。但是领导机关则应该看到这一点,应该向群众解释,说服群众,在

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以后，万万不可作过多过重的处分。在这里，领导机关决不可采取“让群众去处理”的放任的政策，更不要受某些群众一时甚为高涨的宗派报复情绪的影响，而动摇自己正确的与坚定的方针。因为如果这样，就要使我们的整党工作走上错误的道路，或走不必要的弯路。只有对于那些不肯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坚持错误的分子，或者只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以后又重犯同类性质错误的分子，以及钻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和完全蜕化了的分子，才应该无所顾虑地给他们以应得的处分，直至开除出党。因为对这些分子如不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他们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就不能保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严肃性。因此，你们事前不要肯定作出开除一万党员的决定，而要按个别党员的具体情况去作具体的决定。

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正确利用自我批评的武器，首先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在这次伟大的土改整党运动中，获得有重大的成绩，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但运动过程中错误也是难免的。例如，对某些具体政策缺乏及时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如何划分阶级，对地主的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时期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规定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整党也缺乏详细具体的指示。因此，下面就容易犯或“左”或右的错误，有些党员和干部可能由此存有各种意见。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

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有牢骚也让其发泄出来。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人以反攻帽子来抑制党内的民主。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但是，如果有人利用党在一个伟大运动中的某些缺点错误，而宗派主义地及恶意地攻击领导，不是为着弄清是非，巩固团结，而是有意要造成党内纷乱和进行派别活动者，则必须加以防止和反对。否则就只有削弱党的力量，破坏党的团结。

七、有一个问题也值得你们地区注意，就是华北某些地方，群众表现有动荡不安的情绪，而且呈现出一种不很团结的现象，更由于干部的“躺下”，以致迷信活动及会门团体随着有些发展。这与战争延长，人力财力担负很重，天灾疾病流行等有很大的关系，与土改斗争过程中一些过左政策也不无关系。群众中产生一种不正常情绪，反革命特务也就借机活动起来。上述现象应随时加以警惕。现在群众要求安定，这除要在实行土改地区迅速确定地权和负担额，尽量节用民力，减少支前动员，组织群众生产等外，同时也要少开群众大会，以免他们误工太多，妨碍生产。要真正健全区村人民代表会议及区村政权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不要每一小事都开代表大会或群众大会解决。要实行分工负责制，使一切问题能及时迅速解决，去掉存在着的一些混乱拖延、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等状态。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地区，要强调各劳动阶层间的团结，消除贫农中农间、新老干部间、干部与群众间、

这村与那村间、外来与本地干部间某些隔阂现象，并积极地组织被斗过的地富也来积极参加生产。要做到劳动阶层间的坚固团结与安定，首先必须要做到党内老党员老党员间、新老干部间的团结一致。党内团结的方针，应当是不管新老，只论好坏，将新老党员和

干部中的优秀部分，团结起来，成为核心，再将稍有毛病的新老党员和干部，又团结在这一核心的周围，加强对他们的帮助与教育，以巩固党内团结。在新老党员干部团结问题上，双方都有责任，但老干部和老党员的责任要更大。同时党在领导上要注意用各种实际有效办法推进群众中的团结合作，使群众能够安定地去进行生产。在生产运动发展中，又更推进群众内部的和睦与团结。

八、在土改已完成地区，要争取在今年冬季内把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也整理完毕。应利用七八两月时间，将区县干部及各工作团干部集合起来，用会议、训练班、党校等方式，好好检讨一次土改整党工作。首先要使这些干部对于土改整党问题，有一致而正确的认识。发扬自我批评，揭发他们中存在着的一切不正确的想法和作法，使他们自己真正搞通思想和政策。首先要整掉他们中不纯的思想与作风，才能保障他们下去能够正确领导土改与整党工作，而不致重复已经做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特别要告诉他们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要他们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去对待一切工作。他们下去后要按照前述整党方针、步骤去进行党的整理工作。最后，支部要经过一次民主选举，推选出强有力的支委会和小组长担负支部经常领导。在没有支部的地方也建立起党的支部组织，使支

部真正成为农村中的领导核心。支部仍应有自己单独的生活，过去采用一揽子会，就完全取消支部本身的组织生活，显然是错误的，这样会丧失党的领导作用。一揽子会只能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可以举行，它的好处是能减少一些内容重复的会议，使乡村中的积极分子得以民主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但除此种会议外，平时支部还应有支部大会或小组会议，进行党内教育，吸收新党员，利用自我批评武器检查工作，定期改选领导机关和执行党纪等。现在有了人民代表会议，一揽子会自然就没有必要了。但是支部大会及小组会也不要开得太多，而且要求得每次会有准备、有收获。开会时群众愿意者，可以旁听发表意见。每年年底和年初，必须有一次支部工作大检查，在充分民主基础上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并改选支委会及小组长。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注意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之真正成为先进觉悟分子的组织——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且能够团结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去正确地实现党的政策。关于支部如何建立经常生活，你们还必须加以研究，这对巩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政策之贯彻实施，是有极重要意义的。

九、你们五月三日来电所提整党原则及步骤，除某些问题与上述各问题有抵触者应加以修正和补充外，其余一般都可以适用。尚未进行土改整党地区，今年秋后如何进行土改整党工作，望根据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所发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工作指示，及过去所发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指示，以及中央两次（连这次在内）来电原则，和你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按照具体情况去布置进行。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毛泽东同志正确提出了我党当前的任务，我不多讲，只讲几个问题。

一、战争问题。

这两年战争，歼敌一百九十多旅（师），二百六十万人，缴枪九十万枝，打下石家庄、洛阳、临汾、开封，这是大胜，证明我军战斗力强。同时这两年在老区，发动群众，消灭封建，整理党的组织，成绩很大。这更坚定了战争胜利的信心。而且胶东有民族资本内流，中间人士打包袱进解放区，美国已感救蒋太迟了。这证明大家都知天下是共产党的。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我相当赞同宣传五年胜利，可提“争取五年胜利”的口号。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大成问题。但这一点并非全党都认识了，例如调干部南下，许多人怕，故对此问题仍须有系统的宣传。军队向前进，不仅军事上必须如此才能五年获得胜利，如蒋之重点进攻西北、山东，我刘、邓南进，打破了敌之重点进攻而转为我之全面进攻；如我再继续前进，则中原应变成现在之华北。而且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

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测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

其次，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那时，军队深入西南、江南，则群众负担更轻，生产长一寸更有条件了。正因为是过关的一年，故提出在不伤元气太甚的条件下多努一把力，多下一点本钱。

第三，中原的工作要加强，要把群众努力发动起来，那时支援江南就更要靠中原了。第四年、第五年，中原要准备支援，故减租减息的运动在中原应努力普遍搞起来。

第四，要努力争取俘虏，一般做到收容百分之六十以上，好的做到百分之九十也有可能。

第五，老解放区的生产要搞好。

将来南下有可能仍很困难的，前方胃口小些，后方努力

供应。南方在第三年能消灭敌五十四个旅，北线能牵制住蒋军，则就好搞了。要做到原则上不扩兵，既准备第三年的胜利，又要准备“出嫁”。

二、纪律性问题。

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所谓正规化，即是“机械化”，机械一点，螺丝钉配合得很合拍，当然今天还不需要绝对钉死。供给上也是需要统一的，将来会更需要正规化。地区统一后，人为界限要去掉，才便于人民，利于经济发展。正因为党的威信高了，更需要统一和纪律，因为大家更注意了，任何一个角落里搞一点坏事，则“一个老鼠屎坏一锅汤”。大革命时纪律性强些，派工作是毫不讲价钱的。纪律之无条件即是不讲价钱，而不是讲纪律之养成，纪律之养成必须有条件。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人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普通党员干部也要提高，主要靠这三千人，这三千人主要进不成学校，必须挤时间学习。第二个条件就是建

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不如陈瑾昆那样讲法制，但没有法律不行（毛泽东：我们有些共产党员没有守法精神，对我们的法也不遵守）。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此外，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来请示问题必须提出自己的意见草案，否则不答复。而且纯地方性的问题，各地方应主动地想办法，自己处理，送上面审查。县有自己的财政权，有预算，有自治权，县的自治权不要废除，这与加强纪律性并不矛盾。

三、民主问题。

在直接作战的区域，需要在块块内集中，过去强调一元化是对的，而且在这种地方，强制命令的范围也是大些的，但这种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在这种地区，人民的和党的代表大会可以不开。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干部会的长处是办事迅速方便（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有了批评自我批评，而且是真正的，小广播就没有了。如果只有代表会，而小广播的话不能公开在会上讲，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

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大会上自由结组讨论这是一种好的形式，所谓打破开会的封建秩序。

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

在城市中，今后发展党应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农民中发展主要是在新区，而且要加强领导机关中的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的工作。

现在农村中感觉运动太多，整党可以不当做一个单独的运动，而只是结合着其他的中心工作来进行，如在生产运动中整党。

思想教育必须与执行纪律相结合。在整党中，有部分地发展了惩办主义。自然，有些犯错误的党员不处分，党就要脱离群众，即使是已承认错误者，仍然是要处分。

党内缺乏基层组织生活，应加强组织部。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党务工作是应加强的，一揽子的工作方法就是混同党与群众。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央机构必须加强，而且准备过渡到建立中央政府。

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 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我认为还有加以分别而慎重处理的必要。即普通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而只规定特务机关（如中统、军统等）的人员和国民党党部（从下层的区分部起）及三青团团部（也从下层的起）委员必须向政府一定机关登记就够了（党部和团部委员登记时，规定必须将该下层组织所有党员或团员名单交出）。因为这件事如若处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的。

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者（自然少数是自觉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对国民党、三青团关系本来不甚密切，但现在要他们出面登记，他们又会惧怕因此将来要受累（因为他们不会都明白登记的意思，怕将来找他们的麻烦），而不愿登记。由于此种情形，下面执行登记时，就可能产生强迫威等办法，我们又一般对逾期不登记分子规定

* 这是任弼时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的意见书。

“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将其逮捕法办”，更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现象。我认为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在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要好一些。

至于特务系统人员及下层党部团部的委员，是必须强制他们登记的。

此问题必要时可提书记处会议上谈谈。

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

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在农村反封建，发展农村广大生产力，依靠农民，组织军队，包围城市，解放城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城市，就要把官僚资本的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私人资本也允许其有一定的发展。总之是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

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俄国在一九一三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而我们现在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城市，努力发展工业，首先是国营工业，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工业上必须照顾农业技术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农业耕作上所需要的简单机器，将来还要提供拖拉机、康拜因，扶助农业走向集体化。而农业必须生产大量的粮食和原料，以供给日益增加的工业需要；并以剩余的农产品出口交换机器，维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还必须节约出劳动力以供工业发展之需要。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故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

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

党的领导机关在这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城市工作，抽调大批优秀的干部到工业中和工人中去。要教育一切到城市到工业中去工作的党员和干部，认识这项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性，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是否会有障碍和困难呢？有的。

过去，我们由城市转到乡村也不是容易的，当时对“爬山”、“带花”都不懂，对乡村黑漆一团。现在由乡村转入城市也有不少的障碍和困难。据石家庄市的情况，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对管理企业没有经验。其次是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的看法有问题。有的认为工人为敌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我们。有的认为工人不承担战争负担，不出勤务，因此与他们搞不来。特别是发现有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不分析他们大都是被迫的为谋生而出此的，就怀疑工人不可靠，歧视他们，强迫他们登记国民党员的身份，甚至号召“挖蒋根”运动，仿佛工人都是蒋介石之“根”了。于是，这些干部与贫民结合了，因为贫民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与这些干部的相同点较多，容易工作。所以，必须对干部讲清，如何接近工人，否则屁股就自然坐在贫民方面。这些干部还认为搞上层就是搞学生的工作，因此只注意学生工作之蓬勃。这样，与工人有一个时期就是隔阂的。

石家庄直到去年十月以后,在华北局和石家庄市委严重提出依靠工人阶级、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之后,才有了转变,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方面;才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以廉价之米粮供给工人;才组织了工会,发展了党员,数量由一二百增加到一千多。为了加强工人的工作,市委组织了工厂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工厂工人支部。在敌人进攻时,组织工人搬运机器和我们一起疏散;及至打退敌人进攻后,搬回机器,发动工人突击进行安装。他们非常积极,三天之内就完成了铁路大厂的机器安装任务。为了补偿疏散中的损失,发动了增产竞赛运动,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人打道钉,原来每人每天完成定额二百五十个,竞赛运动中最高达到一千二百个,后来规定定额为六百个。这个厂原来计划两个月补上疏散造成的损失,结果一个半月就完成了,还超过计划价值四十二万斤小米。应当承认,石家庄的工作在去年十月以后,是有转变的。现在那里的大兴纱厂有了新气象;炼焦厂的一位老工程师也承认工人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因此,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城市生产就可以很快地发展,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是并不难的;在发展生产中,照顾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就有了保障。

二

我们有了城市,要发展工业,把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的比重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十,资金从哪里来呢?

第一,靠工业利润。这就是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

性,努力提高技术,节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交给国家去发展工业。石家庄铁路大厂的工人,打道钉的由每天的二百五十个提高到六百个,这在资金积累上是有很大意义的。故必须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一部分改善待遇,一部分用于积累。多余的产品如煤、盐等出口换取机器。

第二,靠农业增产。农民增加粮食和原料生产,一方面直接供给工业的需要,同时由国家组织大量农产品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从今天的整个情况来看,积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因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毕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生产是大量的。如出口一百万吨粮食,即值九千万美元。日本侵占东北后,自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五年间,平均每年从东北输出六百六十多万吨粮食,以此来建设鞍山、本溪、小丰满等等。现在我们努力增产(现产粮较战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二),如能在两三年内做到增产一千万吨粮(包括一切农作物在内),只要出口五百万吨,则可获得四五万万美元。

棉花,解放区去年产六万万斤,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全国每年需要输入外棉二万万四千多万斤,如能做到自给,既解决了工业原料问题,又能节约外汇。今年华北地区计划植棉一千四百万亩,相当于战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今后应争取恢复并扩大棉田面积。华北要计划做到植棉二千万亩,这就可供天津、东北甚至上海的需要。目前在一定时期内还需从美国输入棉花,但必须争取摆脱这种依赖。此外,如桐油、花生等农作物,也都必须有计划地扩大生产。

农业要增产,就需要改良水利。如山西省代县有一个村,

原来每亩地只产四斗粮，后来修了一条水渠，解决了一千亩地的灌溉，结果每亩产一石粮，由此证明水利之重要。

所以，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强调发展工业时，决不能忘记农业，相反的，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积累资金，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等等，则必须努力加快发展农业。加快发展农业，也就是为着发展工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初期，农业上积累资金的意义要更大些。

第三，靠税收。靠各种税收，如财产税、营业税、利得税等等。不仅对工商业应当收税，就是对工人职员，一切有收入的职业者，也将准备要收税。我们固然要反对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绝不能有任何施“仁政”而一概免税的错误思想。为了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把这看成是中国人人都有的责任。

有些城市，我们进去以后很久不收税。除开兴办大的工业工程外，许多城市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的。长期不收税，以乡村养活城市是错误的。石家庄市的经验，去年财政收入九万石，支出五万石，余下四万石，证明城市财政还有结余。因为要保护工商业，就到处迁就他们，大量投资给私营工商业而不向私营工商业者收税，这是右倾，同样是错误的；只是在收税时要有限度，要使其能生存并有一定利润为原则。

还可以主办各种专卖事业如酒、食盐、烟等，获得利润，收专业税，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

海关和对外贸易，是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及利益的，海关的关税和外贸收入，是国家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

农民要交农业税,这种税在数量上不能少于现在,在比例上要从增产上求得减少,绝对数将来还可能增加。

第四,举办内外债。这也是取得工业发展资金的一个来源,但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的,内债可以在适当时期举办。内外债都是需要偿还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

第五,提倡节约。在战争结束后,军队大部分复员了,脱离生产由公家养活的人员应当精简,不能如国民党那样多,他们有一千二百万人的话,我们最好争取在八百万。

从节约观点上来看,战争结束后,要全部实行薪金制,而且薪水不能比国民党时的高。

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十年之后,我们才能喘过气来,才能有将来真正丰衣足食的基础。

上面所说的五个方面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也应当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党员人数曾到过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国共分裂后,大批党员遭敌人杀害,只剩下了一万人左右。以后我们就转入农村,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到一九三四年长

征前，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长征中损失很大，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党员数降为四万人。抗日战争后，我党又有了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党员人数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现在，全国已有党员三百多万人，其中女党员约占百分之十五，青年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四。

从党员的成分上看，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东北的党员中，工人多一些，也不过占百分之九点六。

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性等偏向。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骨干中，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的约有五百人，土地革命时期加入党的约有一两万人，抗战时期入党的几十万人。现在，团以上及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概有一万零五百人。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他们率领和教育群众，取得革命胜利。今后还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靠农民党员建设工业那是困难的，要建设工业必须吸收大量工人党员。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和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

中国约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他们受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资本长期的直接的压迫，他们文化政治水平高，团结性纪律性强。我们要依靠他们，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党内工作的干部。

我们计划，经过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一百万党员；在非产业工人的劳动者中，如受雇佣、受剥

削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中，也要争取吸收一百万人进党来；还要吸收二三十万雇农入党；并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

以后在农村中发展党员，一般以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为限度（新区农村党员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有些地方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是没有必要的。但空白村必须补上。

这样，五年以后，党员总数将达八百万左右，工人成分的党员（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在内）要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太快，拉伋是不好的，但关门主义，速度太慢，对工作也是有损失的。我们要依靠工人，发动工人，就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吸收时仍应经过严格审查，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发展工作。过去那种不积极发展工人入党，也包含有一种对工人不正确认识的作怪。

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老解放区的有些农村，党员比例过大，受的教育较差，起的作用反而不及以前。平山县洪子店的支部书记说，“数多而质好则好，数多而质不好则不如少好”。过去一个时期，在农村常常采用一揽子会的活动方式（好处是解决问题快，不好处是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放松了党的组织生活，取消了党员的教育制度，是很大的损失。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前，党的支部生活比较健全，那时有千字课本、党员须知，按时召开支部及小组会，对于党员提高

认识、遵守纪律、服从决议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大概是在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后，又加上一揽子会的方式，党的基层组织很少活动了，连那些行之有效的党内教育也被取消了。入党仪式也取消了，而入党仪式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的宣传机关仍应编印党员课本，党的组织生活应当恢复和健全，各地尚习惯的一揽子会的方式应加改变。

党的支部及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当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各地在整党工作中应联系这些内容，认真加以整顿。

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要只忙于登记干部、转发介绍信，而对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很少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质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一 目前形势与任务

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要用最后的努力来实现这一全国胜利，同时又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个建设的首要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以巩固中国的独立与统一。

代表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集团——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时期，就想借日本法西斯的力量来达到它削弱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目的。它对反共是积极努力的，而对抗日则是消极的，借抗日之名以积蓄力量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这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意图是相吻合的。但是，国民党借日本的力量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希望并未能实现，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之下，成了中国人民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没有它，中国早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自己。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终于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陆海空军兵力总共有四百三十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一百二十八万人，既没有空军海军，大炮也为数极少。国民党满以为依据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各种帮助，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并曾预计在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内定可消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虽占劣势，但是执行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因而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解放军，与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努力相结合，经过一年艰苦的防御战斗之后，在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即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就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反动军队则由进攻转为防御。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解放军除大部收复了在第一年所失去的土地、城池之外，并且把战争引到长江以北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从缴获中培养了自己的炮兵，建设了自己的工兵，因而也就能攻克一批中等城市，如石家庄、四平、洛阳、潍县、开封等，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军威大为提高了。

到了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不可比拟的，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到现在为止，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共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四百九十五万人。现在的国民党反革命军队已经由四百三十万人降到只有一百一十多万战斗部队及数十万后勤机关部队，这些残余的战斗部队

中许多是经过一次或一次以上消灭后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既很薄弱，而且散布在迪化到台湾这一非常宽广的区域之内。人民解放军则于同时期内由一百二十八万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以上，其装备则毫不亚于美国装备的国民党的最优良的陆军。

与军事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的地域与人口也扩大与增加了。据三月初统计，现在解放区的面积有二百六十万一千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整个东北和几乎是整个长江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都已被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万万以上。在包括一万万人口以上的地区之内，已经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在这种地区内，过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说是已经被消灭了。在广阔的解放区之内，有相当的轻重工业、铁路运输的基础，有极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源，如煤、铁、粮食、棉花、盐、石油、木材等。分布在这一广大的解放区内及三百多万军队中，有三百万共产党员。在解放区内，有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工人、妇女、青年及民兵。解放区内工业农业正开始恢复，金融物价也比较国民党区域为稳定。共产党在全国中国人民中的影响大为增加，人民胜利的信心非常坚强，解放军的士气甚为高涨。

人民力量的胜利发展，亦即国民党力量的失败与缩小。国民党随着在军事上的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日益土崩瓦解起来。发行不久的金圆券，已经降到伪法币的地位。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人民面前，遭到从来未有过的孤立。一切过去还动摇着的中间力量，现在已经更加靠近于人民方面。总而言之，人民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对比，

在最近一年之内是起着对人民方面绝对有利的变化。经过辽沈、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在基本上被解放军所打垮。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援助，也不能改变国民党灭亡的命运了。

最后肃清国民党存留的反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使革命在全中国获得彻底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目前应当继续努力不可松懈的工作。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下列方式：一种是继续以战争的方式，就是所谓天津方式，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全部歼灭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有把握做得到的。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的人们，连国民党反动派在内，都会相信这一点。另一种是按照毛主席在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就是所谓北平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没有如天津方式那样干脆痛快，那样能迅速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但是可以避免破坏和人力的消耗。

对于这两种解决中国残余反动势力的办法，我们欢迎第二种，但同时必须准备第一种，而且只有痛击一切反抗和平解决的部分，才更易于争取用和平方式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要努力使南京政府迅速交出自己的权力，以便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实现中国的完全解放与统一。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见，我们离在全中国胜利的时期已经不远了。这种胜利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对世界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比重上，会产生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然而我们要认识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指示的深远的意义，要懂得在军事上完全打败国民党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完全摧毁国民党一切反动统治机构，这是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这还不等于中国就已经最后地达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毛主席着重指出说：“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完全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估计，“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百分之十左右的工业，因为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影响，相当部分已被破坏。我们要使中国在经济上达到完全独立，则不独要努力争取被破坏的工业能够在三年五年内恢复，而且要有计划地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由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比重，使中国有相当强大的机器制造工业，生产大量发展工矿交通业所需要的机器和车船；而且要达到中国自己的工业能够生产国防上需要的大炮、坦克以及飞机等。到了那时，才可以说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达到独立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上也具备有足够力量来保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只有工业发展起来，生产技术随着提高，生产成本日渐减低，能出产极大数量的成品，才有可能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自己和生活水平，

才更能巩固工农间的联盟,真正发挥城市领导乡村的作用,才是替将来转向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固的经济基础。

在恢复和发展工业,努力使中国达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首先使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获得迅速发展的一切条件。为此,我们必须把可能积累的资本,多多地投入国营公营企业里去。我们必须改造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官僚资本手里接收过来的企业,保存一切合理可用的东西,去掉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创立新的适用的东西,使企业管理、劳动组织等更加合理化。教育改造旧有技术干部,只要他们能改变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民主政府欢迎的。更为重要的,我们要从熟练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中有计划地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干部;没有大批的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优秀的可靠的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各种工程师、技师等,那就不要设想能够把中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在恢复和发展工业中,对于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人企业,应当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党的这个政策,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完全必要的。私人资本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使它走出国民经济需要的轨道以外,但惧怕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加以不适当的限制,也是不对的。

由于战争迅速胜利发展,不仅使过去被敌人分割的解放区打成为一片,而且有了一批大的和大批中等的城市,还有大批城市很快就要解放。在这些城市中及其周围,集中有许多工商业和学校,各个城市之间,有铁路和航运联络着。这种形势,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城市的新方针。过去由于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盘据,我们

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削弱封建（减租减息）直到消灭封建（分配土地）的斗争，组织军队，用农村来包围城市，然后去夺取城市的政策，事实上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存在过的只搞城市忽视农村的观点，事实上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新的形势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和工作重心。过去以农村为重心的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来领导乡村的新时期。我们向长江以南进军时，也会是先到城市，然后向农村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组织、领导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一道去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要把城市的文化教育工作恢复、改革和建立起来，使大批学校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材。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一切其他工作都应当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并为它而服务。如果我们进到城市，不去依靠工人阶级，不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其中心的工作，而去依靠贫民或其他阶级，忙于其他的比较不关重要的活动，那一定会要使全盘工作受损失。

我们说，工作重心现在应该由农村移到城市，应该抽调一定力量来加强城市工作，但如果因此而丢掉乡村，把乡村工作力量都移到城市里来，那也是错误的，也是必须防止和要反对的。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住在农村，他们中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是为着要发展工业，也必须使农村能够供给大量的原料，如棉花、

大豆、花生、烟叶、麻等；须要农村供给城市大量的粮食。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数量上既然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这就说明在今天我们还要依靠农民大量生产粮食和原料。解放区农村的封建势力已被肃清或正在肃清中，农业生产力有发展的充分余地。我们要努力去领导农民提高农业技术，改良水利、种子、肥料等，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在农村中，要去组织大量的农民认为需要的生产的、消费的、供销的合作社。我们要大大提高农业产量，还因为我们要利用它来与外国交换为着恢复和发展工业必需的机器。此外，我们还要在农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上述这一连串在农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上述这一连串在农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上述这一连串在农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上述这一连串在农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

如上所述，我们虽然接近于全国的胜利——这也还要不骄不躁地认真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完成——然而要使中国达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则还需我们极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一切以为革命快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要知道建设比破坏要艰难多少倍。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只有这样，再努力十年

到十五年，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是最终地巩固起来了，那时我们有可能和人民一道，过着更加充裕更加文明的生活。我们的前面还有如此艰巨的任务，而旧社会交给我们的遗产又是如此贫乏与落后。虽然如此，我们绝不能因此发生任何的悲观。在具有如此勇敢、如此勤劳的四万万几千万人民力量的基础之上，有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加上苏联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我们有根据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比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会要更为迅速的。

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线日益强大。苏联及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经济，都已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日益改善，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力量。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民主阵线则日益困难起来。战后称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虽在努力用造成新的战争恐怖的方法，争取尽量推迟其国内经济危机之到来，然而危机的征象已在出现。美国援助蒋介石在中国进行的反共战争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胜利将要完全冲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锁链，东南亚几万万人在中国革命影响下，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美国在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把西欧的经济引到了绝路，使受援助的国家对美国的附属性越来越大，因此也遭受各该国人民的越来越大的反对。美国本国因经济大危机的迫近，某些企业开始减缩，工人生活日趋降低，失业恐慌随着增长，人民民主力量也逐渐加强。最近，美英又在用“北大西洋公约”，将来还企图要用什么太平洋公约等办法，来加紧准备战争，加强美国对于受“惠”国的控制，以求逃脱危机。然

而全世界人民连美国人民在内，是不愿战争到来的。只要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民主力量保持充分的警惕与努力，战争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即使帝国主义者真的挑动了战争，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也有把握战胜并消灭帝国主义势力。这一切都说明今天的国际环境，是极有利于我们中国革命斗争的顺利发展的。一切过高地去估计帝国主义这个敌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全世界人民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二 加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

中国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着自己很光荣的历史。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八年抗日战争、抗战以后的民主爱国运动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青年都曾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三十年来的近代革命史，证明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同志曾在一九二六年说：“在中国，青年问题现在是有头等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 切这些力量，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进展。”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这些论断，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青年其所以能起这种作用的原因，也正如斯大林所分析：“我们应当知道，没有那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是如此的深刻和迫切，也没有那一

个感觉需要与这压迫作斗争是如此尖锐和沉痛，如象中国的青年一样”。

我们现在接近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但要求我们作最后的努力；我们面前又放着建设新中国的极为严重的历史任务，没有全体人民的动员与努力，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动员人民力量的时候，必须着重动员青年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作用。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当前总的工作方针，一方面使青年积极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军的最后进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各地；另一方面使广大青年积极努力参加各方面的建设工作，特别努力参加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高农业生产。为着加强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特在今年一月一日通过决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群众的积极分子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发布这一决议，是经过了很慎重的考虑的。为了取得建立青年团的经验，从一九四六年十月起，就已开始在各地试办，这些试办的经验，证明青年团的组织是必要的。我们相信，这一决议各地共产党的党委必定会坚决执行。

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更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青年救国会——包括几乎全体青年的那种青年组织，虽在抗日运动初期，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抗战后期就不能满足青年群众的需要了。现在如果没有比较坚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那么就不易团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现青年的意志和行动，青年运动就势必陷于涣散无力的境地。

同时，在目前全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之下，也很迫切地要求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包括一切进步青年的积极分子的组织。这一组织的社会基础，应当比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它虽应以工农青年及革命知识分子为主要基础，但又须能够团结全国各阶层中的进步青年，并把其中最好的分子吸收到团内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应当有系统地进行生动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每个团员具有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这种规律而去奋斗。有这种觉悟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必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在最后解决敌人，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的得力助手。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是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及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

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应该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下的极重要工作之一。在加强对青年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整个青年一代，其工作阵地，显然不应当限于青年学生的狭小范围内，相反，是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开展工农劳动青年中的工作上，而且主要地是要依靠工农劳动青年群众。在已经掌握了大城市的今天，正当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现时，需要特别加强青年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并要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学徒中发展团员，要求每个重大企业或每条铁路上，每个矿山中，都有青年团的组织，使青年团组织中青年工人成分的比重增加。在不放松农村青年工作的原则下，把青年工作的主要阵地放到城市各企业的青工工作中去。

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青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作为遵守劳动纪律、节省生产原料的模范者。在学习技术和手艺中，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要能起先锋带头作用。青年工人团员应成为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工厂中的青年团，除接受党的支部领导之外，必须和职工会保持正确关系。在组织上，青年团和职工会都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但是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应进行工作，使青年工人自觉地遵守和响应各公营企业工厂或职工会的各项规定和号

召；而职工会在确定有关青年工作的问题时，应当征询和尊重青年团的意见。同级职工会的青工部部长或副部长，最好是由青年团的工作人员来担任。

在农村中，青年团应当继续有重点地去发展团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中农中的优秀青年入团。新富农及农村知识分子中的进步觉悟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入团。但必须保障团的领导成分主要是放在雇农、贫农出身的青年身上。在实行过土地改革地区的农村青年团员，应成为增加农业（包括副业）生产的积极分子，领导广大青年农民与成年农民一道变工合作，进行深耕细作，改良水利，多种粮食，多产棉花和其他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农产品，并且积极参加农村中的合作社运动。在新解放区，则应按照共产党新区工作的方针进行青年工作，准备由减租进到分配土地，同时要不使生产低落。在军队中建团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其方针与步骤，可按照朱总司令在开幕时的致词中所指示的执行。

中国学生运动有很光荣的历史传统。学生青年容易接收进步思想，他们又有知识，希望他们在学习中注意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材，因此今后还要加强学生中的工作。在各大学、中学和专门学校中，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建立团的组织，开展团的工作。学生中的青年团员，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特别努力学习于建设新社会有益的科学，同时应该积极参加学生会的各种工作，依靠自己优良的学业和模范的实际行动，去取得同学们的信任，使学校中团的组织真正成为团聚优秀学生，而且为一般学生所拥护的组织。

为着发展工业和农业，政府将要开办大批培养工业和农

业以及医药卫生方面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城市和农村中的青年团，有任务要供给大批优秀团员和青年工人、农民及革命学生知识分子，进到这些学校和训练班里学习，以便训练出大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人材——工业、农业的专门家、工程师、技师及能管理工厂、农场的干部等。

青年团要在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作部门的青年群众中进行工作，其总的目标，在于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在于领导青年学习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因此，学习问题是所有一切不同职业、不同部门的青年团的共同的中心活动。学习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学习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种具体工作上的实际运用。这就是说，学习要和本身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工厂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厂中的熟练的模范工人；在农村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农村中的有知识的模范农民；在部队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模范战士或战斗英雄；在学校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学校中有思想的模范学生；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本工作岗位上的模范工作者。总结起来说，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

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青年团的工作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偏向的。为着今后青年团工作及青年运动能够顺利地发展，对于青年运动中几个历史上的偏向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恰当的看法，以免许多同志不能勇敢放手地去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障碍青年运动的发展。对于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盗妇和青年救国会时期的青年工作，应当估计为在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成绩的。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从一九二〇年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样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周刊，在中国学生知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在的青年党）作思想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在各种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和北伐战争中，以及在广东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但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的偏向。后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这种偏向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之下曾有过某种程度上的发展。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中，青年团在分配土地、查田运动、建立政权、组织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动员青年参军、发展教育，以及在军队中，仍然是进

行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战以后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在坚持敌后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上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及各解放区青年救国会的活动，大量青年学生、青年工人的下乡工作，也都是轰轰烈烈地发展着，有过优良的成绩。以后有些地方的青年组织，因不善于使青年运动与整个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相结合，过分地强调了青年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一种单独去搞青年自己一套的闹独立性的偏向，这是错误的，但是这种偏向为时不久就受到了纠正。

这就是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代（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和青年救国会时代（抗日时期）大略的实际情况。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不管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或是抗日时期的青年组织，都是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如果不估计到这点，那是不对的。我们承认在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及青年救国会时期的青年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先锋主义”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我们吸取这些教训，并防止在今后的青年运动中重犯这类错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且片面地夸大过去青年运动中产生过的错误偏向，因而否定过去青年运动的重大成就，那就必然会做出不合乎历史事实的错误结论，且将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再没有建立任何青年团的必要了，似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没有什么好处。这类思想如不加以澄清，则将成为创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大障碍。

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教育、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分子，并提高一部分较为落后的分子，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参加解放军和支援战争，参加工业、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力量。目前的重要问题，根本不是惧怕青年先锋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问题，因为青年团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手一些，让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大胆地去进行建团的工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多加以指导和帮助。在现在中国共产党有着这样强大而普遍的组织，有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自己的领袖；而青年运动本身也有了丰富的经验，有了犯“先锋主义”、“闹独立性”（应称为青年主义倾向更为恰当，以免与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独立性相混淆）偏向的历史教训，应当是比较不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的。自然，对这些历史上的错误偏向，应当时常警惕，当它出现的时候必须适当地加以纠正，使青年运动走向正确的轨道。但绝不应当因为怕重复错误，就连青年团的组织也不去建立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要犯错误。同时，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先锋主义是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去代替党的领导，这种偏向我们应当反对。对于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青年主义偏向），也应加以清楚的区别。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我们必需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青年运动按照伟大的

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需要正确地迅速地前进。

当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快要在全中国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建立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这件事是十分的关心和重视，全中国的青年们也都在集中注视这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经过与结果。我们相信在这次大会以后，全国青年运动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青年积极性也会因此而更为提高，使我们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斗争，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长期建设事业中，会获得从青年方面所来的更大力量的帮助。这是中国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

纪念《中国青年》 创刊二十七周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国青年》由创刊到现在，已有二十七年。在这里，我们不禁回忆起北伐战争时期中，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战斗精神。那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革命先烈恽代英同志正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这个刊物传播着马列主义思想，组织青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青年》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及一部分青年工人所喜爱的刊物，在它的鼓舞教育下，千百万青年投入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又在延安复刊，成为当时指导青年运动、帮助青年学习的有力刊物。

现在的《中国青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是继承过去《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并发动他们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任务。由于《中国青年》

* 本文刊载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五十期和当天的《人民日报》。

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和青年团同志们的努力工作，已使它在青年当中发生了良好的影响。

办好《中国青年》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刊物，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

为了更进一步办好这样一个刊物，《中国青年》应该继承发扬过去历史上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大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青年》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

注释

- 1 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即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七月 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提出 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并强调 各国青年团要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特别是学习研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 民族问题、工农关系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第 1 页。
- 2 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 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决议的精神，总结了团的二大以后的工作，通过了宣传、组织、团 的教育和经济斗争等决议案。大会提出“学习列宁主义”、“获得青 年群众”等口号，强调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迎接革命高潮 的到来。大会修改了团的章程，选举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 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 1、14、 19、26 页。
- 3 第二国际是继第一国际之后各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 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 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 第二国际分裂为左、中、右三派，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 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 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 争，第二国际陷于破产。——第 2、33 页。
- 4 郭指郭秉文，当时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胡指胡敦复，当时任上海大同 大学校长。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免去郭秉文的东南 大学校长职务，任命胡敦复为东南大学校长。这一人事更迭，反映了军 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东南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不了解这一 政治背景，也介入了这场斗争，一部分反郭拥胡，另一部分反胡拥郭， 相持了几个月，后由蒋维乔代理东南大学校长。——第 2 页。

- 5 布列斯特媾和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今苏联西部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在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战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第3页。

- 6 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它标榜“国家至上”，主张放弃阶级斗争，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些国家主义者还鼓吹“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组织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出版《醒狮》周报等刊物，鼓吹国家主义，进行反苏反共活动。该党起初依附于旧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逐渐向国民党靠拢。但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下，也曾受到排挤。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参加民主运动，并于一九四一年参加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与国民党达成合作反共协议，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后又参加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第3、8、179、489页。

- 7 五卅惨杀即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口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在公共租界进行示威，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这一暴行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 广大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 5、15、19、27、483 页。
- 8 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为了进一步搜刮上海人民和箝制舆论自由，上海工部局从一九二一年起相继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这三项提案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虽年年提出，也年年遭到反对。一九二五年工部局计划在六月二日的所谓纳税外人特别会上通过这些提案，其中码头捐一项，比原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上海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成为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第 7 页。
- 9 全国劳动大会指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决议案，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当选为全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 12 页。
- 10 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是“中学”，因此这个通告中称团组织为“本校”，称团员为“同学”——第 14 页。
- 11 CP 是英文 Communist Party 的缩写，意为共产党。——第 15、20、30、46、57 页。
- 12 “废约”指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此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一个主要口号。——第 16 页。
- 13 “反奉”指反对奉系军阀。五卅惨案引起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了当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奉系军阀的镇压。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许多地方发起了打倒奉系军阀的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第 16 页。

- 14 指一九二五年十月至十一月间的浙奉战争。一九二五年八月，奉系军阀势力由山东扩大到安徽、江苏，加剧了同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矛盾。同年十月，孙传芳出兵五路向奉军进攻，奉军在东南地区的势力迅速瓦解，于十…月从江苏、安徽退回山东。——第 17 页。
- 15 总校教务处，这里是当时共青团中央局的代号。——第 17 页。
- 16 大学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代号。——第 17 页。
- 17 曹、吴失败指以曹錕、吴佩孚为首领的直系军阀在一九二四年九月至十一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战败。——第 19 页。
- 18 广州政府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通常称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原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制的军政府于七月一日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第 19 页。
- 19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并曾一度把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南。一九二五年秋冬间，相继发生了浙奉战争和奉系将领郭松龄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倒奉事件，奉系军阀失掉了江苏、安徽、直隶等地盘，其精锐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春，奉系军阀虽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擒杀郭松龄，打败国民军，但实力已逐渐衰弱。——第 19 页。
- 20 CY 是英文 Communist Youth League 的缩写，意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第 19、30、32 页。
- 21 劳动童子团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少年儿童组织。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儿童运动决议案》，提出采用劳动童子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儿童运动，随后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城市及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村先后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的组织。——第 23 页。

- 22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和少共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决议虽然指出要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实际上主要是指领导工农运动,而反对共产党向国民党争取革命的实际领导权,认为共产党“应当组织(国民党)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妄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决议也没有提出党争取对军队和政府的领导权问题。这个决议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有着重要影响。——第 25 页。
- 2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已造成严重恶果,中国革命正处在紧急关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和《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争取领导权。但是,大会对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主要问题,即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都没有提出切合当时实际的解决办法。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 25、30、42 页。
- 24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和蒋介石相呼应,在北京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四月二十八日,绞死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李大钊(字守常)、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勳、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二十人。——第 25 页。
- 25 张作霖(一八七五至一九二八),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任

- 安国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李大钊等二十人。——第 25 页
- 26 张宗昌（一八八三至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奉系军阀。一九二六年底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初调集直鲁联军分两路南下援助孙传芳。同年三月，直鲁联军在上海屠杀大批工人、学生。——第 25 页。
- 27 李济深（一八八五至一九五九），广西苍梧人。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发动广州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第 25 页。
- 28 国际代表的报告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对《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的草案内容所作的说明；国际决议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公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第 30 页。
- 29 罗易（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四），印度人。一九二七年初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回苏联。——第 30 页。
- 30 鲍罗廷（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一），苏联人。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回国。——第 30、43 页。
- 31 唐指唐生智（一八八九至一九七〇），湖南东安人。一九二六年响应和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四月任国民革命

- 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叛变，唐也与共产党分离。十月间和南京方面发生战争。失败后通电下野，前往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第 30、44 页。
- 32 汪指汪精卫（一八八三至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底因与控制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有矛盾，出走法国。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第 30、42、175、220 页。
- 33 孙科（一八九 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年七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第 31、175 页。
- 34 劳动大会指一九二七年六月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问题，通过了政治报告及组织问题、经济斗争等十多个决议案，选出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苏兆征当选为委员长。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够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第 31 页。
- 35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也由动摇逐步转向反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等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一再妥协退让，不准工农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他们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枪支弹药交给国民党。——第 31 页。
- 36 老头子指陈独秀。——第 31 页。

- 37 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任弼时在本文中沿用了当时的提法。——第 38 页。
- 38 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新的译文是：“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5 页）。——第 38 页。
- 39 参见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无产青年》杂志刊载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主张和言论的一致》一文。——第 40 页。
- 40 马变即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口，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第 42、241 页。
- 41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全文共十一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政府，因此“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减少政局的纠纷，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可以“请假”；工农等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等。这是一个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第 42 页。
- 42 国际训令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发动农民从下面夺取土地；要求改选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面去；要求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

编成几个新军;要求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去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的反动军官。指示虽然反映了共产国际以为汪精卫集团仍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幻想,但是,关于发动农民夺取地主土地和组织共产党员指挥的新军这两条,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陈独秀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由,不加区别地对五月紧急指示采取了拒绝的态度。——第 43 页。

- 43 独秀即陈独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足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 44、489 页。
- 44 谭延闿(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湖南茶陵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同年七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第 44 页。
- 45 朱培德(一八八九至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马口争变后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分共”活动,在江西压迫工农运动,并将不少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礼送出境”。——第 45 页。
- 46 张发奎(一八九六至一九八〇),广东始兴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年七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没有立即参与“分共”活动,并曾向共

产国际代表加伦表示要率他所属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南下返回广东（广东当时为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李济深所把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45. 166页。

- 47 叶挺（一八九六一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同年八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被蒋介石扣押，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狱，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第45、198、212页。
- 48 罗亦农（一九〇二至一九二八），湖南湘潭人。一九二〇年八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二八年四月，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第46页。
- 49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军。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进攻济南并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事件，也称济南惨案。同年十月双方正式进行谈判，一九二九年三月达成的协议，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责一笔勾销，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屈膝妥协的本质。——第46、61页。
- 50 黄色工会原指资本主义国家被资产阶级所收买和控制的工会。一八八七年，法国蒙索明市的一个工厂主收买工贼组织假工会，用以破坏工人罢工。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加以裱糊，因而被称为黄色工会。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亦被称为黄色工会。——第54页。

- 5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各级工会组织被解散。当时上海工人运动受党内“左”的错误影响，不懂得采取合法斗争、打入黄色工会的策略，一些干部拒绝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工作，一味要求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发动城市武装暴动。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党在工会工作中的“左”的倾向，工人群众对参加赤色工会有重重顾虑，因而赤色工会得不到多大发展。一九二八年初，上海工人经济斗争兴起，黄色工会乘机在工人中大肆进行诱骗活动，而赤色工会的活动阵地则越来越小，逐步脱离了广大群众。——第 54 页。
- 52 奉系军阀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今辽宁省）籍军阀集团。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以后，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下，奉系军阀势力退回关外。——第 59 页。
- 53 国民党政府在“北伐”张作霖取得胜利后，为了树立对外“自主”的形象，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六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对外宣言，提出了重订新约的要求。七月七口外交部又发表宣言称：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废除原约，另订新约；尚未满期者，通过外交手续解除原约，重订新约；其旧约业已满期，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另订临时办法。这一外交活动，是在承认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主要对其中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两项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新关税条约规定的最高税率仍与一九二六年关税会议议定的税率相同，因而“关税自主”实际是一句空话；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从一开始就遭到日本等国的反对，后来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但毫无结果，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也就不了了之。——第 61 页。
- 54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副题为“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一一第 66 页。
- 55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大以前》，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33 页）。——第 66 页。

- 56 这里指国民党政府军一九二八年进行的“北伐”。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葬送了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事业。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军向奉系军阀用兵“北伐”。六月，奉系军阀势力退到关外，国民党政府军占领京津，战争结束。——第 68 页。
- 57 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和《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第 68 页。
- 58 赤少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建立的赤卫队（简称赤队）和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的统称。赤队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先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第 72、83、111 页。
- 59 蓝衫团原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中组建的小型剧团，以工人身着蓝布短衫而得名。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瑞金的工农剧社总社下设立的剧团也称蓝衫团。这里泛指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剧团一类文艺团体。——第 77 页。
- 60 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文件《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第 80 页。
- 61 一九三四年八月，原在湘赣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下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十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在黔东的印江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二十六日在四川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庆祝大会，随后，红三军

- 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同 红六军团一起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 82. 92 页。
- 62 朱疤子指当时湖南省慈利一带的反动团防头子朱际凯。——第 82、94 页。
- 63 辰州即今湖南省沅陵。 一第 82. 98 页。
- 64 何键（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六），湖南醴陵人，湖南地方军阀。自一九二九年起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二月任国民党政府“剿匪”军第一路司令，指挥对红二方面军的“围剿”。——第 83. 113 页。
- 65 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初，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省，位置在红二、红六军团活动地区以西，所以文中称之为西方军。第 83、94 页。
- 66 第五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向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 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先后退 出原来所在的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 84、94、97、247、351 页。
- 67 郭亮，这里指郭亮县，是湘鄂川黔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底为纪念烈士郭亮而设置的，辖今湖南永顺县东北部地区。红军长征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后， 此建制不复存在。郭亮（一九〇一至一九二八），湖南长沙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任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第 85 页。
- 68 周矮子名周燮卿，是国民党政府军驻湖南部队的一个旅长。——第 90、

- 94 页。
- 6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红军连队及一些政府机关都设立了列宁室，作为组织干部群众及红军指战员学习革命理论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园地。——第 95 页。
- 70 十人团是当时红二、红六军团中秘密的群众保卫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保卫部门反奸反叛逃。——第 96 页。
- 71 岳州即今湖南省岳阳市。——第 98 页。
- 72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第 100 页。
- 73 施南即今湖北省恩施。——第 107 页。
- 74 西康，旧省名。所属昌都地区在一九五。年十月解放后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同年十月，西康省正式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第 115 页。
- 75 大定即今贵州省大方县。——第 115 页。
- 76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同年五月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第 116 页。
- 77 宝庆即今湖南省邵阳市。——第 120 页。
- 78 晃县即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第 121 页。
- 79 引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致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

- 应的电报。——第 122 页。
- 80 平越即今贵州省福泉县。——第 122 页。
- 81 引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朱德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 123 页。
- 82 引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 123 页。
- 83 引自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朱德、张国焘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 124 页。
- 84 黑章即今贵州省赫章县。——第 125 页。
- 85 永北即今云南省永胜县。——第 127 页。
- 86 迤西，旧道名，治所在今云南省大理。——第 127 页。
- 87 理化即今四川省理塘县。——第 128 页。
- 88 巴安即今四川省巴塘县。——第 128 页。
- 89 德荣即今四川省得荣县。——第 128 页。
- 90 定乡即今四川省乡城县。——第 128 页。
- 91 瞻化即今四川省新龙县。——第 128 页。
- 92 洛甫即张闻天（一九〇〇至一九七六），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一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第 132、355 页。

- 93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度、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 132、176 页。
- 94 大陆政策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大陆，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政策。一九二七年六七年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据中外报刊揭载，日本首相山本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写了一个呈送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这个计划彻底破产。——第 133 页。
- 95 国民党三中全会指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对日本的态度。会议虽然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但是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中共中央同年二月十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所提出的国共合作条件比较接近。——第 133、177 页。
- 96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

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第 134 页。

- 97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处于服从地位。因中日矛盾尖锐，使得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取消苏维埃，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理由。——第 134 页。
- 98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为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隘口，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第 136、189 页。
- 99 忻口位于山西省忻县北部，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忻口抗战是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初中国军队为保卫太原在忻口地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第 139J90 页。
- 100 崞县，山西省旧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原平县崞阳镇。一第 140 页。
- 101 郝指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军军长。刘指刘家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第 141 页。
- 102 卫立煌（一八九七至一九六〇），安徽合肥人。一九三七年十月忻口战役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十一月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 141 页。

- 103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政权。——第 143 页。
- 104 阎百川即阎锡山（一八八三至一九六〇），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 144、166 页。
- 105 抗战初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发布过一些进步政令，如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优待军人家属、组织民众等。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同志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雁北、绥远、察南战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口活动。战动总会的主任委员是续范亭。——第 144 页。
- 106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于十二月十四日扶植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冀、晋、豫、鲁四省及平津两市的伪政权。一九四〇年三月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第 150 页。
- 107 佛朗哥（一八九二—一九七五），西班牙独裁者。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并成立共和国政府后，他被改任加那利群岛驻军司令。同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进攻首都马德里，受到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长达两年多的坚决抵抗。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得政权，自任国家元首、首相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第 153 页。
- 108 这里指佛朗哥武装叛乱时，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所控制的西班牙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国土面积，而不是指西班牙全境。——第 153 页。

- 109 斯特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至一九七〇），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九三六年曾访问西班牙。从一九二五年起，多次访问中国，向世界人民热情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业绩。一九五八年来华定居，一九七〇年在北京逝世。——第 155 页。
- 110 日俄战争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日本的战斗力也消耗殆尽。在美国调停下，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两国订立《朴次茅斯和约》，宣告战争结束。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第 160 页。
- 111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卢沟桥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奇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 164 页。
- 112 上海战争，这里指八一三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平津后，于八月十三日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十一月中国守军被迫撤退，上海为日军占领。——第 165 页。
- 113 宋哲元（一八八五至一九四〇），山东乐陵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是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第 165 页。
- 114 程潜（一八八二至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二月兼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 166 页。
- 115 李宗仁（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第 166 页。

- 116 白崇禧（一八九三至一九六六），广西桂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第 166、216 页。
- 117 陈诚（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浙江青田人。一九三七年八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 166 页。
- 118 韩复榘（一八九。九三八），河北霸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国土。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第 167 页。
- 119 中英（一八四〇年）战争指一八四〇年英国为了大量倾销鸦片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又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英国侵略军先后攻占定海、厦门、宁波、上海等沿海城市。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军舰船侵入南京江面，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战争指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英国和法国为继续扩大鸦片战争的侵略权益，在沙俄、美国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都市，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美国和沙俄也乘机在中国攫取权益。清政府屈从英、法、俄、美四国压力，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再一次受到严重损害。中法（一八八四年）战争指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受到冯子材等率领的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怯懦，先后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和中法新约，使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达到了打开中国西南边省门户，扩大侵华权益的目的。中日（一八九四年）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又称甲午战争。在战争中，中国方面在陆战和海战中都遭到失败，大连、旅顺及辽东半岛相继陷落，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八九五年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

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八国联军（一九〇〇年）战争指一九〇〇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发动的侵华战争。在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中日（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战争指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中国东北和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进攻沈阳，而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一九三二年一月全部撤退到关内，使东北全境沦陷。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又武装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抵抗，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三月初日军大量增兵，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第 167 页。

- 120 《紧急治罪法》指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中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画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第 168 页。
- 121 人民政治参议院指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决议设置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成立初期，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一定作用。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第 168、223、225 页。
- 122 两马指马步芳、马鸿逵。马步芳（一九〇三至一九七五），甘肃临夏人，青海军阀。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二军军长、青海

省政府主席等职。马鸿逵（一八九二至一九七〇），甘肃临夏人，宁夏军阀。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宁夏省政府主席等职。——第168、219页。

- 123 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峰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第十（矾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矾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170页。
- 124 政学系是对一九一六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该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也被称为“新政学系”。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张群，一八八九年生，四川华阳（今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175页。
- 125 何应钦，一八九〇年生，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第175、216页。
- 126 罗卓英（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一），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八军军长。卫立煌，参见本书注〔102〕。胡宗南（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一九四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一九〇〇至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一八九三年生，河北雄县人。

-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 175、216、219、434 页。
- 127 于学忠（一八九〇至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原东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刘建绪（一八九二至一九七八），湖南醴陵人，原湘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杨虎城（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次年六月被迫“出洋考察”，十一月回国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第 175 页。
- 128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兼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冬，被蒋介石解除指挥军队作战的职务。于右任（一八七九至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院院长。张继（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七），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邵力子（一八八二至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九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 175 页。
- 129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同意该报出版，但对筹备工作百般刁难。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正式创刊，数日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指使特务到报社印刷部寻衅闹事，捣毁机房，企图破坏报纸正常发行。由于报社全体同志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和发行。——第 177 页。
- 130 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

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等文件。王明在报告中，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否定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第 177 页。

- 131 王明（一九。四 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年十一月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第 177 页。
- 132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第 177 页。
- 133 中国党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 案和军事工作草案，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推翻地主 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并指出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次会议还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足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第 178 页。

- 134 十二月宣言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对时局宣言》。这个宣言屈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散布了右倾投降主义论调。——第 179 页。
- 135 两党委员会即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等在武汉与蒋介石会谈时协商成立的。委员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刘健群、康泽组成。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两党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取得积极成果。——第 179 页。
- 136 第三党即一九三〇年由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九三五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七年改称农工民主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 179 页。
- 137 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一九三四年成立。其主要成员是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该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改良现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赞成国共合作，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八月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民主社会党。同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第 179 页。
- 138 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肖制。一九〇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

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 180 页。

- 139 庐山军官训练班即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训练围攻红军的嫡系军官，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近攻红军的战术。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地方军阀的控制。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后，该团训练中止。——第 180, 214 页。
- 140 希特勒（一八八九至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来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德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第 181、383 页。
- 141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第 181 页。
- 142 复兴社即中华民族复兴社，是蒋介石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为维护其反革命独裁统治而设立的法西斯秘密组织。一九三二年春成立。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该社绝大多数成员转为公开的三青团员，复兴社宣告解散。——第 182 页。
- 143 党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第 182、257 页。
- 144 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就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党专政”论发表的答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谈话全文刊载于一九三八

- 年二月十一日《新华日报》。——第 183 页。
- 145 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97 页）。——第 183 页。
- 146 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酝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各党派合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后来没有成立。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这个组织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并入国民党。——第 183、214、406、431、462 页。
- 147 国民党临时大会指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对推动抗战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仍然继续坚持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党独裁”的国家制度。——第 184、208 页。
- 148 陈立夫，一九〇〇年生，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一九〇四至一九四一），浙江温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康泽（一九〇四至一九六七），四川安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曾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刘健群（一九〇二至一九七二），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第 184 页。
- 149 法国人民阵线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法国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者有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一九三六年五月，法国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六月组成第一届政府（法国共产党未参加）。在政府中执政的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领导人，先后背叛了人民阵线对内保障工农利益、对外实行集体安全的纲领。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人民阵线开始分裂，逐渐失去作用。——第 194 页。
- 150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召开的中共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讨论了关于召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问题。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这次大会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 205 页。

- 151 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并通过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同时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第 208 页。
- 152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 212, 225, 241 页。
- 153 中共六中全会即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着重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的部署。全会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和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几个文件。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第 213、241、254、358 页。

- 154 引自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第 213 页。
- 155 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指《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扩大侵略战争而缔结的公开的侵略性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力”；德国和意大利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力”；三国在战争中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第 215 页。
- 156 顾祝同（一八九三至一九八七），江苏涟水人。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一八九五至一九六九），山东商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院南事变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是围攻新四军的直接指挥者。——第 217 页。
- 157 指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国民政府纪念周”的讲话《整饬军纪加强抗战》。他在讲话中把在皖南围歼新四军说成是为“整肃军纪”，“制裁违抗命令、危害抗战的军队”，企图以此混淆视听，推卸其破坏抗战的责任。——第 218 页。
- 158 李仙洲，一八九四年生，山东齐河人。院南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四七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六〇年被特赦释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李品仙（一八九二至一九八七），广西苍梧人。皖南事变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第 219 页。
- 159 傅作义（一八九五 九七四），山西临猗人。皖南事变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第 219 页。

- 160 宋庆龄（一八九三至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一八七八至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三〇年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宣布辞去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一九三七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柳亚子（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他们一月十二日、十八日两次联名致蒋介石，严厉谴责其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第 219 页。
- 161 指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就皖南事变问题在致国民参政会公函中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内容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第 223 页。
- 162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协定，正式结成军事侵略集团。参见本书注（155）。——第 225 页。
- 163 参见本书第 217 页。——第 225 页。
- 164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第 227、239、248、259、294、343、357、387、433 页。
- 165 党的十二月指示指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及国民党所采取的一

- 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采取的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策略原则以及包括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政策，以纠正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这个指示的后一部分内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第 228 页。
- 166 陈正人（一九〇七至一九七二），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 230 页。
- 167 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新的译文是：“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12 页）。——第 234 页。
- 168 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新的译文是：“党只有当自己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把它引向一个总的目标”（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60 页）。——第 235 页。
- 169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新的译文是：“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3 页）。——第 236 页。
- 170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 238 页。
- 171 张国秦（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

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 240、250、269、275、459 页。

- 172 立三路线指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领导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 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 241、275、354 页。
- 173 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第 241、275 页。

- 174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出。——第 241 页。
- 175 这里指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两个报告。——第 244 页。
- 176 整风学习运动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 245、301、393、431 页。
- 177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第 247、351 页。
- 178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以及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等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代表十九路军与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这一事件被称为福建事变。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兵力压迫下失败。——第 247 页。
- 179 “九一决定”即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针对各抗日根据地由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造成的党政军民关系中的一些不协调现象，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

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时也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间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第 256 页。

- 180 “五一施政纲领”指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于同年一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厉行廉洁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实行自由贸易，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等二十一条。这个纲领对进一步巩固边区，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第 260 页。
- 181 三边，原是陕北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统称，这里是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当时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县。——第 266. 325 页。
- 182 法币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止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为它是法定的全国统…流通的货币，故简称法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边区不再设银行、发行货币，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迫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同时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第 270、287、303、318、476 页。
- 183 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一九六〇），湖南临澧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 273 页。
- 184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一九一六年率领农民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枝建立了武装。后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

指挥、湘西靖国军团长、四川陆军旅长、建国川军师长、湖南澧州镇守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去湘鄂西地区组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曾任红二军团总指挥。一九三四年率部去贵州东部与红六军团会合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率部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任晋西北军区（后改称晋绥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二年六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一一第 273, 275 页。

- 185 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而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一第 275 页。
- 186 参见本书《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一文。——第 275 页。
- 187 三光政策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第 278 页。
- 188 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新的译文是：“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

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6页）。——第279页。

- 189 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部袭击了陕甘宁边区的正宁、宁县、镇原等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朱怀冰等部袭击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自卫原则下也行反击，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军事进攻。第二次反共高潮即院南事变，参见本书注〔152〕。——第281页。
- 190 参见本书《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一文题解。——第282, 306页。
- 191 固临，陕西省旧县名。一九四八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今延长县和延安市。——第286页。
- 192 见斯大林《论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新的译文是：“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第一，必须正确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决定问题，就非考虑到群众底经验不可，群众是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底结果的。第二，必须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而要作到这点，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必须组织检查对这种决定的执行程度，而要作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底直接帮助不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单行本，第56-57页）。——第288页。
- 193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后迁到延安务农。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在大生产运动中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第290、396、411、428页。
- 194 见斯大林《论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新的译文是：“其所以需要，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识别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底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底优点和缺点”（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单行本，第49页）。——第291页。

- 195 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新的译文是：“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8 页）。——第 291 页。
- 196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的译文是：“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3 页）。——第 297 页。
- 197 高岗（一九〇五至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第 297 页。
- 198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748 页第 302 页）。
- 199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着重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个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 302 页。
- 200 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第 303. 318 页。
- 201 屯田是自汉代开始的历代政府利用士兵在驻地或招募农民在一定地区开垦荒废田地的措施。抗日战争时期，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驻守边区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贯彻“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方针，一些部队的给养从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第 306 页。

- 202 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其第一章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第 307 页。
- 203 旧时，陕西关中地区把那些由土地不足的贫苦农民结合起来集体出雇，为别人耕种以取得工资的组织称之为唐将班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口根据地，唐将班子是一种劳动互助的组织形式。——第 312 页。
- 204 劳动英雄大会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和交流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奖励了劳动英雄。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号召发展劳动互助组织。这次会议对边区发展生产，克服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 313 页。
- 205 这是当时曾经用过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一九四四年三月，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就要有新式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也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指出，这个概念，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所以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第 313 页。
- 206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越来越偏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偏低，两者好像剪刀张开形状，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状价格差距，简称剪刀差。——第 322 页。

- 207 引自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没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 344 页。
- 208 见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新的译文是：“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优秀的，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也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虽然不是四十座金字塔，也是四十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凝视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他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24 -625 页）。——第 347 页。
- 209 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主持开幕典礼并讲话。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第 349. 382 页。
- 210 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 350 页。
- 211 参见本书注〔178〕。——第 351 页。
- 212 谭余保（一八九九至一九八〇），湖南茶陵人。一九三三年春任湘赣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七月起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游击司令部政委。——第 353 页。

213 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愕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第 353 页。

214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中共湘东南特委由于还未得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继续执行着立三路线，成立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决定依靠湘东独立师及各县地方武装力量，在湘东南举行总暴动。从当年十一月到次年二月，先后组织了攸县、永兴等地的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了损失。一九三一年二月中派代表到湘东南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这一“左”倾冒险行动遂即停止。——第 354 页。

215 吉安位于江西西部，是敌人的军事重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驻有重兵，是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攻打吉安。一九三〇年二月至八月期间，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了八次攻打吉安的作战行动（其中第一次是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的）。由于吉安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加之敌情不明，缺乏主力的配合和必要的攻坚能力，因而八次都未能攻下。——第 354 页。

216 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 354 页。

217 三中全会指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

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对立三路线表现了调和妥协的精神，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第 355 页。

- 218 这是当时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第 355 页。
- 219 恩来即周恩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第 355 页。
- 220 博古即秦邦宪（一九〇七至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一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仍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第 355 页。
- 221 项英（一八九八至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四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第 355 页。
- 222 五月决议案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接受了临时中央不正确的批评，承认对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提出了苏区党要“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中心城市——灏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要求。——第 355 页。

- 223 罗明（一九〇一至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第 356 页。
- 224 邓指邓小平，一九〇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〇五至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维俊（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一九〇六至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第 356 页。
- 225 刘士杰，原任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负责职工部工作。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叛变投敌。——第 356 页。
- 226 王震，一九〇八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一九四四年十月，任南下支队司令员，与支队政治委员王首道一起率部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创建了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第 357、377 页。
- 227 张启龙（一九〇〇至一九八七），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三三年夏历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常务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军区总指挥等职。——第 357 页。
- 228 第一次全苏大会即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

- 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代表六百余人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被执委会选举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第 357 页。
- 229 王首道，一九〇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一九四四年十月，任南下支队政治委员，与支队司令员王震一起率部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创建了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第 358. 377 页。
- 230 甘泗淇（一九.三 九六四），湖南宁乡人。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历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军区政治委员、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等职。——第 358 页。
- 231 夏曦（一九〇一至一九三六），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三月被派往洪湖苏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贯彻执行了“左”的肃反政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撤销领导职务，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第 358 页。
- 232 袁德生（一八九四 九三三），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一九三三年在肃反中被杀害。——第 360 页。
- 233 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碧市总结工农革命军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红军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第 361 页。
- 234 指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的西征。参见本书注〔61〕。——第 361 页。

- 235 谭思聪（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二），湖南茶陵人。一九三〇年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东独立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在战斗中牺牲。——第 362 页。
- 236 谭家述，一九〇九年生，湖南茶陵人。一九三〇年任湘东独立师第三团团团长，一九三四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二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第 362 页。
- 237 李天柱（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师长。一九三二年任湘赣省军区副总指挥、红八军代军长。一九三五年在赣南突围战斗中牺牲。——第 362 页。
- 238 萧克，一九〇八年生，湖南嘉禾人。一九三二年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红八军军长。一九三三年任十七师师长。一九三四年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红六军团军团长等职。——第 362 页。
- 239 蔡会文（一九〇八至一九三六），湖南攸县人。一九三二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红八军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在战斗中牺牲。——第 362 页。
- 240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以主力红十七师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向北行动，破坏敌人的基本运输线—南混路，威胁南昌，吸引赣东敌人重兵，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月，红十七师向南潯路开进，由红十六师掩护破路，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无法达成破路任务。三月下旬，红十七师回到湘赣革命根据地。此次北上，红十七师以及湘赣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削弱。——第 363 页。
- 241 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于次年七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随后与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第 366 页。

- 242 陈洪时，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省军区政委。一九三五年六月叛变投敌。——第 367 页。
- 243 安南即越南。——第 371 页。
- 244 一九二七年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进入湖南南部地区。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起义，相继占领宜章、郴县、永兴、耒阳、资兴等十多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并使工农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结果，在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下，起义部队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四月到达江西宁冈著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第 376 页。
- 245 李先念，一九〇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书记、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第 377 页。
- 246 参见本书注〔264〕。——第 379 页。
- 24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伺机破坏。这种反共策略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第 379 页。
- 248 民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一九四一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今名。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 390、434 页。

- 249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口木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以五六万人的兵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政府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约四十万人，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国民党政府军损失兵力近三十万人。——第 390 页。
- 250 三次“左”倾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祖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 393 页。
- 251 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393 页。
- 252 青年救国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提出《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制订《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要求各地建立多种多样的青年救亡团体，并在会上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第 402、484 页。
- 253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 404、474、493 页。
- 254 共青团这里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其前身为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广大青年一致抗日，决定改造共青团，使它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建立了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取代了共青团。——第 406、489、493 页。

255 陶行知（一八九一至一九四六），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一九二三年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一九二六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次年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称晓庄学校）。一九三二年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他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还提倡“小先生制”以开展民众教育。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并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这里是强调学习陶行知热心为青少年服务的精神，开展青年团的工作。——第 407 页。

256 这里所说的文电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发出的《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提议指出：

一、九年来全国的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区的青救会、青抗先、青联会等组织在参战参军，文化教育和其他建设根据地工作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党政军民各方长期努力下，解放区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其中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青救会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积极分子的要求，而青年工作也因为缺少积极分子有组织的推动，逐渐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这些经验说明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结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历史的经验也证明，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虽有过若干缺点，但他对于党与军队曾是一个有价值的后备军；在协助党与政府的工作尤其是动员性与改革性的工作中，具有突击作用；在贯彻由下而上的群众工作方法以配合由上而下的行政方法方面，具有加强民主的作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是英勇的支持力量。鉴于这些经验，并鉴于过去共产青年团曾有过的狭隘与第二党作风的错误，和抗战中期青年工作中闹独立性的错误，中央认为，今天应该成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二、新的青年团吸收一切坚决拥护民主并愿为民主事业积极奋斗的男女青年，其年龄约为十五岁至二十三岁。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接受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政治领导，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和政府不能直接命令青年团，但青年团必须遵守政府的法令，实行政府对全体人民的命令和号召，而青年团内的党员，则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青年团应该是解放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忠实助手，而不允许成为他们的对立者和妨碍者。青年团应该在为青年和全体人民而服务的基础上，努力创造适合环境特点与青年兴趣的各种方式方法，灵活而有效的团结广大青年进行下列三项基本工作：

第一，在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中事业中组织和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并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估计到今天的战斗情况，军事和半军事的工作应该是主要项目之一。

第二，为广大青年的特殊福利和切身需要服务。

第三，除实际斗争和事业的锻炼与学习外，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工作。

三、青年团的组织暂以解放区为限，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在解放区的军队中是否需要组织，均望各地提出意见，在解放区亦应视各种环境分别研究组织方法，着重在城市学校与人口较集中的村镇中求得发展，首先在较巩固的中心区作起，取得经验去逐步推广。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并应注意下列几点：（1）党应指定青联干部及一批青年党员作为建团的组织基础；（2）先从建立下层组织和工作作起，防止搭架子的铺张形式主义；（3）各级领导机关完全由群众采取民主的方法依次选举产生，在领导机关内部完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废止委派制；（4）工作尽可能的集中于下层，各级干部做到最大限度的不脱离生产。

在青年团普遍成立后，现有的青联会拟转化为各种青年团体的联合大会性质，仍为各地全体青年的代表机构。

四、各局各分局接到此项提议后，望召集会议讨论（吸收青年工作干部参加），总结过去经验，研究此项提议是否可行，有无其他办法，并望择地试验，将研究与试验结果报告中央，以便作最后决定。
——第 107 页。

- 四日写信给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建议对这些同志“实行一种休息制度，以利长期工作。除每年能给以一定时间（如一个月分两次）之休息外”，对少数体弱者“由中央及军委给以特别健康补助费”。信中还强调要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受补助者应确是身体最弱须特加照顾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的同志，并不机械以职位为标准二从那时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二局一直实行休假和健康补助费的制度。——第 410 页。
- 258 中工委原电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对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县以下代表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县以上代表由区县代表间接选举；代表会有权审查政府机关的工作和撤换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负责人等批转了这一指示。——第 411 页。
- 259 土地改革这里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老解放区农村普遍进行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第 413, 438 页。
- 260 土地会议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反对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了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会议对会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第 413 页。
- 261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起草并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施行。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 413、439 页。

- 262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任弼时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作了这个讲话。——第 414 页。
- 263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198 页）。——第 429 页。
- 264 在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这个决定对敌情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在我党的各级机关中混入了大批内奸分子。七月十五日，当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进而提出“特务如麻”，号召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掀起的“抢救运动”，更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发生了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和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及时进行纠正，提出了审干工作应遵循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第 431 页。
- 265 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先后爆发三次规模较大的学生运动。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初全国各地学生为抗议驻华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掀起的反美爱国斗争。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第三次是一九四七年十月至十一月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为导火线掀起的全国规模的反迫害运动。这三次大规模学生运动波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声势浩大，形成了中国人民反蒋反美斗争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第 431 页。
- 266 李鼎铭（一八八一至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一九四一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第 433 页。

- 267 杜斌丞（一八八八—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并于一九四四年筹建和主持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一九四五年十月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一九四七年十月，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第 434 页。
- 268 整党指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在全党普遍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运动。这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规定了整党的任务及适当的步骤和方法。整党在迅速发展起来以后，一度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左”的偏向，采取所谓“搬石头”的办法，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明确规定整党的主要内容为“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指出整党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使整党工作克服了“左”的偏向，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促进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第 438、461 页。
- 269 兴县讲话指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晋绥军区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年五月六日，这个讲话在《晋察冀日报》公开发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第 440 页。
- 270 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工作指示是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第 456 页。
- 271 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指示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曾经毛泽东修改，后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题为《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第 456 页。
- 272 即本篇的两个电报。——第 456 页。

- 273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第 457 页。
- 274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当时的预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政府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上都占优势。结果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第 457 页。
- 275 刘指刘伯承（一八九二至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广一九〇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一凡四七年六月三卜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第 457 页。
- 276 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 459 页。
- 277 陈瑾昆（一八八七至一九五九），湖南常德人，法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第 460 页。
- 278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一九三八年设立，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其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控制着国民党的党务、政权、经济、财税、司法、文化教育部门和某些社会团体。一九四七年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第 462 页。

- 279 军统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一九三八年设立，长期由特务头子戴笠控制。其前身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监视和控制。一九四六年军统局改组，属于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第 462 页。
- 280 七届二中全会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召开。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 464 页。
- 281 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这个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464 页。
- 282 迪化，一九五三年改称乌鲁木齐市。——第 476 页。
- 283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由于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无限制，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发行总额由原规定二十亿元增加到近六十八万亿元，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解放后，各地人民政府陆续用人民币把金圆券兑换收回。——第 476 页。
- 284 辽沈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军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军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国民党政府守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 477 页。

- 285 八项和平条件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28 页）。——第 477 页。
- 286 在任弼时的报告中，此处还有如下一段话：“除开这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于不再参加反动军队来进攻解放军，保持中立，或则站在解放军方面来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可以保持其军队到一定时期再按民主原则来改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消灭最反动的军队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是指的绥远方式，由于当时对绥远方式的政策还不宜公开，因此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这段话未公布。——第 477 页。

- 287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同年九月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友好活动中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第 477 页。
- 288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76 页）。——第 478 页。
- 289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71 页）。——第 478 页。
- 290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368 页）。——第 478 页。
- 2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第 482 页。

- 292 北大西洋公约简称“北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英、法、荷、比、卢、挪、丹、加、冰、意、葡十二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生效。后来希腊、土耳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陆续加入这个公约组织。——第 482 页。
- 293 太平洋公约后来没有签订。但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美国策动英、法、澳、新（西兰）、菲、泰、巴（基斯坦）等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一个“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是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性质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五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第 482 页。
- 29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第 483 页。
- 295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新的译文是：“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景”（《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4 页）。第 483 页。
- 296 见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529 页）。——第 483 页。
- 297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新的译文是：“必须注意，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4 页）。——第 484 页。

- 298 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年），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是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要编委之一。萧楚女（一八九三—一九二七），湖北汉阳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曾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第 489, 493 页。
- 299 参见本书《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一文。——第 489 页。
- 300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不久迅速发展全国和海外一些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合并入青年救国会。——第 490 页。